

纠正 上帝的错误

吴兴人 著

"中国变性手术之父"

何清濂的非常记忆

上海文艺出版社



ISBN 7-5321-2888-1



9 787532 128884 >

定价:22.00 元

吴兴人 著

纠正上帝的错误

"中国变性手术之父"
何清濂的非常记忆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纠正上帝的错误：“中国变性手术之父”何清濂的非常记忆/吴兴人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 8

ISBN 7 - 5321 - 2886 - 5

I. 纠… II. 吴…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6734 号

责任编辑:徐如麒

封面设计:周志武

版式设计:王 嫵

纠正上帝的错误

——“中国变性手术之父”何清濂的非常记忆

吴兴人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l. sta. net. cn

网址: www. slcm. 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交大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2.25 插页 2 字数 267,000

2005年8月第1版 200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100册

ISBN 7 - 5321 - 2888 - 1/I · 2221 定价:22.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 - 54742915

“我是一个临床意义上的易性病患者，我还年轻，我热爱生活，我不能要求一个人永远心与身为敌地生活下去！……是老天搞错了，我本该是个女人。”中国第一个公开亮相的易性病人如此炽烈地表露他要求易性的渴望。

——题记

CONTENT

目录

- 第一章 一个令上帝也感到困惑的问题 / 001**
- “灵魂”对“肉体”的背叛 / 002
 - 何清濂颇为踌躇 / 009
 - 古已有之的易性之想 / 015
 - 中国古代的易性手术——阉割 / 020
 - 美国一名大兵成了红发美女 / 023
 - 马丁诺著书立说 / 028
- 第二章 一种与生俱来的痼疾,一种无法遏制的欲望 / 032**
- 饱含着血和泪的诉说 / 033
 - 他想变性而被开除了党籍 / 038
 - 当了演员仍想易性 / 040
 - 中老年人也并非与易性无缘 / 043
 - 福建最新报告:73岁的陈老汉变成“陈老太” / 044
 - 女性病人的比例也不低 / 048
 - 对马丁诺提供的一份材料的论证 / 053

从扭曲的灵魂到自残的躯体 / 055

变性人的心声：我想做只自由的蝴蝶 / 063

第三章 撩开易性病神秘的面纱 / 069

人类性别只有男女两种吗？ / 070

原发性和继发性 / 072

易性病的生理成因 / 077

易性要求与文化程度高低没有必然联系 / 080

从基因上查找易性病的成因 / 083

亲子关系紊乱的影响 / 086

外部生活环境埋下了“灾难的种子” / 090

外部环境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 / 093

并非再造“人妖” / 096

是否属于同性恋？ / 099

是否精神上出了毛病？ / 107

和异性装扮癖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 112

第四章 拯救被扭曲的灵魂 / 120

妙手回春的前奏 / 121

秦惠英上了手术台 / 123

《文汇报》发表一则独家新闻 / 126

和莫雪文通了十四年信 / 134

何清廉欲罢不能 / 138

关于刘玉的故事 / 140

把他们从绝望中解救出来 / 144

第五章 中国的“马丁诺”在哪里？ / 148

又冒出好几个“马丁诺”式的人物 / 149

何清廉选择了李一妮 / 152

再造阴茎的成功 / 154

女变男, 难度大得多 / 160

“登上手术台之日, 就是我的第二次生日” / 164

第六章 易性之后 / 171

性别变了,工作怎么办? / 171
印度的变性人当上了议员 / 174
泰国的变性人最能得到宽容 / 175
在希望中紧握你的手 / 177
外面的世界并不都精彩 / 184
一位热心人士三处碰壁 / 187
人间自有真情在 / 190
“秦大姐”,您现在还好吗? / 194
变性以后再变美、变声 / 197

第七章 带来了一系列社会、伦理与法律问题 / 201

家庭是否重新接纳? / 202
本人如何融入社会? / 206
婚恋也是一个大问题 / 208
身份证的编码也要修改 / 213
“以后我咋个叫你呢?” / 215

手术费用由谁承担? / 219
一个要求变性的年轻人的思想反复 / 220
人言当然是可畏的 / 222
法律的沉思 / 228
大不可取的做法:以变性人作店招 / 231
“教育那些已经教育过的” / 232
对实施易性手术规定的探讨 / 237
办一家性别外科医院,如何? / 241

第八章 开拓新的人生之路 / 245

从鄙视到宽容 / 246
女变男比男变女的处境要好 / 249
司徒梅英女士建了一家网站 / 254
李小丽在上海开了两家餐馆 / 257
在足尖下跳出一片新天地 / 260
一分为二看“人造美女” / 264

何清濂的最大欣慰 / 266

第九章 看一看世界的新潮流 / 271

旧金山市政府资助公务员做易性手术 / 271

阿根廷 50 岁的“女人”要变男人 / 274

英国也为变性开了绿灯 / 275

印尼的变性人受社会尊崇 / 278

河莉秀在法律上变成了女性 / 281

日本确定 4 月 4 日为变性日 / 283

变性后的运动员可以参加奥运会 / 284

敢吃第一只螃蟹的易性运动员出现了 / 289

尼日利亚国家足球队也遇到了一个难题 / 292

另一道难题：中国变性人能不能竞选“环姐”？ / 294

陈莉莉一展歌喉 / 298

变性人生活也被写进了文学作品 / 299

第十章 莫尼教授为何“无话可说”？ / 302

从两起涉及变性人的刑事案件谈起 / 302

“他残”现象 / 304

又见两位病人状告医院 / 305

再介绍一宗外国变性官司 / 309

庸医之害是终生的 / 311

莫尼教授为何“无话可说”？ / 312

何教授说,上了手术台也可以下来 / 316

变性手术呼唤法治 / 319

何教授开设了一家网站 / 322

第十一章 易性人结婚,怪也不怪? / 324

世界各国的规定不一 / 325

1998年有关部门通知:易性病人结婚的消息今后不要
登了! / 327

2003年中国民政部作出新规定:易性病人可以结婚 / 329

新华社为章琳结婚发了消息 / 331

- “女强人”变成了“男强人” / 334
- “晓晨”的婚礼 / 335
- M 国作家找了一位中国妻子 / 337
- 对阿楠的祝福 / 339
- “何爸”当了两回奇特的“月老” / 341
- 又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 346
- “我做爸爸了!” / 349
- 有没有必要实施“男妈妈工程”? / 352
- 四位护士的爱情故事 / 354
- 性生活是否和谐? / 359

附录:

- 何清濂: 我的手记 / 361
- 秦惠英: 我为什么要做变性手术 / 375

后记 / 378

[一个令上帝也感到困惑的问题]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怎样发展变化的？早在两千多年前《周易》作过一种解释：“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一阴一阳谓之道。”《周易》在另一处又把乾、坤解释为天地，亦为男女：“乾，天也，故称呼父；坤，地也，故称呼母。”这就是说，天与地，日与月，阴与阳，寒与暑，男与女，都是对立的统一，构成了一个相互矛盾，互相依存的世界。《周易》的作者推断出：人类社会，就是在这样一种阴阳交叉，乾道与坤道的互补，男人与女人的结合过程中生成、发展、演化、前进。

这个推断，无疑充满了辩证法的色彩。

关于男人和女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历史，《圣经》记述过一个著名的人类起源的故事，上帝用泥土造人，取名亚当，并以亚当的肋骨造其妻夏娃，同置于伊甸园中，后因两人偷吃禁果，被逐出天国。亚当、夏娃下凡后，子子孙孙，繁衍不息，于是有了这个红尘滚滚的大千世界。

关于《圣经》的上述故事，在17世纪，英国有两位学者，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竟然具体推算出：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上午9时，上帝按照他的旨意创造了男人与女人。虽然此说不可信，但由于约定俗成的缘故，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男性和女性是上帝创造的，他们的性别是不可逆转和移位的。

在人类社会有文字历史记载的数千年之后，有人忽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上帝和我开了一个致命的玩笑，我本来是男孩，却给我塑造了一个女孩的形象。试问：亚当与夏娃的性别

能否互换一下？或者重新做人？

这显然是一个令上帝也感到困惑的问题，一个无法明确答复的问题。

不幸，在有史以来的几百年来，人们反复提出上述问题，甚至以求一逞。

“灵魂”对“肉体”的背叛

——秦惠英写来一封渴望变性的信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一个夏日，上海长征医院整形外科主任何清濂教授，收到了一封寄自苏州的信：

尊敬的何主任：

您好，我是秦惠英，渴望您能为我做一次变性手术。我自去年 12 月停药至今，身体甚感不舒服，想必是内分泌失调所致，常常发热出汗，烦躁不安，全身乏力。我的尿道口非常狭小，完全是单纯性尿道口狭窄症，尿道口的尿流直径才一毫米，尿流不是喷射出来的，而是轻飘飘地流出来的，所以常常感到憋尿。小一次便要比别人多四五倍的时间。据说未婚溢乳是不正常的，但我的双乳不断地溢乳达一个月，虽然量不多，但我总觉得有问题。听说两性人有真假之分，我的情况不知算什么？有几位医生说，我做了变性手术后可以结婚，但不会生育。而且手术要尽快做才好，因为年龄越大越不好办。我今年已 27 岁了，希望自己能尽快地“定性”才好。我已不是个男性，但还不像个女性，您看怎

怎么办呢？我希望能得到您的真诚的帮助，使我早日摆脱痛苦。谢谢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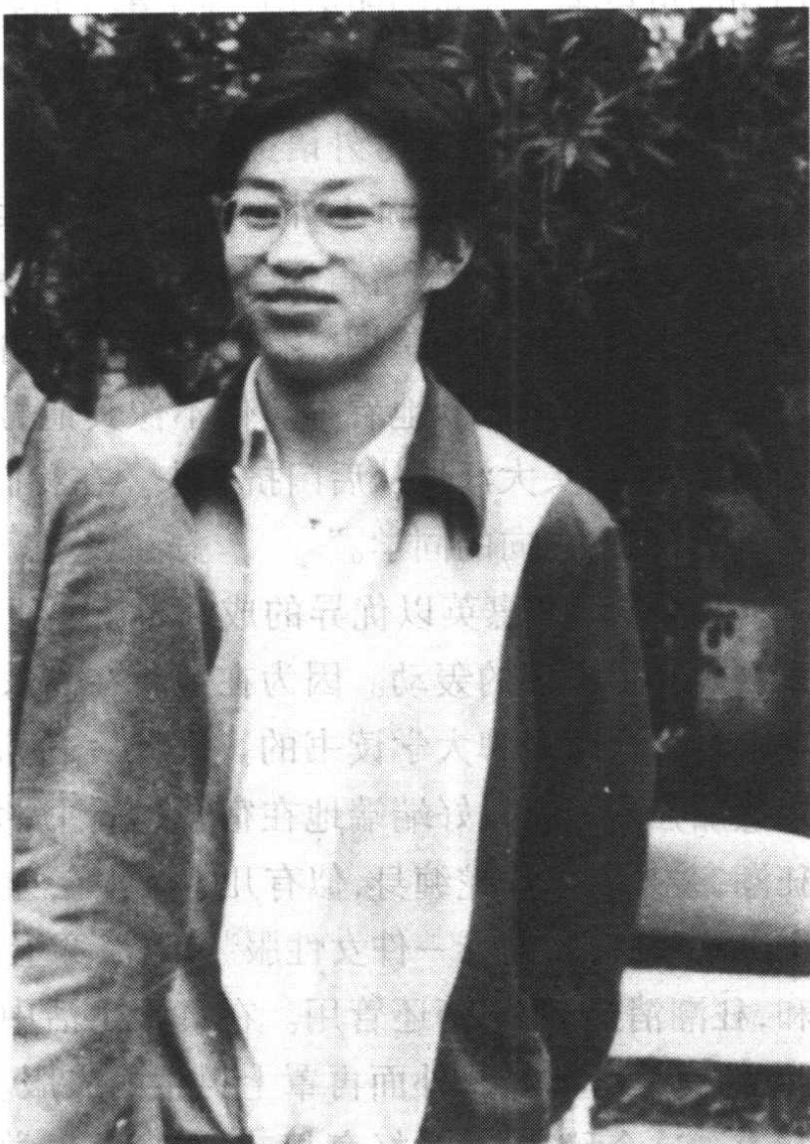
致以

崇高的敬礼

您的病人秦惠英

1990.6.5

患者是一位男性，曾是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的毕业生，1985年毕业后被分配在昆明某学院工作。秦惠英自小发育有点异常，阴茎小，扭曲，睾丸小，左侧比右侧更小。自进入青春期后，渐渐觉得自己的性格变得内向了，时常感到心情烦闷、不适，总觉得有一种朦胧的情结困扰着自己。



复旦大学学生秦惠英在手术前

于是,他不爱与男孩子在一起了,却对女孩子的服装产生好感,常常在梦里穿着女孩子的衣服。只要看到穿着漂漂亮亮的女孩,便心情舒畅、轻松,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暗暗羡慕她们,心想自己要是个女孩子就好了。进入高中后,他经常怀疑自己是否是个女孩,原来文理科成绩都很出色,而到了高二时,就明显地偏爱文科,因为文科班里大多是女孩。据秦惠英高中时的女同学丁蔚文回忆道:“秦惠英在中学时代是一个典型的读书用功的男孩子。在我的印象中,他不善于讲话,也不大到操场上去玩,我甚至不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话。当时我们读的是文科班,文科班里还有几个考外语类的,秦惠英就是其中的一个。教外语的教师姓吴,吴老师上外语课让秦惠英回答问题,答不上或答错了,秦惠英就会脸羞得通红的。他也总喜欢在靠窗的座位旁站着小声地背外语单词。有时我们从自由活动课锻炼回来,还发现他在那里静静地看书。他不像其他男生那么贪玩,上课铃响了,才满头大汗地从后门挤进来。在我们班上,他是一个寡言少语、性格内向的同学。”

1981年,秦惠英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这在家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在他所在的农村里,还很少有人考上复旦这所名牌大学读书的。进校后,他渴望变成女性的欲望愈加强烈。有时好端端地在宿舍里看书,突然心头涌起一阵狂潮,袭来时如白蛇缠身,似有几十条虫在身上爬。这时只有一个办法可解围,即弄一件女性服装来穿,穿上去后便觉得心平气和,狂潮消退,比吃药还管用。在日常生活中,他时常悄悄在里面穿一件女性内衣,外面再罩上男生的衣服。同寝室的同学们都知道了这个秘密,有时好言相劝,秦惠英也觉得十分后悔,自己怎么有这种“恶形恶状”的心理?他开始以为这是一种怪癖,曾

与它作过多次自我斗争,但无效,斗来斗去,往往是想变成一个女人的思想占了上风,她只得再穿一件女性内衣消解。幸而大学里学习生活紧张,而他又是一个学习十分用功的学生,家在农村,供养他上大学也很不容易,他在心里烦躁不安时,便尽量集中注意力上课、看书,甚至连星期天也在校园里看书学习。这样,烦躁心理才稍稍有所压抑。

秦惠英在读大学期间,虽然自觉心理异常,还谈过一次恋爱。这是一个不应遗漏的重要细节,写出来,对医学家们研究易性病的生成与发展,也许有用。他在大学二年级时,曾和一位苏州姑娘相好,秦惠英也是苏州人,彼此吴语软糯,情意绵绵,对方文静、内向、温柔,秦惠英很喜欢她,欣赏着她的美貌,很中意她的身材,曾萌发拥抱、亲吻她的冲动,但终因大学里管束严格,自己也不好意思而未能如愿。进入大学三年级后,这位女同学和一个身材高大的研究生好了,他们心照不宣地分手。要是此次恋爱一直维持下去,秦惠英后来的情况,会不会是另一种格局,人们也未可知。

1985年大学毕业前夕,北京军事科学院指名要秦惠英去报到,但他思忖:一旦穿上军装,就无法再着女装,于是婉言拒绝了军事科学院的盛情,毅然报名到昆明某学院工作。到昆明后,紧张的学习环境和气氛消失了,身心松弛下来,潜伏多年而一直受到压抑的易性念头,像不可遏制的火焰一样在胸中熊熊燃烧。现在有了经济收入,可以尽兴地买些自己钟爱的女性服装。到了云南,秦惠英索性把所有的男装及男性用品全部扔掉,两天内买了许多漂亮的女装及化妆品,刻意打扮自己。他留起了披肩长发,身穿一件女式咖啡色灯心绒西服,内着淡紫色女式圆领毛衣,下穿一条黑色女式紧身健美裤,足登高跟鞋,描眉抹粉,小巧

的身子倚在桌边,两只手像女孩子般交叉放在胸前。总而言之,他处处模拟女性的气质、步履、姿态,一步三摇,姿态妖娆,俨然像个道地的新潮女性。当时从广州中山大学分配来的另一位女同学看见秦惠英这副模样,觉得惊奇万分,而秦惠英却颇为自得地说:“当我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竟然这样漂亮,我高兴得哭了,但同时又想,为什么我是个男的,真是讨厌!”从此,秦惠英完全以女性生活方式行事,喜欢与女同事呆在一起,与男同事则格格不入。秦惠英说:“他们说话的声音太响,我不喜欢;骑自行车速度太快,我也不喜欢;走路格登格登的,我更不喜欢。我的兴趣爱好以及行为举止都与男性不同,总之我喜欢女性的世界。”起先,秦惠英所在的工作单位部门并没有干预他的这一切,认为人各有志,人各有好,穿衣打扮,不必强求一律,他又是从上海的一所重点大学分配来的,对他的行为举止表示既不反对,也没有加以责难。

事态的发展却沿着不幸的方向演进着。1988年12月26日晚上,秦惠英参加了一个舞会,心头突然涌起了一种莫名的冲动,他觉得自己生了这样一个男性生殖器真是一个累赘,留在身上,烦躁不堪,不如去了它吧。他于是匆匆回到宿舍,在一阵心理狂躁之后,竟然拿起一片剃胡子的刀片,沿着阴囊中线狠狠地划了一刀,切掉了自己多年来视为多余的两个睾丸。事后,秦惠英回忆道:“我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真是十分可怕。奇怪的是,当时竟不觉得痛,可能是由于精神高度亢奋的缘故。我一点也没有犹豫或后悔的感觉,心里充满胜利的快感。这完全是自己未曾料到的突发事件。在此之前,我并没有这么干的计划和想法。”秦惠英自残以后,顿时流血不止,猛然袭来的剧痛使他大喊起来,幸亏隔壁的孟老师,奔进屋里,见状大惊,没有一刻的

犹疑,立即用自行车把秦惠英送进一家医院。秦惠英处于昏迷状态。医生给他输了血,经过各方面的诊断表明:秦惠英的病情是一种心理变异的疾病,但不属于精神病,外科医生们为他做了简单的缝合手术,住院8天,付了1000多元医药费后,让秦惠英回家了。

秦惠英此举的损失太大了。他为此丢掉了这份工作。当时学校里有人认为,这种自残是一种“道德败坏”的行为,对纯洁无瑕的学生会产生不良影响,他不能再做教师工作,学院决定不再聘用他。秦惠英于是回到上海。从此,他失去了工作,没有了收入,也没有了人们的资助和关心。在生活上,他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但是,他的变性之想愈加炽烈。虽然工作丢掉了,睾丸切除了,但阴茎仍旧留在身上,秦惠英认为“累赘”仍未“根”除,心情依旧烦躁不堪。

他听说昆明正在举行一个全国精神心理研讨会,有两位瑞士精神、心理专家也出席这次会议。秦惠英便兴冲冲地赶到昆明翠湖宾馆。找到这两位瑞士专家,秦惠英用英语陈述了自己的病情,并向他们请求救治之法。这两位专家听后,双手一摊说,瑞士也有这种情况,但没有办法治疗,有的国家可以做变性手术,但在中国,你们的国情和医疗条件允许吗?兜头浇了一盆冷水,秦惠英郁郁不欢地回到了上海。他听说山东聊城有一家医院能做这种手术,秦惠英赶紧去信联系,该院原本已同意秦惠英去聊城做手术,但临行之前,秦惠英突然接到该院一位医生的来信,劝他暂时不要去。因为做变性手术国内尚无先例。他又找到了上海一家大医院,一位主任医师坦率地告诉秦惠英:“许多事搞不清,所以不敢给你做。”而中山医院的一位医生说得更

坦诚：“这种手术，从技术上讲虽然可行，但在我国的法律中还没有规定，道德上也未必允许，你还是等待一个时期再说吧。”

秦惠英没有灰心，又找到了上海另一家大医院。这家医院也已基本同意为他做易性手术，并住进了病房。但有一件事严重损害了秦惠英的自尊心。医院不相信他的自诉，认为需进一步调查：他的睾丸被割去，究竟是打架所致，还是自残所致。秦惠英一气之下，离开了已住了20多天的这家医院。在此期间，他又几次向上级卫生部门写信，阐述自己的病历以及医生和心理医生的诊断意见，但均无回音。事出无奈，秦惠英只得再次自己操刀了。他在酝酿一项更加令人吃惊的“计划”。他不顾自己经济条件的窘困，花了100多元购买了一套手术器械，并先后研究了《妇科学》、《外科学》、《男性学》、《麻醉学》、《护理学》和《解剖学》。在掌握了一定的医学知识后，他又购置了止血钳等几件外科手术器械，决心把阻碍自己成为女性的“最后障碍”除掉。他为自己设计了七种手术方案，最后经过比较，选定了最保险的一种。

1989年11月的某一天，离他第一次自残正好一年，秦惠英自己动手，为自己做了第二次“手术”，把自己的阴茎切除了。他对人说：“我等不及了，我忍受不了啦，我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减轻痛苦，我已不是男人，但也不是女人，我是连户口簿都无法填写的人啊！”

这次自己动手的切除手术，由于事先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没有引起大出血，但还是到一家医院挂了急诊，诊治的外科医生很不理解这种自残行为，草草为他做了缝合手术，留下了一个很细的尿道，结果，他连排尿也发生了困难。

秦惠英为此感到痛苦不堪。后来，他听说上海长征医院整

形外科主任何清濂教授的医道十分高明,于是,他接连向何教授写了14封信,请何教授救救他。

何清濂面对秦惠英这厚厚一叠来信,陷入了沉思:是不是应该救救他?

何清濂颇为踌躇

何清濂是上海长征医院整形外科主任。长征医院是第二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医德医术,在上海堪称一流。该院人才荟萃,集纳了一批名医。何清濂是该院的佼佼者之一。我第一次见到何清濂,他一身戎装,中等身材,头发虽已略见花白,但目光依旧炯炯有神。戴一副鸽蛋形的老花眼镜,站在手术台边,身手不凡,颇有几分白求恩大夫的风度。他出身于一个革命干部家庭。乃父何炯,是一位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干部,又是一位著名的新闻工作者、诗人,积诗近万首。著有《何炯诗词选》三集。何清濂1928年出生于浙江江山,在家排行老大,曾就读于江山一所有名的小学——中山小学。1945年至1950年在江苏医学院医学系学习,毕业后即到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当一名外科医师,1960年入党。何清濂有一双灵巧的手,掌握一把神奇的刀,被病家尊称为“神刀圣手”。家乡父老一直以出了这样一位名医而自豪。1951年1月,20出头的何清濂在“雄赳赳,气昂昂”的歌声中,跨过了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手术队。在朝鲜战场,他一把炒面、一把雪,爬雪山,涉冰河,日行军六十里,二次通过敌人海空封锁线,在第五次战役反击战中直抵三八线,出色地完成了救治任务,荣获朝鲜军功章。他目睹了许多志愿军战士被凝固汽油弹烧伤,造成脸、颈、手畸形,由此萌发



何清濂荣获的朝鲜军功章

了帮助病人整复形体之想，不料此想萌生，一发而不可收拾。他在外科手术台前度过了 53 个春秋，依然宝刀不老，闻名遐迩。他凭借手中这把不到一百克重的手术刀，解开了数以千万计患者脸上紧锁的愁眉，抚慰了一颗颗忧伤的心，使男儿破镜得以重圆，令石女开花又结良缘。他为许多先天性面部缺陷的病人，如塌鼻、唇裂者雪中送炭，把欢乐带给他们，为许多著名演员整容，延长他们的艺术青春，他使许多伤残病人恢复了劳动、生活功能，为两性畸形患者“定性”，为后天阴茎缺损者再造阴茎。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再造阴茎手术，在日本长崎举行的国际会议上，放映了他的手术过程的幻灯片后，引起了与会者的巨大兴趣。一家德国报纸以大半版篇幅，称颂了何清濂神妙的器官再造手术。他的妻子楼月芳教授，则是一位名满天下的眼科专家，医技同样十分高明，曾任长征医院眼科主任，夫妻

俩都穿军装,在长征医院里是令人羡慕的一对。更为可喜的是,楼月芳教授并没有被世俗偏见所囿,十分支持丈夫从事易性病的研究,支持何教授成天和“性”病打交道。1993年6月,何清濂、楼月芳夫妇双双赴日本作学术演讲,介绍他们在易性病研究方面取得的最新成就,再度引起轰动。

整形外科担负着“雪中送炭”的使命。何清濂不止一次完成了这样的重要使命。在过去的岁月里,哪里需要,哪里危险,哪里艰苦到哪里,为救治伤病员,他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为工农兵服务,他三进大庆,二进大别山,他曾上山下乡,为许多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送去炭火,送去温暖。安徽的大别山区,由于地处山区,那里缺医少药,得了病没法及时医治,造成许多人肢体畸形。何教授曾到安徽金寨县古碑乡为农民治病,发现当地有不少先天性兔唇和畸形手的病人。面部的缺陷使一些年轻人见了生人就躲躲闪闪,而手的畸形,则大多是由于山里人冬天烤火时,婴儿乱摸炭火而酿成的悲剧。何教授的心头引起了巨大的震撼。他下决心要让他们重新获得劳动的权利。他根据手灼伤后的各种不同形状分别命名为“握拳手”、“兰花手”、“爪形手”、“棒槌手”、“手枪手”等,经过何教授的精心诊治、手术矫正后,这些手竟一一奇迹般地恢复了功能,消息传出,在当地传为美谈。

一位名叫王礼义的青年,两岁时右手被烧伤,疤痕挛缩使腕部重度屈曲,整个大拇指与前臂紧紧粘连,手的功能完全丧失。何教授为他做了难度较大的前臂逆行动脉岛状皮瓣及胸腹部大面积皮片移植,终于解除了病人20多年的痛苦。还有一次,一位老乡抱来了个左大腿屈曲与肚脐粘连在一起的孩子,又见他膝盖上碗口大的创面裸露着,脓水直淌。因当时床位已满,何教

授便让人在地上铺了一层稻草,权且当作加床,收下了这个孩子,并亲自跪在地上,躬着腰为他清洗创口和包扎。这番情景,感动得那位老实巴交的农民眼圈红了,不知说什么才好,竟跪下来给这位上海来的医生连连磕头。

何教授在诊病时,还不时碰到一些疑难杂症,看似山穷水尽,但何清濂仍想方设法,努力探寻,终于柳暗花明,又见一村。

比如说,一个人如果没有鼻子,那他的日子将怎么过?

在何清濂施行整复手术中,印象很深的,则是为一个无鼻孩子再造鼻子的经历。那是在6年前,何清濂在门诊部接待了一位山东少年,他生来没有鼻子,严重的生理缺陷,使他躲躲藏藏,不敢见人,平时外出总是戴一个口罩。口罩已相伴了他15年。如今孩子已长大了,没有鼻子,将来怎么参加工作?孩子的生理缺陷使做父母的寝食不安。十几年来,做父母的不辞辛苦,在各大城市里奔走,试图为他们的儿子安装一个鼻子,终因手术难度太大而未能如愿。1987年,病孩的父母转辗打听到上海长征医院有位整形名家,叫何清濂,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极好,是真正的、名牌的“老军医”。于是怀着一丝希望,慕名来到上海。何教授为面部后天性缺损者修复鼻子,有成功的先例,但目睹这个先天无鼻的孩子,几经周折而令多家大医院束手的特殊病例,何教授犹豫了。无中生有,实非易事。但是,当他看到孩子父亲苦苦哀求的眼神,无鼻的孩子大为失望的沮丧表情,何清濂的心软了,他收下了这个特殊的病人,决心运用他的智慧和神妙的手,为他再造一个鼻子。他设计了一个又一个手术方案,又一个又一个地否定了自己的方案,几经比较,反复琢磨,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从患者的额部取下一块筋膜肌肉的皮瓣,做成鼻孔和鼻小柱,再将鼻部的皮肤撑起来做鼻子的表面皮肤,既可以减

小再损性的创伤,又不至于让再造部的鼻子看出人为的破绽。方案已定,巧施手术,事在人为,一举成功。那个饱受15年无鼻之苦的孩子,手捧小圆镜,久久凝视脸上耸立起来的鼻子,不禁绽出了舒心的微笑。有鼻子和没有鼻子感觉到底大不一样啊!从此以后,他可以再也不戴口罩了。何清濂注视着面前的“杰作”,想起一位日本作家说过的一句名言:“幸福越与人共享,它的价值越增加”,他也开心地笑了。

何清濂还是一位美容专家,一位人体造型的艺术大师。整形外科大师米拉德教授说过:“美容外科是一个高深微妙的专科,它不仅致力于颜面和躯体恢复正常,而且比正常更加美好。”经过何清濂之手的美容,确实体现出了“比正常更加美好”,可谓锦上添花。雪中送炭,诚然必不可少;锦上添花,也并非多余。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生活美学的普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爱美之心的复活,整容美容成为时下的一大热门,受到许多爱美的女士和男士们的青睐。整容医院门庭若市。逢年过节,上海的多家整形医院门前竟排起了长队,称得上当今社会的一大盛事。一位85岁的老汉,也多次光顾时光整形医院,想使自己变得更年轻一些。上海的好几家报社和电视台,相继报道了这件新闻。

整形外科包括重建整形外科和美容整形外科两个分支,前者是先驱和基础,没有前者就不可能有后者。何清濂正是在重建整形外科这个领域里作出了杰出的建树,才能继续在新兴的美容整形外科中开创了一个新天地。近20年来,他曾先后为全国100多位著名演员做过各种美容手术,使他(她)们永葆艺术青春,受到广泛的好评。

有次,一位著名表演艺术家临时接到一项任务,前往美国纽

约出席一次颁奖仪式,领取亚洲杰出艺人奖。这位演员已年过花甲,想通过除皱术,使自己年轻一些,但飞机票已订好,隔日起飞,她来向何教授询问,能否为她“突击”除皱?按照常规,做这项手术至少得四五小时,而且需要留院数日,观察伤口是否发炎。如果手术出了差错,将一张肿脸带到纽约的领奖台上,岂不是帮了倒忙?但时间已不容迟疑。何教授艺高人胆大,决心为她立即做除皱手术。他小心翼翼切开头皮,将松弛的皮肤充分游离后,提紧,然后切除多余的皮肤,并重新绷紧,接着飞针走线,用一根最细的针缝伤口,这样做手术,虽然工作量大一些,但可以不留痕迹地缝好伤口,手术做得极其精细,消毒极为严格,力争万无一失。手术在下午进行。术毕,天色已黑。她驱车前往参加一个为她举行的欢送宴会。第二天,这位演员登机启程,脸部皱皮已除,但刀口隐藏极好,一点没有发炎,头部也没有剧痛。她头戴一顶漂亮的帽子,经过十几小时的飞行,神采奕奕地走下飞机。第二天,她又容光焕发地出席了颁奖仪式。几天之后,这位演员赴美归来,收到了摄影师为她拍摄的“减去十岁”的照片。

除此之外,眼皮加层、去掉眼袋、加宽脸颊、拉长下巴、腹部抽脂,对何清濂来说,都是小菜一碟,水到渠成。港澳台一些巨商大贾,纷纷慕名而来,一一欢喜而去。广州有位民营企业家,事业有成,但美中不足的是,下巴短缺一段,看上去令人很不舒服,求教于何教授,他略施小技,给他加长下巴,使这位企业家喜出望外,恩同再造。还有一位妇女,花了2000多元,做了除皱、隆乳等手术,结婚两年,她的丈夫尚未发现其中人造的“奥妙”呢!50多年来,何清濂做了10000多例手术,修补、矫复、整容、再造,为万千病人恢复了健美的体型,真可谓“洒向人间都是

爱”！

1992年7月21日，上海成立中华医学会上海医学美学美容学会，何清濂被推选为首届主任委员。

但是，这一回，面对要求男变女的易性病例，何清濂还是平生头一次遇到。

面前摆着秦惠英一封封言词恳切的来信，何清濂却颇为踌躇。做吧，史无前例，没有经验；不做吧，即见死不救。而且，政策是否允许，又无明确规定。那么，怎么办？

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想来想去，“上帝”被感动了，何清濂教授决心涉足一下这个中国外科手术的“禁区”。因为做这样的手术，在中国医学史上是史无前例，在动刀之前，他抱来了一堆国内外的文献资料，连夜仔细研读，他试图从前人的经验中寻找一点借鉴。

古已有之的易性之想

翻阅文献资料，十分有趣，令人大开眼界。易性现象不是二十世纪才出现的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它不仅存在于现代社会，而且在近代社会和古代社会中也曾有过。关于易性之想，或者说，易性之术，在中国，其实古已有之，我们的老祖宗对此有许多设想和尝试。

明代李汝珍在小说《镜花缘》中，曾记述了多九公、唐敖、林之洋在女儿国的遭遇，十分有趣。这个女儿国有男有女，只是男人穿长裙，还要缠足，女子则穿靴戴帽，以男子身份出现。女儿国里来来往往的男子，都不长胡须，说话娇声娇气，走路扭扭捏捏；而有个人家坐着一个身着红衣绿裙的妇女，头梳盘龙髻，耳

坠八宝环,缠着一双小脚,却是一脸络腮胡子。唐敖看罢,忍不住扑哧笑了出来。那个妇人听到笑声,追出来骂道:“你这蹄子,明明是个妇女,竟冒充男人,好不要脸。”后来林之洋进城推销胭脂、香粉、缎带之类,因为他“卖相”好,长得白净脸皮,竟被女儿国国王招入内宫,强行穿耳缠足,充任王妃,闹出了许多笑话。这个故事虽属作者虚构,但文艺作品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可见早在明代,已有易性之想,并在衣饰上付诸实施,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在生活中已时常可见,因而才有女儿国的荒诞故事的构成。

清初刘献延的《广阳杂记》上,则有另一条女变男的记载:“长沙有李氏女,其母尼也。年将二十,已许字人矣。忽复为男子。往退婚,夫家以为诈,讼之官。官令稳婆验之,果男子矣。道薙发留辮,解足缠,易男子装,学剃头取耳以为业,今三年余矣。列肆于市,质人使人招之薙头,不来,盖闻其为当道,寓中人客杂沓,羞赧不前耳。虞臣同紫华,闻声往其肆,令其薙发,旧言其声音相貌、举止意态犹俨然是一女子。因细询原委,果然也。余忆泰西人身之说,言女变为男,只内肾脱出便是,若男变为女则绝无此理矣。说在脉络图说中,可检也。”刘献延所记的女变男事,用现代医学的眼光看,此人疑是男女两性畸形,即所谓“阴阳人”,兼有两性生殖器官,随着人的青春发育,其男性特征更为明显,自动变成“女变男”,但女性的“声音相貌,举止意态”,并未截然改变。因而变成不男不女,引起人们围观,不便在街上做剃发营生。这个女子如果生活在当今时世,则可以通过整形手术,加上服用性激素,便能使两性畸形得到妥善治疗,并可以定性。

在外国,男变女或亦男亦女,也多见之于文字记载,而且在

某些民族中,还将变性视作神的全知全能的过程和特殊性的标志,它是随着超自然的伟力和僧侣职能俱来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科学家在2001年5月有了一个惊人的最新发现:世界上最老的埃及木乃伊,原来是一个“变性人”。3100年来,一直以为这个埃及女歌手的木乃伊,原来是一个男人。悉尼大学博物馆助理馆长索沃达说:“我一发现这个(秘密),当场吓了一跳。”因棺木图案设计精细,博物馆职员以为那具木乃伊是女的。但是,X光和脱氧核糖核酸揭露了它的真正性别。纽卡斯尔大学外科系的斯派格曼教授说:“我们是通过小孔,在未损坏木乃伊的情况下抽取样本,析离其脱氧核糖核酸。”看来,在3100年前,这名著名的女歌手,也是一个男变女的变性人。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变性人了。至于这名女歌手的变性手术是怎么做的,那有待于现代考古学家和医学专家去作深入的研究。

不过,在为数不多的历史文献中,细心地钻研一下,也能发现其中的某些文字记载,约略可见古代易性的某些蛛丝马迹。留美的社会学青年学者祁冬涛先生在其论文《“灵魂”对“肉体”的背叛——变性人现象综述》中提到,在古希腊和罗马遗留下的大量历史文献中,也能看到有关易性人现象的叙述:有的哲学家记录了易性人渴望“易性”的强烈愿望;有的诗人则细致描述了这批人追求女性化服饰、举止的行为。据记载,古罗马皇帝 Nero 在一次暴怒中踢死了怀孕的皇后,事后追悔莫及,便找了个与皇后极其相像的人——一名男奴来代替皇后。他命令自己的外科医生给这名男奴做了易性手术,并正式成婚。而另一名罗马皇帝 Heliogabalus,据说与一位强壮的男变女的男奴也正式成了婚。婚后这位“皇后”不仅担当起了所有皇后的职责,而且

出手十分阔气,她为了使自己获得真正的女性生殖器官,竟然将半个罗马帝国都赐给了身边的御医。

有趣的是,土耳其中部的古代居民弗里吉亚人,还允许阉割过的男子过女性生活。公元1世纪——2世纪时的罗马讽刺诗人朱文纳耳考察了这个地方的易性人的生活后,认为罗马也不妨支持弗里吉亚人的做法:“他们还等什么?难道还不是他们试行弗里吉亚方式,完成那件事的时候吗?——操刀一割,除掉那块多余的肉不就完了?”而古希腊的医生,被称之为西方医学鼻祖的噶伦在他的《医书》中,也记载过有“非男子”的存在;他们把自己当作女子,干女子的活,一般人认为他们是在神的干预下而女性化的。此外,在古代,“有人想方设法使男性变为女性而不以为耻”——甚至切除他们的男性器官。上述的“非男子”现象,即是西方最早的“男变女”的易性手术,从时间来看,比中国的封建时代的太监的出现,还早了一千多年。

国外的人类学家还给我们今天研究易性问题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苏格兰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在他的传世之作《金枝》中写道,在更加原始的民族中,“有一种广泛流行的习俗……即有些男子终生穿女子服装,行为举止一如女子。他们往往是自幼献身于这种行业并受过训练的。”例如,马达加斯加的“沙隆巴雅”完全忘记了自己原来的性别,认为自身完全是女性。楚克奇爱斯基摩中的男性“柔弱人”是幼时奉长辈之命扮作女子的,嫁丈夫,终生过女子生活。在安第斯山区的巫师,也遵奉部落习俗改变性别,即安第斯人的莫哈甫族的男童公开加入女童行列,著名法国画家高更终老于太平洋上的大希提岛,其间的土人在婴儿时则公然鼓励把自己设想成是女性的一员,以至于这个岛上女多男少。高更光临这个岛上,受到了许多年轻貌

美的女子的追求,甚至夜夜都有艳遇。

到了近代,易性的表现更是屡见不鲜。据16—18世纪的法国史书记载:16世纪后期的国王亨利三世一直想做一个女人。17世纪中叶,他从小被路易十四派往暹罗(泰国)当大使的一位大臣抚养,一直被作为女孩抚养成人,而且内心里一直认为自己是一名真正的女人。18世纪,还有一个著名的法国外交官,名叫Chevalier d Eon(哀鸿),以女扮男装而闻名于世。哀鸿本是一位法国爵士,他的家境很好,后来客居伦敦。在那里,他一反常态,以女性身份、打扮出现,并得到社会公认。他曾着女装在舞会上得到路易十五的赏识,被路易十五委任为外交官,并于1755年男扮女装出使俄国,极其出色地完成了使命。路易十五死后,他一直过着女性生活。此人的寿命不短,活了83岁。他的一生中有49年过的是男性生活,34年过的是女性生活。直到他死后由医师尸检时,才发现他是一个极正常的男子。此后,“易性人”现象才受到医学界的正式关注,Chevalier d Eon的经历被著名性心理学家霭理士称为“哀鸿现象”。19世纪中后期,还有一位享受法国国王赏赐的上千法郎养老金的女人Mlle,死后也被发现原来是一个男人。他在生前想法弄到了一个证明他是女性的出生证,一直过着完全女性的生活。

人类学家通过在世界各地的考察发现,易性现象并不仅仅囿于欧洲和移民大量进入后的北美,在美洲的印第安人中,在印度,甚至在非洲,都发现了易性现象,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有一定差别,人们所赋予的名称有所不同。可以这样说,只要有类人生活的地方,就会有要求易性的现象出现。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在许多被所谓的“文明人”视作不甚文明、不甚发达的地区,变性现象倒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现象。(祁冬涛:《“灵魂”对“肉

体”的背叛——变性人现象综述》)人类学家米德曾撰文描述一个部落的男子,胆小怕事,常存戒备心理,对艺术、戏剧很有兴趣,关心闲言碎语,常因软弱而感到孤独,或因情绪压抑而发生冲突,他们常身着美丽的女性服装招摇过市。更有甚者,妻子分娩后外出操劳生计,丈夫留在家里坐月子。这简直是《镜花缘》中“女儿国”故事的翻版了。

在近代的西方,男变女的事件更是屡有所闻。18世纪法国著名的教授兼文学家、外交家特·许阿西经常在他的卧室里接待来客,他穿着缎子做的女服,还戴了羽毛做的饰物,习以为常,后来年事渐高,身躯发福,面容冷酷,仍乐此而不疲,看上去觉得更加怪诞。还有一位著名的伊昂武士,在参加了一次化装舞会后,居然欣赏起女性生活来了,最后奉国王和政府之命,同意他男扮女装,尽管他是一名军人。从国外古代的文字记载来看,男变女的材料较多,而女变男的很少。这可能是由于前者施行变性手术较为容易,“操刀一割”就成了,而女变男则较为复杂,即使到了18世纪,外科医师在这个领域里依然是一筹莫展,如何重新制作这样一具阳物,暂时还没有办法。

中国古代的易性手术——阉割

实际上,早在汉代司马迁受的腐刑,以及封建社会里太监的阉割,就是中国古代施行的易性手术。不过,这种畸形的易性,则是打上了封建制度残暴、人性被摧残的印记,“净身”的经过,可以说是血泪斑斑。有一本《宫女谈往录》的书,记录了老太监张福谈被“净身”的经过,里面充满了血腥味,读来令人发指:

“‘净身’需要选好季节,最好是春末夏初,气温不高不低,

没有蚊子和苍蝇最合适,因为下身不许穿衣服。

“‘净身’的屋子在卧室外一个小单间,是用破砖和碎坯垒起来的,乡下栽白薯先要热炕加温发芽,净身室就和白薯炕一起两用。炕面必须用砖铺成,一个来月的大小便,经常会洒在炕上,不用砖铺是不成的,用土坯就会变成泥浆了。净身的人要像鬼叫似的嚎三四天才能过去,不是单间,谁家也受不了。

“净身师要准备好两个新鲜的猪苦胆,煮臭大麻水的时候,要同时煮两个鸡蛋,煮的时间越长,鸡蛋越硬越好。喝了臭大麻水以后,脑子就晕晕乎乎的,肉皮发胀发麻,好像身上任何部位的肉都在颤动。太阳已经爬满了窗子,到了阉割的时间了。

“我顺从地被捆好了手脚,腰部被绑得紧紧的。一副旧的绑腿带把眼睛蒙上,把猪苦胆劈成两片,两个鸡蛋剥好了,还有大麻秆等,放在头旁边。一切准备就绪,就要开割了。就像挨宰的羊一样,浑身每块肉都在颤动。开始动手术了,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先割睾丸。在球囊左右各割开一个深口子,是横割不是竖割,主要是先把筋割断后再进行挤,要把睾丸从割口挤出来。挤是奇疼无比的,但也有绝招,割开临挤前,把一枚剥好的煮鸡蛋塞在嘴里,堵在我的嗓子眼上,喊叫不出是小事,主要是憋得不能出气,简直就要憋死了。于是就浑身用力,身子打挺,小肚子往外鼓。就在我拼死挣扎的一刹那,就把睾丸挤出来了。这时,把劈好的猪苦胆贴在球囊两边,猪苦胆黏糊糊的,可以消肿止血。不知为什么,我全身都出冷汗,觉得连头发根底下都是汗珠。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第二是割势(即把阴茎切掉)。这是技术活,如果割浅了,留有余势,将来内里的脆骨会往外鼓出,那就必须挨第二刀,俗称‘刷茬’,‘刷茬’的苦,不下于第一次挨割;如果割深了,将来

痊愈后,肉会往里塌陷,形成一个坑,解尿时,尿出来呈扇面状,会一生造成不方便。净身师割完睾丸后,磨一磨刀。然后他在阳物处用手指掐了掐,将根部掐紧,又让副手往我嘴里搁一个又凉又硬的煮鸡蛋,把咽喉堵住。我觉下身像火钳子夹似的剧疼,一阵迷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也就是片刻工夫,下身感到火烧火燎难受,此时已经割完,插了一根火柴梗,把另一个猪苦胆劈开,呈现蝴蝶形,敷在创口上,又留一个容大麦秆的洞。最后,用一片刮好了的窄木板,放在我两脚中间,把球囊托起来。这时我浑身哆嗦,连腮边的肉都觉得在跳动,嗓子像火一样干辣。过了很长时间,才进来一个人。我求他给点水喝。他用一个旧皮球,皮球边剪一个小圆洞,就用它来吸水,瓦罐里是我早晨煮好的臭大麻水,足够我喝两三天。

“说净身师有慈悲的心肠,我是不相信的。手术前喝大麻水,目的是让我迷糊,做好手术再喝大麻水,减轻小便的排泄量,都是为了保证手术的成功。至于痛苦与否,他们是很少考虑的,第二天才给少量粥喝,也是用破皮球吸粥送到我嘴里的。有谁愿意端起碗来喂我一口呢!一个瓦盆放在床板子底下,让我自由地拉稀尿。”

真是惊心动魄!我抄下这一段文字,手也颤了。人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做这样的“去势”手术,其痛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人间惨事,莫此为甚!再回过头来读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的一段文字,回忆他惨遭腐刑后的奇耻大辱,似可以进一步理解这位历史学家当时的心态:“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

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如此奇耻大辱，真是永世难忘。7岁的张福自然写不出这样寓意深邃的文字，但他后来忆及“净身”际遇，尽管已时隔70多年，但其神情依然是黯然的，一字一句，依旧在流血。封建社会里的阉割，人成了皇家祭坛上一件悲惨的贡品，人成为非人，与动物竟无大差别，人和动物类似，被人捆绑起来，任人阉割。张福在回忆录里还提及，净身有两种价钱，保活是一种价，保阉不保活，又是一种价。在不用麻醉药物、缺乏起码的消毒和护理条件下，作这样的切割手术，实在是太惨无人道了。保阉又保活者，实在是被阉割者不幸中的大幸了。

这种人的“异化”，确实是一个不幸时代的产物。从医学上看，张福及其一批受害者，其生理、心理上都是被扭曲的，原始的易性手术，实在是不堪回首的。今日欲自残者，读一读前清太监张福的回忆文字，也许会自觉缩手吧！这也是我不惜篇幅，将上述文字照抄下来的缘由之一。

美国一名大兵成了红发美女

要求改变自己的自然性别是一种病症。患者的主要表现是性身份的严重颠倒，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认为自身生物学性别与心理性别间具有矛盾性或不协调性，自认为自己是与自己解剖学性别相反的另一性别成员，医学上称之为“易性转换症”，或曰“易性病”。

男性患易性病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在医书中就有记载了。1896年，在克拉夫特·埃宾的著作——《性精神病态》一书中，曾提及这种病态，但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索。当时的人们因无法

使外生殖器形态加以改变,有人便进行异性装扮,冒充女性。“哀鸿现象”在今日西方,仍比比皆是。对异性病作深入研究并取得重要进展,是近半个世纪的事。考德威尔在1949年对这种病作了上述命名,并介绍了一个女孩子想变成男孩儿的事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医学界对易性病的特征才有了较为明确的概括与界定。

对易性手术的广泛关注始于1930年。有个名叫F·Z·AbYzhzm的外国人,第一个做了这种手术,后来逐渐增多。在国外,对易性病施行手术治疗,只有60年的历史。在本世纪50年代以前,施行易性手术在西方曾被认为是不体面的事。有些外科医生把它和敲诈、淫行和服安慰剂混为一谈。50年代伦敦有位医生写道:干这一行,好比有人自称是纳尔逊(指抗击拿破仑的英国海军名将,在战斗中失去一臂),你就截去一臂,满足他的幻想一样。在当时,许多西方国家的外科医生不屑于做这种手术。对变性手术的广泛关注始于1953年的美国,当时对一名叫克莉斯汀·乔根森的变性人实施了变性手术并做了广泛报道。从那时起至1977年,美国已有2500名变性人接受了变性手术(Costello and Costello, 1992)。而现在的美国,每年大约有1000人申请做变性手术。可是,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对变性手术开绿灯,变性手术在许多地区都会遇到来自宗教或者法律的阻力。

克莉斯汀·乔根森(原是乔治·乔根森)是一名美国军人。他是美国第一个受到广泛报道的、成功的变性人,过去总觉得自己生理上有问题,当他由于体重太轻(98磅)而被军队除名时,他便查阅有关医学资料,了解到男性和女性的身体都存在着雌雄激素。为了掌握更多有关的知识,他参加了一个医疗技术培

训班,而且不经医生同意,开始给自己服雌性激素。1950年他飞抵丹麦,由克里斯蒂安·汉堡医生给他施行了易性手术。本来,手术是悄悄地进行的。不料,1953年2月13日,当克莉斯汀走出纽约的国际机场时,突然发现有关她的新闻报道铺天盖地。当天《纽约时报》的第一版,以三栏的大字标题,作了下述报道:“一名大兵变为红发美女——手术改变了布隆克斯的性别。”通过这次史无前例的外科手术,26岁的男性青年乔治·乔根森,变成了克丽斯汀·乔根森女士。回到美国后,面目一新的克莉斯汀利用自己意想不到的知名度,开始从事演员和夜总会招待员的新职业,大受人们的欢迎。

后来,世界各地的患者竞相仿效。由一名大兵变位美女的,在美国并非乔根森一人。德博拉·哈丁,后改名为奥斯丁·哈丁女士者,是乔根森的同乡,也是一位美国大兵,不过,他是一名海军战士。他回忆童年的生活时写道:“在学校时,男孩子在教室的一边,女孩子在另一边。我的目标是到女孩子那一边。”但是实际上,要作这样的调整是很困难的,他终于在五年级时被学校开除。不过,德博拉·哈丁要求变性的欲望依然不变。1953年,他加入海军,希望能被派往国外,最好是到沙漠地区,再悄悄地前往丹麦接受易性手术。他在整个服役期间始终呆在美国本土,后来虽然结了婚并生了一个女儿,他仍旧在美国各地寻找能给他施行这类手术的医生。他有好几次甚至想自己动手阉割,切去那个讨厌的东西。到了1970年,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动了手术。现在,他是美国一所大学的教师。过去的10年里,哈丁曾在电台和电视台上现身说法讲自己的经历,还在各大学讲授有关变性的课程。

1953年,继男变女的手术获得成功后,美国一名修女马里

欧·马丁诺也毅然走上了外科手术台。在人类医学史上又树立了一块里程碑。

德国在建立了“变性诊所”后,由于手术的成功,一时间,这家诊所门庭若市,每天都有十几名男女青年慕名而来,强烈要求大夫帮助他们改变性别,并答应支付巨额酬金。有钱能使“医推磨”,外科医生们纷纷发了大财。据统计,德国已有8000名年轻人提出了易性申请。1989年7月,瑞典成立了专门的变性中心,美国也有了多家专门的变性医院。

现在,改变自己的性别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易性病患者决不限于青年人,人到老年还想易性者,也大有人在。美国加州有个已做了祖父的“乔”老汉,最近终于实现了他披一袭美丽的婚纱夙愿,他与身穿普通服装的新娘一起步入教堂出嫁。他在举行婚礼时:这位62岁的“乔”老汉乐滋滋地说:“穿上这美丽的婚纱,我无法形容当时兴奋的心情,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这个“秃头新娘”现在是一名富商,数十年前第一次结婚,有五个子女,孙子也十几岁了。这位老汉自幼便喜欢穿女孩子的衣服,男扮女装,婚后也不改此癖,妻子因此经常与他发生争吵,最后忍无可忍,宣告离婚。但是,老汉依然我行我素,平时照样戴上假胸、假发,穿上高跟鞋,走起步来扭动臀位,“婀娜多姿”,全然不理睬别人投来的怪异目光,自得其乐。他还取了个女性的名字,叫“卡娜”,不喜欢别人叫他“乔”。此外,老汉还参加了一个叫做“第二自我协会”的组织,那里有1200多名“志同道合”的会员,都有不同程度的性偏离行为,其中包括教师、工程师、行政人员、货车司机等各阶层的人士。

无独有偶。2001年5月6日的英国《世界新闻报》刊登的一篇专访透露,英国爱德华王子的妻子苏菲近来又有一件烦心

事,她71岁的叔叔贝特尼想做变性手术。贝特尼是苏菲父亲的哥哥,也是苏菲的教父。他与苏菲的关系非常好,在苏菲与爱德华王子结婚大典时,贝特尼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应邀参加的人之一,还被引见给了英国女王。贝特尼年轻时是个芭蕾舞演员,80年代时还曾主演过一部电视连续剧,并且小有名气。1993年,他与结婚多年的妻子离婚,6年前他遇到了同性恋者安迪·利特尔,并与他同居,同性恋的事实逐步公开。贝特尼承认过去几年来,他曾多次想过做变性手术,这样生活起来可能会更方便,但做变性手术需花1万英镑,这对他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他为此非常犹豫。由此看来,易性病如不医治,人到老年并不会自愈。

在美国,较早完成女性变男性手术的,则是1940年出生的祖德·巴顿(朱迪丝·巴顿)。她是一个邮递员。在16岁前,她一直是个顽皮女孩,很少有人敢欺侮她。她把头发理成男式平头,举止与男孩十分相像,以致学校的教师劝她去看心理门诊。大学时,学校向她提供4年的奖学金,条件是女学生必须穿裙子,可是,巴顿宁肯不要奖学金,也不愿脱掉男式服装。大学毕业后,她居住在美国一个中西部城市,在一家工厂做工人。后来,她听说斯坦福大学开设了变性课程,并于1972年和1973年两年中接受了4次手术。“外科手术确实是个奇迹,”巴顿说道,“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个完整的人。”目前他仍在邮局干活,另一方面还在读研究生课程,他打算当一名业余的心理学专家。

在以后几年中,变性手术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据1979年11月《变性特报》报道:“在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至少有1000人接受了这种手术。”目前在英国、泰国、日本、摩洛哥、香

港,施行变性手术成为整形外科的一个新的分支,人们对此已见怪不怪。而到了2004年,美国仅完成男变女者,就有5000人之多。在欧美许多国家,政府对易性手术并未作任何严格的规定和限制。任何公民只要请求,不论次数多少,都可以施行易性手术。美国加州圣迭戈布,曾有一位名叫杰里·苏沙的人,分别在1969年、1981年、1988年做了女变男、男变女、女再变男三次变性手术,均无人干预,悉听尊便。在日本的电视节目中,还时见播出变性人互诉衷曲的特别节目。易性手术成为发达国家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

马丁诺著书立说

有意思的是,有些变性人在完成手术后,愿意现身说法,著书立说,因而名声大振,书也十分畅销。

最早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的是美国人马里欧·马丁诺先生。她曾经是一位女性,长期在修道院从事护士工作。1953年易性成为男子汉后,攻读法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写了一部自传体纪实文学作品《变性人》,记述了自己由修女变为男子汉的过程,从身体、生理、心理、情绪、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变化,娓娓地向读者敞开心灵世界。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中写道:“不是亲身经历过变性的人,绝不会理解到:一个男性女性兼备的,并且是阴阳倒置的人身体所受的煎熬。被这种什么都具备又什么都不明确的两性所禁锢的人,身体上、精神上所遭受的是无止境的非难和摒弃,以至由此所产生的绝望。我是幸运的。我终于走出了迷宫,拨开了云雾,见到了春天。因此,我愿意坦率、公正,甚至带着轻松的口吻说出那些稀奇古怪而又混

杂着羞辱的往事。我愿意向读者提供我的生活、性情等各方面的真实情况,让医生、科学家、需要复性的人和社会大众,对这样一个鲜为人知或所知有限的问题,获得一些资料。”这本书出版后,很快获得了普利策传记奖,并被译为中文于1988年出版。

尔后,美国作家詹姆士·摩理逊(后改名叫琪恩)和艾德·拉斯金(后改名叫琳恩)也作了变性手术。琳恩写了一本书,名叫《变性人日记》,同样极受读者欢迎,琳恩也因此名扬于世。

文笔最好的,则莫过于莫里斯的《变性人自述》。他是英国著名记者,著有三大卷《英帝国兴衰史》。在三部曲的每一册的扉页中,都有这样一段话:“写作《英帝国兴衰史》三部曲期间,詹姆斯·莫里斯完成了性别的转变,现在以杰恩·莫里斯为姓名继续生活和写作。她的父母分属威尔士人和英格兰人,所以她的日子一部分在北威尔士的书斋度过,一部分在南部的家里度过,同时还游历国外。她最有名的著作是先后写于男性和女性时期的《威尼斯》、《牛津》、《西班牙》和《生平困惑》(即《变性人自述》);她还出版了三卷游记并编辑了牛津版《牛津手册》。”

莫里斯1926年出生于英格兰的萨默赛特,回忆起3岁时,在他听母亲弹奏钢琴时,第一次感到自己应该是个女孩子才好。青年时代的莫里斯曾当过7年兵,还进入牛津大学读书,大学毕业后,他开始做机动记者。他先后在伦敦的《泰晤士报》、曼彻斯特的《卫报》任驻外记者,写了大批有影响的报道、特稿。在27岁时,他以首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独家报道而闻名于世,被《经济学家》杂志誉为“我们这一代的首席记者”。他体验了从未有过的兴奋和激动。詹姆斯·莫里斯也曾恋爱过,结了婚,生养了4个孩子,但他始终对性生活不大感兴趣。用他的话来说:“有点乏味。”在1972年,即在他45岁那年,詹姆斯·莫里斯和

他的妻子离了婚(两人离婚后感情仍甚笃),在卡萨布兰卡正式接受了变性手术。以后,他过着一种女性的生活,著有《变性人自述》(原书名《生平困惑》)一书,凡十万言,叙述了他的改变性别的心理、生理过程,有叙有议,译者的文学水平也很高。莫里斯在《变性人自述》的导言中写道,为了对家人的爱,为了向友人解释,为了对世界各地所有的同病者表示同情,于是她写了这本书。《变性人自述》1974年出版后,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英国《观察家》杂志说这本书“道出了难以启齿的东西”。现在,这本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在我国销路也不坏。屈指算来,这位男变女的英国作家,如果健在,已是一位78岁的老太太了。

如今,在国外作变性手术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每年有数以千计的病人接受了变性手术。据香港《大公报》报道:美国加州有一位名叫法兰克·约翰逊的男子,为了寻找自幼失散的妹妹,20多年来,踏破铁鞋,走遍全国各地。皇天不负苦心人,最近终于让他找到了,但是骤然相见时,法兰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眼前久别相逢的妹妹,竟是一位须眉男子。这对兄妹在年幼时,父母因车祸丧生,他们顿时成了一对孤儿,后来各自被人领养。法兰克跟随养父母来到科罗拉多州,并在那里长住,大学毕业后在一家药品公司做推销员。他怎么也忘不了妹妹,一定要设法找回失散20多年的史蒂芬妮。不久前,兄妹终于在洛杉矶团聚,只是妹妹在5年前接受了变性手术,改名为史莫夫,是洛杉矶的一名房产推销员。兄妹成了同行,相逢时,现年40岁的法兰克喜极而泣,含着热泪讲述他与“妹妹”喜相逢时的情景:“当我见到她时——不,是他,真的难以置信。我原想会见到一位妇人,没料到她却变成了一个男子汉,当时我不知道上前拥抱好,还是握手好。”“我俩相互凝视了几秒钟,激动得

热泪盈眶,然后拥抱在一起,我们毕竟手足情深。”由此可见,在美国,妹妹变成了弟弟,哥哥并不以为是“大逆不道”,而是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一现实。

在国外,还有些人之所以愿意施行变性手术,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中性人。34岁的英国妇女克莉丝蒂从青春期起,就为自己隆起的胸部和月经的来潮感到苦恼万分。“我虽然生来是个女的,但我从未有过女性的情感,也不想要结婚或生儿育女。”于是,6年前,克莉丝蒂便开始向伦敦一家私人诊所要求切除她那丰满、健康的双乳,但遭到了拒绝,而她最终在别处找到愿意为她做这种手术的外科医生,为此缝了一百多针,花了4000多英镑。两年后,她又设法说服伦敦另一家医院,为她施行子宫切除手术。眼下,也正打算切除卵巢,并采用昂贵的电针去毛法,除去身上除眉毛和眼睫毛之外的所有毛发。她认为,这些手术帮助她实现了真正的个性。“爸妈决定了你要么是男性,要么是女性,但我既不想做女人,也不愿当男人,我要让人们知道介于两性之间的中间人也是存在的。”因为这样做“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这种古怪的念头,使克莉丝蒂在伦敦以身试刀,满足了自己的刻骨铭心的要求。

2

第二章

[一种与生俱来的痼疾,一种无法遏制的欲望]

性别模糊的确是一种病。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痼疾。因为一个生物学上的男性或女性个体,尽管他(她)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物学性别,但却在心理上感觉到自己是异性,并渴望改变自己的生物学性别。1949年Caldwell首先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易性癖”(transsexualism),这样的个体称之为“易性癖者”(transsexual)。变性症通常被认为是在个体性角色中表现出的性别的自我认知障碍性疾患(gender identity disorder)。变性症现象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献中即有记载。1916年Marcuse对这种现象就从精神及性心理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到上一世纪60年代,各国学者对变性症的研究已取得初步成果。变性症患者(确切的说法应为易性病患者)往往承受着极大的心理痛苦,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改变性别使自己能真正过上异性人的生活,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遭受别人的白眼与歧视。1930年,人类首例变性手术成功,举世震惊。从那以后,数以万计的易性病患者,在整形外科医生手术刀的帮助下,成功完成了他(她)们“性别涅槃再生”。

在国内,20世纪80年代中期,医务界也曾悄然进行过一例变性手术。因为没有作公开的报道,也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由于传统的、文化的、心理的种种因素,中国人对性疾仍羞于启齿,对易性病的病情、病因及治疗方法,均未曾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和探讨,当然氛围也并未形成,因而这例变性手术完成后,病人旋即与医院失去联系,如黄鹤飞去,杳无音讯。尔后,广州某医院也完成了一例变性手术,《澳门日报》曾作过报道,但内地报刊则

不见一字。

如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外许多先进的医疗技术的引进,变性手术也从鲜为人知到略有所闻。于是,引出了上面的这封来信。

那么,秦惠英是不是“道德败坏”呢?如果不是,他患的是一种什么病呢?

饱含着血和泪的诉说

有人要问:爹妈已经给你定了性,社会的大舞台已经给你设定了一个所扮演的角色,你缘何如此不安其位,千方百计想易性更名?

议论是多种多样的。有人说,这是心理变态所致;有人说,这起码是生理发育不正常;也有人说,这是同性恋的表现;还有人说,他是有毛病、十三点……一度有人把易性病患者看作是“流氓”、“道德败坏”。有人说:“这是自甘堕落。”有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自己为自己断后,便是对父母的最大的不孝。”还有人说:“你不顾念父母也罢,连子女也不顾及,都能不要,你的心也太狠了。”还有一位做父亲的,听说儿子想要变性,又给他套上了一顶“性神圣”的帽子:“天生什么性别,谁不是顺其自然,而你却对性别如此苛求,把性看得至高无上。为了性别,为了性,你是不惜一切代价,工作可以不要,子女可以不要,社会地位也可以不要。这不是标准的性神圣!”那么,上述这些议论对不对呢?

让我们先从性与性别的区别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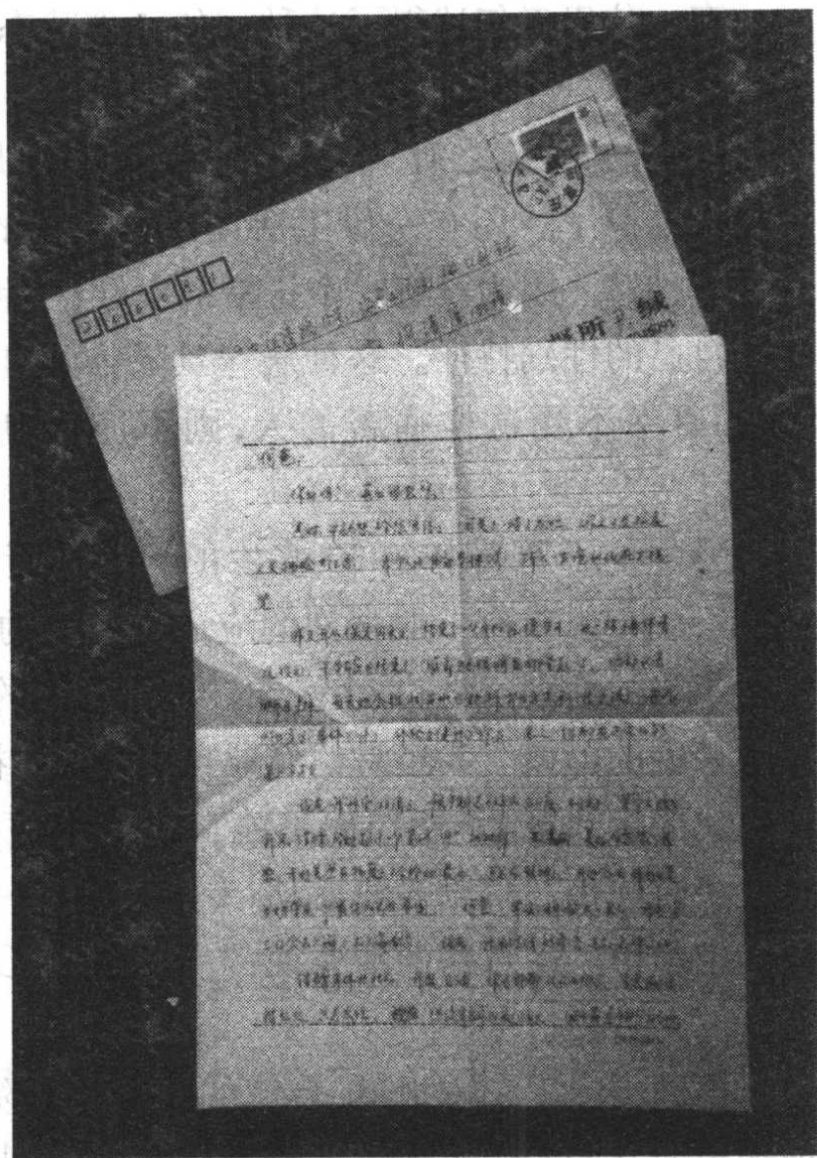
性与性别,原本是不可分离的。性,指的是解剖学和生理学

上的性,也就是性器官,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性器官是生物学上的指针,而性别则是指针移动幅度盘的刻度。性别是指一个人对自己是男是女的认识。性器官是物质的,性别是精神的。诚如世界著名性医学专家著名精神病学、性学和内分泌学专家本杰明博士关于“性”与“性别”的一段精辟的论述:“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重要的基本事实——性和性别之间的差别。性,是你所看到的,而性别,则是你感觉到的。这两者之间的协调对人类的幸福是必不可少的。”这里所提到的“性”(Sex),是指解剖学上的性;“性别”(Gender),则是指心理上的性别或性别自认(identity),即一个人对自己是男性还是女性的自我认识。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其解剖学上的性与其心理上的性别(性别自认)是一致的。但大约有十万分之一的人,或十四万分之一的人,他们以为自己是性别错位,即身子是男性的,心理上却以为是一个女性,反之亦然。尽管他(她)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物学性别,但却在心理上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另一种性别,并渴望改变自己的生物学性别。在医学上,叫做异性转换症,或称“易性癖”。何清濂教授认为,“易性癖”一说,也不十分科学和准确,临床上应称为易性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表达该疾病的特征,易性病不是传染得来的,也不是主观所为,而应该是生物学因素所致;“癖”则是指后天养成的一种习惯。易性病,是一种性身份严重颠倒性的疾病,患者通常在3岁时萌发,青春期心理逆变,持续地感受到自身生物学性别与心理性别之间的矛盾或不协调,深信自己是另一性别的人,强烈地要求改变自身的性解剖结构,为此要求做易性手术以达到信念。他们(她们)在与他人交往中,或在社会生活中,他们常以异性角色表现自己:穿异性服装,蓄异性发型,佩异性的装饰,从事主要由

异性承担的工作,等等。他们对自己的性别深恶痛绝,他们的语言、声音、姿势、兴趣与爱好也无不带有异性色彩,他们渴望完全按异性的角色去生活,在易性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常因内心冲突而极度痛苦,甚至导致自残、自戕。据统计,患易性病的人,有自杀念头的占到90%以上,20%—30%的人有自残、自戕行为。

易性病,换一个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男人认为自己应该是女人,女人认为自己应该是男人。他(她)身上的性器官与心理上对自己性身份的识别打起架来了,而且打的是一场持久战,双方各不相让,要斗个你死我活而后快。“异性转换症”是由英语意译而来的,顾名思义,即是指性别或性欲发生异变。异性转换症以穿着异性服装为外在表现,以变性为其最终目的,患有易性病的人,可以称之为“套在男人躯壳里的‘女



易性病患者给何清濂写来的求助信

人’”，“锁在女人身体里的‘男人’”。据王贤才主编的《英中医药辞海》中对“易性癖”条的解释：“性别方面的心理变态，患者深信自己是另一性别的人，强烈要求改变其性解剖结构，为此常以激素或要求手术以使解剖结构符合个人信念。自以为生错了性别，必以易性而后快，并以此成癖，这就是易性癖患者的最根本的特征。”严重的易性病，药物治疗是徒劳无益的，心理治疗也无济于事，惟有通过手术才能从根本上解除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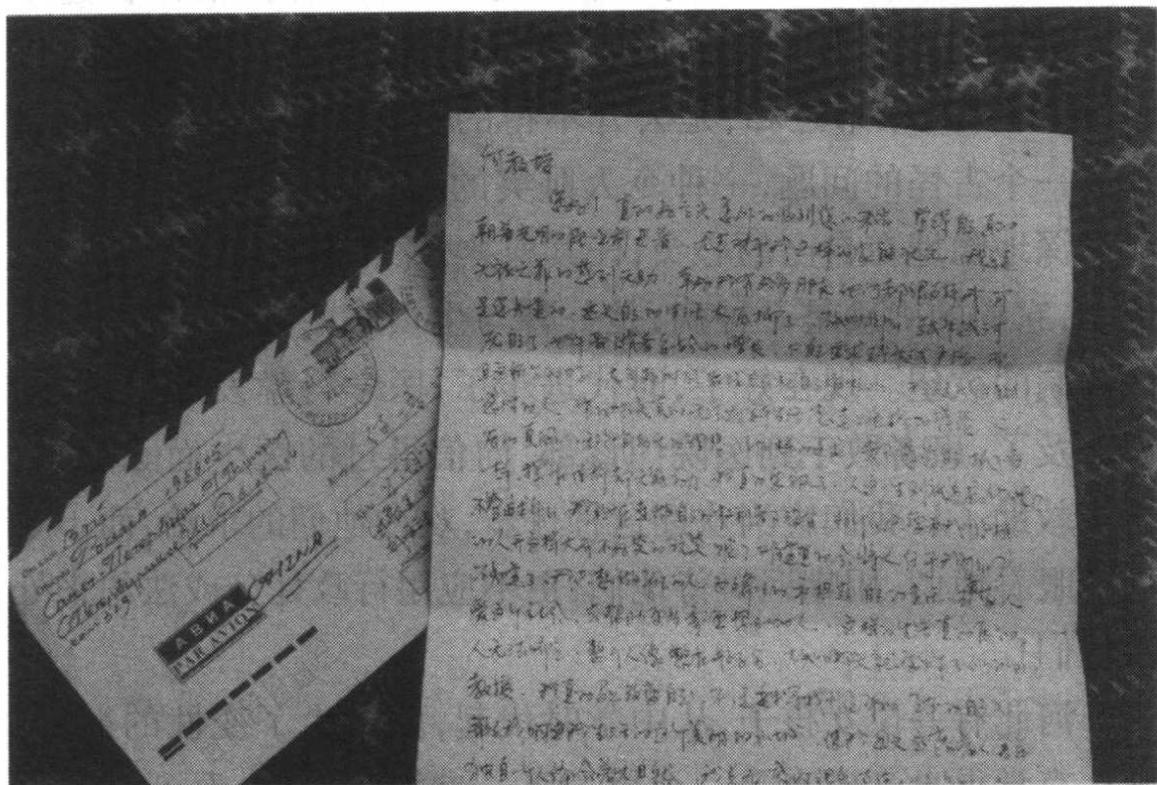
有一位患者叙述得了这种病的心理状态是：这是一种铭心刻骨的追求，一种无法遏止的欲望，一种与生俱来的痼疾，一种难与人言的“嗜痂之癖”。这几句话，可以说是把易性病的痛苦讲得很透辟了。还有一位生活在山西农村的女孩子写道：“这真是一种病。因为没有有一个正常的女性（男性）的生活，是那么讨厌自己的性别特征。这种病一旦降临到自己头上，是那么痛苦，而有幸不受这样痛苦的人，则不应讽刺嘲笑祈求变性的病态。”

另一位不愿署名的30多岁的男性患者给何清濂写信道：“自我懂事起，就有一股强烈的应成为姑娘的愿望，我感到父母错生了我的性别，我应是个娇柔、纤弱、妩媚的姑娘，而不应是个呆头呆脑的男孩。我经常偷偷地穿戴姐姐的裙子，高跟皮鞋，虽遭慈父的无数规劝、惩罚而不能自拔。”他因想易性而不能，就在业余时间参加京剧表演活动，专攻青衣，一曲《苏三起解》，赢得满堂彩声。他致信何清濂说：“天下万物无所求，只愿还我女儿身。”

据国内一家杂志报道，台湾的荣民总医院外科医生方荣煌能做男变女的易性手术。一位湖南姑娘看到了这则报道后，即给方医师去了一信，询问做手术的条件及费用。方医师很快就

给这位姑娘回了信,但手术费却需一万美元。这对于一个中国的普通公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这位湖南妹子为了积攒这一万美元,毅然离开了当地较为舒适的工作,离开了无法理解她的父母,只身来到广州闯世界。她埋头苦干,发誓要积攒一笔钱,“迫切地期望着,使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此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也是令人惊叹的。

要想到海外去做变性手术的人,也是大有人在,有人还因此而上当受骗。2001年初,何教授收到了江苏徐州市李昭的一封信。她是一位小学教师,参加工作已有十年,她一心一意想把自己变成男性,听说国外能做这种手术,便开始攒钱。当时,她的月工资只有200多元,1995年增加到500元钱,1999年涨到700多元。好不容易积了二万多元,却遇到了一个骗子,把她的二万多元钱骗走了,出国做手术的希望成了泡影。李昭大哭了



从国外写来的求助信

一场,但要求变性的决心不减。她又积累了三万多元,她给何教授写信道:“我哭到无泪水,痛到心麻木,活着不如死,死又死不成。您无论如何救救我,收下我,给我做手术吧!”

他想变性而被开除了党籍

变性的要求,还被许多人视为异端。有一位被易性病苦苦折磨了20多年的山东患者,用一种异常愤怒的口吻写道:“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不断驱使着我,我猛然觉得,是老天爷错生了我的性别,使我这个女性的灵魂吸附在一个可恶的男性躯体上。我愤怒了,老天爷,你是怎么搞的!我发誓一定要做一名女性。”

过去,我们中国人认为,“性”是不可告人的,很讳言这个字。虽然孔夫子二千多年前就说过:“食色,性也。”但美食可以写书,“性”是床第之私,是公开不得的。更何况是性身份倒错这样一个古怪的问题,一种令人耻笑的心理状态,多少年来,只能深深地隐埋在自己的心头,任其煎熬,任其啮啃,说不出口啊!但是,它的的确确是一种病,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痼疾,是一种无法遏制的欲望。现在好了,时代进步了,医学科学发展了,性知识普及了,患者敢于到医院门诊部,向信得过的医生面陈隐私、祈求救助了!我们应当欢迎这种进步,欢迎他们的求治,而不要用冷眼看他们,用嘲讽对待他们,更不应用行政处分或法纪来处罚他们!

河北有一位女孩子,从中学时代起,就产生了变性的欲望。她一直觉得自己应当是一个男子汉。参加工作后,看到一本书上写道,结交异性,以至结婚,可以消除这种病态。于是,她交了

男朋友,很快结了婚。患者自诉:“虽然我能吸引他,可是,他却吸引不了我。”半年后,她提出离婚,原因之一就是自己“有一颗男儿心”。丈夫不从,但她执意要分手,最后经不起她的死缠软磨,并拿出了5000元现金给丈夫,结束了这段不幸而短暂的婚姻。患者事后对人说,我现在觉得很轻松,但想做男人的愿望依旧在心里升腾,心情又感到十分压抑。“我吃药,练气功,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这个怪念头,使我的心情更加沉重,甚至产生不如死掉算了的想法”。另有一位女易性病患者给何清濂教授写信道:“我试图以婚姻来摆脱困境,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我的行动不但伤害了别人,也深深地伤害了自己。从今以后,我不想再欺骗别人、欺骗自己了。”“易性病虽然不会传染,但它却传播痛苦,传染不幸,而传播的对象恰恰是你的妻子、丈夫,是你的家人,是那些关心、爱护、心疼你的人,是你的至亲好友。”

最不幸的是一位大学教师,因患易性病而被开除了党籍。他是上海某大学的青年教师,工作表现很好,肯钻研业务,但说话有点“娘娘腔”,爱穿女装,平时喜欢和女青年交往,到了三十多岁也不想结婚。在“文革”中,他被指控为“生活作风有严重问题”,在“整党”中,被开除了党籍。现在他已六十多岁了,但变性的念头依旧十分强烈。他说:“即使开除了党籍,我还是想变性。”现在,这所大学的原领导已认识到了错误,但谁也没有勇气去改正过去的错误决定。

南京市也有一位女技术员,结婚10余年,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自萌生变性的念头后,已和丈夫长期分居。她不愿再过女性生活,对家人表示:哪怕能做一天男子汉,死也甘心。她的妈妈对她说,你要是去做这种手术,可能就得死。她说,即使死在手术台上,我也情愿。我死也要做手术,我一定要过正常人的

生活。她的妈妈缠不过她,最后让她做了变性手术。

当了演员仍想易性

从我手头掌握的病例材料来看,患者产生易性要求,不少人始于童年,到青春发育期则突然加剧,易性要求一旦得不到满足,就引起内心的剧烈冲突,而感到极为痛苦,其症状是性格孤独狂躁,不喜交际,产生内疚感、悔恨感。从1990年至今,何教授已收到了近五千封来信,其中约80%是20—30岁的青年人,在读的大、中学生也不少。

青年人发病的最大的特点是来势凶猛。有一个自称为“痛苦的男子汉”写信给何教授说,他产生变性的念头是从17岁开始的。到27岁时愈加强烈。某市还有一位中年妇女,她担任服务员工作,受到单位上下的好评,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但也有强烈的易性意愿,萌发之时才16岁。辽宁某市还有一个20岁的女青年,来到人世一年,就失去了母亲。父亲和姐姐一直按照女孩子的生活方式,将她抚养成人,但当她步入青春发育期后,性格变得十分内向,喜欢一个人独自坐在屋里凝思静想。同时,她对男孩子的服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仰慕男孩子的神情和气概。到初三时,她明白自己不能成为一个男子汉,终日沉默寡语,大热天也不穿裙子,而着一身运动服,在学校不上女厕所,小便也要捱到中午回家。老师、同学嘲笑她“不正常”,她的内心十分痛苦,学会了抽烟、喝酒,企图以此摆脱困境。初中毕业后,她不愿再上学,终日在外游逛,家人批评她,有一次竟服毒自杀,幸被及时发现救活。尔后,她常在自己手臂上用刀划痕,自己折磨自己,不想再活下去。

广东有一位自称“错生性别的人”，给何教授写信道：“我是1963年出生的，在我10岁时，我就希望自己是一名女孩子，喜欢和女孩一起玩耍。上初中时，这种意向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强烈，特别爱穿色彩鲜艳的服装，留女孩子的发型，言行举止也极力效仿女性，虽然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但我的举止却多次遭到老师和家人的指责，这并不能改变我的易性倾向。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体内产生，我猛然觉得，是老天爷错生了我的性别，把一个女性的灵魂依附在一个可恶的男性躯体上。”

有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仍难以抑制自己的变性欲望。某地有一位省级剧院的青年演员，已小有名气，仍渴望变性。他从小学习成绩很好，能歌善舞，但他决心报考艺校。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考重点中学，将来能进大学？他说，做一个演员，可以化很漂亮的妆，穿好看的演出服，其深层的思想是可以在舞台上饰演女角。后来，他果然如愿进了艺术学校，学习也很刻苦，毕业后分配到一家剧院当了演员。报到的那天，领导见到他问道：我们要的是一个男演员，怎么来了个女娃子？他回答说：我真的是个男孩，不信你问我爸爸。进了剧院后，他演了好几出戏，表演非常出色，但有一个心愿未了：变成女性。这种感觉，随着年龄的增大，越来越强烈。发展到后来，戏也无心演了，脱下了女装就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惶惶不可终日。他遇到变性舞蹈家金星，问他出路在哪里？金星称他“妹妹”，劝他上医院诊治。医生建议他做手术治疗。剧院的领导很开明，为他开出了同意做易性手术的证明。

还有更触目惊心的，则是来自新疆喀什的一封来信。2003年12月，何教授收到了一位新疆病人赵元一的来信。他患易性病已有八年，这个折磨自己那么久的难题，只有用动手术的办法

来加以解决。他不想再求助于亲人的资助来支付手术费。他提出了一个让人心跳的解决办法——用自己五年来的积蓄加上两次卖血的钱,用来支付手术费和路费。他在信中充满期盼地写道:“当上海那个令人神往的大都市还沐浴着新时代的太阳的时候,新疆这片古老西域的土地上早已披上了古丝绸的银装——到处是白雪皑皑。在我的心头仍然想念着您,当我最痛苦和无助的时候,我就会展现你给我的回信。我一定要在人生的大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希望您能帮助我摆脱困境。苦命儿赵元一。”

如果是双胞胎,一人有变性的要求,另一人是不是也盼望易性呢?也不一定。浙江某市有一对双胞胎,都是女孩,一直同居一室,穿同样的衣服,作一样的打扮,但双胞胎长到20岁时,妹妹长成一个活泼健康的少女,打扮得花枝招展,正在与一个男青年谈恋爱,而姐姐却不爱红装爱男装:小分头,牛仔裤,酷爱跑、跳等体育活动,成了一个“假小子”,她现在觉得和妹妹同居一室“蛮别扭的”,“不方便”,提出要和妹妹分室而居。姐姐做梦也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英俊漂亮的男子,坚决要求施行易性手术,这种念头使父母大惑不解。

即使工作万分紧张,也不能使易性病患者熄灭心头的烦躁之火。一位终年在野外工作的地质勘探队员,用诗一般的语言,向何教授陈述了自己深沉的痛苦和强烈的易性夙愿:“我独自漫步在纷纷扬扬的雪原中,任凭寒风像刀一样割我的身与心,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进在白色的田野上,身边呼啸而过的火车每一声长鸣,都撕动着我的心……何教授,岁月悄悄地从我身边流逝,黄金时代正在渐渐离我远去,我向往的新的生活似乎愈加渺茫,但是,我庆幸见到了您的名字,我每日每夜都在等待您的佳

音,也许我将会失败,我可还在苦苦等待着柳暗花明的一天的到来——哪怕现在只见到一点星光!”

中老年人也并非与易性无缘

易性病患者青年居多,但并不等于说,中年人就和易性无缘。莫里斯的由男变女,是40多岁、和妻子生了4个子女以后的事。就我接触到不少材料,在40岁以上,有了子女的爸爸、妈妈,要求易性者,也不乏其人。黑龙江省鹤岗市有一位工人,已42岁,但仍要求由男变女。他为了使自己变成女性,服用了大量雌性激素,然则非但未能如愿,反而变得不男不女,他难受极了。某大学有位副教授,已64岁了,男性,但仍渴望易性。他在大学毕业后,虽历经肃反、反右、四清、文革等历次运动,但要求做个“表里如一的女性”的意向并未减弱,反而愈来愈强。他自称,易性后变成一介老妪亦不妨,而且坚信一旦变性后,对任何人不会造成损害,自己则因此能迸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成都市居然有一位年过八旬的老汉,在前几年,也瞒着老妻做了易性手术。据东方网2004年6月2日报道:家住成都北门的黄老太,今年已80多岁了,但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临到暮年,在自家屋里又发生了一件“新鲜”事,与自己朝夕相处60多年的丈夫,竟擅自去医院做了易性手术,两夫妻在一夜之间成了“姐妹”。对此,黄老太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但想到两个子女,想到自己已80多高龄,就忍了,希望就这样和睦相处,到死算了。可是,近年来,变成女性的“丈夫”,还经常骚扰她,她已无法忍受。黄老太还说,她和“丈夫”结婚时还是在解放前,当时没有到有关部门登记,因此他们之间是事实

婚姻。由于没有登记结婚,就不能到民政部门协商离婚,而只有到法院去判决离婚。“丈夫”变性后,还将身份证改了,模样举止也有了一定的变化,邻居和亲戚都知道有这回事。其实他俩已经不具备夫妻的基本条件。她和女儿商量后,毅然决定和丈夫解除这段婚姻。2004年6月1日,黄老太由女儿陪同来到城北法律事务所,要求这里的法律工作者帮助她了断这段名不副实的婚姻。

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易性病患者老中青都有,年龄不是一条发病率高下的界线;工作情况的繁忙,也不会使他们对易性病患者增强免疫力。患这种病的人,虽然只占整个人口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患了这种病的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生不如死,其痛苦实在是难以言表。因此,他们对病情的申诉是值得同情的,社会不应歧视他们。

福建最新报告:73岁的陈老汉变成“陈老太”

这里要向各位作一个最新报告:据2005年4月19日媒体报道,福建一位年逾七旬的老汉五十年困惑“真身”,一朝去了病,还我老太身。

老汉姓陈,是一位退休干部,今年已73岁。2005年3月16日,他在厦门中山医院完成了易性手术,了却了一辈子的心愿。他逢人就说:“这一天是我的再生之日。”

事情是这样的:据厦门中山医院整形外科医生修志夫说:2005年3月13日上午,他正在给一位女青年谈整容的事,一位梳着齐肩头发、围着一条红丝头巾、身上穿着花花绿绿的毛衣的“老太太”,走进了他的诊室。“老太太”很兴奋,拉着修医生的

手说：“我可找到您了。”修医生感到很奇怪，因为他虽然接触过许多病人，但对这位“老太太”，似乎没有一点印象。他想，难道她也想整容，有点不好意思开口？在生活中，现在老太太想美容，也不是个别的。于是他对这位老太太说：“阿姨，您找我有何事？”老太太笑笑说：“你看得出来，我想来干什么的吗？”修医生毫无准备，一脸茫然。他对老太太说：“很抱歉，我不明白您的来意。”“他”对医生说：“我要切掉下面的东西。”因为他长相太女性化，医生反问：“你要切除子宫吗？”后来，医生明白了：他要切除的是男人的阴茎。老太太大声地对修医生说：“想请您帮个忙，我是男的，想变成女人。”“手术并不难，只要把我的下身那个东西切掉就成了。”

手术倒是不难，但难在于要了解他为什么想变成“她”。修医生至今还难忘陈老汉要求易性的那种急迫而恳切的神情。陈老汉自诉自六岁起，就觉得自己是个女孩子，爱穿姐姐的衣服，喜欢和女孩子一起玩。后来，随着年岁的增加，他越来越强烈地盼望自己能做一个女人，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因为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要肩负起非常重要的传宗接代的神圣使命。他初中毕业后就参加革命，曾拿过手枪打过土匪，是勇敢的小伙子。他多才多艺，越剧、黄梅剧、歌仔戏、闽剧都能唱上几段；二胡、京胡、风琴玩得有板有眼，写得一手好书法，单位开会，会标都是他写的。他当过剧团的一把手、文教单位的领导。现在享受离休待遇，医药费全报。但他太有女人味了。他从小在女人堆里长大，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家里穷，他一直穿姐姐们穿过的衣服。他不明白：为什么她们都是女的，我却偏偏是男的？他没有喉结、没有胡子，人家都怀疑：他肯定不会有孩子。医生也说：像你这样的人，最好不要结婚。他不服

气,偏偏要结婚生孩子。他遇到了比她小1岁的女青年林月芬。20岁时,两人结婚了。他多才多艺,柔情似水,亲手为妻子做衣服、裙子。妻子在性方面并没有太多的要求,他在精神上的加倍爱抚,给妻子带来了极大满足。次数极为有限的性生活,却制造出了4个小生命,他们有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他觉得,自己与妻子的相处,更像姐妹甚至是母亲与女儿的关系。他9岁那年失去了母亲,于是将对母亲的依恋寄托在妻子身上。下班回家,他从不开门,而是在门口高喊:芬,我回来了!妻子嗔怪:你怎么老不带钥匙?他撒娇:我带了也不开,我就要你帮我开门!他写过一首诗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深情厚爱:我家有片林,永世花玉婷。远近闻奇讯,爱神也亲近。念我林太美,林中赐真情。月月花更艳,芬芳永留存。每句诗的第一个字连读,就是“我永远爱念林月芬”。但自从有了几个孩子后,他们就结束了性生活。陈老汉觉得过夫妻生活是一种罪恶。因此,陈老汉觉得对不起妻子,在日常生活中对妻子更加体贴入微,妻子也很谅解他的照顾,但始终不愿意离婚。这种没有爱情只有同情的婚姻生活,一直维持了50年。66岁时,他彻底失去了性功能,女性特征越发明显,以至搬入新居后,邻居们将他和妻子当成姐妹看待。他对妻子说:我已不能尽丈夫的责任了,我想做变性手术。妻子不同意,一方面担心手术出问题,更担心变性后显得年轻的他,会离她而去。

2004年初,林月芬不幸得了癌症。临死前,妻子说:“你去做手术吧。以前我不答应,是因为担心失去你。”他对妻子发誓:变性后,我也是女儿身了,我永不再娶,一辈子只属于你。2004年7月的一天,与他相伴一生的妻子去世。他觉得家庭的阻力没有了,下决心要做易性手术,并四处奔波,打听哪里可以

把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女性。后来,他得知厦门的中山医院能做易性手术,便找到了修医生。修医生为他作了认真的检查,发现陈老汉的易性病的确是原发性的。他的易性愿望是如此的强烈,六十多年而没有改变,但老汉有多种疾病:高血压、心脏病,还有心肌梗塞的病史。修医生不赞成他做这个手术,并告诉他如做易性手术,有一定的风险。但陈老汉矢志不渝,铁定了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无论如何也要变成一个女人,妻子活着,自己不能变,妻子死了,自己更要变。他说:“我不怕手术有风险,我等了50年,就等这么一天,哪怕生命只剩下最后几天,也要做几天女人。如果变性不成功,我宁愿死在手术台上。这叫做好死胜过赖活。”他还劝修医生说:“我的心脏病就是因为不能变成女人而引起的,心里难受极了,才得了心脏病,如果早些时候做手术,我就不会有这些毛病了。”修医生看他变性的决心是如此坚定,知道劝说也无效。与其如此,不如操刀一割算了。

手术需要家属签字。起初,儿女们不同意:你变成女的,我们怎么称呼你?他说:喊妈吧。儿女说:不行,我们只有一个妈,刚刚死去。经过一番交流,懂事的大儿子在手术单上签了名。因为他今后不再过性生活,同时胸部的肌肉和皮肤已下垂,手术的内容仅为阴茎切除一项,不需要再造阴道和乳房,因而比较简单。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他本来就没有喉结,也没有胡子,减少了手术难度。2005年3月16日,只花了不到3小时的时间,手术就顺利地完成了,72岁的他实现了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拥有女儿身。陈老汉终于变成了“陈老太”,病人、医生皆大欢喜。修医生说,“陈老太”在住院观察期间,我们发现她的尿道移位之后状况很好,手术后住院仅10天,“她”就开始了新生活。

她出院后,一身女装,红格子外套,耳环、戒指、手镯,环珮叮

当。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笑露出一对酒窝，显得顽皮可爱，丝毫不像年过七旬的“老太太”。采访她的记者喊了一声：“美女阿姨。”她开心地笑了。现在，她和保姆住两居室房子，儿女们也渐渐理解了她，为她买来影碟机，周末常回来聚聚。她也想得很开：一定要好好过上几年女人的日子。她利用充裕的时间，到全国各地的名山大川旅游，交了许多新的朋友，度过了她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她逢人便说：“做一个女人真好！”

女性病人的比例也不低

查一查国外的医学文献，有一种说法，说易性病患者，男性大大高于女性。从何清濂接触到的病例材料来看，此说并不准确。女性要求易性者，人数不少。与男性易性病患者相比较，比例也不低。据何清濂完成的近 154 例变性人手术中，由女变男的占有四分之三。

下述材料，同样值得整形外科的专家们读一读。

我国南方有一位年轻的母亲，为其两个尚年幼的孩子来信求救：“我有两个女儿，大的 12 岁，一切正常，小的才 10 岁，她喜欢留平头，穿军装，玩枪使棒，与男孩子们结帮拉伙，冬天打架，夏天玩水，常常吵着要做男孩。与小朋友玩时，让比她小的孩子喊她‘哥哥’，不喊就打。有一次看见一个男孩穿开裆裤，伸身就去揪他的‘小雀雀’，说要揪下来安在自己身上，揪得男孩脸色大变，也不松手。我告诉她安不上，她很失望，哭着求我‘妈妈求求您，让我变成男孩吧！我愿干重活，长大当军官……’我们实在无法可想，恳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吧！”两个女儿，一个有易性的强烈愿望，一个却生活得很好，可见易性病与遗传无关。

杨莹晶是上海一家公司的计算机操作员,今年22岁。她诉说道:“那是在上初一的时候,随着女性月经的来临,我开始十分羞愧。我讨厌尖细的声音,讨厌女性的外表特征,更讨厌女性特有的月经。到了乳房隆起的时候,我就死命束胸,还尝试过用药物停经,睡觉时用砖头压住双胸,但这一切都无效。万般无奈的我,常会在夜深人静之时跪在地上,祈求菩萨保佑,把我变成一个男人……”



易性病患者的臂上刺着“忍无可忍”四字

刘晖是武汉一所大学的研究生,今年23岁。她说:“我恨父母,为什么生了我一个女儿身,却给了我一个男儿心?我做梦都企望自己是个男人。每当痛苦得不能自拔时,我就用刀一点点地划自己的身体,划得全身伤痕累累……”

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也会患上易性病。西北某大学有位青

年教师,她从几岁起就产生了“我不是个女孩,上帝分错了身体”的想法。她在童年时,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长大成人后,她更加相信自己女性的外表是一种伪装,而内在的自我是一个男性。这种表里纠结于一体的矛盾,折磨得她五内俱焚,日夜不得安宁。她也试图用发愤学习的办法,求得心理状态的平衡,但诸种努力都失败了。到十五六岁时,她终日神思恍惚,学习成绩直线下降。后来,她终日沉默不语,充满了对自身的厌恶。家人找了一位心理学家诊治,但收效不大。她需要的是一位外科医生。她认为,劝说、胁迫、麻醉药、心理分析甚至电击,都不会动摇重归男性队伍的决心。既然父母亲已错生了性别,纠正这种错误,唯一一法——“正身”。有人告诉她,在国外可以做这种手术,但需要十几万元钱。为了筹集这笔巨款,她高中毕业后,没考大学,工作了两年,积攒了一笔钱,买了两台编织机,回家当了个体户。她起早摸黑地干活,但离出国就医的目标,仍然很遥远。后来她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以优异成绩留校当了老师,但她渴求易性的欲望,并没有因此减退,反而愈加炽烈。

广东有位已年过30而未婚的农村姑娘给何教授来信说：“我的一生最大的希望,就是把我改变成一个有生育能力的男人,就算千刀万剐也心甘情愿(愿),永不后悔,假如改变不了,我这一生最忧郁,成为一个废人,也是一个世界上最苦、最惨的人,如能实现我的心原(愿),我就是世上最幸福、最开心的人,我的下半辈子将活得有味道。”

兰州有一位姑娘,1969年出生,从小性格开朗,聪明伶俐,学习成绩出众,初中就考上了省重点中学,但在发育期间,却产生了一种非常反常的感情,和女孩在一起处处感到别扭,和男孩

相处却视如兄弟,她不愿穿女孩子的服装,怕见女性用品,也不愿上女厕所,思想上痛苦不堪,月经也不正常,一年只来二三次,1992年考上了大学,许多同学不理解她,引来了许多怀疑和误解,“此愁无计可消除”,她只有含泪辍学,离开了深爱的象牙塔。离开大学后,她花了不少钱治疗自己这种“怪病”,也不见成效。她终于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曾自杀过一次,但被家人发现,抢救了过来。有一天,她独临萧瑟的秋风,看着片片落叶离开枯枝回归大地时,她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她顿时觉得脑际出现了一片空白,顿时万念俱灰,竟皈依了佛门,出家做了尼姑。暮鼓晨钟,以度余生。一日,偶然看到《文汇报》上刊载何清濂完成又一例女变男的消息,一颗冰冷的心重新跃动起来。她给何教授写信,请他无论如何,救她一命。她写道:“何教授,你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救救我吧!”

已婚了的贺利兰,是四川的一名石油工人,现年27岁,同样强烈地渴望变性。二十几年前,她就想变成一个男孩。在成都市读书时,看到报纸上有关变性的报道,就写信给何清濂,要求变性。参加工作后,小贺为了摆脱变性的困惑,交了一个男朋友;后来,为了分到单位里的一套住房,她和男朋友结了婚。但是,结婚对贺利兰来说,实在是一种大不幸。2003年8月1日,贺利兰给何教授写信道:“婚姻对我来说,什么感觉也没有,甚至是一种负担,特别在夫妻生活方面,我感到厌恶,总觉得和他是同性人,做这方面的事,很恶心,所以我们在性生活方面几乎没有,他也感到很痛苦(但他很喜欢我,所以就忍了)。我在和他做这种有名无实的夫妻的同时,我却喜欢上单位里的一个女孩,与她在一起,才有一种幸福和快乐,是从来没有的那种感觉。我痛恨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现在我已和原来的丈夫结束

了这段不幸的婚姻,和那个女孩已相爱了四年。”她恳求何教授能为她做手术,“能给我以光明,让我的生命重生!”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种易性的渴求,竟然也扩展到夫妻之间。湖北有一个工人,年近半百,妻子是一位营业员,生有一女一男,分别为18岁和13岁。现在夫妇要求将他们的生殖器官互换,让丈夫成为妻子的妻子,而妻子则成为丈夫的丈夫。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还要生一个孩子,为中国的易性手术作一点贡献。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相信这个要求也许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夫妻两人热情支持您,预祝您获得新的成功。”他们还郑重其事地在信末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还认真地询问需要什么手续,大约需多少费用等等。这无疑是一种近乎开玩笑的设想。因为无论从医学上、生理上,还是从道德与法的角度来看,此种建议是不可接受的,但作为一种设想,其心态值得研究。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做父母的,从“品种齐全”出发,也希望为孩子做变性手术。杭州有一位母亲,是一名机关干部,专程来上海向何教授探询:她有两个女儿,小女儿才8个月,长得极像男孩,可否在幼儿期间为她做易性手术?这种要求是违法的,这里也暂时立此存照。

罗列了上面这些材料,无非想说明,女性要求易性者,为数也不少。形形色色,无奇不有,这的确确实是一种疾病,无论是从治病救人出发,还是从发展中国的医学科学出发,都应当把易性病的诊治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

罗列了上面这些材料,也无非想说明,当你走进这群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变性人在没有变性之前,其内心是复杂和痛苦的,他(她)渴求能与其性别相反的人一样地生活。如果变性要求不能得到满足,他(她)甚至可能自残或做出对家庭、对社会不

利的行为。对他们来说,身体的改造所带来的巨大生理痛苦及正常人好奇甚而怪异的眼光相比,那点痛苦已微不足道。

对马丁诺提供的一份材料的论证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再转向海外,研究一些外国的女变男的材料。

美国人马丁诺完成女变男的手术后,和一位名叫琪恩的姑娘结了婚,动用自己的积蓄,设立了一个变性咨询服务机构,腾出了前间卧室来接待各种患者,并放映幻灯片,回答患者本人和他的女友或妻子的各种问题,并对所有的资料保守秘密。通过咨询,他们对变性人的过去和现在的发展有了深切的了解。他们调查分析了100个男女变性人的特征,并写下了统计说明:

变性人的平均年龄是27岁。身高5英尺4英寸,体重为144磅。人种有爱尔兰、意大利、德国,这三个国家患者为数最多,以下按人数多少为序有:英国、波多黎各、波兰、法国、希腊、西班牙、瑞典和挪威。只有一人的国家是: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古巴、丹麦、匈牙利、印度、罗马尼亚、俄国和土耳其。其中有多重国籍的占3%。

87%出自父系家庭,13%是母系家庭。

60%来自散漫的家庭,20%是一般家庭,20%是温暖和睦的家庭。

73%有宗教信仰。其中57%属罗马天主教,34%是基督教。

有40人中学毕业,18人大学肄业,17人大学毕业,11人有硕士学位,6人在研究生班肄业,6人没有受完中学教育,2人有

博士学位。

职业：从不需要技术的劳动者以至大学教授。

80%的人都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变性人。

100%的人都认为应该在婚前告诉给伴侣。

90%的人要和“旧生活方式的女性”结婚。

5%的变性人的妻子，在遇到女变男的变性人以前，曾经有过同性恋的关系。

6%的人在手术以后，经常涉足于男同性恋酒吧。

这个材料是很宝贵的。它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它为医学科学研究变性人的课题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依据。在我国医学界，现在还拿不出这样比较完整的一份统计材料。

首先，这份统计材料说明变性的强烈要求，大都来自青年人，或在青春发育期间。因此，变性人的平均年龄是27岁。过了30岁这个年龄阶段，要求变性的人数就大为减少，即使依旧存在变性之想，也变得比较易于遏制。

其次，它又说明温暖和睦的家庭环境，可以适度地遏制变性的渴求。在这100个变性人中，60%来自散漫的家庭，20%来自温暖和睦的家庭。看来，不良的家庭环境，对子女缺乏足够的抚爱，或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缺少必要的沟通，就会萌生对变性的渴求。有的家庭发现子女有变性的念头，则视为“大逆不道”，以为“不体面”、“不道德”，重则打骂歧视，轻则冷嘲热讽，这就无形之中把有变性要求的人推出家门，使变性病患者的病情越发加重，最后只能到医院去寻找手术刀，以求得解脱。

第三，说明有变性要求者，不是因为无知使然。恰恰相反，期望变性者，在100人中，竟有半数以上受过高等教育，仅6人没有读完中学。变性手术是医学科学昌盛的产物，是人类文明

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的产物。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更易萌发变性之想。但是,患易性病的病人,又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在这100名变性人中,从普通劳动者到博士、专家学者、大学教授都有。

第四,变性之后均有性的渴求,希望和异性结婚,也希望有子女。

关注易性病的医学专家学者,是否可以从马丁诺提供的这份材料入手,作进一步的深入的研究和论证,以期进一步解开要求变性之谜。

从扭曲的灵魂到自残的躯体

有易性要求者,如心理状态不加平衡,任其发展下去,有可能从心理变态导致生理自残。除前述秦惠英的来信外,另据《乌鲁木齐晚报》1991年9月18日报道,在9月9日10时,昌吉市公安局接到报案:一男青年在该市医院门口台阶上昏迷不醒,下身鲜血淋漓,性器官被切除,公安机关迅速投入调查,证实这是一次要求变性者的自残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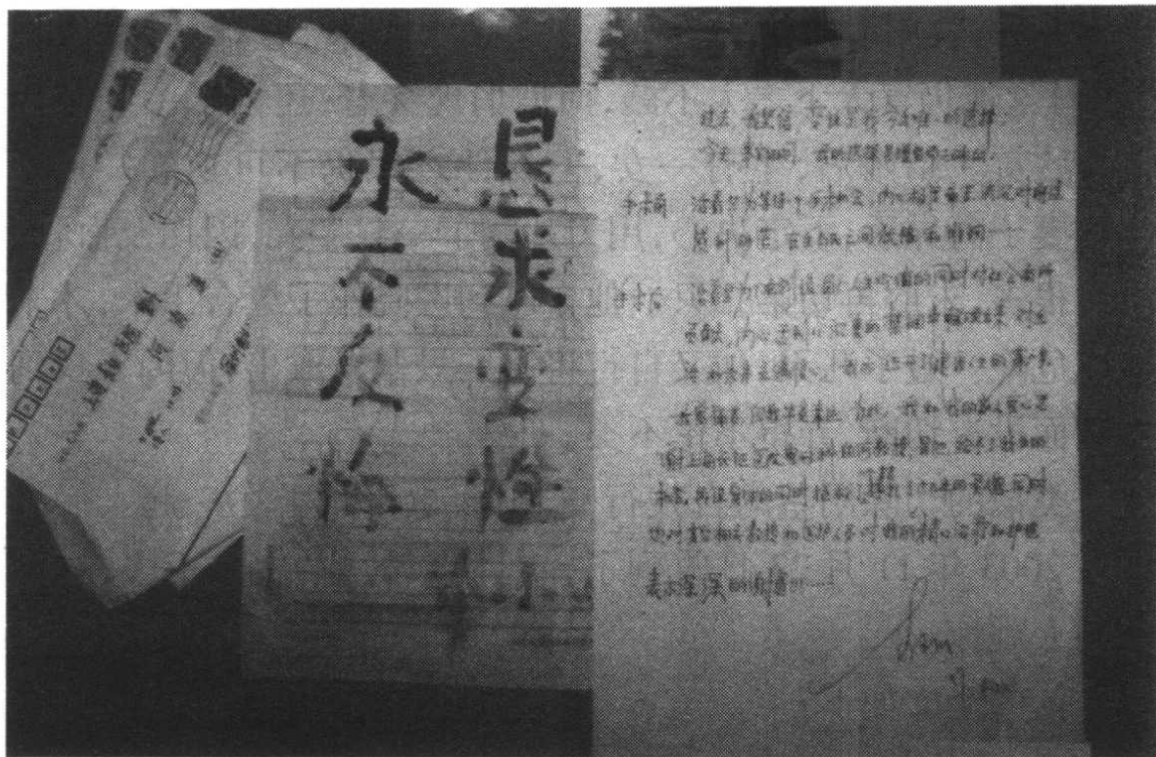
自残者当时32岁,在某医院工作。1984年结婚后,有一个7岁女儿。据患者自述:他从小就十分羡慕女孩,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心理变态日益严重,已伴随他20年,他常常偷偷使用妇女用品以寻求抚慰。高中毕业后参了军,紧张的军营生活,也没有充分遏制这种心理的滋生。他偷偷地购买了一些女性服装,穿在军衣里面,还将军裤也改成女式的,或借口外出,躲到无人处,换上女装溜达一圈,才感到舒心。复员后,他被分配到某单位工作,要求易性的念头更强烈。结婚并不能遏制其变性之想。

他乘妻子上班之际,穿上她的衣裙、乳罩,涂上口红,还忍痛穿耳环,修眉毛。在单位里,同事、朋友们都嘲笑他、奚落他。他变得沉默寡言,后来索性辞掉了工作,以自残来达到易性的目的。

1991年9月9日上午8时,他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手术刀、麻醉药、纱布等,自己将睾丸割去,当麻醉药的药性过后,他疼痛难忍,不得不跌跌撞撞走出家门,由于失血过多,终于在昌吉市医院门口昏倒。经医院抢救,才脱离危险。这个自残者提出和妻子离婚,但妻子和他感情不错,表示:离婚后,可和他以姐妹相称,孩子也可互相往来。但是,假如这个易性病患者得以如愿,这样的“夫妻关系”能否继续存在下去,是否合法,则是大可怀疑的。

这名患者在自残前曾去过不少大医院治疗。他曾去乌鲁木齐市精神病专科检查,经测试分析,精神一切正常;又经新疆医学院中西医结合的专家会诊,确诊无精神病症。后来到性心理咨询门诊,认为是性心理变态,确诊患的是易性病,医生说这种病没有较好的药物治疗,只有经过自身锻炼,达到心理平衡。他在家人的帮助下,根据医生的建议,制订了周密的工作、学习、娱乐计划,充实精神生活,分散心理压抑状态,可是坚持不到两月,旧病又复发了,如此循环往复三次,心理上的痛苦有增无减,终于出此自残下策。自残后,家人作出了妥协,同意他申请做易性手术,但家人要求他在手术前,再也不要做出更可怕的事。

像这样的情况,决不止前述两人。在80年代末的一天,广州有一男青年,是公共汽车的售票员,3岁那年,就产生了易性的要求,成年后,他一直把自己打扮成少女,他对自己的男性生殖器十分痛恨,多次上医院要求医生对他作“更正”。但医生经



求治病人写来的血书

过认真检查,认为他的生殖器发育良好,无须作“更正”。售票员见别人无法帮助他,就想办法自己“帮助”自己了。于是,他从商店里买来了刀子和药棉,返回家中,解开裤子,操刀一割,把那个可恨的东西割了下来,外婆回家,见他已昏倒在地,大惊失色,急送医院救治,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他自己给自己“动手术”的当天,他光荣地获得了广州市“模范售票员”的称号,因为他的温文尔雅的服务态度,曾多次收到乘客的表扬信。“模范售票员”和易性要求并行不悖。广州这家医院将错就错,将他推进了手术室,为他作了男变女的易性手术。可是,当时囿于人们的认识水平,认为这是“模范售票员”的隐私,没有对这件事作公开报道。

与秦惠英有同样的自残意愿者,山西也发现一个。山西某厂有一名工人,男性,从上中学就欢喜穿女性服装,1968年从学

校毕业后,就用菲薄的工资买了一些女式服装、花棉袄,时值扫“四旧”,他仍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悄悄地穿着,还拍了一些照片自我欣赏。结婚后,生有一女,但易性之想仍不可逆转。1991年和妻子离异后,下定决心,用刀片割下一只睾丸,因切及血管,出血很多,未敢再切第二只。他自己到医院作了缝合手术,才未造成危险。过了几天,他又自行将第二只睾丸取出,但因未找到血管而没有切断,弄得不伦不类。

类似的切除阴茎的自残行动,山西也不只上述一起。何教授在2003年11月23日收到了一封简单的信,文字不多,内容却叫人震惊。

信的全文如下:

“尊敬的何教授:您好,我叫王蕾,现年22岁,家住在山西太原市,现在一家部队工厂工作,是家中的独生子,母亲在四年前去世,现在和我爸,还有继母一起生活。我从小患有易性病,在4岁时,心中就有一个强烈的念头:自己根本不是一个男人。我也试着用各种方式克服和改变心中的这种欲念,但一切都是徒劳,我只能在生与死之间挣扎,让自己愈陷愈深,而且更加痛苦。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痛苦越来越折磨着我,让我每时每刻都感到:活着好累。有好多次,我想结束自己的生命算了,但反复想想,又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做,为了自己和家庭,也要活下去。在2002年4月底的一天,我终于用一把刀片,把自己下身双侧的睾丸切除了,并在我爸工作的医院做了清创手术,全家的人都知道,他们对我的态度没有太大的改变,单位的领导和

同事都知道了，更关心我的身体健康。我希望您能帮助我完成其余的手术，一切重新开始。对不起，何教授，我不太善于写信，所以写不好，请原谅。”

自残的方式除自己切除生殖器外，还有的患者用绳子将阴茎和两个睾丸牢牢捆起来，扎了个严严实实，在痛得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轻轻地解开。有一名易性病患者自发病至今，已自我捆扎了十几次。时间最长的一次是一整夜，第二天早上去上班，才不得已将其解开。他以此作为要求变性的一种象征。还有一个45岁的男子，易性病极为严重，每年到秋季尤甚，情绪忧郁近乎失控，表现为捶胸、头撞墙、厌世，但是，他与妻子感情很好，育有两个孩子，每当病情发作时，妻子总是好言相劝：“你可以不考虑我，但无论如何也要考虑到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因此你必须坚持活下去。如果实在忍受不了折磨，我同意你做易性手术，只要你能愉快地活下去，这就是我唯一的希望。”这位易性病患者有这么贤惠的一位妻子，才使他免于走上自残或自尽的不幸道路，后来，他终于如愿以偿，何教授用自己手中的一把手术刀，挽救了他的生命。

女性要求易性而不能如愿以偿，有人走上自杀的道路。李一妮是南方某大城市的商店营业员，是年27岁。她患易性病已有十几年。李一妮从小就具备男子汉心理，一直拒绝穿女装，渴望成为一个男子汉。一旦这种愿望不能实现，内心十分痛苦，长期的忧郁使她产生轻生之念：与其这样生活下去，还不如死掉拉倒。她曾在失控的情况下三次自杀。第一次服安眠药，昏睡两天醒了过来；第二次服降压片，被抢救了过来；第三次是切腕，被家人及时发现后送医院缝合。李一妮的母亲为此焦虑万分，给

各有关部门写了一封恳求信：“各级领导：为了使我孩子解除十几年来的痛苦，为了她将来乃至一生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堂堂正正做人，我同意为她做女变男的手术。作为母亲，我能深切理解孩子，她的痛苦与压抑是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她是个诚实、要求上进的好孩子。她对待生活、对待困难、对待挫折的勇气以及独立的个性使我们全家佩服。因为有病，她失去了一次又一次发展的机会。所以，我们支持她通过医疗手段来解除这种痛苦，去拥有一个幸福的未来。我希望大家都能理解她，给她一个快乐的人生。”何清濂教授和他的助手对这个病人的病情作了细致的研究，认为她和秦惠英一样，已处于一种更严重的病态之中，如不及时对她做手术治疗，这个病人随时有丧命的可能。

要求易性的强烈渴求，促使有些人作出了一些反常的举动，甚至不惜以身试法。我还读过一封从边境收容所寄出的信。这封信是用铅笔写在一张手纸上的。这个27岁的女性病人，是新疆某厂的工人。她曾因要求变性而到北京、上海多次求医，但未能如愿。“来自家庭以及社会各方的压力，使我产生生不如死的想法。我很痛苦，我已快30岁了，我不知我活着为什么。我曾有理想，有抱负，可是这种反向性格让我生存很困难，在这种沉重的心理负荷的压力下，我来到新疆，想偷越国境。因为我曾在一张报纸上看到有关瑞典变性人的报到（道），我想到瑞典去找那位医生，但在边境被抓住了，我现在新疆某地武警边防收容审查站。我现在是做（作）一名犯人给您（何教授）写这封信的，如果有什么不敬之处，请多多原谅。希望您能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帮助我，哪怕给我写几句话，也能使我增强活下去的勇气。谢谢

您能把这张纸看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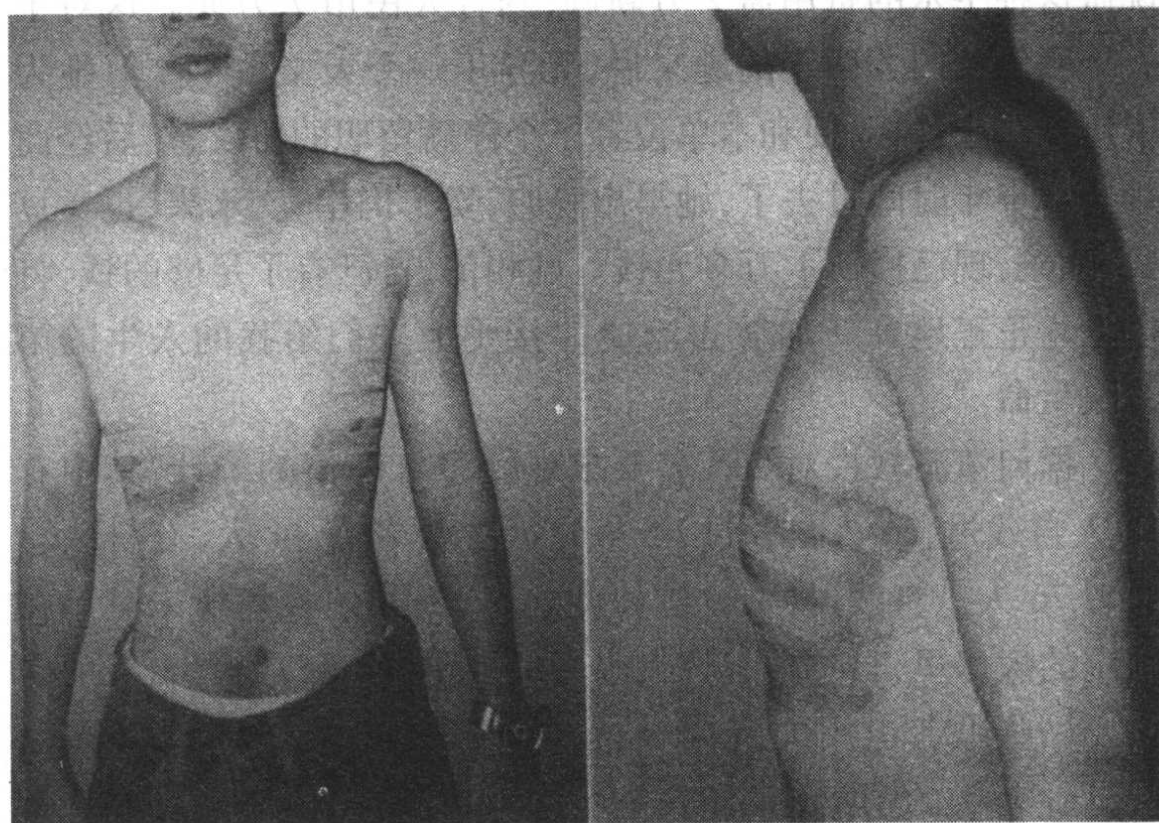
信是这个病人托人从收容所里带出,转交到何清濂手里的。无独有偶,另一位新疆的患病女性,虽也产生到国外求医之想,幸而没有走到越境这一步。她在报上读到《新加坡变性人及其变性手术》一文,由于发现了“一线新生命的光源”,于是便写信与新加坡国立医院联系,该院郭丽萍教授很快给她回了信,信中说做这种手术的费用需2万新圆,约合人民币7万元。这对于一个刚出校门才两年的她来说,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但她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便和本单位签了个停薪留职的协议,然后经商赚钱。半年时间过去了,她早出晚归,卖羊肉串,卖水果,也卖豆浆、油条,现已攒下1万多元钱。她相信,自己有了足够的钱,将会堂堂正正地到新加坡去治疗,“接受大夫们给我的人生的第二次生命。”

据何清濂教授对295名要求变性患者病情的统计,其中有10人自残过,26人自杀过,产生自残念头者有44人,有自杀念头者76人。自残、自杀比例如此之高,为其他疾病所未见。在医院的病房里,只要拉起许多患者的袖子,就可以看见自戕的伤口。一些患者也用文身来表达被抑制的情感,这些文身多是“忍”字一类的图案。

自残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的。山西某印刷厂有一位女工,痛恨自己隆起的前胸,就用刀片把胸脯割得伤痕累累,但并不能变得像个男人一样平坦,于是,她用布把前胸紧紧束住,即使胸闷得难受也不在乎;她还用各种办法阻止月经来潮,以至痛得死去活来。河北有一个要求易性的小学教师,为了使自己的乳房变小,就到五金厂去找了两块铁片,把它捆在自己的乳房上,晚上睡觉,还用两块砖头压着胸脯睡觉,如此坚持了8个月,乳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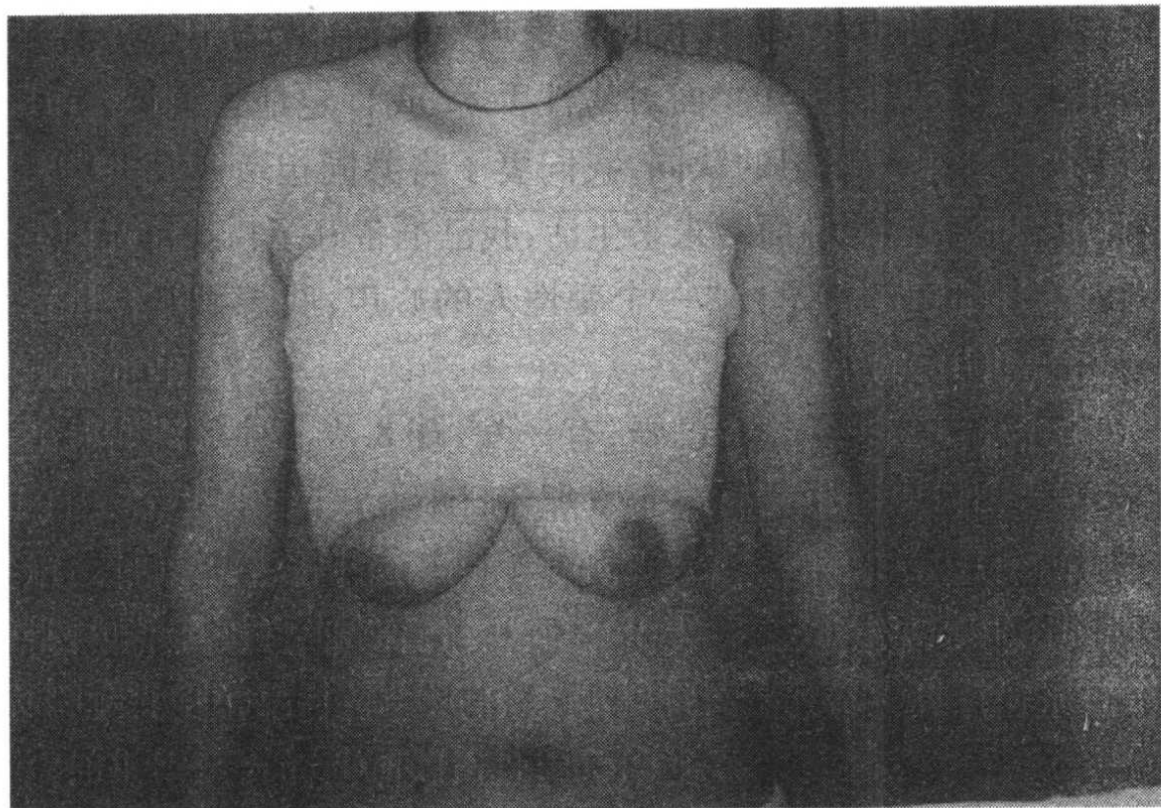
依旧不见缩小。后来,她又到医院买了许多胶布,把自己的乳房粘贴起来,一个星期换一次,导致发炎化脓,处处是伤疤,她的体重从126斤降到91斤,夜里严重失眠,需服6粒安定才能入睡。

在希望自残的病人中,也有人理性占了上风,终于没有走上自残这条路。有一个要求变性的女青年,结婚一年后,就和她的丈夫离婚了。她曾对人说:“在这样一种没有理解的日子中,



这位易性病患者用胶布贴了13年乳房,希望它能消失

年复一年地度过,无疑是慢性自杀。我不止一次地想用自杀方式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可是,我想到自己年迈多病的老母亲,想到一旦我死后她的痛苦状态,便打消了死的念头,我决定为我的母亲而活着,等她老人家去世后,如依然不能变性,我再死不迟。”



还有用布把胸部捆绑,希望把乳房压扁

变性人的心声:我想做只自由的蝴蝶

到了21世纪,虽然社会已有了巨大的进步,但中国绝大部分易性病患者的痛苦并未得到解除。另一种情况同样值得注意,在生活中,随着科技知识的普及,人们对易性病认识的加深,明白这是一种病的人更多了。因此,易性病人不是减少了,而是大量增加了。

据了解,中国现约有5万人要求做易性手术,但已成功地施行手术者,不过近千人,而何清濂教授估计真正完成全部变性手术的,仅有200—300人。因此,在全国各地,“秦惠英式”的呼吁则此起彼伏、连绵不绝。2003年5月17日,何教授又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名叫王迎浩的信。来信末尾有一段动人心弦的

话：“尊敬的何教授，救救我吧！我热爱生活，我要工作。我要活下去，完成我的责任。面对易性手术，我肯定地告诉您：我已得到母亲、妻子、姐姐的认同，我同妻子将共同担负起女儿的未来，我有能力与信心面对未来生活，我已准备好了！我恳求您老人家给我做易性手术！”“一个变性人的心声：我想做只自由的蝴蝶。”

王迎浩，今年41岁，已婚，有一女，现8岁。他的父亲是一位医生，母亲是教师。他在5岁那年，随母亲下乡，到7岁时才上小学，回到上海。王迎浩受过高等教育，毕业于上海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先当教师，后来又下海开了一家商店，收入不菲。

但是，王迎浩从小就有一种强烈的易性欲望。他在4岁时，就向父母亲吵着要穿裙子。爸爸是一个比较开通的人，笑着对妻子说：“他要穿裙子，就让他穿吧，反正我家已有女孩。”当他长大成一个男人时，父亲有时会取笑他说，我们的儿子小时候居然喜欢穿裙子。母亲有时对女儿开玩笑说：“你爸爸小时候也喜欢穿裙子。”但他的父母亲不知道，王迎浩在读初二时，学了生理卫生课后，竟产生自己切除睾丸的念头。有一天，他把书放在一旁，翻到男性生殖器构造那一页，他找来一把刀片，用酒精棉花消毒，当冰冷的刀片接触皮肤，并且割出一点血时，他害怕了，他害怕出血过多而死（他曾看过一段关于阉割的描写，担心自己成为太监），当然，这一切，王迎浩是向父母亲保密的。

自此之后，王迎浩感到自己想做女人是一件很羞愧的事。他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得了精神病？他经常告诫自己：不能有这样“荒唐的愿望”。但是，他又不能摆脱强烈的易性愿望，还是很讨厌自己的男性生殖器。他的内心一直处于犹豫之中：既想变性，又怕变性，既想改变自己的性别，又想隐藏自己的“秘

密”，他经常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之中。

他的性格内向，平时寡言少语，不合群。他不是不愿说话，而是自己内心有很多痛苦，不便与别人交流。他怀着难以启齿的易性欲望，又怕说出来叫人笑话。他并不自卑，反而很自信。他努力工作，当工作中遇到困难时，他会加倍地努力学习，去克服困难，他相信自己会比别人做得更好。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自信，却被未知力量所支配的易性欲望一次又一次地嘲弄。在生活中，他有许多情趣爱好，但在可恶可怕的易性欲望面前，它们都显得黯然失色。

王迎浩下决心摆脱易性病的困扰。他找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如到外面去转一圈或做一些紧张的工作，症状就能减轻些。1986年，他已参加了工作，有一次，易性病袭来，他不得已请了假，到大连、天津、北京、山东逛了一大圈，回上海后，他真的病了，感冒发烧，躺了一星期。1988年9月，易性病继续发作，比以前更猛烈。他祈望出国寻求出路，顺便做易性手术，但在经济上缺乏实力。于是，他在1989年辞了职，下海经商，创业赚钱。创业的繁忙使他暂时摆脱了易性病的困扰，但好景不长，1991年易性病再度发作。这一回来势更猛。他寻找到了一种暂时能克制易性欲望的方法，即把自己置身于危险的环境之中，让自己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他驾驶一辆摩托车，高速行驶，有一次晚上开出去，不知不觉开到了无锡。于是再开回来，不料回到昆山时，已是清晨5点，王迎浩再也开不动了，只能把摩托车托运回来，自己找了一家旅店睡了一觉。他还经常独自一人到长江口去游泳，最远的一次竟游出长江口700米，幸未发生意外事故。他还一个人到穷乡僻壤去旅行，试图摆脱易性病的困扰。他在露宿乡间，受到饥饿逼迫时，他会自己问自己：

我在干什么？这就是我的生活吗？但是，我自己又对自己说：是的，这就是我的生活。为了远离易性病，摆脱易性病，我必须吃别人所不能吃的苦。我只能不断寻找刺激，来平衡心头的易性的要求。这样做，虽然能暂时摆脱一下易性病的困扰，使他暂时忘却要求易性，但不能从根本上割断易性之想。

到了1989年，王迎浩谈恋爱了。他在结识现在的妻子前，没有谈过恋爱。虽也有人帮他牵线搭桥，但都被他以各种理由婉言谢绝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在他的心头徘徊：我这个人也配结婚吗？王迎浩的顾虑重重：结婚后假若有了孩子，哪该怎么办？易性病会不会遗传？但是，另一种思绪也占了上方：结婚后，能不能阻止易性病的发作？如果能，不妨一试。抱着这样的想法，王迎浩和现在的妻子谈了恋爱，并很快地堕入了爱河。爱情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居然使他在一段时间里忘记了易性的痛苦。他在1993年结婚了。结婚时，他没有告诉妻子自己有易性病的经历。他们共度了一段甜蜜的时光，过了三年，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但是，好景不长。到1997年，王迎浩的病又犯了。这一回，病势来得很猛。他极度痛苦，好像《白蛇传》里的白娘娘喝了雄黄酒显出原形一样。他赶紧离开上海，到南京生活了几个月，后来，王迎浩不得已，把自己的患病经历告诉了妻子，妻子抱头大哭了一场，劝他尽量忍耐、克制、控制。但是，这个病就是怪，易性的欲望像一个强烈的磁场，吸引着病人朝这个黑洞一步一步走去。他说：“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了解我的生活和全部痛苦，包括与我最亲密无间的人。”王迎浩的病时好时坏，到了2001年，他已无法正常工作了，他只能把商店的全部经营和管理工作，委托给了他的姐姐。

王迎浩发现自己对易性病已无法可想了。他对易性欲望极

端愤怒,对自己极度失望,但又无可奈何,他需要解脱,再也不能忍受那种折磨了。他想到了自杀。在这种冲动、绝望的冲动的指使下,他到商店里买了一把刀,可惜,这把刀很钝,只割破了一点皮,流了几滴血,疼痛使他清醒了过来。其实,王迎浩不想死。他热爱生活,发现自己的生活周围,还存在一种力量,可以去对抗易性的欲望。这种力量来自对女儿的爱,以及对母亲、妻子和亲属的责任。他想,自己的女儿只有3岁,要是自己死了,她没有爸爸了,妈妈也年纪大了,自己一旦死了,她该多么痛苦!他忽然觉得,自己自杀的念头太自私了。他用拳猛击自己的脑袋自言自语说,为了自己的解脱,竟可以不顾别人的死活,人怎么可以这样?然后,他收起了刀子,决心再好好活下去。

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他用喝酒来麻醉自己。他以为,一醉可以解百忧。但是,他发现,酒醒之后痛苦依旧存在,自己仍生活在痛苦之中。他不得已,继续大剂量服用雌激素,一连服用了几个月,身体反应很大,脾气暴躁,嗜睡,皮疹,胸闷,有类似早孕的反应,身体也向女性化方向发展,他明知自己这样的年龄,大剂量服用雌激素,危险性很大,将严重损害自己的健康,但他已走投无路,无法可想了。2002年9月,他再次自杀,但被家人及时发现,把他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王迎浩感到,易性欲望好像受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左右他,给他的感觉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每到夜深人静之际,他会默默自语:“我要释放痛苦,痛苦的根源是易性欲望。但释放的结果却是越来越痛苦,叠加在一起的痛苦,综合的痛苦。”他一直在寻找易性病的根源,但一直找不到答案。在他身上,痛苦和忍耐交织在一起。他痛恨易性,但又摆脱不了易性。它从一开始就改变了他的性格,改变了他的全部生活,改变了他的生活轨

迹。他说：“上帝要我来到人间，给了我那样巨大的痛苦。如果真的有上帝，我一定会大声地对他说：‘我再也不要来人间了。’”他在每一次与易性欲望抗争失败后，便不得不面对手术治疗时，他都要回顾一下印度的圣父甘地说过的的一句话：“我准备好了吗？”是的，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他如果要做手术，将要面对家庭、女儿、亲人、社会、朋友、工作、未来的生存等问题，他下一步该怎么办？王迎浩依然在彷徨着、犹疑着。他在给何教授的信中又写道：“尊敬的教授，我已把自己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展现在您的面前，我信任您，我等待着您的指点。”

何教授考虑到他已组建了家庭，且又有了孩子，而且他的病情是时轻时重，要不要给他做手术治疗，77岁高龄的何教授直到现在，还想观察一下，没有打定主意。真是不做不是，做也不是。

从上述种种病例来看，易性病患者的病情是五花八门的，病人的经历也是各不相同，能不能做易性手术，也不可一概而论。这是一门专门的学科。但是，在中国，真正懂得它并付诸实施者，为数不多，而关于易性病医学理论的研究，更是大大的滞后。

[撩开易性病神秘的面纱]

易性病人,这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群体。在中国,也是最近十几年来方才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弱势群体。它的绝对数,与中国的13亿人口相比,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

根据国外文献报道,患易性病的病人,占人口比例,男性约为十万分之一,女性约为十三万分之一。又据1968年国外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易性病在男性中患病率为1:137000;在女性中的患病率为1:103000。其发病率各家报道不一,在英格兰男性约为1:135000,女性约为1:105000;在瑞典和北爱尔兰与英格兰相似;在美国,男性约为1:100000,女性约为1:400000;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男性约为1:124000,女性约为1:150000;在荷兰,男性约为1:145000,女性约为1:200000;在新加坡,男性约为35.2:100000,女性约为12:100000;在新加坡这样一个人口不多的国家,要求易性的人却是居高不下。据统计,自1971年实施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例变性手术后,在1980年至2000年间,新加坡接受变性手术者已有409人。看来,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越高、经济越发达,患易性病的病人比例越高。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初步判断,真正的易性病患者的发病率,大大高于上述公布的数字。

我国尚无这方面的统计数据。如按上述比例推算,我国有13亿人口,患易性病的男女病人则至少有一至两万人,再加上其他一些性偏离的患者,总数在10万人以上。据何清濂教授在1998年的统计,全国各地(包括台湾、港澳地区)写信和前来门诊,提出要求做变性手术者达1307人,其中522例要求男变女,

785 例要求女变男。发病者涉及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包括教授、博士、硕士、大学生、中学生、教师、医生、护士、演员、律师、工人、农民、战士、营业员、经理等;年龄最大者 60 岁,最小者仅 10 岁,其广泛性和严重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人们的性别是与生俱来的。那么,为什么人们从娘胎中“定性”出世后,又会产生变性之想呢?

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易性病是一种综合性的病症,也是现代医学至今尚未完全解开的一个谜。在中国,由于临床病例太少,全国最多只有几百人做了这方面的手术,且有相当一部分手术并不成功。因此,医务界目前难以全面探究个中根源。这里,我只能根据十几年来掌握的一些材料,作下述极不成熟的探讨。

人类性别只有男女两种吗?

关于人的性别,传统的观念是只有男女两种。在人类社会里,人们也认为,人的性别,非男即女,非女即男。若干年前,曾有人提出了“第三性”的概念,即除了男女之外,另有一个人群,他们既不能完全划分到男性中,也不能完全划分到女性中,但又确实存在着,这些人群的存在颠覆了原先“世界由男女构成”的性别构成概念。1998 年,何清濂教授正式提出了这种关于性别观念的新见解。

何清濂认为,准确地说,人的性别已知的有 7 种,或者更多。除了众所周知的男性和女性外,其他 5 种性别的人分别为:假男人,即女性假两性畸形,染色体为 46XX,有卵巢、子宫、阴道,又有阴茎;假女人,即男性假两性畸形,染色体为 46XY,隐睾丸,有

阴道,无卵巢,无子宫;两性人,即阴阳人,有睾丸,有卵巢,有精子,有月经,有阴茎,又有阴道;无性人,无睾丸,无卵巢;变性人,即本身为男性或女性,却强烈要求并成功地变为异性。从现代性学研究和发展的百年历史可以证明:21世纪人类的性别将会出现更多的难题需要解决,包括性别选择、性别认定、性别自认、性别判定和性别再认定以及性别角色、性别取向,等等。这些问题都要求人类首先要更真实地面对自己。

我在1998年8月4日的《文汇报》上发表的一则新闻中,介绍了何清濂教授的上述见解。他还认为,判定人的性别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除染色体、性器官、性腺之外,有性激素、胎儿生长过程中脑部的构成,还有影响性别的诸种社会因素,如公民性别、抚养性别、自认性别等。如果决定人的性别的诸种因素的平衡发生了问题,或者诸种因素排列错位,就产生了非男非女的性别。如一人兼有两性生殖器官特征,需要经过外科手术重新定性,进行性别重塑。谁也不知道全中国每年有多少男女性器官异常的婴儿出生,但如果简单地把这种婴儿的性别在离开其母体时就定为或男或女,那是不科学的。这一重要的见解,为探寻易性病的病因,提供了一把新的钥匙。如果顺着这个思路探寻下去,也许会有更多新的发现。

当然,何清濂目前做的变性手术,是针对易性病患者的治疗而言。他概括易性病的特征为:“正常的生理解剖,可以生儿育女,异常的性别思维,不变性不如死。”他所做的上百例两性畸形、尿道下裂、外伤性性器官的性别再认定的手术,则不在此之列。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11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题为《Are Men Necessary? Are Women Necessary》的文章,也对

性别存在的非男即女提出了质疑。文章指出,对于女人来说,男人不再意味着传宗接代,因为能够使用数代的精子银行足以让她们单独完成这一任务;而对于男人来说,从母亲的肚子里出来也不再是他们惟一的选择,因为人造子宫将使“男爸爸”——男人生孩子的梦想成为现实。对于上述见解,何清濂却不能苟同。他认为,性别消失的理论在目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得到证实,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更应该注意现实的存在,而非脱离实际生活的猜测。我们这个世界存在两性的差异,是难以在近期内消失的。最基本的,男女厕所还是分开的,男性不能侵犯女性的身体,强暴女性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在男女差异存在的情况下,即使医学技术已经能够混淆男女,性别的概念也不可能取消。更何况这还是有些科学家的一种猜测。其次,我们不能忽视法律和宗教的作用,随意更改性别会带来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人意愿的问题。另外,两性的区别,不只在繁殖,还有性需求的满足,而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两性关系上也越来越重要。如果两性消失了,人们的性的需求又如何满足呢?

对于人类性别的认定和区分,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医学科学家去探索。偏激的态度和行为往往产生于无知。我们需要把讨论建立在对事实的分析的基础上:

接下去,我们还是要着重对易性病的来龙去脉作一些细致的分析和研究。

原发性和继发性

易性病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前者与生俱来,是性

身份的严重颠倒。患者通常持续地感受到其生物学性别与心理性别的矛盾性或不协调性,他们深信自己是与解剖学性别相反的另一性别的成员。刘燕明先生主编的《性偏离及其防治》一书指出,易性病是性身份异常的表现形式之一:“典型异性癖的性器官解剖结构通常没有什么异常,但其本人却坚信自己应该属于相反的性别,他们对这种矛盾情况的描述一般为‘我是一个陷入错误躯壳中的另一性别成员’。这种人不仅自我深信并声称自己是异性,而且希望他人也按异性对待自己,并采取各种措施或寻求医学帮助。易性癖者对自己生物性别的反感,并要求改变性别的欲望是一贯的,而不是暂时的或阶段性的,他们通常在幼年(3-4岁)就显示了异性化迹象,不仅有异性化行为,而且兴趣、爱好和志愿等都与异性一致,其进行异性装扮并不是出于审美方面的好恶,而是为了减少其内心的矛盾冲突,做到‘表里一致’。”

原发性易性病的病因至今还不甚了了。目下,科学家和临床医师们都致力于探索研究中。国内外专家指出,导致这种疾病的产生,可能与遗传因素和器官性病变有关,即和出生前的荷尔蒙不均衡有关,可能与胎儿的早期发育出现了性的异常情况有关,也可能是胎儿的生长过程中脑部的程序发生了问题。安徽医科大学的周江林博士的一篇在国际医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的论文,为易性现象的生物学解释增添了有利的砝码。他对6例易性人大脑的结构作了深入研究,发现下丘脑中有一个叫做“终纹床核中央区”的核团和人的性别自认有关系。普通男性的这个核团比普通女性大44%,而男变女的变性人的这个核团只是普通男性的52%,和普通女性相仿。这项结果第一次从生物学的角度证明了变性人的脑结构不同于普通人(《北京青年

报》1999年8月31日)。这项研究成果和荷兰一位医学家解剖了十几具易性人的尸体后,发现他们的大脑中有一个主管人的性功能的核团,和常人大不一样的见解相近。可惜的是,这项发现没有深入地研究下去。

美国有一期变性特刊上,还有关于变性人的心理成因分析:“不幸的是,目前世界上学识最渊博的权威学者,对于变性人的心理成因,如同对于同性恋问题一样,也说不清、道不明,找不出它的起因的症结,这个问题仍然停留在研究和实验阶段。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性别的混淆现象,是由于父母方面的偶然失常而发生,是由于某一种胎儿脑内荷尔蒙的失效作用或无作用的关系。”什么叫“父母方面的偶然失常”?这篇文章没有提供足够的实验材料来解释它;然而,关于“一种胎儿脑内荷尔蒙的失效作用或无作用”的分析,倒是值得注意的。但是,国内的医生只注重于临床手术,关于易性病的病因的研究还排不上议事日程,这门医学的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从事易性研究的英国伦敦红十字医院的里查德·格林博士在2004年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左撇子在变性人中比普通人更普遍;不管是男变性人还是女变性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是左撇子。他们对443例男变女的变性人与93例女变男的变性人做了研究,结果表明,与284名自愿者组成的对照组相比,变性人用右手习惯的几率要小的多。而人们使用右手或左手,则是和男性荷尔蒙或雌雄激素的接触程度有关。有些研究人员认为,人们通常用左手还是右手是由胚胎时期在子宫内与男性荷尔蒙或雌雄激素的接触程度决定的。格林指出,人在怀孕15周之后就可观察到胚胎是选择左手还是右手。一种理论认为,荷尔蒙接触会影响大脑结构的发育,并最终决定更喜欢用哪只手。美

国西雅图性学研究专家安尼·劳伦斯博士手头有许多关于易性的临床报告实例,他也同意上述的观点。他说,子宫内婴儿发育的不稳定是可能的,但这未必与激素环境的不同有关系。

但是,变性人不一定都是左撇子。这项发现并不能解释如下一个问题:为什么变性人中有不少人有用右手的习惯?有更多的左撇子为什么没有易性的要求?劳伦斯(她本人就是一个变性人)说,关于变性,我们所了解的一点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况,这表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止一条。她说,我们相信有许多情况都可能使一个人选择变性的途径来改变他们生活中的尴尬;发育的影响可能会起作用,但未必就是全部的答案。关于变性人很多是左撇子这一重要发现,现基本上仍停留在数字的比例上,它是否可能成为打开这个神秘的王国的大门,还有待于医学家的继续努力。

美国巴尔的摩城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精神荷尔蒙研究中心主任——对性别学有精湛研究和见地的约翰·门理博士认为:“变性的成因,至今仍在困惑中。我个人认为,如果设想找出单纯的唯一的原因来,这想法是错误的。人们大多喜欢能够找出一种事物的单一因果关系,但大多数问题的发生原因却不只是一个。”他在临床病例中发现,至关紧要的一点是:在最有决定性的平衡上发生了问题。他解释道:“我可以这样说,每一个人都带有两种概型,一种是得自父母和效仿同性模范角色,经发展而成;另一种相辅概型,得自父母和其他异性。这两种概型因人而异其分量。但在一般情况下,这两者的分量平衡则使人舒通。”

门理博士的意见对我们研究变性的成因不无参考价值。要求变性的人,往往是在这种最有决定性的平衡上发生了问题,因

而感到烦躁不安,消沉忧郁,日思夜想,食不甘味,夜不成寐,非变性而后快,希望有朝一日永久和完全变性,以实现这种均衡概型。须眉男子涂脂抹粉,穿女性衣裙,这种变更外部形象则是变性的初级阶段,也是属于一般插曲性质,不一定属于原发性的易性病患者,而真正属于原发性的易性病患者,则希望人体内两种概型的平衡是不可逆性,因而强烈要求手术治疗。杰恩·莫里斯从萌发变性之想后,连续八年服用女性荷尔蒙。他曾粗略地计算过,从1964年到1972年,他至少吞服了12000片女性荷尔蒙药片,把多达50000毫克的女性物质吸收进机体里,其中大部分无疑是通过机体自动排出了;其余的产生效果,逐渐把莫里斯从一个将近中年、看上去像一个性倾向正常的健康男性变成了一个阴阳人,看上去不男不女,也不见老,身上粗糙的表皮脱落了,皮肤的强韧性质或肌肉的隆起消失了,他和他的妻子的性关系淡化了。但是,这不仅未能减弱他变为一个女性的强烈欲望,反而下决心走进外科手术室,接受变性手术治疗,彻底结束这种不男不女的状态。

他在《变性人自述》中写道:“我觉得,我已够得上大部分标准。千千万万颗药片已经改变了我的体形和性格:我哪怕还不是女子,也无疑已是一个怪异的男子。我虽为进入另一个现实而历尽艰难,毕竟还没有精神错乱。我的子女自幼知道我的跨性状态,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我辜负他们。我认为跨进新阶段的时机已到。我已抵达两性间的界限,越过界限去探索生活的时候已经到了。”杰恩·莫里斯终于在他45岁的时候,跨越了两性的界限,由男子汉变成了一个姑娘。但是,门理博士的意见只是提及了一种易性病患者的表象,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两种概型”的不平衡性,他依然没有说清楚。

上海有一位美少年,有过和莫里斯类似的经历。他今年21岁,一米七六的个儿,长得一表人才,还能写得一手漂亮的散文。不幸的是,从6岁起,就渴望变性。他妈妈有一天从《文汇报》上看到秦惠英的变性报道后,曾对他说,等你成大了,你就变个女孩子吧!他成人后,大量服用女性荷尔蒙和女性避孕药,每天一片。几个月后,他的皮肤变得光滑细嫩,肌肉柔软,胸部隆起,加上一个鹅蛋脸,真是一个见人爱的美少年。许多人看后,都认为他如果不变性,那该多好!但是,他执意要求变性,四处求医。他在听说时光整形外科医院院长许蓓华答应给他作手术治疗后,喜不自胜,写了一篇文章描述自己的心情说:“我好像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3月25日这一天的夜晚对我的人生来说是最重要不过的。”他逢人便说:“吃药再多,还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只有动手术,才使我走向新的生活。”这种原发性的易性病,靠服药看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已于2005年初做了切除阴茎的手术。

易性病的生理成因

易性病的类型,如果再细分一下,还可以区分为男性易性病、女性易性病、轻型、中型、重型五种。易性病的生理成因,也是众说纷纭。易性病发病的原因十分复杂,不少环节还无法解释,至今仍停留在观察和研究阶段,据推测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

1. 遗传因素。一般认为遗传因素可能与易性病发生有关,但尚无充分资料能加以证明。曾有2例双胞胎,其中哥哥健康正常,弟弟患有严重易性病,而父母身体健康,其他兄弟精神亦

无异常。

2. 内分泌因素。有学者报告血浆中睾酮水平在易性病中男性患者偏低,女性患者偏高,但也有人认为男女易性病患者血浆中睾酮均无明显变化。在何教授接触的病例中,术前术后血浆睾酮水平有改变,但症状并没有随睾丸和卵巢的被切除而消失,可见根源不在于此,性激素水平的差异并非易性病发生的原因。

3. 外生殖器大小与形态的因素。由于外生殖器与性身份有着密切关系,有人估计外生殖器的大小及形态与易性病的发生有关。但在何教授目前掌握的资料中所见,还未发现有男性易性病患者性器官大小、形态异常,以及女性易性病患者的外阴畸形(如阴蒂肥大等)的情况。有不少易性病患者的外生殖器与常人无异,但他(她)却是十足的易性病患者。

4. 环境和心理因素。人们习惯上认为,产生易性病的原因是由于父母对幼小儿女按异性打扮或抚养,或患者在异性人群中成长。女性易性病患者可因为对男性刚强性格和独立生活能力的崇拜而产生对男性性别的向往,这在病例中也确实有所发现。然而,不少演员一生扮演女角,却从来没有改变他们对自身男性性别的认同;有些两性畸形患者,虽从小被切除睾丸、阴茎,并按女孩打扮抚养,似乎已成为“真正”女性,但在青春期并未出现女性特征,而在了解自己的身世后,最终仍要求恢复男性。

5. 性别中枢功能异常。有学者认为,决定性别的中枢在下丘脑。至青春期,下丘脑会使人体向既定的性别发育成熟。由于下丘脑的功能受制于染色体上的性基因,性基因的启动,才是表现性别的真正原因,而性基因的选择,在卵子受精的瞬

间已决定。但是,易性病的产生并不仅仅是由于心理变异,它还应该有生物学因素的作用,深入的研究有可能为此找到证据。

国外另有一种颇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既有遗传的因素,也有发育的因素。据国外医学文献记载,染色体异常者,有可能伴有易性病。美国著名医学家鲍利对 80 例易性病患者作了检查,发现均有镶嵌型染色体异常。国内易性病患者也发现有几例伴有家族性。如有一女性患者自称,她的母亲一直与父亲关系不好,她年幼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待她长大了,有变性要求,才明白母亲长期与父亲不和,乃至最后离婚,就在于她的母亲认为自己是从小是投错了胎,她应当是一个男人,但又无法改变性别,因而一直郁郁寡欢,虽然生有一儿一女,但最后还是离了婚。这位易性病患者告诉医生,她的妈妈实际上是一个易性病患者,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条件进行治疗,而她自己的易性要求,则是有遗传因素在起作用。

除了上述 6 种意见外,何欧尼格在 1979 年对 46 例易性病患者作了脑电图检查,发现脑电图异常者 33 人,其中女性异常率为 75%,男性为 38%,异常多发生于颞叶。凡此种种,都提醒人们注意:易性病的发病,是有其生理成因的。虽然这些生理成因的原委,当前人们还不甚了了,但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肯定可以破译这个“谜”。

原发性易性病患者虽然人数不多,但病的生成,既不是一种性关系的方式,亦不是厚此薄彼的行为举止,尤其不是一种性行为。这是一种炽烈的终生消灭不了的信念。真正错生性别的人,几乎没有一个醒悟过,从患病到死,都始终伴随着病人。

易性要求与文化程度高低没有必然联系

易性与知识结构有没有必然联系呢？中国第一个公开自己的易性身份的秦惠英回答说：“没有。上海有一青年工人识字不多，照样不可遏制地想变性，我上了大学，读的书多了，只是懂得了该怎样去治疗自己的病。我最欣赏《红楼梦》里贾宝玉说的话：‘女儿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在实际生活中，期望易性的人，不仅有文化层次较高的大学生、研究生、副教授、律师、工程师，也有不少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农民。

内蒙古某旗有一个青年农民，长到24岁，从没有出过远门，连火车也没坐过，但也有强烈的男变女的要求。结婚数载，依旧是度日如年，对妻子没有多少感情。石家庄有一位复员军人，只有高中文化水平，今年25岁，自诉在五六岁时，就向往做一个女孩子，进入初中后，这种想法就越加强烈。他希望有个男孩子来爱他、保护他，和女孩子在一起时，觉得心里很踏实，很愉快，而和男孩子在一起时，却觉得羞赧不安。他高中毕业后参了军，生活在一个男性世界里，但希望变性的欲望并没有缓解。他有过类似秦惠英的自残的念头，但拿起了一把刀片，又下不了手。他爱穿女孩子的衣服，觉得自己穿女孩子的衣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他做梦也想变成一个女人。复员后悄悄地服用女性荷尔蒙，乳房渐渐地胀大，他不敢去男浴室洗澡，也不去男厕所方便，同事们议论他是“阴阳人”，父母则责怪他把自己弄得个不男不女。他没有朋友，没有欢笑，只有苦恼。他认为，生活环境如同“人间地狱”，每天下了班就关在房间里发呆。有一次，他痛苦得不能自拔，想一死了之，但家人把他救了过来。父母为他

介绍了几个女朋友,他一点兴趣也没有,反认为自己应找个丈夫。他下定决心,如不变成女人,就独身一辈子。他发出呼喊道:“我渴望生活,渴望有人关心我,体贴我。面对漫长的人生道路,我刚走完了25年,今后的道路该怎么样呢?”

大多数男、女易性病患者自诉是从懂事以后,才“朦朦胧胧”地产生变性要求。江苏某厂有一位女工也给何清濂教授来信说:“我不是有些人所说的那种心理变态,我要求变性是与生俱来的,自懂事起,我便是个出了名的‘假小子’。我家有兄弟姐妹七人,家中不缺少男孩,但父母常把我按男孩子来装扮。这不是我的过错,我觉得从小起,就无法按照女孩子那样来生活。”

河南新乡农村的符玲只有22岁,是一个女孩。她生活在当地的一个山村里,她渴望变成一个男子汉,然后和一个深爱她的女孩结婚,但是她没有钱。她给何教授来信说:“首先谢谢您给我的答复,只是我不知从哪儿去弄这一大笔手术费。现在我一个人在外地,找工作也难,我一个女儿身,一副男儿打扮,是一个谁也不要的‘二流子’。我虽然没和家里脱离关系,但家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变性的现实的。我曾想去偷去抢,弄一些钱来做手术,但想来想去,自己还不想走这条犯罪道路,到那时进了监狱,一切都完了,变性也变不成了。”怎么办?符玲在信中又提出了一个办法:“何教授,我想如果可以的话,我去你们医院卖掉一个肾,再卖一些血,然后用这些钱做手术,行吗?如果卖肾可以,您回信给我,我可以马上过去。”如此设想,真是出于无奈了,当然事情是绝不允许的。这个女孩在信末又写了这样几句:“如果卖肾不可以,我想会弄几百元钱,到上海见您一面,这样死也瞑目了。”悲惨之情,跃然纸上。

湖南某厂有一位自称“求救者”的女工,在一年内接连给何清濂写了十几封信,声称她从小就有十足的男儿味,自懂事开始,就整天和男孩一起玩,进入中学后,越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女孩,和女同学合不来,认为女孩脆弱,办事不稳,自己的性格粗野,脾气急躁,喜欢打架闹事。19岁进了一家纺织厂,被投入了一个女性世界,这对她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她大哭一场,坚决要求做一名搬运工,十几年来,工作虽然极辛苦,但心里很踏实,变性的念头,始终强烈地困扰着她。进厂后,她没有一天上过女厕所,没有一次进过女浴室,怕上街购物,怕踏进社交场合,理由是自惭性别不明。后来到一家医院做了切除乳房和子宫、左侧卵巢手术(在手术时,医生发现该女右侧卵巢缺损),现在身份证、户口簿已改为男性,但尚未做人造阴茎手术,以为自己仍是“不女不男”。她要求何清濂再施妙术,还她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的身子。像这样的病例,似可视为原发性的易性病患者。

凡此种,都有力地说明:易性的要求和文化程度的高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也不是文化程度高的知识分子的特别要求,知识水平低的大老粗也不会与易性要求无缘。原发性的易性病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是先天就有的,这种愿望一旦形成,是很难以个人的意志而转移的。

继发性易性病也有其生理成因。这一类病人为数不多。有的女性因生育之艰辛,引起生理上的某种变化,因而希望变性。某省某机关有一位女干部,已40余岁,10年前就结婚,次年剖腹产生下了一子,她备受生育之困苦,尔后生理上出现一些男性化症状,嗓音变粗,喉结变大,月经断断续续,有时竟数月不来,心理上也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男子汉,行为举止也男性化了,以至于在公共场合常被误以为是男的,多年来,她感到十分痛苦,多

次产生轻生念头,家庭亦因此解体。她给何清濂写了一封信:
“我诚挚地请求您为我做一次全面的检查,为我做变性手术,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昂起头来做人!”

从基因上查找易性病的成因

易性病的生成,除了生理、心理和社会、文化的原因外,还可以从生物医学的根源上寻找其生成的原因。

有人问,若是得了易性病,是否只有手术治疗一法呢?可不可以不做手术治疗,也能把易性病治好?从社会学和医学的角度看,如果能找到其他的治病办法,不通过手术治疗,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但这样做的前提是查明易性病的成因。科学家们发现,若能从基因的方面作深入的研究,找出易性病致病的根本原因,那才是 21 世纪对易性病研究的方向。

“男性基因”和“女性基因”的发现,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易性病的生物医学基础。基因,指存在于细胞内有自体繁殖能力的功能单位。这种功能单位的概念最早为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所建立,但这个名词后来由丹麦植物学家、遗传学家约翰逊所提出。根据美国实验胚胎学家、遗传学家摩尔根的研究发现,这种单位在染色体上占有有一定位置而作直线排列。现代分子遗传学的研究进而表明,基因的化学成分主要为 DNA,基因是具有特定的核苷酸顺序的核酸(多数为脱氧核糖核酸)分子中的一个片段,是储存特定遗传信息的功能单位。

医学科学家们经过多年的临床研究发现,在人的身上,人的性别是由人的性别基因决定的。过去,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对性别的界定还是靠染色体,即单纯地以生理划分男女。21

世纪分子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类对生物的认知更微观,能看到细胞里的分子 DNA,就是基因,所以,现代医学逐渐以基因取代了染色体来鉴别性别。1991年,英国伦敦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的彼得·格德弗罗实验室的分子生物学家发现了“睾丸决定因子”(TDF),初步认定这是男性基因。此后,研究人员又在男性的 Y 染色体中发现了一种称为 SRY 的基因,并认为它是决定性别的基因。而且在其他哺乳动物中也发现了 SRY 基因。研究人员认为 TDF 是一种遗传开关,一旦被打开,就可能决定胚胎是否发育成雄性。可是,后来的研究证明,所谓决定性别的基因 TDF 就是 SRY,所以也称 SRY 基因为“男性基因”。

1999年,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还有另一个基因决定着人和哺乳动物的性别,即所谓的“女性基因”。这一被称为 Wnt—4 的基因也存在于 Y 染色体中,通过对小鼠实验证明,如果该基因被激活和履行它的职责,所有胚胎都会发育成雌性,所以认为该基因是“女性基因”。

易性病患者常常表现为其性别基因和外貌及外生殖器呈现为不一致,甚至于对立的状态。即所谓“性反转女人”和“性反转男人”。即基因是“男性基因”,而外生殖器却是女性生殖器;反之,基因是“女性基因”,外生殖器却是男性生殖器,这种性别与外生殖器的错位于是引起了人的莫大的痛苦。有研究人员统计过,在每 500 名女性中,就有一人是 46XY 染色体核型。这种核型当然是男性核型,但她们的相貌和外生殖器又表现出是女性,就是“性反转女人”。相应的,也有为数不多的 46XX“性反转男人”,即染色体核型是女性,但外观又是男性。这些情况造成了性别和性指向的错综复杂,显出种种严重的病态。中美洲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三个村落常见幼时有女性外生殖器官的小孩

在进入青春期时突然发育出阴茎及睪丸,称之为“12岁阴茎现象”。原因是带XY染色体的胚胎在发育时无法合成一种叫DHT的荷尔蒙,所以发育出女性或者仿真两可的外生殖器。至于发育内部生殖器官所需要的荷尔蒙—睪丸激素(testosterone)和M. I. S. (MuellerianInhibitingSubstance)则可以自行合成。青春期时睪丸激素比DHT扮演更决定性的角色,所以男性外生殖器官此时才开始发育(Fausto - Sterling1985:84)。由于缺乏相关的研究,性科学家仍然不确定引发变性欲望和性别和性指向的错综复杂关系的真正成因。

另外,有相当多的易性病患者,其基因的排列组合呈现为混乱的状态,与正常人的性别基因大不一样。性别由基因差异决定的,但是,这种基因差异有时会出现某种混乱。男性为XY核型和女性为XX核型,但这并不意味着性染色体中所有基因、碱基对序列都按现有的男女性别标准或基因序列表现出来,也许还存在着性染色体内的基因和基因表型的多样性,多样性出了差错,就呈现出一种病态。即使性染色体正常,并不意味着性染色体中的所有基因不出现多样性或“异常”。例如,表现为XY男性核型的却在性染色体中查不出男性基因SRY或SRY基因发生突变,因此可能表现为女性化;而表现为女性核型XX的,却在性染色体中找不到女性基因Wnt-4或Wnt-4基因发生突变,因此可能表现为男性化。

有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易性病患者给何清濂写信分析病因时说:“我个人认为不应该把社会诱因作为病因,也就是您提出的‘原发性和继发性’的关系问题。我不大认同后一种病因的存在。社会诱因是外因,而且很琐碎,它不起本质作用。我认为根本原因应该在生命形成的瞬间中去寻找,一是父母双方当时

存在倾向的心理状态,二是精子和卵子的质量欠佳(存在被污染的可能)。巧得很,我们这批病友都是家庭里最小的孩子。基于此,我觉得要攻克这一难题,可以听病人的家族基因为起点,借助现代分析手段进行研究,尔后建立专科医院,强化治疗和护理手段,为更多的病人解除痛苦。”这位病人的意见是颇有见地的,即是说,从基因的方面来分析,易性病人大多数是原发性的,很少是继发性的。这个意见应引起研究易性病的专家学者们的注意。

易性病和易性手术属边缘学科中的边缘,应该采取跨学科的研究观点和方法,充分利用现代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尽快缩短性心理和性生理之间的差距,使人人都能获得良好的身心健康。以基因入手,来研究易性病的成因,目前还是初步的,临床试验的数据和理论探索均不足,但也有科学家指出,它很可能是一把解开易性病之谜的金钥匙。摩尔根认为,在个体发育中,一定的基因在一定的条件下,控制着一定的代谢过程,从而体现在遗传特征的表现上。基因可以通过突变而改变。如果能够运用基因这把金钥匙去探索易性病之谜,我们运用改变基因的排列顺序,通过突变去改变基因的排列程序,来为易性病患者治病,那就别开了新生面。也许有某一天,可以不用动手术,只需改变人的某些基因的序列,就能治愈这个与生俱来的顽症,那真是人类的一大福音了。

亲子关系紊乱的影响

继发性易性病患者如上所述,是后天生成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有相当一批病人没有一贯的易性病史,而是到了一

定的年龄段后,发生了某些人格判断力方面的问题,于是强烈要求变性,并伴有种种心理异常,甚至会引出某种社会矛盾。从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角度看:幼时的经历会对性别认同的发展产生影响。很多材料说明:对于男孩子而言,母亲过分的关注和保护、缺乏年长同性伙伴作为榜样、缺乏与同性小伙伴的交往,被鼓励穿着异性的衣服,被鼓励有异性的举止等,都有可能导致儿童性别认同的障碍,使他们偏离了自己原来的性别。精神分析学家则认为,“俄底浦斯情绪结”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得到及时化解,就会造成各种性倒错行为,也包括性别认同障碍。

这就说明,易性病并不是全部都是原发性的。继发性的易性病的成因也是极其复杂的,男女并不一样。据专家们的分析,男性易性病的成因之一,可能是由于亲子关系紊乱而造成的。据有关研究材料表明:有30%的变性人都是因为从小被性别错误指定所造成的。如果家长从小正确引导,那么就可以避免孩子的终生痛苦。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罗勃·司徒勒博士以纯精神分析法解释继发性异性转换症的成因时指出,至少在男性盼望变成女性的易性病患者中,有一部分人是由于亲子关系紊乱所造成的。专家们指出,很多典型的男性易性病患者均有一个较强的双性人格的母亲,这些母亲通常又是不幸福的或受压抑的,并且嫁的多是远离的、被动性强的男性。这种母亲一般以通过生一个漂亮的男孩而感到获得了新生。她们把爱和欢乐寄托在孩子身上,这种过分密切的肉体和心理共栖关系,使孩子的女性化趋势加强,女性的易性病也有类似的情况。

罗勃·司徒勒博士的分析不无道理。儿童时期形成一种特

殊的亲子关系,也是诱发易性病的一个关键因素。有研究表明,人类对性别的自我启蒙是从2至3岁开始的,因此,家长们的特殊爱好往往会对孩子造成不良性别诱导,长大就容易成为性身份心理障碍患者——继发性的易性病。有专家认为,有30%的易性人都是因为从小被性别错误指定所造成的。一些家长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抚养孩子,比如男孩子长得漂亮就装扮成女孩来养,或者喜欢儿子就把女儿打扮成男孩来养。虽然大人们觉得好玩,结果酿成大错。如果家长从小正确引导,那么可以避免孩子的终生痛苦。母亲和儿子过分密切的肉体和心理上的共栖关系,导致了儿童性别角色的混乱,这在我国第一例施行男变女手术的患者秦惠英的经历中,得到了某种佐证。秦惠英的来信说:“我很清楚,我的童年及少年时期,我是个典型的男孩,一般的男孩的习性我都有,成天和男孩子们一起打闹玩耍,无忧无虑,家里也是完全将我按男孩来抚养的。”他自诉自小对母亲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因为母亲营养不良,奶水不足,母亲含辛茹苦,用糖水把他喂养长大。秦惠英自小对母亲极为感激,从而对女性充满了敬意,因而萌生了变性的愿望。这种愿望随着他的年龄的增大而愈演愈烈。

男性易性病的发病率高于女性的原因之一,有专家认为与孩子从小受母亲抚育有关。因为无论男孩和女孩在哺乳和襁褓期间,一般均与母亲发生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对女孩来说,无疑是有利于其女性化的;但是,对男孩也可能带来一定的女性化影响。如果在男孩稍稍长大之后,生活在一个正常、健全的双亲家庭里,母亲又没有给予一种独特的强化的女性化影响,那么,绝大部分男孩都不会发生易性病;但是,如果男孩的生活环境是一个缺少男性的单亲家庭,这种片面的影响就会增大,使孩子一开

始就对解剖结构所指定的性别无法作出明确的理解,而把异性(母亲)作为自己言行举止的榜样,甚至自觉加以模仿,从而认定自己同母亲乃是同一性别,那就可能会从环境的异化导向性心理的偏离。因此,何清濂教授提出,对成长中幼儿性别的认定应给予关注,当发现儿童性格有异样或已有轻症者,须通过心理行为治疗及早予以纠正。要注意同情患者,理解其痛苦,进行正面疏导,用各种方法,尽最大努力,使其自我解脱,尽量减轻体内对立的两种倾向。要充分让他(她)认识到手术是不可逆的,把自身的性解剖结构变异成易性结构,从现有性别角色变为易性角色,这是人生所有改变中最激烈的改变,因此,能不做变性手术就尽量不要做,应尽量凑合,逐渐顺应性别,改变性格,用各种办法克制自己,自得其乐。

此外,经验不足的产科大夫,也有可能造成继发性的易性病人。专家指出,有的婴儿刚刚出生的时候,性别特征先天发育不良。而急于填写出生证的产科医生,往往根据自己的常识来判别“是男是女”,当然大多数的判别是正确的,但也有个别的判别会发生差错,这种差错如果在孩子出生后相当的一段时间内未被纠正,那就可能为继发性的易性病的发作创造了条件。

目前我国大城市里的幼儿园教师几乎是清一色的女性,小学教师也是女性占了大多数。有识之士指出,这对于培养男孩子的一种勇敢、坚毅的品质,大为不利。我以为,目前教师队伍性别比例失调,也对男孩子的性别认知产生误导。幼儿园里只有阿姨,在这种环境里成长的男孩子容易阴柔有余阳刚不足。小学教师中多为女性,对于孩子性心理的健康成长,也有一定不良的影响。从有益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方面来考虑,小学教师队伍中配备一定比例的男教师,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国外也有专家认为,易性病人最容易和自己的双亲疏远。这种疏远,又不断波及到和他关系最亲密的兄弟姐妹和姑姑姨娘。从我接触到的国内易性病患者的材料来看,易性病患者(男女都有)与双亲关系的疏远,约占50%以上,而这种和家人的疏远,又增强了易性病患者的孤独感,使他们更加执意要做易性手术。

外部生活环境埋下了“灾难的种子”

家庭、生活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甚至一本书、一册连环画,都可以吸引儿童的性别心理的变化。有些家庭偏爱男孩,把刚生下的女儿按男孩打扮、抚养、对待,结果导致易性病。国外曾报道“山多尔伯爵”一案,则典型地说明从小的外部生活环境不当带来的巨大危害。“山多尔伯爵”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原是一个女孩子,从小却被父亲按男孩抚养、教育,长大后,一直令她穿男装,教她骑马、打猎、参与剧烈运动,饮酒、逛妓院,特别迷恋女性化强的女人,与很多女人有过恋爱关系。后来,这个“花花姑娘”爱上一个年轻女教师,便以男性身份和她以隆重仪式结婚,周围的人都以为她是男性,但最后她终因伪装被识破而为当时的英国法律所不容,终于被投进了监狱。

类似的情况在国内也时有所闻。有些父母偏爱女孩,将新生的男孩作女孩来抚养,取女名、梳小辫、穿女装,找女伴玩,进行女性化教育;有些家庭则重男轻女,明明生了一个女孩,却将她按“假小子”打扮,从中获得“画饼充饥”的心理满足。还有在某个大家庭里,一个男孩从小和许多姐姐妹妹生活在一起,从小一直与异性相伴玩耍。凡此种种,都埋下了“灾难的种子”,导

致儿童性角色的自我识别发生障碍。

有一个女孩子,从小参加乒乓球运动训练,后来成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她剪短发,穿短裤,整天跳跳蹦蹦,活泼好动,养成了勇于拼搏的性格,加上父母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她就发誓要有所作为,产生了变为一个男人的想法。

有一位农村妇女,自小出生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童年时代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在少年时代又极少得到父母的爱护,几乎天天吃不饱。她的姥姥说:“女孩子家吃那么多干什么,长高了还要多费两尺布。”而她的哥哥吃饱了,姥姥还要塞馒头给他吃,她整天饿得慌,就想:妈妈为什么不把我生成一个男孩呢!尔后就产生了变成一个男孩的想法。有一天,她去理发店把两根又粗又长的辫子剪了,还买了一副太阳镜戴上。整天和男孩们在一起活动,在进入青春期后,强烈要求变性,给各大医院写了两三百封信,由于没有一家医院能接受她的要求,曾几次自杀,均未遂。

还有一位强烈要求变性的男青年向医生自诉病史道:“在我没出生前,我父母生下了哥哥,就很想要个女孩,当时的政策是允许生二胎的,不料事与愿违,又生下了我,这就导致了我的不幸命运。由于父母的强烈愿望,他们从小就把我当作女孩抚养,给我穿女孩服装,梳小辫子,不让我跟男孩一块玩,后来上了小学,虽然父母不再让我扮女孩,但我的心理上却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女孩。到了中学时代,只要家里给我一点零花钱,便拿去买些妇女用品来打扮自己,有时是里面穿女装,外面穿男装。到了高三,我看了一些有关的书,知道服用雌性激素能使自己女性化,我就买来服用,结果导致免疫系统和内分泌系统混乱,双眼发生暴盲,经过半年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视力才恢复到0.8。但

是,我的变性的愿望,依旧没有绝灭。”

书籍、艺术的影响,也可以导致青少年心理的失衡,产生继发性病变。有一个女孩子,在14岁那年,看了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她被电影中主人公童阿男的风姿迷住了,散场回家路上,她心里一直激荡着一种莫名的骚动,脱口而出说了一句:“我要是个男的就好了。”老师误会了她说这句话的本意,说:“女孩子一样好当兵。”从此以后,她就萌发了变性之意,如今已年近30,仍尚未成家。她强烈地希望变性后易地工作,找一个心爱的女子结婚。

还有一位要求变性的男青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上有两个姐姐,他是家中最小的一个成员。父亲是个戏迷,他在很小的时候,就随父亲去看京剧,特别迷上了旦角的表演。回家后,就模仿戏中旦角的一招一式。他的艺术天赋也冒了出来。在12岁那年,他被一所艺术学校录取,学习梅派表演。从那时起,他进入了一个女性世界,天天蛾眉粉黛,每每水袖飘飞,和女孩们在一起排戏、生活,感到趣味无穷,久而久之,萌发了变性的念头,以致不能遏制,四处求医。为了他所钟情的戏曲艺术,他情愿付出变性的代价,终于如愿以偿。

内蒙古还有一位年过40的知识分子,他的变性之想,竟出于童年时代看过一本题目为《儿女国》的连环画。这本连环画就是根据小说《镜花缘》中林之洋在女儿国的遭遇编绘而成的。当时他才读三年级,看了这本连环画后,萌发了装扮成一个女人的意念。从此以后,他对女性服饰产生了好感,成年后在家里悄悄地乔装打扮,对镜自赏,他还以女装摄了一本影集,姿态各异,妩媚动人。在夜深人静之际,他取出影集,再自我欣赏一番,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但是,他又为自己不能变成一个女性而万

分苦恼。曾写有一诗云：“恨为须眉非裙钗，欲挽鬃环世不容。脂粉堆里难为伍，唯有梦里化芙蓉。但闻世有变性术，不知何处能施行，切盼此生能遂愿，早日变成女儿身。”对这位患者来说，我认为，《儿女国》的连环画不过是一种外在的诱因而已，引发了他的易性之想，而真正的病因，还在于他的内在的生理因素，要是原来没有先天性的变性欲望，再多看几本《儿女国》的连环画，也决不会产生变性的强烈愿望的。

外部环境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

的确，外部生活环境、家庭影响、衣着打扮，对一个人易性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生活中也有相反的证据存在，即许多没有接触到这些因素的儿童，也发生了性别认同障碍。精神分析学家则认为，“俄底浦斯情绪结”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得到及时化解，就会造成各种性倒错行为，也包括性别认同障碍。这种假说在现实中也遇到不少挑战。我国不少演员一生扮演女角，如四大京剧名旦，却从来没有改变他们对自身男性性别的认同，也没有听说过谁要求做变性手术的。我国浙江和上海的越剧演员，多为清一色的女演男，男小生多由女演员饰演，平时有的越剧演员甚至好着男装，但也没有听说有哪位越剧女演员想变性的。有些两性畸形患者，虽从小被切除睾丸、阴茎，并按女孩打扮抚养，似已成为“真正”女性，但在青春期并未出现女性特征，在了解自己的身世后，最终仍要求恢复男性。

在医学史上，还有这样一个著名的例证，可以证明外部环境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35年前，8个月的男婴约翰在一场恶性事故中身受重伤。祸不单行，一位外科医生在为他修复包皮的

手术中,不小心把孩子的阴茎几乎全部切掉。考虑到他也许再也无法长成适应良好的男子,医生们劝约翰的家长把他当女孩抚养。医生以残存组织为约翰造了一个阴道。家长给他改名“琼”,为“她”买了裙子、娃娃等女孩衣着和玩具,还教“她”涂唇膏。到12岁,琼开始接受激素治疗,以使乳房生长。当时,研究人员宣称这例性别再造是成功的,说这个孩子“轻易而彻底地”接受了他作为女性的生活,证明“社会化,而不是生物学因素,决定性别和性别角色认同”。从此,这个个案常被作为在性别角色发展方面后天因素比先天因素重要的证据,而被广泛地引用,被称为是“划时代的里程碑”。

但是,不料在尔后的科学实验中,这个“划时代的里程碑”被无情地粉碎了。夏威夷大学教授冒登·达艾蒙德和加拿大精神病医生凯西·西格蒙德森,于1994年和1995年对成年后的“琼”进行了多次采访,并于近期在“儿科与青少年医学论坛”上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报告说,在1963年取名“琼”的婴儿,已在70年代末重新变成名叫“约翰”的男孩。他们的报告说,其实约翰从来没有真正变成过“琼”。尽管他的身体变成了女性的,被当作女孩抚养,而且他父母一直把性别再造一事对他隐瞒,但是,他实际上从来没有接受自己的新性别。甚至从学步之时起,他就对家长给他的典型女孩衣着、玩具和游戏非常反感,把裙子撕掉,梦想长大了当工程师,甚至不顾他的生理解剖特征而尝试站着小便。

“我觉得我是个怪物什么的”,成年约翰在采访中对两位研究者回忆道。14岁时,他企图自杀,这使他父亲把变性之事告诉了他。“突然间,我恍然大悟”,约翰告诉两位研究者,“有生以来第一次,所有的事都明白了,我理解了我是怎么回事。”在

家长的支持下,约翰在70年代末接受了由另一组医生提供的乳房切除和男性外生殖器再造手术。25岁时,约翰与一位女性结婚,婚后领养了孩子。可见,后天的努力,并未能把真正的男性约翰变成女性的“琼”,最初的医生试图再造一个女性的努力并没有获得成功。

类似的病例在国内也能找到。南京有一位研究生来信说:“我从五六岁起,身为男儿身,却一心一意(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地想变成一个女人。我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愿望,并没有自小把自己当成女孩看待和打扮;相反,作为儿子,我父亲对我是十分喜欢的,不希望我成为一个女孩子。因为我有三个姐姐。经过反复的考虑,我同意了父亲的意见,不再要求变成一个女孩。现在想想,我的这样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从上述例证中,也可以说明,进行变性手术必须非常谨慎行事,必须全面地分析其生理、病理的病因,而不可仅此一端,便草率从事,否则遗患无穷。

继发性易性病人多为青年人。有一种意见认为,可能与青春发育期间内部荷尔蒙的生长变异失调有关,或者是荷尔蒙紊乱有关。美国的著名外科专家兼心理学家马内教授在阐述男变女患者的疾病成因时写道,这些病人“可能在胎儿期体内存有一种变性细胞。这种细胞数量虽小,但作用却极大。它似乎决定着胎儿以后的心理倾向。这种细胞在青春期前是蛰伏着的,但到了青春期时便开始活跃起来,这个人的心理便被导向另一个方向。”“因为这种细胞极易使人产生紊乱,包括思维的、心理的,以及内分泌的。”从生理的变化推寻心理变异的成因,我以为这种分析是唯物的,而且也可以从病人的自述中得到证明。

并非再造“人妖”

提到变性的生理成因,不管是医生还是病人,首先遭遇的是一梭子弹:疯子、变态、人妖、精神病、流氓……有人提出如下的质疑:医院可以做变性手术,这不是鼓励、支持、造就“人妖”吗?

回答自然是否定的。

“人妖”也者,原意指人事上的反常现象。《荀子·天论》曰:“政令不明,举措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妖。”又指生理上发生变性或假装变成异性的人。真正的人妖,则是泰国至今流行的一种歌舞团体。人妖1975年起源于泰国的帕塔亚,选择身材高挑、容貌俊美的男性少年,在17岁前施行易性手术,然后服用女性荷尔蒙药物,过着女性生活,同时进行歌舞表演的专业训练,然后进行商业性演出。经过变性后的“人妖”成为富有魅力的少女:身材颀长,皮肤白皙。这与一般泰国女子不同。泰国女子个子矮小,肤色带一点浅黄褐色。“人妖”则不然。她们在舞台上,个个都是出色的俏丽,堪称绝色佳人。她们能歌善舞,演的戏剧、歌舞多是民间故事,舞台布景富丽堂皇,服装更是精美无比。在舞台上,他们有时作宫廷贵族女子打扮,衣饰光彩夺目,有时穿薄纱衣裙,更显妩媚动人。歌舞弹唱,颇令观者动容。有一种颇受欢迎的“妖怪舞”,演出时,十几个头戴法式黑色羽帽,身穿黑色比基尼泳装的少女在迪斯科舞曲的伴奏下,踩着黑色高跟鞋“啪”、“啪”作响,显得健美、潇洒。女演员们一个个长得丰满、修长,服装又完全是一式的,无论她们怎样变换队形,舞台上始终保持整齐、合拍、欢乐的场面。她们一个个涂着浓浓的口红,长长的眼睫毛下一对大大的眼睛,不时向观众投去妩媚的

微笑。她们似乎比女性更女性化。如不是事先被告知,你很难想象,这舞台上一群俏丽的美女,原来竟是清一色的男性。表演散场后,观众可以在剧院外的广场上,任选一名“美人”与之合影,收费十几美元;倘若合影时做一点亲昵出格的动作,收费则要加倍。这是该团演员的一项特殊收入。

人妖在泰国虽然不能真正为主流社会所接受,但好在并不遭受很大的歧视,学校里有人妖学生,商场里有人妖售货员。据不完全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泰国人妖已达2万多。按照泰国政府的规定,人妖可以结婚,但无法生儿育女。大多数泰国人妖选择这条道路是为了挣钱,也有一些人则是天生的性别错位,但走上这条路后,大多数人妖都发现,“她们”不但要经历生理和心理的磨难,挣钱糊口也并非想象中那样简单。泰国法律规定,人妖仍然是男性,不过人妖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定位为女性。人妖上公共卫生间则根据自己当天的服饰选择,如果是女性装束,那么自然去女卫生间。

泰国对做过变性手术的人妖还特别关照。2001年,泰国推出了一项“第三性别”的护照。即签发给当地的人妖和变性人的护照,将分别附上“变身前后”两张照片,避免有人以假证件隐瞒真实身份,偷渡到国外从事色情业。泰国驻德大使卡西迪说,目前至少有5000名泰国籍变性人合法或非法在德国居留,不少人利用“雌雄莫辨”的特殊身份,以虚假证件取得德国签证,前往当地“钓金龟”或从事色情活动,情况令人关注。泰国外交部2001年推出全球首创的“第三性别”。这样做,既有效地保护了易性人的利益,又能防止少数变性人借变性从事非法活动。

不仅在东南亚,在欧洲,“人妖”也异常活跃,多以卖淫为

生。在巴黎、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等地的郊外，幽圃浓阴，芳草遍地，游人如织。每当夜幕垂降、华灯初上之时，成群“人妖”更是浓妆艳抹，袒胸露臂，恬不知耻地向嫖客炫耀丰乳肥臀，屡操皮肉生意。仅巴黎一地，据统计，就有来自南美、北非的“人妖”500人之多，“人妖”每夜接客十余人，虽有警方夜间巡逻，仍屡剿不绝。

欧洲的人妖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变性手术，去除男性生殖器，同时服用大量雌性激素，使其皮下脂肪积淀，加深女性第二性特征，使之更类似女性；另一种则是保留男性生殖器，以满足同性恋者的欲求。据说，来自南美的人妖，以中年男子居多，他们均已成家，娶妻生子，为使自己“变性”，他们在前额、颧颊、唇颊、胯间、膝部均连续注射硅酮，长达数年之久，穿上女性服饰，也几可以假乱真。

有人用“中国第一人妖”的字眼来形容一位变性的舞蹈家，他气愤地说：“什么人妖？他们连这个概念也没搞清楚。泰国的人妖，是以特殊的性形象为生的。他们上半身是女的，下半身可还是男的。”人妖是对人的一种摧残和异化。人妖跻身于情天世界，则成为西方世界一大罪恶的渊藪。他们是不折不扣的“人造美女”。这些健康的男青年不惜牺牲自己的青春，去忍受非人的痛苦。在展现这种“女性美”的后面，隐藏着对人的本性的最大的摧残，也是对“人权”的最大的伤害。人妖又是性病、艾滋病传播的重要媒介。巴黎警方拘捕的人妖中，艾滋病毒感染阳性率高达百分之一百。现代医学科学被移用于卖笑、卖肉生涯，实在是对崇高的外科手术的一种亵渎。人妖把健康的童男变成了不男不女的畸形人，把人变成了“非人”。它与中国古代的太监、弄臣是异曲同工的产物，但与封建帝王宫闱制造大批

阉人,任其欺凌驱使不同的是:泰、欧的人妖是将奴仆变成了玩物,成为生财的工具。人妖也成了一种商品,不要看他们在舞台上千姿百态、妩媚动人,在夜阑人静之际,他们的内心有难以名状的痛苦。据说,泰国的人妖一般都活不长,一俟青春已逝,他们的卖笑生涯就结束了,有的人则成为社会的弃儿。

易性病患者则不然。他们不是因某种经济利益的驱动,而去作违反生理的手术,不是把男人变成“人造美女”。他们是一群病人,是一群不折不扣的病人,是一批需要急切救治的病人。他们的种种看上去反常的行为,其实是一种病态。对易性病患者施行变性手术是为了治病救人。从我国已施行的变性手术的对象来看,他们都是濒临绝境,危及生命,经过慎重的观察研究,在确定药物、心理治疗无效的情况下,才施以这种手术的,而这些病人在经过手术治疗后,大都恢复了健康,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他们在实施手术十几年后,依然健康地生活着。如秦惠英现已40多岁,身体很健康,平时连伤风感冒也很少。何清濂教授所作的154例变性手术,全部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这与“人妖”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可相提并论。

是否属于同性恋?

对于这个问题,国外医学界是有争论的。1886年,克拉夫特·埃实在其性医学和性科学的奠基性著作《性精神病态》中,曾把易性病作为同性恋的某种情况考虑,认为希望改变性别只是同性恋不断发展的结果,但未予以命名。其后,著名的性心理学家霭理士也曾对易性病病例进行描述,但仍未能将易性病人和同性恋严格地区别开来。

同性恋者,按《辞海》的解释,即与同性者发生性的关系,通常对异性不感兴趣。按美国精神病理学会对同性恋的解释:“对人的性取向是同一性别的。”而对变性人的解释是:“对性别的认同有困惑,终生对同一性别的人相处不适。”由此可知,同性恋者在幻想中或实际生活中,有喜欢与同性个体发生性关系的癖好,以同性个体作为性爱对象,若仅幻想与同性发生性关系,未落实在行动上,则常称为精神型同性恋,若已发生性关系,则称之为典型的同性恋。

同性恋者对自我性别认同,无变性要求,性定向指向同性,是对他人的感觉,以同性个体作为性爱对象。同性恋多以男性为多见,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圈,往往结成团伙活动在公园、公厕、公共浴池,以鸡奸为性爱方式,多数人扮演着主动、被动两种角色,性行为完全是宣泄性欲,固定的同性恋情侣很少。他们称有此同好者为“同志”。同性恋者并不愿着异装,即使是扮作异性姿态的一方,仍注重同性气质,更无变性的渴望。女性同性恋者大多是情感型,她们相爱甚深,有时不易与易性病相区别,这有待于医学家们作深入研究与甄别。

易性病则不然。1964年,美国著名的医学家何欧尼格对易性病的特征概括为经典性的四点:“一,深信自己内在是真正的异性;二,声称自己是异性,但躯体发育不正常;三,要求医学改变躯体为自己所体会的性别;四,希望周围人按其体验的性别接受自己。”

同性恋是对别人的感受,易性病患者却是对自己的感受。易性病与同性恋的主要区别在于,易性病患者则鄙视同性恋行为,并厌恶自己的性器官。而易性病患者对同性极为反感,而对异性的一切都感兴趣。这种兴趣,一般说来,并不是为了和异性

发生性的关系。特别是对已结过婚的继发性易性病患者来说,更和同性恋不可相提并论。通过上述的比照,我们似可以得出结论说,易性病是一种独立的性偏离,根本不同于一般性欲倒错或同性恋。“我们不是同性恋者。同性恋者喜爱同一性别的人。我们属于错误的性别,我们把我们所爱的人看作是异性。”一位有女朋友相伴、即将接受女变男手术的患者说道。还有一位希望男变女的易性病人写道:“这是我的不幸,并非我的罪过。这是一种灵魂与躯体的错位,一种难以言状的痛苦。”大多数人的生活都过得如此艰难,以致他们不再期望社会理解他们。他们只是想独自过正常的生活,远离关乎手术之痛苦经历的永无休止的询问。

易性病与同性恋患者的精神状态是截然不同的。易性病患者的情绪状态,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心理变态,一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绝望情绪。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情绪自卑、孤独、烦闷、焦躁,不少人有自残或自杀的念头,也无性欲可言;而同性恋者则不然,他们与同性的恋情甚浓,有强烈的性欲,大部分同性恋者希望通过与同性的交合来满足自己的性欲,他们大部分人是开放性的性格,结伴而行,招摇过市,以寻欢作乐、享受人生。

易性病患者一般不损害他人,也不介入别人的恋情,而同性恋者的行为,则对他人、社会带来危害,现已有足够的材料证明:艾滋病的传播渠道之一,则是同性恋者的性关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同性恋者,其中有一部分也希望自己变成异性,即同时也患易性病,这种情况为鉴别是否是易性病患者,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他(她)们希望自己变成异性,以便和原来同性相恋的对象结成夫妻,成为永久的、合法的情人。何清濂研究了500多封

来信,其中有十余人承认自己既是易性病患者,又是“同性恋”者,其概率约为2%。

现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同性恋者、变性人、易装癖者也都有自己的自助组织、杂志和网站,积极要求自己正当的权利,确实推动了社会对他们的接纳和帮助。1999年9月24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安帝洛普高级中学的50名学生在学校门口举行示威活动,他们不是要求减轻课业负担,而是要求校方收回解雇做过变性手术的老师的决定。

现代医学科学的最新发现表明:同性恋不是一种病,而是由于与某种基因有关。1993年7月,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的丁·汉默认为,同性恋与基因有关。同性恋者和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在其X性染色体长臂顶端区域有一个叫做Xq28的基因,是这一基因决定了人们在性指向的同性恋。汉默等人调查了40名男性同性恋者,经他们同意提取其细胞做基因检测。他们发现,这40多人中,有30多人X染色体中具有相同的Xq28基因,因此认定Xq28基因可能控制着男性同性恋行为和趋向。

荷兰在1998年已准许同性登记相互间的伴侣关系,2001年4月1日则正式宣布具有同样性别的人可在荷兰结婚。德国议会于2000年12月通过了允许同性恋结婚的法案,60%的德国人赞成这项新法案。2004年5月17日这一天,美国马萨诸塞州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美国同性伙伴在美利坚的土地上,将第一次获得合法婚姻的权利。有7对伙伴将分别在波士顿和其他的几座城镇,当着亲戚朋友和支持者的面,步入婚姻殿堂。剑桥市政府结婚登记处特别在5月16日晚间加班,接受同性恋的结婚登记申请,以便在午夜过后就能发出证书。在午夜过后,等在门外的同性恋人开始庆祝完成登记的同志伴侣,还高

唱美国国歌,更有一对男同性恋者举着标语“我们相恋49年!”标语的背景则是他们领养的孩子和孙子;有的同性恋者甚至兴奋得不敢相信。5月16日接近午夜时分,麻省剑桥市政府前人声鼎沸,同性恋者排着长龙准备申请结婚证书,抢到第一个登记合法结婚的是汉姆斯(Marcia Hams)与她的新娘苏珊(Susan Shepherd),汉姆斯说:“获得这个州的最高法院认可你有权结婚成家是很棒的,这能给你勇气。”波士顿市长也到场致意,表示“这实在是个非常大的喜悦,同性恋婚姻的权利可以进入市议会,我欢迎你们到市议会大厅来结婚。”美国因此成为继荷兰、比利时、加拿大三国之后,成为第四个存在同性婚姻的国家。马萨诸塞州前议员、现同性恋权利组织“人权战役”负责人谢利尔·雅克斯说:“对广大美国人来说,5月17日是个完全普通的日子,没有什么不同……但对于马萨诸塞州的同性恋家庭,这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性的日子,他们的家庭更加牢固,他们的孩子更加安全。”

2001年出版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和诊断标准》第三版中,同性恋不再划归到性变态的范畴,它只是作为性指向障碍,归于性心理障碍一类,同性恋行为并不一定属于心理异常,这表明同性恋在中国学术界也不再被视为病态,所有这些事实,都反映了世界各国的法学和医学界在对待“亚文化”群体的态度上的进步。作为一名普通的社会成员,我们每个人也都应本着科学的精神去理解和宽容包括变性人在内的所有“亚文化”群体。而易性病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欲置人于死地的疾病。

易性病患者可能混迹于同性恋之中,即貌似同性恋,实为易性病患者。这种情况有时见诸于女易性病患者。对此,我们要特别作认真仔细的鉴别。女易性病患者由于生理特点和心理特

点,一般对世人的性道德观念十分敏感,并有所顾忌,所以多能隐藏其易性的要求,较少在青春期或性成熟不久,就直接求医或要求转换性别。有的专家认为,这种易性病患者常混迹于女子同性恋中,又可使人们对女性易性病发生率偏低作出解释。过去有资料认为,女性易性病仅是男性易性病的八分之一。从何清濂成功地完成了男变女和女变男的变性手术后所收到的来信看,这种比例是不正确的。女性要求易性者,与男性要求易性者几乎相等。

女易性病患者混迹于同性恋者,有一些病例可供佐证。有一个来自农村的18岁的女孩,因从小作男孩子打扮,上中学时,偷偷地喜欢上了一个同班的女同学。为了同她“相爱”,她离家出走了,十余天后被家人找回。但她执意要变成一个男性,同这个女同学相好。遭到家人、亲友的鄙视,她曾自杀未遂。现在,她觉得,同性恋和自杀都不能帮助她摆脱人生的困难,唯有通过施行变性手术,才能真正获得解脱。从这个女孩子的上述情况来看,她的病态虽然貌似同性恋,其实却是一个易性病患者。

在西方世界中,同性恋的发病率可达10%,其中20%属于精神型同性恋者,从不发生性关系;35%偶有性关系,经常保持性关系者占45%。在我国,同性恋是被认为非法和不道德的,因而其发病率难以统计,但现在有些人因患有易性病而求治于医院,我们就可以研究一下这两者的关系。

从现有的要求变性的材料来看,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实是:要求变性的人群中,确有一批真正同性恋者。他们貌似易性病人,实为同性恋者。有一位男青年坦率承认自己在初中时,就与同班的一名男生“关系密切,形影不离”,“我在他身上找到了一种男性的爱”,“我非常珍惜这种感觉,并极力寻求这种感觉。”初

中毕业后,他与这位男同学分开了,“我又迷上了另一位男孩子”,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考上了一所中专,但仍摆脱不了对同性的爱慕。基于此,他要求做易性手术。这名男青年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易性病患者,而有明显的精神型同性恋倾向。如果为他做了男变女的手术,那会造成终身的遗憾。

另有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男青年也向何教授诉说道,他自小生活在一个阴盛阳衰的大家庭里,全家十几口人,除爷爷、爸爸、哥哥外,其余都是女的,他自小就被家人当女孩抚养,整天跟姐姐、表姐、表妹、姑姑等生活在一起,到五年级时还和姐姐、奶奶睡在一床。上中学时,才恢复男装,但依旧女儿味十足,在高中时,因在校住读,和一个男生好上了,后来参了军,仍和这个男同学保持暧昧关系。他为了和同性恋彻底决裂,便下决心做变性手术,使自己成为一个女性。

有一位女性,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机关干部,参加工作已近5年,工作表现不错,曾被评为三八红旗手,但她与一个女孩子相好已近5年,两人都已年过30,现在,两人都相约不谈朋友,非对方不娶(嫁),但同性恋为法律道德所不容。这位小姐看到报上有关变性的报道后,也顿发奇想,为了使两人的关系合法化,她希望能完成女变男的手术。这名女青年的举止倾向,本质上也是同性恋者。还有一名女同性恋者悄悄地对人说:“如果说女孩爱女孩是一种不能接受的或者说不正常的现象,那么,此时此刻的我,强烈地希望自己变成男孩,可以堂堂正正地去爱一个女孩。”对于上述这些同性恋者,我们不能将他们看作是易性病患者,不能轻易地在他们身上动刀,一旦变了性,再也不能按原样复原,后果不堪设想,甚至于弄出一些复杂的官司来。

类似这样病例还有一些,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有人曾建议男易性病患者与同性集体住宿,也许可以减轻病情。从上述材料来看,这是不妥的,有可能诱发同性恋。倒是多和异性集体多接触,可能对缓解变态心理有帮助。从上述病例来看,易性病患者不一定是同性恋,而同性恋则有可能并发易性病,不过是借此作为摆脱同性恋困扰的一条途径。如此行事,显然是难以如愿的。

把同性恋当作易性病来治,那也会给同性恋者带来终生的痛苦,也是一种庸医杀人。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军方为同性恋军人做变性手术。曾在前南非军队服务的外科医生们对《卫报》记者说,1971年到1979年,每年都要做约50个这样的手术。《卫报》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在这项极为机密的计划中,军队心理医生和牧师在应征的新兵中寻找可疑的同性恋者。军方随后将这些人送往一家军队医院进行甄别治疗。在接受荷尔蒙等药品治疗和心理治疗后,那些仍不能治愈的同性恋者们将接受变性手术,有不少人在手术中丧生。即使幸存者,也是错把茄子当辣椒,不可逆转了。很多专家认为这个办法不可取,因为变性是不可逆转的,在未能清晰地判别前,宁可作同性恋处理,而不应立即作手术治疗。这个问题,还不妨作些深入的研究。

再者,社会如果能宽容同性恋者,那么,有一部分被“确诊”为易性病的女青年,则表示不愿意再做易性的手术。我曾向部分易性病患者作过调查,问几位住院待做女变男手术的病人问道:“如果社会宽容同性恋,允许你们按自己的爱好打扮,你们还做不做这个手术?”她们回答:“那绝对不做。”另一个回答说:“社会对同性恋和着异装的歧视太严重了,其实我们又没偷没抢。那回我的卡被银行取款机吞了,我拿身份证去取,柜台那人看我一眼就说,‘让她本人来’。我当时和现在一样,完全是男

人打扮,梳着平头。我很生气,我说‘我就是本人’。那人特厉害说:‘去,回去让派出所开证明来。’我们真是被逼无奈才走这条路的。谁愿受这个罪?像死一回一样。社会太不宽容了,再加上媒体的误导,到处都说做完之后有多么成功,结婚对方都发现不了。”这就说明,同性恋能帮助易性病患者渡过难关。让易性病患者保留同性恋的状态,也可能使一部分症状轻的病人不走上手术台。

是否精神上出了毛病?

有人还问道:易性病患者是不是精神上出了毛病?是不是患了精神病?

回答也是否定的。是的,易性病患者在行为举止方面,确有一些令常人难以接受的表现,特别在性特征方面,因错生性别观念而引出一系列违反常情的举止。如好着异性服饰、性格内向、忧郁不安、喜欢独处,病情严重的,还有自残、自杀的念头和行为,等等。凡此种种,有人于是认为是精神上出了毛病。

在现实生活中,确有易性病患者被错认为精神病的例子。新疆有一位男性易性病患者,年近30。大学毕业,在某机关工作。他的工作表现很好,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但有强烈的变性要求。他的同事们称他为“假丫头”、“X小姐”。他觉得忍受不了,但又无可奈何。于是,他被一位亲戚送进了当地的一家精神病院,当作精神病治疗半月。他反复声称自己没有精神病,但医生不理睬他的申辩。半个月后,他的体重减轻了8斤。后来,他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的“治疗”,毅然从精神病院里跑了出来。这样的处置显然是失当的。后来经过专家的认真检查,确诊为易

性病患者。实践证明,把易性病看作是精神病是完全错误的。

什么是精神病呢?根据《辞海》的解释:精神病是“以精神活动障碍为主要表现的一类疾病,病因很多。临床上的表现为知觉、思维、情感、智能和行为等方面的失常。常见的有精神分裂症。”某些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忧郁症患者,常有固定不变的性别幻想,精神病人一般均有行为、知觉、情感和智能方面的障碍,通过详细的精神检查都能排除。易性病患者通常持续地感到,他们是与自己解剖学性别相反的另一性别的成员。目前国际上性科学和性医学界已公认易性病是独立的一种性偏离,并确定为性身分识别障碍性偏离,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精神病。

精神分裂症患者,有的也有变性妄想,妄想自己成为异性成员,把易性手术视为一种有魔力的治疗方法。他们避免去正视自己的问题焦点,有的男性偏执地妄想变性后能生儿育女,有的妄想成为出名的歌唱家,有的想变性后成为著名的模特儿,有的为消除胡子而要求切除睾丸。他们并不存在性身份与其生物学性别相互矛盾的巨大心理冲突,亦无一贯性的病史。成天想入非非,对工作、学习无所适从,在得不到变性满足时,在恼怒激动状态下会失去理智,动手打骂亲人,扬言杀人,呈现轻度精神分裂症妄想症的表现。这些在病史中应认真加以分析,从求治者的异样眼神中可以得到正确判断。

科学家们经过研究后发现,易性病患者的内分泌大都失调。有一位名叫斯塔卡的科学家在报告中指出,男性易性病患者血浆睾酮水平明显低于正常男子水平,女性易性病患者的血浆睾酮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女子的水平。还有人发现,尽管女性易性病的基础激素水平正常,但她们存在着促性腺激素分泌反应异常,当给予合成促性腺激素释放因子时,有关激素释放情况显示

了一种介乎正常女性和正常男性之间情况的模式。虽然上述材料还是不完整的,易性病患者与内分泌、性腺激素分泌的关系还缺乏更充分的说明,但由此已经可以看出,易性病患者的变态心理有其异常的生理原因,并不是“以精神活动障碍为主要表现的一类疾病”——精神病。何清濂研究了秦惠英的病情后,明确地指出,他患的不是精神病,这一点已为成功的临床手术实践所证明。在变性手术完成后,其他症状就全部消失了。

但是,有一些精神病人,特别是某些精神分裂患者,常伴有改变性别的妄想,可以表现为明显的易性要求和易性行为,但其行为的基础是一种荒诞的偏执性妄想,且伴有其他感情、知觉和思维障碍。这种人通常只是强调成为异性后的优越性,并不存在性身份与其生物学性别相互矛盾的巨大心理冲突。若是精神分裂患者的变性要求,通过治疗后,如精神病不再复发,其变性要求则会消失。因此,对这类病人的确诊需要慎之又慎,倘若对本质上是精神病患者作易性病对待,并作了手术治疗,一旦其精神病治愈后,他发现自己竟改变了性别,其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值得注意的是,据国内外科学家对许多易性病患者的观察发现,在要求变性的人群中,除上述心理、生理变态之外,有相当多的患者的智商、能力、事业感均与常人无异。有些人还有过人的才智。美国著名精神病学者罗伯特·斯特罗勒专门研究过儿童的错生性别现象。他分析这些人的病情后写道:“这些小男孩的艺术趣味是我们的社会认为女性成分胜过男性的那一类,因为这些男孩既聪明、活泼、好奇而又有独创性,他们的创造力是肉欲的而非智力的。他们摸、击、嗅、听、视、尝——他们创造是为了满足感觉。”另据国外文献记载,95%易性病的患者,均未见明显的身体方面的异常情况。经过周密的观察,易性病患

者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其他方面大多是完全正常的。以秦惠英而言,据她的中学的教师与同学回忆,秦惠英在校时当过班里的学习委员,性格内向,胆怯懦弱,不善交际,有明显的女性倾向,经常一人吟唱评弹,无不良性行为表现。大学时学习也很努力。到昆明某学院工作两年多,先后担任七个班的公共外语教学工作,其中两个班学习的教学效果也挺好。何清濂告诉我,据他接触过的几位真正易性病患者,智商都不低。他们不想伤害任何人,仅是想做一个享有公民权的普通人。在完成变性手术后,他们的工作热情很高,原有的聪明才智得以施展,在工作成就方面,一点也不低于常人。

何清濂接着举了几个病例:

有一位易性病患者,是老三届毕业生,现已人到中年,他在利用五年的业余时间,读了四所大学,获得大学学士学位,还获得了四所大学的专业结业证书,先后参加过两本教材和一本专著的撰写工作,但他强烈要求变性。

还有一位 50 多岁的男子,是某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声称自己“与生俱来易性病,宁可不当副教授,亦要变性”,“这个目标是死不悔改,如不能实现,亦要以女尸火化”。

要求变性的人群中,除工人、大学生外,还有演员、律师、机关干部、农民,也还有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新长征突击手、学雷锋标兵、总经理等。西南某市敬老院有一位服务员,工作极为出色,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还被该市多次评为学雷锋标兵,但他也期待走易性之路。“我的变性手术如果不能做,我将没有勇气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我才 28 岁,我真不想提前了却生活,我太渴望过正常人的生活了。”

有一位 30 多岁的患者写过几首描述变性心态的诗:“看似

闺中一女郎，巧理云鬓帖花黄，如若不把真情吐，谁疑婵娟是我妆。”诗的标题是“为影集自题”。另一首诗云：“男子穿耳古今稀，只缘喜妆画蛾眉。虽非窈窕裙钗女，却愿鬓边饰金坠。”从这两首诗的遣词造句来看，患者的文学修养是在常人之上的，说明他的智商很高。还有一位21岁的男青年，写得一手漂亮的散文，散文的笔调则完全是女性化的。

还有一位在江苏一家银行工作的职员，是一位大学毕业生。他在1999年1月30日写给大哥的一封信中，对他的易性要求和期待作了如下的表述：“此一不幸，与生俱来，存在已久。而今的变化也只是认识上由不知到知，并无所失，无须惊愕、惋惜。庄周亡妻，击盆而歌。要充分理解人，以理化情，便可处变不惊，保持一颗平常心。不可思议的选择，有了不可思议的不幸事实作基础，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了。”“做女人该有女人的样子，做男人该有男人的样子。美最本质的内涵是一种协调、和谐和统一。同样的言行举止配上一个女儿身是一种美，换上一个男儿身便成了一种病态。天生我女儿之气，女人之心，何必又强留这副与我格格不入的男儿身！男人的臭皮囊似枷锁，让我欲望难成现实，只能空受折磨。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天生注定有此一劫。万望大哥，念手足之情，助我早日涅槃超生，脱离苦海。”这两段文字，就其表达自己的内心的痛苦和真切而言，堪称一绝。没有相当的文字功底，是写不出如此精美的字句来的。

我还采访过好几位作了易性手术的男、女青年，发现他们神采奕奕，思维正常。秦惠英的英文翻译既快又好，字迹秀丽，文笔流畅。她告诉我：一旦条件成熟，她一定要像莫里斯那样，写一本书，把自己的易性过程公诸于世，还问我能否为这本书的出版提供一些帮助。我当然是很愿意助她一臂之力的。

有一位女变男的青年,在完成变性手术后,他经营房地产业,大有成就,在大连拥有了一条街的房产,拥有一辆高级轿车,并有一位林黛玉式的白衣天使作为妻子,恩恩爱爱,很令人羡慕。

另一位完成了女变男手术的青年教师,谈话的逻辑思维极强,不时穿插几句富有哲理的话语,颇有学者风度,令人根本不信他原是一位秀外慧中的姑娘。

和异性装扮癖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易性病还极易与异性装扮癖相混淆。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时可以见到有些人穿异性服装成癖,简称为异装癖——TV:TransVestite。扮异性症这个医学名词指的是“扮异性症”,指需对以穿着异性服装而产生性兴奋者,但不代表患者希望变性,或是同性恋者,其实大多数的TV都是异性恋。异装癖者对自己的生物学性别持肯定态度,并无变性要求,属性行为异常,多见于男性,性定向为异性,对性交有兴趣,着异性服饰带有性快感追求成分,甚而出现性兴奋或性感满足。偶有要求变性者,但在明白变性手术实质后,多远而避之不再求医。有一异装癖者;取得妻子认同,每月着异装,装扮成女性逛街一次,而性生活均正常,近来告知其还有裹足癖,欣赏女性三寸金莲,经7年多交往观察,其为一典型异装癖患者,而本人是一名律师,工作很出色,打赢了好几起经济官司。

异装癖男女性都有,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才出现的。我国的有关专家认为,异性装扮癖约占人群的1%。男着女装或女着男装,均古已有之。

早在魏晋时代,就有不少爱穿女性服装的男子,比较有名的一个人物叫何晏。此人是曹操的女婿,喜欢空谈,鲁迅称他为“空谈的祖师”,又是魏晋时期最早提倡玄学的人。他喜欢搽粉,爱穿女人的衣服。《宋书·五行志》曰:“魏尚书何晏好服妇人衣服。”魏帝似乎不喜欢这个搽粉的“美男子”。有一次,让何晏喝了一大碗“热汤饼”,结果汗流满面,把涂粉的面孔弄成了一个花脸。除何晏外,还有曹丕的弟弟,写过著名的七步诗的曹植,也是喜欢搽粉的。在魏晋时代,男子崇尚女性美蔚然成风,不仅傅粉施朱,把自己弄成一个小白脸,而且还流行用香料薰衣。衣服的香味太重了,连胯下的马也受不了,跳起来咬主人的膝盖。在梁朝全盛时期,贵族子弟薰衣剃面,傅粉施朱,则成为一种时尚。何晏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异性装扮癖,但他并不是易性病患者。

女着男装,在唐代,尤其是盛唐,也屡见不鲜。天宝年间,官民均爱穿一种紧身窄袖的“胡服”,进行社交活动,犹如今日的西装。士大夫的妻子们为追求时髦,也索性穿起丈夫的“胡服”,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旧唐书·舆服志》就有这样记载:玄宗开元初,“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期一贯矣。”《新唐书·舆服志》亦载:“官人从驾,皆胡帽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鬓驰骋,帷帽亦废,而衣男子衣及靴,如奚、契丹之服。”“奚”是匈奴的别称,“契丹”乃东胡的一支,即后来的辽。唐代妇女着“丈夫衣服靴衫”,在不少唐墓室壁画、绘画、出土俑中,均可见到。其形象多为头戴幞头,身穿圆领窄袖胯衫,足着乌皮六缝靴,腰系革带,几与男子无异。据说武则天年轻时,也好着男装,以至于她的女儿太平公主也加以仿效。据《新唐书·五行志》载:高宗尚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

歌舞于帝前，帝与武后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这位太平公主看来也是一位异性服装的爱好者。这是接受她的母亲武则天的影响，也和当时宽松的舆论氛围分不开的。

女扮男装，在中国古代除了东汉花木兰代父从军的著名故事外，也还有南朝时的娄逞，此人穿着男服，为官多年，骗过了皇帝老子。据《南史·崔慧景传》载：“东阳女子娄逞，变服作为丈夫，遍游公卿，仕至扬州仪曹从事。事发，明帝驱令还东，逞始作妇人服而去。帝曰：此人妖也。”这个娄逞，看来并没有什么生理、心理上的变态，也不是异性服装癖，不同于武则天、太平公主闲得无聊，以着装来寻寻开心，她只想和封建礼教开个玩笑，出一口气，说明巾帼不让须眉，一样可以为官，一样可以治国。于是，乔装易服，浮沉宦海，与公卿们周旋了好几年。那位明帝看来也还开通，只是“驱令还东”，骂她一句“人妖”即了事，并没有对这位女扮男装的娄逞兴师问罪。如若责之“欺君”，她的头就要保不住了。越剧《孟丽君》中的主角孟丽君，风流倜傥，女扮男装，居然也把皇帝都蒙住了，当上了宰相，后来被皇帝察觉，多次和她游逛，但孟丽君又成功地避开了皇帝的性骚扰，成为一大佳话，被编成越剧，成为一个出色的传统保留剧目。

但是，异性装扮癖与易性病，不是同一种病态，前者属于性行为手段方法异常，后者则为性身份异常。现代性科学研究成果表明，异性装扮癖与易性病有明显的差异，应该加以区分。在现实生活中，有人对两者不加区别，而把异性装扮癖与易性病一概看成精神病患者，甚至把他们投入监狱。在“文革”期间，有一位被邻居看成“性反常者”的病人，就因为她穿男人的衣服而被捕，不加审判，关进监狱，不服判决，越狱逃跑，再判死缓，一关就是13年。这真是人世间的又一大冤案。三中全会后才得以

彻底平反,补发工资,恢复工作。

异性装扮癖,指的是习惯性地穿着异性服装,从中取得性兴奋以至性感满足的一种性偏离行为,只是希望穿着一下异性的服装,获得一种性满足而已。易装癖是以穿着或触摸异性衣裤、胸罩等激起性兴奋,得到性满足,他们在获得满足的过程中并不需要性伴侣。有的已结婚,大多数易装癖者都是异性恋,但许多也是潜在的双性恋者。他们对自己的性别和生殖器基本满意,并没有要求改变性别的强烈愿望。他们的特征是患者性身份辨识没有问题,他虽然爱好穿着异性服装,但对于自己的生物学性别持肯定态度,并不希望把自己变成异性,而且其性定向也正常,是指向异性成员的,只是一种性行为手段方法的异常,有异性装扮癖好的人,不一定是易性病。

杰恩·莫里斯也喜好穿女性服装。有人以为他既是一个异性装扮癖,或是一名易性病患者,以为他穿上异性服装便能得到一种性的快感。有一次,一个人竟安排他同一个文化素养极高的同性恋者——伦敦某画廊的主人秘密会晤。此人以为,莫里斯若和他作为伙伴,可以使莫里斯获得极大的愉快,结果马屁拍在马脚上。莫里斯认为:“我们共进了一次非常尴尬的午餐”,“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同性恋者。我羡慕女子的服饰仅仅因为这是她们女性身份的外在标记。”杰恩·莫里斯在《变性人自述》一书中进而指出:“错生性别现象的标准形式与‘异性服饰狂’不同,与同性恋也不同。异性服饰狂唯有从穿异性服装中得到满足,若进入异性行列就丧失了乐趣;同性恋者对自我性别认同,无变性要求,以同性个体作为性爱对象。顾名思义,既非一种性关系,也不是厚此薄彼,尤其不想与异性发生性行为。这是一种炽烈的、终生的消灭不了的信念,真正的错生性别的人没

有一个省悟过。”杰恩·莫里斯的这段话,把异性装扮癖和易性病、同性恋之间的区分,说得非常清楚。

至于说到在当今现实生活中,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各种新潮服饰的涌入,引起国人的竞相效尤。70年代初期国外盛行“中性服装”,男女皆可穿着,穿后男女莫辨。因此,凡爱好“中性服装”者,不能认为是“异性装扮癖”。“牛仔裤”原为男性所穿,现在着牛仔裤的女性也不少,这也不能视为“异性装扮癖”。此外,国内现又流行女着男装,一些年轻的姑娘,剪一个男青年的发型,上着一件皮夹克,下套一条时装裤,甚至结一条男式领带,作为一种服饰的“异化”,一种审美趣味的“异化”,柔和中透出某些坚强,娴静里加几分刚毅,温顺而不失高傲,也是无可非议的。

异性装扮癖和易性病在现代生活中是水火不相容的。上海有一位易性病患者,在手术成功后,出院后建立了一家“网站”,全国许多易性病患者的网民,都上网交流,但在这家网站的“论坛”里,易性病的网民和异性装扮癖的网民,各自在自己的论坛上发表意见,绝不到对方的论坛上发表意见,泾渭分明,河水不犯井水。这说明他们彼此都认为,自己和对方绝不是同类。

但是,这里有必要指出,异性装扮癖和易性病,确实存在着某种交叉和重叠。有异性装扮癖好的人不一定是易性病患者,但易性病患者大多兼有异性服装癖,有异性装扮行为史,当然时间长短不一。因为穿着异性服装是易性病的一种外化,一种变态心理的物化。但是,易性病患者穿着异性服饰后,并没有异性服装的性兴奋,或性快感,其异性装扮在于使自己的外表更符合其自觉追求的异性性别;而异性装扮癖者的异性装扮,则带有性快感的追求成分,并常伴有随着异性装扮而出现的性兴奋或性

感的满足。异性装扮癖和易性病之间并不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有易性病的最初症状,便是对异性服装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尔后不再满足于形同异性,由此及彼,进一步要求对自己的生物学性别加以改变。有一位青年易性病者,最早的病情是做梦成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后来他背着父母买了一条高级弹力健美裤,白天不敢穿,晚上当内裤穿上。有一年夏天的晚上,他乘姐姐不在家,偷偷地穿了她的连衣裙,高跟鞋,戴了胸罩,然后到大街上去溜了一圈。患者自诉道:“我从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虽然只有几分钟。”后来,这个21岁的青年,发展到要求施行变性手术,成了一名继发性的易性病者。

还有一位男性易性病者诉说自己的病情说:“我在几年前对女性的衣着打扮发生了兴趣,开始留长发,买女性的服装,有时干脆买一些女性内衣内裤穿在里面。这样,我的烦恼得到了短时期的解脱,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感。还有几次,我真的在大街上体验了做女性的幸福感。首先,我在理发店把头发做成长波浪,回到家里,在室内将硬邦邦的定型乳罩系上,穿上丝织内裤和长袜,再穿上有花边的女衬衫,系上长裙,最后穿上高跟鞋,再把脸部稍微修饰一番。对镜一照,啊,连我自己也认不出来了,我就出门在大街上游玩起来,居然没有人发现我的庐山真面目。看来我的化装术还不错。后来我还特意将自己扮成女性,到一家照相馆拍了几张照片,以便能让自己仔细欣赏自己的女性美。但是,这些做法毕竟不能长久地公开活动,在精神上,我又产生了一种深重的压抑感,令我坐卧不安。我期待做一名名符其实的女性。然而,此刻妨碍我成为女性的最大累赘就是我身上的那个肉团,我从心里恨透了它,当我正在想办法处决它时,我读到了国内首例由男变女的消息,我失眠了,我知道,迄今

为止,真正错生性别的人,没有一个由于劝说、胁迫、服用麻醉药、心理分析、羞辱、取笑或者电击治疗而接受自己生错性别的躯体,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状态,我迫切希望您能伸出人道主义的手,像挽救秦惠英一样挽救我……”

从这位男易性病患者的病情演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开始穿异性服装产生的“一种说不出的舒畅感”,是属于异性服装癖的特征。他顾影自怜、自我欣赏,拍几张女式的照片,但还没有演化为易性病。尔后,他“又产生了一种深重的压抑感,令我坐卧不安”,最后恨透了那个“肉团”,甚至产生了自残的念头时,这说明病情有了转化,即从异性服装癖转化为易性病。男性易性病人的“性定向通常指向男性,但与男性同性恋者不同,总希望男性像对待真正的女人那样对待他”(《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卷17》,P181B)。所以,这些男易变性病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因为他们心理上确实认为自己就是女性,自己热切要求的是异性恋,只不过外表上看起来有点像是同性恋而已。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变性人都有“易装”行为,但不是真正的易装癖。

浙江还有一位署名陈雯的姑娘给何清濂写信道:“我家有六口人,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是最小的,都参加了工作。我的父母是普通工人,我从小一直按照女孩子的标准抚养长大的,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得爱打爱闹,对男孩子的性格和服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佩服他们的勇敢和直率,而痛恨上苍为什么阴错阳差让我以女儿身来到人世。我常常做梦也梦见自己成了个男孩。这种欲望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而愈加强烈。原来我没有钱打扮自己,后来参加了工作,挣了钱,就里里外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男孩。但是,就因为这一身男装,挨了家人不知多

少打和骂。妈妈骂我心理变态,整日逼我把头发留起来,厂里许多人议论我不男不女,说我是个‘怪物’。对于家庭和社会舆论的压力,我不在乎。只是有时看到白发苍苍的父母,因此而伤心,则感到内疚和不安,可是我无法改变自己的易性欲望。我只要一穿上女性的衣服,就感到浑身不自在。我真不理解,我并没有妨碍别人,也没有做出对不起家庭和社会的事,他(她)们为什么要这样恶言恶语对待我?我忍耐着,我等待着,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愿望能够实现。”从这位女病人的情况来看,她对男性服装的爱好和冀望变性的欲望,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她穿男装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性感的满足,而是和变性的欲求紧密地掺和在一起的。

尽管易性病人和异性服装癖两者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但两者毕竟不是一家人。判断一个爱穿异性服装的患者是属于异性服装癖,还是属于易性病,实际上并不难:即观察他是否对生物学性别有强烈的变性要求。如果患者仅仅停留于以穿异性服装为满足,那么,经过一定的心理治疗和行为治疗,这种癖好是可以逐步得到纠正的。

4

第四章

〔拯救被扭曲的灵魂〕

为了拯救这些被扭曲了的灵魂和肉体,何清濂经过审慎的考虑,决定操刀一试。秦惠英,经过何清濂和他的助手们的研究和分析,被列为长征医院施行变性手术的第一例。

何清濂走出了大胆而果断的一步,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味道。这需要勇气,更需要技术。他对他的助手们说,只有走着棋,才能挽回秦惠英年轻的生命。他和他的助手们神情严肃地走进了那间熟悉的手术室,习惯地按了一下按钮,整个手术室里顿时明亮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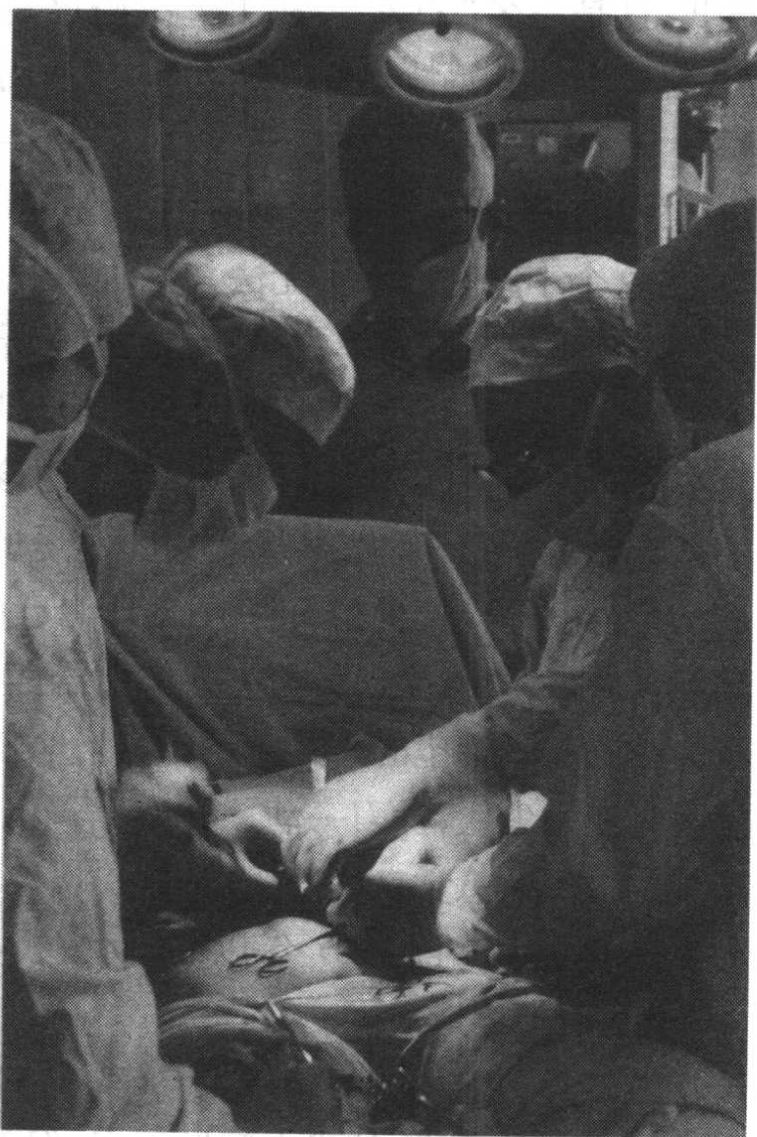
这是因为,秦惠英目前已处于一种严重的病态之中。如果不及时地对他做手术治疗,排尿不畅,精神崩溃,那就不仅会使他丧失工作能力和生活能力,而且会危及他的生命。同时,秦惠荣又是独身,改变其性别,对社会、家庭和他人,均无直接的妨碍。

无论是从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出发,还是从提高中国整形外科的医学水平着眼,为秦惠英做易性手术,都是必要的。当然,这样做,是有相当大的风险的。

根据国外文献报道,在易性手术施行之前,患者需要在实际生活中以异性角色生活 1—2 年,在这段时间内,患者将同时应用处方,或荷尔蒙药剂,使其在性别外形上有一个明显的改变。这种改变包括:毛发的分布、乳房和声音的改变。上述条件,秦惠英都具备了。他从 1985 年开始,就以女性姿态生活,至今已有 5 年多。他服用女性荷尔蒙也有多时,第二性特征也有一定的改变。

妙手回春的前奏

何清濂从事整形外科手术,已积有40多年的临床经验。这也为他施行易性手术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证。如前所述,他和他的助手们配合默契,在这张熟悉的手术台前,由他主刀,曾为数以万计的病人施行整容、修补、矫复及性器官再造手术,重塑阴道、阴蒂的手术,效果也令人满意。使许多愁眉苦脸而来的病人,高高兴兴地出去。在治疗男性睾丸女性化、女性假两性畸形等领域,何清濂都获得显著疗效,成功率在95%左右。这里必须提及的是何清濂在性器官再造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这是施行易性手术前最重要的技术条件,也是施行易性手术的前提。如果缺乏精湛的男女性器官再造的临床经验,



做易性手术要一丝不苟

那么,纵然有施行易性手术的良好愿望和决心,恐怕也难于成其好事。

男、女性器官再造,相对来说,再造阴道要容易一些。据医学统计,在4000名女性之中,便有一例先天性无阴道患者,民间俗称“石女”。我有一次去访问何清濂,见一位美貌的妙龄女郎正在何清濂处就诊。她的身体各部分发育完全正常,身材高挑,三围合格,疑是一位服装模特儿。待这位病人离去后,何教授告诉我,这是一名“石女”,和丈夫结婚已有三年,虽然没有性生活,但丈夫和她感情很好。最近,何清濂用自己设计的阴股沟皮瓣技术,仅用了三个小时,就为她再造了一个阴道。这个方法,比国外用自己的肠子改做阴道的办法,要安全得多。手术的成功,为这个小家庭增添了无法言语的欢乐。

还有一位李姓姑娘,亭亭玉立,貌美异常,她那高雅的气质,令许多“白马王子”紧追不舍,可是,20有几的她,却从未有过月经来潮。迫不得已,她上了医院,医生的诊断报告上写下了一行字:“先天无阴道”。姑娘从此关闭了爱的心扉,不再出现于社交场合,深居简出,少与人言语,对于自己的终身大事,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打听到何教授有人体性器官再造的绝技,她终于在心头升腾起了希望的火花。她急切切地来找何教授。何清濂果然没有使她失望,操刀一动,“石女”开花,人工阴道具有创伤隐蔽、供血正常、感觉良好等优点,姑娘欢天喜地而去,重新展翅飞向生活的蓝天。自1987年以来,何教授已成功地为26例“石女”做了阴道再造手术。

虽然凭着上述的经验以及参考国外有关文献,何清濂自知完成男变女的手术,技术上问题不大,但面对这样一个因性心理变态而造成自残的病人,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成功把握。尽管如

此,何清濂觉得,即使手术有一定的风险,为了治病救人,也值得冒险一试。

秦惠英上了手术台

窗外瑞雪纷飞,窗内春意浓浓,病人心情愉快。秦惠英终于登上了手术台。何清濂和章惠兰教授神色庄严地开始了手术。

手术的第一步是为秦惠英将残存的阴茎切除,利用敏感皮肤改制成女性外生殖器——包括阴唇、阴蒂和阴道,尿道则改植成女式。第一步,切除残存的阴茎,并不太费事,操刀一割,男根清静,因有麻醉,病人无多大痛苦,再造阴道,却颇费周折了。因为再造阴道,并不是模拟一个女性阴部形状就完成了,还要有血有肉,有感觉,能过正常的性生活,有性高潮,才算真正成功,才算高明。这一点,难不倒何清濂。他有独特的创造。他通过临床观察及解剖学研究发现,在股内侧与会阴之间的皮肤,由于多源血管及神经的供养,皮肤细腻而敏感,是皮瓣带蒂转移或游离移植,作为器官再造和组织缺损修复的一个优良供皮区。何教授为它取名为“阴腹沟皮瓣”。何教授小心翼翼地在秦惠英两腿根部取下两块大小相仿的皮瓣,皮肤面朝里,相对缝合成囊状。塞入会阴部的人造腔穴内,再造阴道因有血管神经,血运及感觉俱佳。手术第一步成功了。秦惠英的小便不畅之苦就解除了。据何教授说,再造阴道者,同样可以结婚,有正常的性生活,有性高潮,但不可能生育。

半月后,何教授和他的助手又为秦惠英做了隆乳手术。何清濂的隆乳手术十分高明,根据病人的身高、体型设计,可以以假乱真。有一位姑娘,因患乳腺病切除了右乳,何教授为她精心



何清濂为秦惠英检查隆胸手术是否成功

做了乳房再造手术，两乳对称，手感柔软，手术切口小而隐藏，以至这位姑娘在结婚两年后，她的丈夫还没有发现妻子的右乳是人造的。秦惠英变成女性后，自然需要一对高耸的乳房。秦惠英对此梦寐以求。何清濂经过精心的设计，为秦惠英造了一对漂亮的乳房。一星期后，伤口愈合，拆线后，秦惠英低头望着自己胸前隆起的一对乳峰，满意地笑了。与此同时，何教

授又成功地为她做了喉结切除手术。这也是高难度的手术，弄得不好，会危及人的生命或失声，有些大医院的五官科医师也不愿轻易做这个手术，何教授细心操刀，又出色地完成了这个高难度的手术，手术切口很小，小得令人难以察觉。如是，秦惠英的男变女的手术，已全部完成，尔后，她又服用了一段时期的女性荷尔蒙药物，皮肤变得白嫩、细腻而有弹性，加上一身合适的女性打扮，秦惠英终于如愿以偿。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困惑、躁动和

痛苦之后,身高1米60,体重50公斤的秦惠英,从“他”变成了“她”。

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将秦惠英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1990年8月末,秦惠英终于走出了生活了50天之久的长征医院。一个中等身材、秀气的女子从医院里走了出来,她和护理她的护士们合影留念,依依不舍地道别。



秦惠英要出院了,和医务人员依依不舍告别

秦惠英恢复了她的生活的正常秩序。在她的眼里,大城市的蓝天,变得更蓝;都市里的花儿,变得更红;川流不息的来往人群,似乎都以欢欣的目光注视她;外滩的高楼大厦,在她眼里,也比以前更为壮观了。我问她:“此时此刻,感觉如何?”她回答我:“我对生活从不消极、悲观。与其委屈地活着,不如奋发地进取。生活的明天,一定比今天更美好。”她牢牢记住美国变性

人马里欧·马丁诺的名言：“我愿站在一个变性人的立场上，告诉你我的座右铭：‘在困难面前败下阵来，不是我的性格。我要迎着困难上，一个一个地解决它。’”

秦惠英的生活，从此展开了新的一页。

《文汇报》发表一则独家新闻

1990年8月31日，我为《文汇报》写了一则消息。消息是试探性的，因为在当时，国内未曾公开发表过这样的消息。在事前，我和何教授字斟句酌，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了新闻的全部内容，并征得了秦惠英的同意，然后向编辑部发稿。编辑是有眼力的，断定这是一则不可多得的有价值的好新闻，很快予以全文发表，且刊于第二版的显著地位，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消息全文如下：

“本报讯 上海长征医院整形外科主任何清濂教授为一例患有‘异性转换病’的病人，成功地施行了变性手术。患者由须眉男子变成妙龄女郎，日前已康复出院。

患者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某某单位工作。1988年的一个夏夜，患者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睾丸，后阴茎也由患者自残，一家医院急诊室的外科医生只得为他草草作了缝合手术，结果造成尿道口狭窄。患者常感憋尿，工作也难以为继，于是到上海长征医院整形外科求医，希望医院帮他变成‘她’。何清濂教授为他作了详细检查后，并参照研究了国外的有关文献，认为这名患者患的是易性转换症的病。由于心理变态导致生理自残。如不及时为他做变性手术，那

就会使患者完全丧失工作能力和生活能力。

何清濂和他的助手们经过慎重研究,出于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为患者做了两次手术。第一次将残存的阴茎切除,利用敏感皮肤改造阴部,造成阴唇、人工阴蒂和新的阴道,尿道改植成女式。半个月后,何教授又为患者做了隆胸手术,人造了一对漂亮的乳房,两乳对称,手感柔软,一星期后,伤口愈合,几可乱真。同时,何教授又为患者作了喉结切除手术,切口甚好,难以令人察觉,整套手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患者在施行手术后,已恢复了工作能力。据悉,有关部门正在考虑为这位已康复的变性人重新安排工作。”

独具慧眼的
《文汇报》二版主
编刘文峰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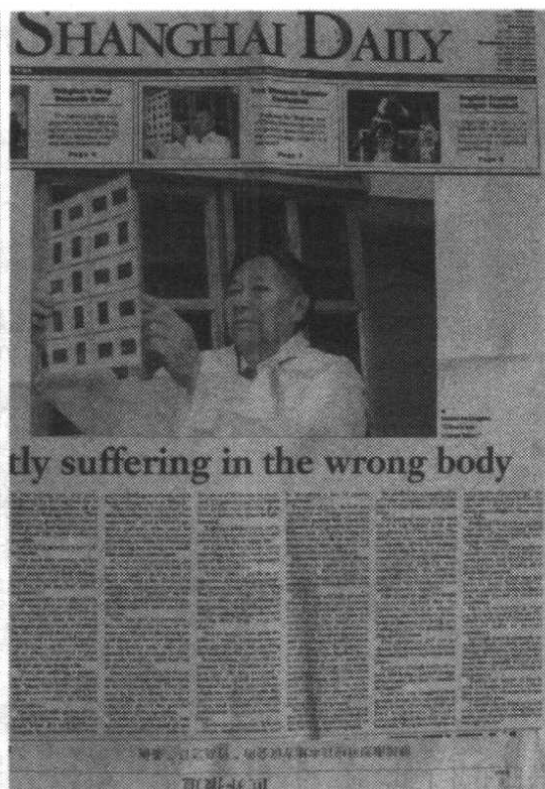
国内首次报道男变女易性手术成功

(现已去世),为这则新闻加了一个醒目的标题:“教授施妙术,须眉变女郎。”这则标题使新闻更加醒目。

新闻虽然只有六百多字,却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敏感的港、台报纸,如香港《大公报》、《明报》、台湾《联合报》还设法弄到了秦惠英变性前后的照片,以“首宗变性手术,上海获得成功”、“须眉男子变成妙龄女郎,长征医院变性手术成功”为标



香港大公报等转载了变性手术获得成功的信息



中国日报、上海日报、美国世界日报等外文报刊也纷纷转载变性手术获得成功的信息

题,全文转载了文汇报的消息。路透社和美国一家权威的华文刊物《中外论坛》,也发表了关于秦惠英变性的长篇特写。国内几十家报纸和杂志,以及好几家文摘报刊,都竞相转载了这条消息。善良的何清廉教授当然没有意料到,他为秦惠英开的这一刀,是向道德与法的大海丢了一块石头,为中国医学史撰写了新

的一页。

一石激起千层浪。《文汇报》的消息发表后,成千上万为了自己的心灵和性别无法相互认同而日夜不安的人,那些正不知如何定位与认知自己的性别而迷惑的人,那些已决定做变性手术却不知如何起步最好的人,犹如身处黑暗王国中见到了一线光明,许多濒临绝境、自杀过几次的人,重新激起了求生的欲望。何清濂成了易性病患者心目中的“上帝”。求治的信如雪片飞向上海市的长征医院,门诊室里挤满了一批批要求“个别谈话”的易性病人和疑似易性病人。何清濂的案头、一张中午休息的小床上,堆满了求治者的信。最多的一天,何清濂收到 50 封信。美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也有人要求来沪做变性手术。据统计,在半年内,何清濂收到了 700 多封信,其中快件、挂号信占了一大半,最多的一人连续来信 35 封。其中提出要求做变性手术者有 295 人,115 人要求女变男,180 人要求男变女。直接来门诊求治者 62 人,患者分别来自全国各地,有父领子、母携女者,也有妻为夫、哥送妹、姐陪弟来,言辞恳切,声泪俱下,其情至哀,诉说受易性病折磨的痛苦,不少人竟在门诊部长跪不起,叹息:“上苍为什么使我们得这种怪病,请医生无论如何想法救救我们。”他们之中有教授、研究生、中学教师、学生、医生、护士、工人、农民、战士,可谓“工农商学兵,行行都有人想变性”,年龄最大的 56 岁,最小的 10 岁。妈妈发出呼喊道:“救救我们的孩子。”此情此景,使何清濂这位操刀治病数十年的医生,不禁为之怦然心动。据他行医的经验,过去患有易性病的患者,极少公开申诉此病,更不用说上门求医了,而且他们的经济状况大都很差,有人甚至找不到工作。前些年,我国一本医学专著上说,我国仅见一例易性病病例。如今,有这么多患者来信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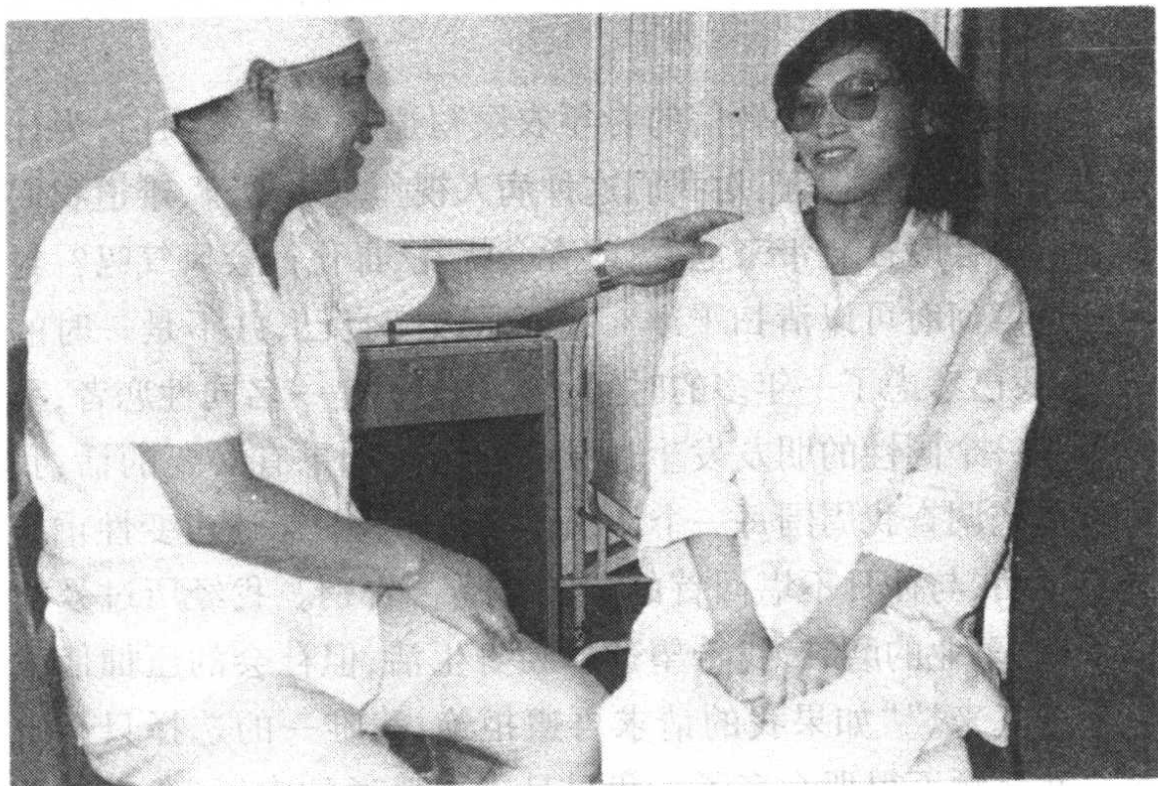
访,详详细细地公开自己的病情,实在令人震惊。无病是不会呻吟的,谁也不愿意拿自己的性别和公布自己的隐私开玩笑。何清濂深有感慨地向上级部门写了一份报告说:“现有这么多的病人,我们有责任去研究,提出治疗的办法,治病救人,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天职。对这门新兴的学科,严肃的医学事业,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深入研究病因,对症治疗,已迫不及待了。”可是,上级领导对这些情况,似乎并不感兴趣,他们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理由是:我们是部队的医院,弄这个东西,似乎有点“不务正业”,但何清濂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治病救人就是自己的天职,他这个人有股倔劲:认定是正确的东西,不管阻力有多大,也要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面对那么多的来信,更使何清濂下决心去探索这个领域的奥秘。这一大叠信,是研究易性病的十分重要的资料,详细研究、分析这些第一手资料,将有助于研究出治疗此病的各种方



何清濂收到了 5000 余封血泪斑斑的求助信

案。于是,读信成为何教授业余生活的一大内容,许多重要的来信,或病情严重有自残、自杀念头的病人,何教授一一亲笔复信,对病人进行心理治疗,或劝慰,或鼓励,娓娓谈心,不厌其烦,有时一封复信写了好几张纸,最后签上自己的名字。此外,他又求助于科内一位做事细心的陈卫平医师,请她根据患者的性别、地区、病情,分门别类,归纳整理,分别作出处理的意见,并归档在几十个自制的大口袋里,重要的来信还在信封上写了内容提要,以便考察研究时可以一目了然。后来,70岁的何教授从长征医院退休了,依然保持了这种对病人来信极度重视的态度。他认为每封信都是血泪史,都是宝贵的医学资料。在他77岁的那年春节,我到何教授家去贺年,他又从书房里拿出一大叠整理得好好好的信给我看,还多了几张现代化的光碟,其中录制了一对易性



手术结束后,何清濂和秦惠英谈心

病患者喜结连理的动人情景。

来信大多饱含着血和泪。他们希望自己能成为何清濂手术台上第二个、第三个“秦惠英”，现摘录几封来信如下：

一位青年工人来信说：“您能拯救一条生命，为什么不能让众多的痛苦心灵得到解脱？您说有关部门不同意开展此项手术，那为何同意第一例手术，又要拒绝以后求医的病人呢？您做第一例手术时，难道不想想天下之大，还有更多的病人怎么办？求求您，答应我吧！只要能改变性别，即使少活几年，我也心甘情愿。”

还有一位年过30、署名为“一个错生性别的人”，写信给何教授道：“我很欣慰地从有关报道中看到了您的名字。新的希望立刻在我心头升腾而起，中国终于出现了我的‘上帝’。您能给予我们这些病人以新的生命、新的性别和新的希望。您丝毫不比上帝逊色。”

一位请求别人代转信的青年农民写道：“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中国这样保守，对我们这种病人视作洪水猛兽，难道我们变性以后会对社会带来危害，或者会扰乱、毒化社会风气吗？封建的遗毒何时可以清扫干净？我要求改变自己，并不是一时的冲动，我已考虑了一年多的时间了。我更不是一名同性恋者，我没有和一个同性的朋友发生过猥亵行为。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请您调查我周围每一个认识我的人。我只想通过变性重新开始生活，与往日不堪回首的辛酸和痛苦告别。我经历过爱情的失败、事业的磨难，我希望选择独身生活，但社会的压抑使我喘不过气来。”“如果我的请求再遭拒绝，我唯一的选择只有自杀。我已顾不得那么多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我实在活得太累了。在我的生活里：总有这样的时刻，日子是灰色的，生

活在阴云里,失望是那么多,心底的痛苦无法向人诉说,只有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总有这样的时刻,我忧心如焚,望夜空繁星点点,飘渺凄迷,无言地踏上人生的旅途;总有这样的时刻,我伤心又失意,爱情不知何处寻觅、惘然之中,轻轻地对远方呼唤,那深情,那痴迷,汹涌澎湃;总有这样的时刻,一切都想放弃,死亡离我很近很近,绝望之中,含泪问苍天:是谁人主宰命运?那无奈,那消沉,似大雾迷漫……”这样的文辞,这样的诗情,如果帮助他除去了病情,说不定足以使他的才思喷涌而出?中国的文坛上,说不定会增添一位引人注目的新秀。

还有一位大学毕业生的父母联名致信何清濂道:“我们的女儿最近多次苦苦哀求,要我们支持她到医院拿掉子宫、卵巢,变成一个男性,逼得我们做父母的也无所适从。但据她说,如不改变现状,活着非常痛苦,时时受着精神的折磨,不如早点离开人世,我们的意思是,只要能救救孩子,使她今后精神愉快、生活幸福,怎么医疗好(包括做变性手术)都行。附上孩子给我们的信,请您一阅。俗语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您救了孩子一命,也是救了我们全家,今生来世感激不尽。”

何清濂读了这些来信后,用充满感情色彩的语言对我说:“他们在苦苦地等待着,寻找着能够为他们施行手术的医院,他们急切、焦渴的心情,就像在辽阔无际的茫茫沙漠中的旅行者,行走得筋疲力尽,已多日滴水未进、饥渴难当,但还在不甘心地寻找着水源。”对于这些历尽艰辛的人生之旅的旅行者,能丢下他们不管吗?我们能闭着眼睛不看吗?我们能打一声官腔,砰的一声,把医院的大门关上吗?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把他们拒之门外吗?

任何有良知的人们都会回答说:不能。说一声不能,还是容

易的,但真要帮助他们脱离苦海,那又谈何容易。

和莫雪文通了十四年信

《文汇报》刊登了秦惠英第一例易性手术获得成功的新闻后,有一封来自哈尔滨市的来信,引起了何清濂的关注。

来信者名叫莫雪文,是一位机关干部,当时在一家街道办事处工作。他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位硕士生,毕业后曾在南京工学院当教师,已婚,妻子很漂亮。他的智商极高,文笔也很好。第一封信写于1990年12月,诉说了他读了秦惠英变性成功的报道后,渴望自己也能变性的请求:“多年来,我总是希望渺茫的婚姻能够拯救我,然而不幸,易性病真是不可逆转的,多年的压抑只能加剧我的痛苦。”

何清濂立即给他回了一信,告诉他做变性手术是要有许多条件的,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莫雪文立即给何教授写来了第二封信,文笔依旧很漂亮:“谢谢您!我终于收到了您的答复,太谢谢您了!只要您想象一下我这些日子所忍受的煎熬,就知道我的感谢有多深!”“我看了不少资料,我早已断定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易性病患者。我穿女装不是为了性满足,而是觉得我本来就该如此。我本来就是女人。我之所以没有过多地穿女装或没有想通过自残来求得一时的满足,那是因为我对于前途的过分看重和高度的克制。如果您看过小说《蓝花豹》,您就可以知道一个生理上完全是女人的男人,由于某些原因,过上了半辈子男人的生活,那是多么的痛苦。我生活的座右铭的头两个字就是‘克制’。但是,我‘克制’得太久了,我不能再忍受了!我为什么要把自己装在自己不情愿的男人的躯壳里,去考虑那什

么用处也没有的‘前途’呢？我要求活得潇洒些，活得自在些！我要按自己愿意的方式去生活！我要抗议上帝的错误，恢复女性的本来面目。”在信中，他还告诉何教授说：“目前，我准备以男性的身份考博，考上后再说明真情，换了一个全新的环境，我的生活、工作和经济情况都会变得对自己有利，即使手术失败，露出真情后，社会也不会不容我。”

何教授考虑到他已结婚，并准备报考清华大学博士生的具体情况，建议他再观察一段时期，再“克制”一下自己的变性愿望。还告诉他变性手术是不可逆转的，割除了，就装不上去了，是否做手术，一定要慎重行事。莫雪文接受了何教授的建议，通过自己的艰巨努力，考上了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并顺利地取得了博士学位。后又留在北京工作，他和妻子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现已10岁。他的妻子和儿子随他去北京生活，不仅维持了婚姻，用莫雪文的话来说，“而且应当说是美满的”。妻子非常爱他，而且善解人意，经过多年的沟通，她已能充分理解他的痛苦，而且愿意力所能及地帮助他解除痛苦。他努力工作，在专业上卓有建树，成为首都建筑学界一位有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他还与时俱进，在互联网上建立了自己的网站，经常和何教授在互联网上探讨一些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曾自以为病症较轻的莫雪文，仍然在忍受着易性病的煎熬。他一方面努力控制自己，希望自己能达到心理平衡，一方面却无时无刻地都在想，女性生活才是他生存的目的和希望，他甚至于无法维持正常的婚姻生活。莫雪文有一位要好的朋友，是位医生。他劝莫雪文说，趁着你们都还年轻，理智地分手，各自找一个更好的归宿，岂不两全其美？莫雪文拿不定主意了，他决定再找何清濂当面请教。

2002年夏天的一天下午，莫雪文专程从北京来到上海，和

何教授作了倾心长谈。讨论的题目是：究竟是做手术好，还是维持现状好？究竟是像秦惠英那样好？还是像他这样虽有痛苦，但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为好？何教授告诉他：你比起秦惠英来，有更多的人生中积极的東西。如家人的爱、天伦之乐，工作上有许多令人羡慕的成就。做易性手术毕竟是人生的一部分，而不是人生的全部。你虽然暂时不能易性，不得不忍受着一些与生俱来的痛苦，但人生在世，谁能十全十美？何教授以自己的工作情况为例说，我想创办一所性别外科医院，专门收治要求变性的病人，还可以从事易性病的病因探讨，可是想了十几年，依然是心想事成。我还不是照样过日子？所以，在我看来，你能过维持现状的生活，就不错了。

莫雪文基本接受了何教授的建议。回到北京，他又通过互联网给何教授发来了一封“伊妹儿”：“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您跟我的谈话。在见您之前，我心中对您怀着神圣一般的感情；见过您，对您的执着、敬业和苦衷有了直接的了解，我更加尊敬您。像您这样的良医在中国可能真的不多了。TS 弱势群体有您这样一位良医，是我们的幸运。”莫雪文决定竭尽全力承担为人夫、人父的责任和义务。他对何教授说，只要她愿意和我一起生活，我选择做变性手术就是自私的、残忍的。何况，我们的孩子还小，我不能无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考虑到他的病情，何教授又向他提出一点建议：目前不必做变性手术，如果为了使自己的易性心理得到某些满足，则不妨在自己的面部长相方面作一些两性之间的“切换”——到当地水平较高的整形医院做一点外科手术。莫雪文又接受了何教授的建议，经和妻子的反复沟通，到北京一家著名的整形医院做了下颌骨缩小手术，手术非常成功，使面部变得女性化了，即使是着

男装也看起来像女性。莫雪文的自我感觉又好了许多。近日，莫雪文又来信，向何教授提出了切除喉结的要求。这一点，莫雪文能否如愿，看来还要继续探讨下去。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里，有的医院如不预付钱，是见死也不救的，更谈不上无偿地和患者通信和谈心了，但是，何教授却视这一切为己任，是自己的责任。

莫雪文和何教授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他们的通信内容不仅谈病情、谈生活、谈思想、谈工作，也谈中国易性手术的发展和未来。在另一封信中，莫雪文还向何教授提出了如下建议：“我热切支持您关于办医院、筹建基金等等想法。这些都是把TS事业推向纵深的有力手段。您这样高贵的医生不仅应该成为TS的救治者，而且应该成为TS产业（如果能够成为产业）的领头人。因为不然，就会被市井之徒所利用，使这个可怜的群体面临更多的灾难。TS是一种复杂的病，它需要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综合防治，而不只是手术治疗方法，国内迫切需要‘性别认定中心’这种国外已经存在多年的综合机构。我非常希望您能够利用自己的威望，振臂一呼，从而更好地实现‘治病救人，使人幸福’的理想。”这个建议当然是很有识见的，但要付诸实施，又谈何容易！

我细读了这些沉甸甸的“两地书”，真是感慨万千。14年来，通信、电话、网上交谈，来来往往，不下几十次，占去了何清濂大量宝贵的时间。何清濂苦口婆心，不是动员莫雪文来上海做手术，而是说服他暂时不做手术。对那些以变性为诱饵牟利的人来说，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治病救人，岂止在手术台上？被誉为“中国变性手术之父”的何清濂，他所做的更多的是治病救人的工作，是通过思想先行来实现的。救人先救心，在今日的中国，弥足珍贵。

何清濂欲罢不能

何清濂真是欲罢不能。所谓“欲罢”，因为他受到了相当的压力，各种各样难听的话都飘来了；什么“不务正业”啦，什么“好好的一个部队医院，却弄这些不三不四的行当”啦，但这些屁话，何清濂一概置之不理。他依然亲自接待了大批的患者，亲耳倾听他们的申诉，亲自阅读大批和着血和泪的来信。变性手术这把刀，拿起了，似乎就放不下来。何清濂没有退路可走，只能努力向前。

又有一封江西某市 33 岁的男性建筑工人的来信，引起了何清濂的注意。这位建筑工人有一个典型的男性化的名字：张洪发，却自称是“一个十足的女性”。他的一些异性朋友，也评论他是“女性中的女性”。这位易性病患者自诉说：“我从 7 岁起，就十分肯定地确认自己是女性”，他并斩钉截铁地表示：“绝对没有家庭、环境的影响、也没有人从小开导我，我自懂事起，便自以为自己是一个女孩，喜爱将姐姐的衣裙穿在身上，和女伴们做新娘游戏，跳橡皮筋，上小学三年级时，学校进行舞蹈比赛，我表演了独舞‘美丽的哈瓦那’，身穿连衣裙翩翩起舞，受到全校师生的一致赞美，被公认为‘班花’。”17 岁后，进入青春期，他发现自己的男性特征，又羞又恨，无地自容。他从心底里厌恶和讨厌它，认为“它本来就不属于我的一部分，剥夺了我的心理色彩，害苦了自己的一生”。一年 365 天，他每天用一条长形布带，将男性生殖器紧紧地裹在大腿中间，使外观没有一点突出的痕迹。他从来不上男厕所，每次小便都采用蹲式。1990 年去深圳花了 5000 元钱做了隆胸手术，手术虽然成功了，但未能变更

自己的性别。每天傍晚,都有一种莫名的烦躁,整夜失眠,甚至去寺庙拜佛,去教堂祈祷,希望佛祖、上帝能保佑还他女儿身。为了能解脱自己的痛苦,他于1984年、1988年先后两次上吊、服“敌敌畏”自杀,幸被人发觉而免于丧生,但至今仍未消除自杀的念头。这可以说是一个原发型的易性病的典型。

这位患者的全家都支持他做变性手术。他给何清濂来信说:“虽然我们全家都同情和关怀我,虽然我爱人一往情深地爱我一辈子,那不过是一条形式上的爱,对我来说,这一切都难以缓解我心灵深处的巨大伤痛,唯有您的手术刀才能使我获得真正的幸福,给我合法合理的女性身份和无拘无束的生活。请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把不属于我的一切拿掉,把属于我的一切还给我。”

何清濂被打动了,当即给张洪发回了一封信:“如果你能把一切手续办妥的话,请于1992年1月来我院就诊。”

张洪发接到何清濂的信后,这位文化水平不高的建筑工人,却写了一封非常有感情色彩的回信:“希望的曙光以(已)经升起,我终身(生)追求将要变成现实。是您的无私的奉献给了我重新做人的希望和权利。我无法用适当的赞美词句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您的大恩大德我一辈子也感激不尽。”

1992年春天,何清濂为张洪发顺利完成了男变女的手术,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了。

尔后,何清濂又为一位广告模特儿和一位舞蹈演员完成了男变女的手术。那位广告模特儿完成易性手术后,身材修长,亭亭玉立,俏丽可爱,款款动人地在屏幕上展现种种华丽服装,令人目不暇接。她正在努力追求事业上的发展,并获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她暂不愿意透露她的身世和变性的缘由。她告诉

我，一俟时机成熟，她会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像马丁诺一样，将自己的痛苦和欢悦公之于世。

我期待着这一天，这一天的到来可能不会太遥远。

关于刘玉的故事

1998年，70岁的何教授自长征医院退休后，立即被解放军上海411医院聘请为医院的医学顾问和整形外科主任。何教授与他的博士后研究生赵焯德，以及李旭东博士、刘刚主医组成了“变性基地”。许多易性病人立即蜂拥而至。

1998年国庆节前，来自甘肃兰州的病人刘玉在411医院做完了男变女的手术，出院时，她紧紧握着院长肖正达和何清濂教授的手，激动地说：“感谢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成了一个真正的母亲。”

故事要从1993年说起。长征医院整形科主任何清濂收到了一封来自兰州的信。来信人名叫刘玉。他的经历十分不幸，是兰州一家化工厂的普通工人，自幼患了易性病，强烈地希望把自己变成一个女人。这种病给他的生活、工作带来了许多痛苦。此病在兰州市无法治疗，刘玉在病痛的折磨中过了一年又一年。他无法结婚，但也希望拥有一个家庭。于是，在1983年领养了一个女婴，28岁的他成了一个单身妈妈，靠几十元工资和女儿相依为命。

刘玉是个善良的人，他在这个女婴身上倾注了全部心血。婴儿刚领来时，单位给了刘玉4个月的假。孩子刚生下才十几天，又瘦又小，刘玉给她洗澡，每天买2.5公斤牛奶喂她。几个月后，孩子被养得白白胖胖。刘玉要上班了，只能把孩子一个人

留在家里。他把孩子绑在暖气管上,盖上被子,放上玩具,自己去上班。可是她刚要出门,孩子就哇哇大哭起来,刘玉只好回来哄她,直到她不哭了才走,可她一转身,孩子又哭了,她只得再回来。这样总要反复好几回,致使她上班经常迟到。沐浴着温暖的母爱的兰兰一年年长大了。兰兰很孝顺妈妈。有一次,刘玉生病住院,上小学的兰兰第一次做饭,给妈妈熬稀饭,做酸面汤,还帮他擦身,使刘玉感动得直流泪。

199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刘玉得知上海长征医院整形外科能治易性病,便试着去信询问。他在信中写道:“尊敬的何清濂教授,你一定要接受我的要求,因为我盼望了35个春秋,我是在绝望中挣扎活到如今。我的孩子一直管我叫妈妈,可却因为我患了这种古怪的病,常常受到别人的讥笑。你救救我们吧,你给这小小的孩子一个真正的妈妈吧!”何教授热情地给他回了信,给他提供了详细的治病资料。

此后的几年中,刘玉和何教授通信多达20封。得知自己的病有望治愈,刘玉高兴极了。他拼命挣钱,希望攒够了钱,能去上海治病。母女俩非常节省,平时从不买肉,餐桌上不是青菜就是菠菜。刘玉只有在发工资时,才买点鸡蛋给兰兰增加营养。尽管生活清贫,但懂事的兰兰从不和同学攀比,学习十分刻苦,成绩优异。经过几年的省吃俭用,刘玉终于攒了1万多元钱,他得知何教授已到了海军411医院,下决心请何教授动手术。

1998年7月,刘玉带着1.3万元钱离开兰州。这是他第一次出门、坐火车。他把钱缝在内裤里。火车到上海时,天已黑了,他牵着女儿出站。站在火车站广场上,他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不知该往哪里走。这时,迎面走来两个中年妇女,亲热地招呼她说:“大姐,住旅馆吗?我们有便宜的招待所。”说

着便拉着他和女儿走。人生地不熟的刘玉稀里糊涂跟着她们往前走,走了半个多小时,转了十几个弯,进了一个小弄堂里的“旅馆”,中年妇女让母女俩在一间仅摆着两张床的房间住下,给他们送去了两瓶水后走了。刘玉和女儿喝了水后,昏昏沉沉地睡下了。

第二天一早,当刘玉醒来时,发现身上的钱被洗劫一空,甚至连给何教授带的白兰瓜、兰州百合都不见了。他如遭雷击,一下子懵住了。钱没了,病看不成了,多少年的苦苦期盼,一下子化作了泡影;多少年一分一厘的积攒,一下子化为乌有。他欲哭无泪,呼天抢地,他恨那些骗子和强盗。他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还好,兰兰那里还藏有300元钱,刘玉踉踉跄跄跑到火车站,买了两张硬座票回兰州去了。

到兰州后,刘玉已身无分文。为了给兰兰付学费,他只得将住房以300元一月出租,自己和女儿另以150元一月租了一间小屋栖身。随后,他将来沪的遭遇写信告诉了何清濂。

何清濂得知后非常震惊。他深知这对经济条件不佳的刘玉的打击是多么大,立即给刘玉寄去1000元钱。可是,由于汇款单上的地址少写了两个字,刘玉没有收到这笔钱。不过,刘玉得知后,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女儿兰兰给何清濂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何爷爷:当我们收到您的来信时,心里十分激动,十分兴奋,更十分地感谢您。是您在雪中给我们母女俩送来了热炭。我恨那些无耻的小偷,他们偷走的钱,是我妈妈每天从工作岗位上用一点一滴汗水换来的,她还要供养我上学。攒这些钱是多么不容易啊!我本以为,这次我和妈妈已经走到绝路上了。可您的来信使妈妈重新振作起来

了。虽然我们没收到您寄来的1000元钱,但您的好心我和妈妈一定记住。希望终有一天您能治好我妈妈的病。最感谢您的女孩 兰兰。”

刘玉的人生道路似乎特别坎坷。就在这一年,他下岗了,每月仅拿180元生活费,有时还不能按时拿到。他只能在火车站摆地摊,卖钥匙链、毛巾、袜子等物。而兰兰放了假就去打工,到火锅店端盘子,在保龄球馆当服务员,以减轻妈妈的负担。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熬了过去。

刘玉再也攒不起钱了,在兰州跑了多家银行,问能否贷款看病,回答都是令人失望的。但治病的愿望在他心中越来越强烈。经过和何教授多次通信,刘玉和兰兰带了全部积蓄700元和两箱方便面,再次踏上了去上海的列车。

这次,何教授给他画了详细的地图,告诉他到沪后在火车站坐64路车,然后在福建中路同一站换21路,坐到终点站鲁迅公园。到上海下火车后,他向人询问64路车站在哪里,不料有人说,问路要2元钱。不过兰兰眼尖,一下子就看到了64路车站。到了鲁迅公园,下车后情况就不同了,好些人热心地给他们指路,使他们顺利地找到了411医院。

刘玉终于见到了何教授,看到了这位他在脑海里描绘过千百次的白衣天使。从何教授那双和蔼的眼睛里,他分明看到了一颗善良而崇高的心。他的700元钱在买了火车票后,到医院时身上只有200多元。只有这点钱,这病还能看吗?何医生安慰他道:“你别担心,你来了,我就要把你多年的心病去掉。”住院后第3天,由何教授主刀、整形科主任赵焯德博士担任助手,为刘玉做了变性手术。

多年的痼疾一朝去除,刘玉激动得三天三夜没合眼。手术后,何教授给“她”送来了家里做的营养菜,几天后,又送来200元钱。护士长施雅婉也给她炖了鸽子。病友看她女儿用方便面充饥,为她多订了一份饭。护士李婷给兰兰买了漂亮的连衣裙,病友刘芬给她100元,病友王宇超出院后寄来了2000元……

经历了那么多坎坷的刘玉突然被爱的阳光所包围,住院的这些日子里,感动始终洋溢在她的心中。

医院对这位来自西部的病人也倾注了特别的关爱,院长也去看望了她。考虑到她的特殊困难和求医的艰辛,院方决定免去她全部1.07万元医疗费。医院的激光整形美容中心还将承担兰兰今后全部的学习费用。

“上海还是好人多。”被爱包围着的刘玉说着,泪水止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临走时,刘玉对何教授说:“我这一辈子的心愿了了。上海,将成为我记忆中最亲切的城市。”

把他们从绝望中解救出来

在说这个故事前,且让我们读一封寄自四川的绝命书。

爸、妈:

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我心里只有愧疚。我对不起你们,我也不想走这条路,可我已找不到别的路了。现在是我认命的时候了。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你们没错,我也没错,只是命运对我太不公平,我也太懦弱了。我已没有勇气继续活下去。虽然我不想死,也不甘心这样死,但我无可奈何,甚至没人能够理解和体会我的痛苦。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死法,我选择的不是最好的一种,却是最适合我的一种。

请你们不要伤心和难过,因为正如你们常说的:不值得。我不愿意把我对你们的内疚之意都写出来。这样做,只会增加你们的痛苦。说实话,我一直下不了决心,不是害怕,只是想到你们会受不了。这个家将会垮了。我犹豫了,只好苦苦地撑着。现在,我终于顶不住了,我看不到一点光明,甚至连幻想中的希望也没有了。我不得不这样做了。这对大家都是一种解脱。我解脱了,你们也解脱了。活着多累啊!我现在不用累了。我这样做,虽然很自私,很懦弱,但我已经坚持到了我所能做到的最后一分钟,但我斗不过命运之神。

我不愿意再说对不起一类的话。因为这对你们来说,已是没有意义的了。我衷心感谢你们21年来的养育之恩,我也没有办法回报了。我也不愿意说下辈子做牛做马来报答的话,那是空话。我惟有一个希望,就是你们好好保重,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这样,我在九泉之下,就瞑目了。

你们的儿子段和平

2002年8月12日

段和平的父母发现了这封信后,急坏了。母亲赶紧把儿子带到上海,找到何清濂教授。她用近乎哀求的口吻对何清濂教授说,儿子正在读大学三年级,人很聪明,就是一心想变成女青年,请何教授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救救他。何教授经过仔细的诊断,判断段和平是一名典型的易性病患者。

据何教授的统计,在易性病患者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患者有自杀的念头和倾向,曾自杀和自残者约占一半。如果不及时治疗,有相当一部分人会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易性病是一种对人类危害很严重的一种疾病。

何教授提出,发现了易性病后,有条件做手术的病人,要尽早做手术,最好是在未婚前就做手术,这样可以减少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社会矛盾。

他举了一个例子。在1991年中国完成第一例易性手术——秦惠英的手术见诸报端后,他接到了一位工程师的来信,他毕业于哈工大,是一位硕士生,后又到清华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一家外资企业任工程师,已婚,有一个孩子。他和妻子、孩子感情很好,妻子说什么也不愿离婚,即使夫妻没有性生活也不愿离婚。何教授说,考虑到这种情况,如果贸然为他做变性手术,那就拆散了一个家庭,他建议这位工程师以不做变性手术为宜。现在,这位工程师已升任总工程师,他仍然很痛苦,但又舍不得和他的家人分离,真是进退两难。

有的社会学者指出,易性病者作为特殊患者,在痊愈出院后,如何开始一个异性的崭新生活,还面临着很多挑战。医院可以给这位男子一个女性的身体,但是她将来能不能真正幸福的生活,成为一名真正的女性,重要的还是要靠社会尤其是亲人的理解和关心。

现在,让我们把镜头再回到段和平身上来。何教授当即和段和平谈了话,告诉他,来医院求治,就一定能治好病。希望他能好好治疗,不要胡思乱想。考虑到他只有21岁,是否的确是易性病患者,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于是,何教授就请他在医院住了下来。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心、治疗、观察,何教授心里有底

了,便于2002年10月为他作了男变女的手术。她的父母一直在医院陪着他。出院后,段和平心情十分舒畅,高高兴兴地回到重庆上学去了。现在,他已大学毕业,又继续攻读法律硕士,逢年过节,都会给“何爸”来个问安电话。

5

第
五
章

[中国的“马丁诺”在哪里?]

秦惠英由男变女获得了成功,那么,女变男是否可能呢?

中国的“马丁诺”在哪里?

第一例变性人的报道在报上曝光后,原来呻吟已久,痛苦不堪,但又羞于启齿的中国“马丁诺”式的人物,纷纷从各地冒出来,向何清濂报到了。

其人数之多,病情之严重,申述的痛苦,也大大出乎何清濂教授的意外。

一位因不堪忍受精神折磨、毅然辍学到一所庙宇出家的女大学生来信说:“您也许不相信,我万念俱灰,竟然皈依了佛门。半年多来,暮鼓晨钟的寺庙枯燥生活,并不能净化我的心灵。古语曰:‘哀莫大于心死’,可是,我的痛苦莫过于‘心不死’,我朝思暮想成为一名男子汉,像一个正常的男人那样生活。但是投医无门,‘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现在好了,我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的火苗,这迟来的春色使我欣喜若狂,今天,我情托于砚墨,将我心中的一腔苦痛,倾诉于您的面前。在中国,能否也出现一个马里欧·马丁诺的奇迹,我愿意提供自己的身体,给您做个实验。即使手术不成功,也无所谓。有幸的是,我终于争取到了一个重新获得生命的机会,我一定和您好好合作。如果手术获得成功,我可以完全正常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学习,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社会……”

“何教授,请您那巧夺天工的手,再造我的第二次生命吧!”

读到这封信,又使何教授不安了好几天。但是,更出乎意料

的是,类似的信件,接二连三地给何教授寄来了。

又冒出好几个“马丁诺”式的人物

“马丁诺”式的人物,在生活中真是不少。1992年12月6日,何教授又收到一封来信,这又是一个“马丁诺”式的人物。

她叫周小玲,是湖北省的一位大学毕业生,学的是纺织,工作能力很强。她毕业后,应聘到武汉市一家丝绸厂当了副厂长,负责技术管理工作。上任伊始,把整个厂的生产抓得有条有理,但是,她在大学里发现患了易性病,自称自己“好像是一个在京剧舞台上永远不卸装的梅兰芳”,希望在台下是一个男子汉。周小玲说:“我本来是个男人,到这个世界上就被化了女装,我卖力地又做又唱,但是卸了装,我还是一个女人。我就这样男扮女装了24年。24年了,我是无可奈何又无可奈何,我竭力调整自己的心态,但一切都是徒劳。”她称自己是“男人的世界进不去,女人的世界不愿留”。别人称她为“女强人”,她感到那个“女”字特别刺耳,刺得她的心口发痛。周小玲宁可死,也不愿听到那个和“女”字连在一起的名字。易性的欲望强烈的时候,她无法集中精力一小时或十分钟,做好一件事,她不得已,辞去了副厂长的职务,四处奔波,一心想把自己变成个男人。

她到上海找过何清濂,泡在电信局里给何教授挂电话,给北京的各大医院写信。白天,周小玲把自己关在一间租来的小屋子里,拉着窗帘,怕见熟人,更不敢到街上去,生怕别人议论、猜测她是男还是女。天黑了,她就往外跑,不论是刮风,还是下雨,她都要到电影院里去“消夜”,只有在这个时候,她的心灵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她觉得,只有在黑乎乎的放映厅内,才能像正常

人一样端端正正地坐着,没有人来关注她,她又能和人群在一起。这才是她的正常的人的生活。

周小玲在一封给何教授的信中写道:“我宁肯做一个懦弱的男人,也不愿当一个所谓的‘女强人’。我宁可不当人,也不愿当女人。我还没有疯,但是,我发觉自己已近半疯了。一个人内心世界分裂得太厉害,也是会疯的。我内心的这个男性,和外表的那个女性,一天到晚在斗争,使我一刻不得安宁。我一天到晚在流泪,我常在深夜里失声痛哭。我一遍又一遍地呼喊:周小玲,周小玲,你该怎么办?”“我想和别人一样逛逛商场,和常人一样有家庭、有职业,甚至有可爱的孩子。我想健康、平和地生活,把我的知识献给我热爱的祖国,报答我的恩人,但是,命运和我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我现在不能。这只是一个幻想,一个遥远的梦。我活着是在演戏,骗别人更骗自己。我讨厌我这个女性的躯壳,我讨厌,就像蚂蟥吸在身上一样。何教授,改变我吧!我把您当作再生的父母,我求您了!求您了!”

另一位求助者的材料,同样使何教授惊心动魄。

她叫杨维良,女,1975年生,初中毕业,广州某机械厂技术员。她理着男式短发,穿着男式西服,言谈举止,完全是一副男人模样。她出生在四川成都郊区的一个五口之家,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她母亲在怀上她时候,就渴望生个男孩。快生她时,母亲腆着肚子去寺庙拜佛,在送子观音前得了三个“幸”卦,母亲喜得合不拢嘴,一回家就张罗着给她取名。谁知事与愿违,她不是男孩,令全家人非常失望,但仍决定把她当男孩哺育,以求得全家心灵的安慰。

谁知这样一养,就养出了大问题。杨维良从小着男装,留光头,爱打爱闹,和男孩子一起玩,还当上了孩子王,和男孩一样站

着小便。在九岁时,她便以为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男子汉了。但令人懊丧的是,在13岁的一个晚上,她突然来了月经。这时,杨维良的父母亲觉得再也不能把女儿当作儿子养了。他们为女儿买来了女装,但她死活不肯穿上,父母就将她关在房里,不准她出去和男孩子玩。她一个人在房里,对着衣柜的镜子看到自己微微凸起的乳房,感到这两团东西真讨厌,就想用刀把它挖掉。而想起同伴虎伢子身材健壮,勇敢威风,真让人羡慕不已。她从此郁郁寡欢,同时又感到老师同学用异样的眼神看她,仿佛芒刺在背。那段时间,她的内心非常矛盾苦闷,学习也难以正常进行,真想一死了之。15岁那年,她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闲在家里。这时,父母对她非常鄙视,不仅没有关心,还经常打骂,将她当怪物看待。

杨维良的父母亲还给她与邻家的小女孩订了“娃娃亲”。这也给她带来了更大的苦恼。这个小女孩长大后常常刮着脸羞她,严重地刺伤了她的自尊心。当她闲在家里烦躁不安时,突然对她产生了报复心理。一天,她趁父母姐姐不在,将她诱骗到房里,强行指奸了她,把她的处女膜弄破了。她父母知道后,喊人将她毒打了一顿。当时她的母亲在拉架时,左眼不慎被人用木棍刺瞎了。那个女孩长大后,嫁了两次人。她现在的男人还在四处找杨维良,扬言要与她算账。于是,杨维良的父母亲赶紧将这个“祸女”远嫁重庆。

嫁了人,生活依旧不幸福。结婚那天,她和丈夫约法三章:第一,不生小孩;第二,不做家务;第三,我穿男装,你穿衩裙。丈夫刚离婚,有一个孩子,听了她订的这一套“家规”,感到很新奇,就满口答应了。她于是将一套新娘的衣服给他穿上,给他套上胸罩,穿上带卫生巾的内裤和绣花内衣,披上婚衫,戴上准备

好的假发,并为他描上口红,画上眉毛。杨维良则穿上新郎的西服、皮鞋,将新房里的灯全部点亮。看着这样一个奇特的婚礼,她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到自己已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但是,好景不长,丈夫发现,这个妻子对性生活毫无兴趣,而他对房事的欲望又特别强烈。丈夫对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极度反感,他们俩的婚姻维持不到一年,就分手了。

离婚后,杨维良只身来到南方一家机械厂打工。眼界宽了,她考虑做变性手术,每天关心这方面的报道,搜集有关易性手术的资料。可是变性手术需要一大笔钱。她意识到,就是自己埋头苦干一辈子,也凑不起这笔巨款。她于是给被誉为“中国变性手术之父”的何清濂教授写信,希望何教授能救救她。她在信中写道:“不能变性,生不如死,您有办法治好我的病,减轻我的痛苦,请您无论如何救救我……如果得不到您的帮助,我就一死了之……”

面对着那么多的求救者,何清濂只有两只手,他到底先救谁呢?何清濂踌躇再三。

何清濂选择了李一妮

何清濂没有料到,治好了一个秦惠英,会引出那么多的同病相怜者。他当然更没有料到,《文汇报》一则几百字的新闻,将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震动和关注,尔后将是风波迭起,争辩不休。从某种意义上看,秦惠英的要求易性,也是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一名弄潮儿,千百年沿袭下来的道德观被打开了一个缺口,禁锢已经冲开,变性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那么,何清濂能不能运用他手中那把10厘米长的手术刀,继续为人世间更多的不幸者

解除痛苦,也为中国的整形外科谱写新篇章呢?

何清濂决心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再一次敲开了治疗女变男的易性手术的大门。

他选择了李一妮。李一妮,就是前文提到的已自杀三次未遂的那个青年女营业员,她的母亲为此赶到医院,在何教授的脚下长跪不起。

李一妮的病情的确是值得人们同情的。这个女孩子自小喜欢和男孩子一起玩,和男孩子一起翻墙爬树,而且不喜欢着女装。据专家们的分析,这可能是一种性偏离的表现。人们的性身份的核心或基本内容,即我是男性或我是女性的自我确认,在大约3岁时完成。有关意识的萌芽,可能在出生时候就存在了。我采访了李一妮。据她对我说:当我刚到十三四岁的时候,便开始萌生一种渴望——将来要成为一个男子汉。我爱骑自行车,骑车的水平可与小伙子媲美,吃饭可以三口吃下一个二两的包子,气得妈妈对我说:“没有一个女孩子像你这样吃东西的。”我回答妈妈说:“我胃口好,难道也是一种罪过吗?”李一妮说:“因为我脾气大,力气大,在我家周围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子,都怕我三分。我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男孩子气质,也使我吃了不少苦头。有一次,因为打架,身上打出了一个伤口,共缝了12针,其中4针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缝的,我没有哼一声。但最大的痛苦,却莫过于心想事成不成。我自以为是一个男孩,但身子却是女性的,无情的现实粉碎了我的梦想,我苦闷,我彷徨,我烦躁,我变得一声不吭,茶饭无心。中学毕业后,我当上了一名商店的营业员,因为无法改变性别,我觉得活在世上已经没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死掉算了。我自杀过三次,但每一次都被家人发现救活了。正在我求死不得、求生无望的时候,我从报上读到了

何教授为秦惠英完成了男变女的变性手术。我高兴得跳了起来。我有救了,我有生的希望了。二十几年的愿望可能实现了。我妈妈也高兴极了,和我一起来到上海长征医院,希望何教授能救救我……”

何清濂教授说:“在他的病房中,几乎所有的患者都有类似的故事。”他说,许多人像李一妮一样,已尝试自杀过几次了,而且少数人已毁灭了自己。

何教授反复研究了李一妮的病情后认为,并非所有有易性要求的患者,都必须通过施行手术治疗来救治。患有严重易性病的病人,也必须具备个人申请,公安部门证明,精神病院证明,工作单位及居委会、父母兄弟的证明,已婚者必须解决好配偶问题并具备证明,才考虑是否施行手术。但是,像李一妮这样的病人,有过三次自杀的病史,如其他证明齐备,则可以考虑优先作手术治疗。李一妮在得到上述明确答复后,回到其住处和工作单位,顺利地取得了单位、居委会、派出所等有关部门同意手术的证明,她本人也写下了手术申请书。

何教授面对这一叠有关证明,当然也明白自己手里这把手术刀的分量。男变女已取得了一些临床经验,但相对来说,“男变女”还比较容易,而女变男则不同,需要再造一个男性生殖器,而且需在患者身上动三次大的手术。这三刀尚无先例,且是不可逆的,万一有失误,那可真的会把一个人毁了。

再造阴茎的成功

何清濂没有九成把握,是不会在李一妮身上动刀的。他之所以有相当的把握,就在于他曾创造了神奇的阴茎再造术,为几

十例深受肉体和精神折磨的病人带来了福音,给无数家庭重新送去了欢乐,也使中国首例女变男的外科手术成为可能。

早在8年前,何清濂接待了一对来自浙江的姐妹的求医。姐姐22岁,妹妹20岁,均长得花容月貌,但美中有不足,两位大姑娘至今未来月经。到当地的医院检查,诊断为阴道缺损,听说何教授医术高超,便慕名来到长征医院求医。

此病怪,亦不怪。何教授一经检查,病情立即明了:两个大姑娘虽已过及笄之年,但盆腔里却空空如也,没有卵巢、子宫,而大腿根部却各有一个睾丸,而染色体为46xy。决定一个人的性别不仅要看外生殖器,主要看性染色体。女性的性染色体为xx,男性的性染色体为xy。有些人外生殖器像女性,但染色体则是男性,这就是假两性畸形。何清濂告诉她们:你们不是女性,本质上是男性。你们不需要造阴道,而应再造阴茎。

“阴茎也可以再造吗?”两姐妹嗫嚅地问。扮演了20年女性角色的两姐妹,忽然要“定性”为男子,而且需要为“她们”再造一根阴茎,这怎么好意思啊?又怎么回去向家乡父老交待啊?

她俩说什么也不愿意上手术台。何清濂出于尊重科学和为病人的长远幸福考虑,以一个长者的身份,先后与“她们”促膝长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征得了两人父母的同意。“妹妹”先上了手术台,何清濂花了5个多小时,就为“她”成功地施行了阴茎再造术,“妹妹”变成了弟弟。5天后,“姐姐”也还原为男子,成为哥哥。

这样的矫复手术,何清濂已做过几十例,全部获得成功,并为一些因后天因素造成的阴茎缺损患者解除痛苦,有的还恢复了性功能,挽救了一些濒临破裂的家庭。

试看下述病例:

有一位来自河南的病人,年已30岁,患有先天性无阴茎症,但睾丸、副睾完好,那么,小便是从哪里出来的呢?何教授用了好多先进的仪器为他作检查,都不得其解。于是,何清濂亲自蹲在厕所里,观察这位病人小便,终于发现小便是从肛门内的小孔内流出的。这样的病例在医学上极为罕见,国内还没有人报告过。何清濂决定先做手术探查。病人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麻醉剂已经起作用了,操刀在手的何教授思之再三,又把手术刀放回了器械盘。何教授利用局部麻醉的条件,为患者进一步作了检查,终于在肛门里找到了尿道口。但是,要把肛门里的尿道口改植到前面,又谈何容易。弄不好,就会造成小便失禁,尽管手术有风险,但何清濂并没有退却。他设计了好几种方案,制订了各种预防措施。尿路改道手术终于一举获得成功。但第二次作再造阴茎手术时,病人却不肯合作,原因是不愿从前臂切取一块医学上称之为前臂皮瓣带血管的组织,病人担心手臂上留有一大块疤痕。他宁愿不做阴茎再造手术,也不愿在手臂上留下一个疤痕。病人的顾虑不无道理。何清濂决定另辟蹊径。他放弃了原定的手术方案,放弃了回浙江老家过春节的打算,留在上海为病人重新设计了一个手术方案,即从腹壁取皮瓣的方案,采用“乒乓球拍状皮瓣”样式,为病人成功地制造了一个人造阴茎,连接好改道的尿路,使患者从此可以直立小便。何清濂的这项成果,获得了1986年军队科技成果二等奖。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身高一米八十的小伙在长征医院住院期间,和护理他的一位上海姑娘产生了感情。后来鸿雁传书,终于喜结秦晋之好。1990年,这对有缘千里来相会的夫妇喜得一女。1992年9月,患者因人造阴茎中的肋骨弯曲,再度来沪求治于何教授。何清濂为他换置一根近年研制成功的银丝硅胶棒,它可以人工弯曲,

伸展随意,又胜过硬直的肋骨许多,使性生活更为和谐,病人喜不自胜,连声道谢而去。

何清濂的再造阴茎的成功,为不少因工伤、车祸等意外事故造成阴茎残损者,重新找回了青春,也为一些濒于破碎的家庭重新恢复了生机和温暖。

有位青年工人,1983年在一次不幸的工伤事故中,一台制砖机的齿轮扎掉了他的一条大腿,连同阴茎也一起绞断了。当他刚从伤残的噩梦中醒来时,妻子又以他丧失了性功能为由,提出离婚要求。这位青年工人面对24岁的妻子和1岁的幼子,痛不欲生,便喝下了敌敌畏,幸而抢救及时,才幸免一死。工厂为他安装了假肢,恢复了残腿的部分功能,同时,工厂的领导又千方百计做这位伤残者妻子的思想工作,劝她不要离婚。工厂领导同意给这位青年工人一万元钱,让他到全国寻访名医,看看哪个医院能为他“妙手回春”。他向全国六家大医院投书,均没有听到回音。最后,他试投一信到长征医院。胸有成竹的何清濂复信请他来上海治疗。厂领导派专人护送青年工人来长征医院治疗,短短45天,为他再造了尿道、阴茎和阴囊。何清濂在他左侧腹壁取下一块乒乓球拍状皮瓣,其中有两根动静脉血管,用以制成一人工阴茎,其间插入一根软骨作为支架,将尿道接通,然后将人工阴茎带蒂移植于阴茎缺损残根部分。尔后,排尿畅通,阴茎外观理想,妻子来沪看了何教授的成果,说了一个字:“中。”这位青年工人的性功能得到了恢复,后来妻子做了两次“人流”,一个濒临破裂的家庭被保全了。当时,他只花了500多元医药费。此后连续几年,这位青年工人全家多次来沪看望何清濂,感谢他的再造之恩。

还有一位战士小康,有国防施工中被高压电击烧掉了阴茎,

也是痛不欲生。何教授为其再造阴茎后,他带着二等残废军人的证书复员到了江西老家,不久寻到了意中人。不料小康在长征医院做过手术一事被女方知晓,姑娘想割断情丝。小康赶紧写信给何教授求援,何教授迅速给小康的恋人写了一封信,说明再造阴茎有血有肉,与常人无异,打消了姑娘的疑虑。两个年轻人欢欢喜喜结了婚,婚后感情不错,但两年后妻子仍未怀孕。妻子便责怪小康无能,邻里也传出流言,谓小康的“家伙”是橡皮做的,是假货,中看不中用。小康招架不住,又写信来向何教授讨教,何教授又在百忙之中给他复信,传授以有关知识。此后不久,小康的妻子便有了身孕,十月后喜得一女。按政策,二等残废可生两胎,三年后又得一子。现在,小夫妻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恩恩爱爱。

安徽某县农村有一男孩,在一岁时,他的母亲为儿子解便,正好有一犬走过,见男孩排便,便探头食粪,食毕,意犹未尽,竟纵身一咬,将男孩的“小鸡鸡”咬下,嚼食而去,男孩的母亲大怒,赶紧追去,但已无法挽回,幸亏睾丸未受损害。男童年幼时,尚无大碍,但长到20多岁后,无阴茎是一大困惑,乡里人常常指指点点。于是,他跋涉千里来找何清濂。何清濂依照原法,制成一个人造阴茎安置上去,后来这个青年喜结良缘,一年后也得一子,全家额手称庆,说遇到了救星。

四川有一对夫妻,丈夫为团干部,妻子是护士,年轻漂亮,可称得上郎才女貌,婚后感情很好,育有一女孩。1983年春节,夫妇同去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均多喝了几杯,回家后昏昏睡去,中午,妻子不知出于何种动机,竟用一把剪刀,将丈夫的阳物一刀剪去,丈夫被送医院急救,妻子却自杀了。丈夫生命保住了,却失去了阴茎。后来听说何清濂能再造阴茎,千里迢迢赶来上

海求医,何清濂又用他自身的皮肉,为他做了一根阴茎,何清濂告诉他可以结婚。此人回到四川,轰动全县。后经人介绍对象,这个男子又结了婚,5年后何清濂去四川他家随访过一次,听说再婚的妻子已人工流产两次,因已有一女不能继续生育。

年已45岁的彭先生不幸患上阴茎癌,不得已把阴茎切除,巨大的身心痛苦给他莫大的压力。长征医院的医务人员为他施



何清濂在日本国际学术会议上

行海绵体前移和皮瓣移植手术,将残存体内的少量海绵体拉出,再用腹部皮瓣重塑阴茎外形,手术效果不仅形态逼真,而且使彭先生恢复了排尿、勃起性交等功能,20天后顺利出院。

1986年,何清濂写成论文《腹壁取双血管带筋膜皮肤瓣一次完成阴茎再造》,附12病例,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第100期的头条地位发表,引起国际上的广泛注意,因为国外尚未见用

此种方法再造阴茎。德国、阿根廷、印度、瑞典等国医学界均来信要求作学术交流。德国威士巴顿《医学论坛》以一整版的篇幅介绍了何氏再造阴茎术。1989年10月,何清濂赴日本长崎,出席日中整形外科学术会议,何清濂作了学术报告,并展示了幻灯片,在与会者中引起了轰动。何教授的这一创造发明,获得了解放军总后勤部颁发的科技进步奖。

何清濂在15年间完成154例变性手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为中国医学史写下了重要的一章。何清濂的手术水平远远超过了日本。据1999年6月25日日本《每日新闻》报道:1998年10月在日本埼玉医大综合医疗中心成功实施了日本首例女性转换成男性的手术,1998年6月25日,该中心又完成了第二例男性转换成女性的手术。患者是住在日本中部的一名男子,32岁,是一个“性同一性障碍”的典型患者。从1997年在埼玉医大医疗中心接受心理治疗,后又注射女性荷尔蒙,均无效,于是实施易性手术,获得了成功。何教授所做的易性手术的质量也大大领先于日本。他自行设计的阴股沟皮瓣做的再造阴茎,有神经感觉,能充血,有性功能,几可乱真。他到日本作学术报告,并放映手术录像,在日本引起轰动。

女变男,难度大得多

正是有了几十例再造阴茎成功的先例,何清濂才有充分把握登上手术台,为李一妮作女变男的手术。

1991年10月,何清濂和他的助手们经过充分的准备,制订了一套周密的手术方案,把李一妮送上了手术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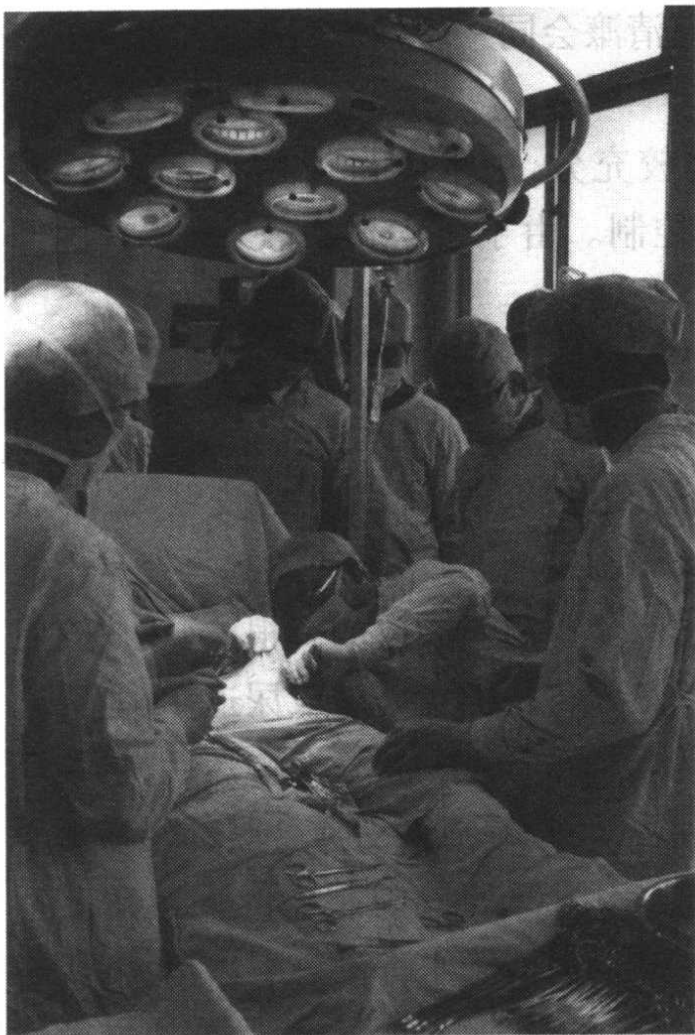
在手术灯下,李一妮进行了半身麻醉,静静地躺着,大脑还

是清醒的。为慎重起见,何清濂会同一位妇产科专家,切除了李一妮的乳房和子宫、卵巢。

由于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手术做得很顺利,李一妮性“变”了一半,病情得到了控制。由于手术伤口较大,李一妮回到家乡去休养一段时间。

过了两个多月,李一妮又来了。何清濂再度为她作了第三次手术。他在病人的腹部左侧小心翼翼地掀起一层长约20厘米、宽14厘米的腹壁浅血管和旋髂浅血管为蒂的皮肤瓣,形状酷似乒乓球拍,拍柄部带有动脉、静脉。手术的关键之处是不能损害这几根连皮带肉的血管,如弄断了其中的一根,这块皮瓣就成了一块死肉,只得丢掉;然后,将拍部皮瓣卷成尿道和阴茎体。人造阴茎中的尿道与病人体内的尿道接通、缝合。然后,再在病人腿部取下一块皮,移置到腹部,让它成活后愈合腹部伤口。手术一结束,人们当场就发现,用腹部的皮肉制成的人造阴茎活了。整个手术进行了9个小时,何清濂水都没有喝一口,厕所也没上过一次。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何教授患有严重的过敏性鼻炎,为防止手术时鼻涕流出,他用棉花团塞住鼻孔后上了手术台。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一连几个小时,不能用鼻子呼吸,其苦楚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何教授为解除他人的痛苦,置个人的病痛于不顾的高尚医德,值得人们仰慕。

李一妮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后,现在已能站着小便了,李一妮见到我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现在心里特别开心,感觉特好。”病人已于1992年秋天出院。1993年春,李一妮来院复查,何清濂又为他作了残留的尿道修补术。这样,中国的第一个“马丁诺”出现了。何教授告诉我,这则新闻第一次的发布权仍交付给我,待发表后,他才约见其他报刊的记者,即使是新华社,



取下皮瓣,是做女变男手术的重要一步

也不例外。这对于我来说,当然是一种莫大的信任。

1992年11月12日,我又为《解放日报》写了一则消息,报道我国首例女变男的手术获得成功。消息写道:

“上海长征医院著名外科专家何清濂教授,在完成了该院首例男变女的变性手术后,最近又完成了我国首例女变男的变性手术。据悉,何教授在完成手术后,又运用他创造的阴股沟皮瓣新法,完成

了第二例女变男手术。第二例的‘她’变成了‘他’后,现已和一女青年谈起了恋爱。”

尔后不久,何教授约见新华社记者陆斌,为他提供了相关的材料。1992年12月14日,新华社从上海发出了一则消息,报道女变男的易性手术在长征医院获得成功:“中国著名整形外科专家何清濂教授施行的中国首例女变男手术获得成功。此间专家说,这表明我国的变性手术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例

手术于1991年10月进行。目前,这位患者在生理、心理上已逐渐适应男性生活。近日,这位患者向何教授来信说:‘痛苦与死亡已离我远去,我要为新生活去奋斗。’”“何教授强调指出,我们做变性手术是为了治病救人,和国外‘人妖’那一套摧残人的把式有着本质的不同。”

一石又激起千层浪。消息经新华总社报道,向国内外播发,因而中央各报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各省市报刊相继刊用了这则报道,东京、纽约、巴黎、莫斯科以及港、澳、台各报刊,也以显著的地位刊登了上述消息。中国变性手术取得的新成就,已为国内外舆论界所公认。何清廉被海内外报刊称为“中国变性手术之父”。中国的变性手术水平已赶上了国际先进水平。

由新华社发表这则消息,另



解放日报报道国内首例女变男手术成功

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价值，即易性手术的成功，可以由官方的最有权威的新华社报道，这向全世界又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中国的改革开放，又迈出了一小步。

“登上手术台之日，就是我的第二次生日”

但是，人们的认识，并不是整齐划一的。一个新事物要被大多数人认同，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在易性病患者心目中的“上帝”，也有其难以启齿的苦恼。何清濂教授在探索变性手术的征途中，并不是到处堆满了鲜花的。成百上千的病家将他看作“救命恩人”，但也有人视他为“好事之徒”，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好曝光”、“出风头”。有人认为，长征医院是堂堂正正的解放军医院，烧伤、整形的手术都做不过来，却去收治什么“变性人”，和那些不男不女的人混在一起，有啥意思；也有人说，我们的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搞变性手术，把人弄成“人妖”，不伦不类；也有人说，变性变性，迟早要变出一场官司，够他受的，吃不了，兜着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那些亲热地称何清濂教授为“何爸”的病人，更没有想到，“何爸”为解除了他们的苦痛，竟给自己带来了那么多的难言之隐。

不过，“何爸”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他的肚子里，容得下各种稀奇古怪的议论，一不发火，二不计较。他觉得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生气，要生那个气，还不如抽些时间多做些宣传解释工作。登报出名吗，他没有浓厚的兴趣。许多报刊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希望他能提供更多新鲜的材料，以增加报刊的“卖点”。一般来说，“何爸”都是摇摇头，婉言谢绝了。他不想成为一个医务界的“明星”。

他宁可把时间花在整理病人的来信上。每当夜深人静,他开始了最有兴趣的“业余活动”:细心地把数以千计的来信,一封一封地编上号,在信封上作了提要,分门别类作了归纳,然后分送领导传阅,送给同事们看,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他著文介绍国外的易性手术的情况,对那些指责他是“好事之徒”的人说,有这么多的病人,在痛苦中挣扎,岂能无动于衷?搞科研之事,又有什么罪过?有人不助一臂之力,却专干吹冷风之事,难道反而变成光荣?难道能使他人相信,甩手的、指手画脚的比实干的人高明?

何清濂教授的心里装满了病人的苦痛,装满了救死扶伤的责任,装满了创造的跃动,装满了手术的每一个细节,唯独很少想到自己。他对写信来的病人的情况,可谓是烂熟于心。

此时此刻,他又想到了另一位病人:谢媛媛。谢媛媛,一个多么可爱的女孩的名字,是家里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取这个名字,也可以想见父母是多么喜欢她。谢媛媛从小成绩不错,品学兼优,一直受到教师的夸奖。但到了读小学四年级时,她参加了一次学校的化装演出,男女同学穿着漂亮的演出服,谢媛媛看着男青年的潇洒的服装,心头突然升腾起一种归队的愿望。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套中人”,穿着女性衣服的外套,内心却是一个男孩子。

她长大了,温文尔雅,别人走过她的眼前,都会情不自禁地“再回首”。但是,谢媛媛讨厌这异性的目光,她渴望异性的认同。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子,于是留心各种报刊杂志发表的关于易性手术的报道。她得知国内外都能做这种手术,但需要一笔钱。高中毕业了,她没有考大学,而是参加了工作,在一家经营五金杂货的个体户处打工,干了几年,积攒了一笔钱。尔

后,她又萌生考大学的念头,考入了一家大学的哲学系。她的变性的念头没有绝灭,她到上海来看望了何清濂。何清濂会见了她,鼓励她好好完成学业,在学习结束后再研究是否施行手术。谢媛媛回到学校后,给何清濂写了一信,文字同样写得凄婉动人:

尊敬的何教授:

我们是病人,同样是天地间的一种生命,为什么不能争取健康的生活? 医务界既然承认这是一种疾病,那么,中国法律同样赋予了公民接受医疗的权利! 既然国外已有专科医院,外国人能将变性的经历写成一本书,而我们又为何年复一年地苦苦地挣扎着? 既然美国的生物学家公布最新研究成果已表明:性的倒错具有生理原因,既然中国已有了一个秦惠英,所以,我坚信,中国的变性患者一定能盼到重见天日。中国有了何清濂,我们这些可悲的生命就不致于绝望。

何教授:多少次我之所以没有自杀,支撑我的信念是黑格尔所说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们这一群人,也是活生生的存在者,其中也不乏佼佼者,可是,有些人自杀了,有些人自残了。社会为什么不正视这个问题? 社会学家为什么不抽出时间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有些好事之徒为什么要对我们指手画脚,评头品足? 我坚信人的性别不唯由生殖器判定。完善的结论是什么? 现代医学尚不能回答。我们是走在这个空白地区的人,我们的社会为什么眼睁睁地看着我们陷入绝境?

尊敬的何教授,我若是男子,也会像秦惠英一样自残,

无人相助只有自己动手,可惜我不是。何教授,不知您做过女变男的手术没有?如果您哪一天决定试一试,我争取成为您第一个赐福之人。你是否理解,我从7岁起就无法摆脱“我不是女孩,上帝分错了身体”的信念,一步步趋向手术台。没有任何力量阻止得了我的行动。我不怕遭到讥笑,不怕贫困,不怕与世隔绝的危险,不怕手术的危险。对我来说,纵然死在手术台上,也胜过百无聊赖地混日子。

谢媛媛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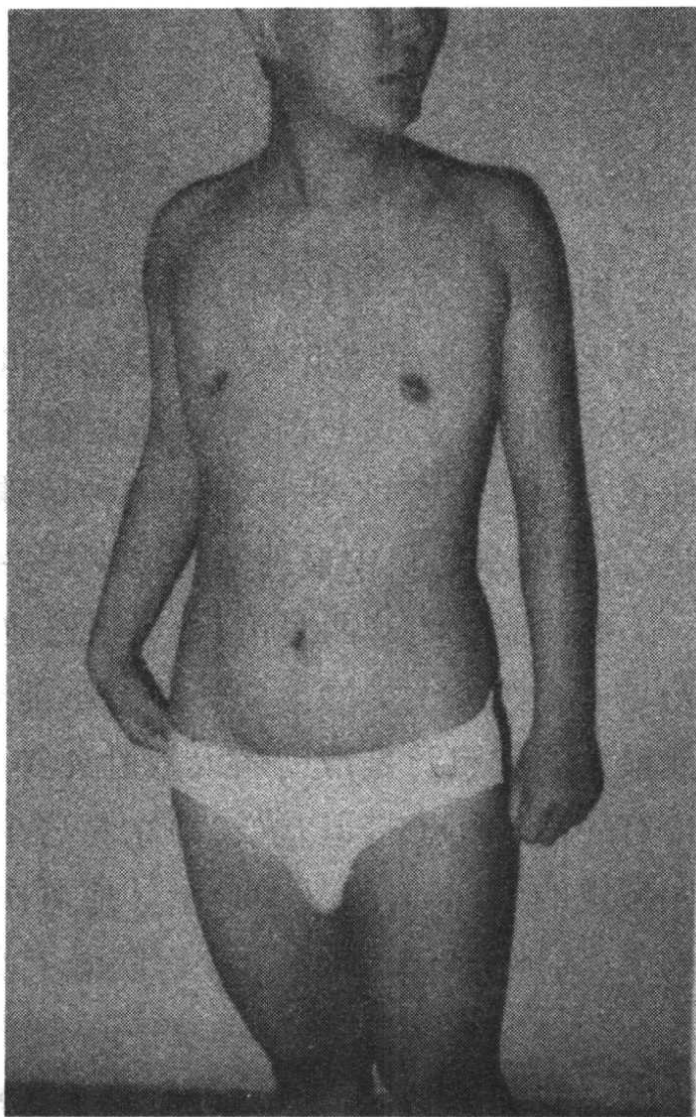
谢媛媛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我准备在手术后,把我的经历写出来,以此感动世人。希望这个世界别冷酷地对待我和我的同病相怜者。我一直以为,命运给了我这样一段不幸的经历,使我介于两性之间,我将要把这种特殊的感受奉献于人类。但是,目前我的心目中最神圣的殿堂是手术台。”

何清濂读着这两封信,心灵强烈地受到了震撼。救死扶伤,乃是一个医务人员的天职。他最不能容忍的事乃是见死不救。他最大的欣慰乃是帮助病人战胜死神。为了免遭非议,何清濂曾有一段时间想打退堂鼓,停止对这个领域的探索。这回读了谢媛媛的信,何清濂又动心了。他再次决定向她伸出人道主义的手,约她于1993年3月来医院做了女变男的手术。

阳春三月,我在长征医院一间充满阳光的病房里见到了谢媛媛。我递过名片,谢媛媛说,我了解您,您发表过我国首例男变女的报道,何教授也和我谈起过您。我问她:此时此地,你的心情如何?谢媛媛告诉我:我走上手术台的那天,就是我的第二

次生日。

1993年4月11日,这个日子对谢媛媛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谢媛媛被安置到手术台上。她显得镇定自若。她是在半清醒的状态下完成变性手术的。1993年5月10日,谢媛媛又做了双乳切除手术,同样很成功。谢媛媛告诉我,她前后动了三次大手术,身上有五处伤口,可以说是伤痕累累,但只输了200CC血。她没有受到严重的痛苦。在国外,女变男的成功率很低。制造一个具有性功能兼排尿的阴茎是最困难的事。在排尿方面,必须重新装置尿管。国外很多病例显示:新的尿管使人的身体抵抗能力减弱、容易受到感染,有时,新的阴茎在制造上虽也坚挺有力,但缺少性高潮的感觉。美国的变性人马丁诺从修女变成男子汉的过程中,作了切除乳房、切除子宫、阴茎再造三大手术。由于失血过多,马丁诺曾两次昏厥,差点送命。她忍受了生理上的巨大伤痛,而且付



人造阴茎成功了

出了一笔昂贵的医药费用。在长征医院,何清濂教授为谢媛媛所做的变性手术,手术顺顺当当,收费仅为国外的八分之一。谢媛媛手术后对我说,现在我精神很好,身体恢复得很快,人也长胖了。我从和他的几次访谈中,也强烈地感受到,谢媛媛从“她”变成“他”后,完全判若两人。他说:“我虽然不想张扬我的成功,但新的生活已经开始,我要用我自己的努力,去谱写我的生命史中新的一章。”

无独有偶,把做手术这一天,看作是第二个生日的,还有陕西的李自英。在手术前,李自英给何教授留下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些感人肺腑的话:

“何教授:我自4月28日入院以来,就一直以急切的心情等待手术那一天。4月28日是我的又一个生日。我要把这一天看作我新的生活的开始。我自以为是一个好孩子,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女人。我要恢复我本来的女儿身。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期望。如今,这一天就要来到了。我每天都在兴奋之中。每天早上四五点钟醒来,我就再也睡不着觉了。我真希望明天一朝醒来,我已拥有一副女儿身。明天,我就要做手术了。我深知手术的不易和不可逆性,但我更盼望手术的成功,从而更愉快地面对未来的新生活。尽管手术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但比起我长期以来身心所受的折磨和痛苦而言,这又算得不了什么?我一定会挺得住。对未来新生活的美好向往,会支持我去战胜一切困难和痛苦。入院前,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找我谈了话,了解了我的情况,表示尊重我的意愿。我的父母亲也希望我在手术后,能心情舒畅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报答单位领导对我的

关心。我也希望做一个孝顺的女儿，报答父母亲的养育之恩。我更希望用我将来幸福的生活，来报答为我做手术的何教授及全体整形外科的医生和护士们。”

[易性之后]

易性病人在完成手术之后,对他们的人生历程来说,是迈出了重要的决定性的一步。这一步是至关重要的,许多病人说是“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可以说是一点也不夸张。但是,对每一个易性病人来说,走出医院,走向社会,从工作到生活,从社会认同到家庭关系,都还会碰到一系列的新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新的生活,还是刚刚开始。这些问题处理好了,在社会生活中有了立身之地,方能说真正完成了变性手术。

性别变了,工作怎么办?

性别变了,工作怎么办?这是易性人首先碰到的问题。在国外,许多人由于性别的改变,工作也随之改变。仁妮·李查丝在变性之前,是纽约一位有名的眼科专家,“他”变成“她”后,走上了运动场,成为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网球职业选手;还有一位名叫佐约·巴德的美国女运动员,也是由男变女的,她在1984年第23届奥运会上参加了3000米的长跑,并取得良好成绩;琳恩·拉斯金在写了《变性人日记》后一举成名,但此后,她再度隐姓埋名,易地而居,生活重新开始。

卡纳莉·康恩(原是但尼·奥康纳)是一位美国歌唱家、新闻记者。他在2岁时就觉得自己好像是女孩,而且经常穿他姐姐的衣服。由于他很想证明自己是男孩,他踢足球,同女友约会,甚至试图参加海军陆战队。21岁时的他,成为丈夫和父亲的一年后,他又决定重新确定自己的性别。由于康恩具有男性

和女性的生理特点,他还同一个男朋友同居,他通过打临工挣到了足够的钱,于1971年接受了变性手术。她后来成为一个有成就的歌唱家、抒情诗人。至今,她还担任美国好莱坞的记者和电视谈话节目的主持人。

马里欧·马丁诺变成一位男子汉后,回到了他原来工作的医院里,马丁诺曾以这个医院已经给过自己太多的伤害为由,准备提出辞职,但这家医院的行政主管却没有对他另眼相看,反而升任他为原先工作部门的主管。这大大出于马丁诺的意料之外。马丁诺还和一位漂亮的姑娘琪恩结了婚,获得了心理学学士学位。此外,马丁诺和琪恩创立了“迷宫基金咨询服务处”,服务对象主要是从女变男的变性人,彼此互相学习、交流,处理在变性方面的许多复杂问题。

但是,即使在变性人的人权得到充分尊重的美国,目前有男变女的变性人4万人,但她们中有不少人的各项权利还无法得到保障,有许多经过易性手术的变性人的悲惨境遇并没有多大改变,她们的日子依然很不好过。这往往仍是和其周围的环境对他(她)的排斥有关。美国曾对100名作过变性手术的变性人作了调查,发现有94%的人在变性手术后因为不能被人承认而搬迁到另一个地方居住。他们变性后在就业、婚姻家庭、人际交往、性生活等方面遇到更多的麻烦,使一部分变性人选择了自杀的道路。葆拉·格劳斯曼(原是保尔·格劳斯曼)是一位小学教师,1971年,担任了31年之久小学教师的格劳斯曼改变了自己的性别,她以一个女子的身份重返新泽西州赛达希尔小学。学校董事会宣布将她解雇,理由是她的出现将在学生中产生“反面影响”。随之引起法律诉讼,一直持续到1976年,当时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此案,但新泽西州高级法院则判定格劳斯

曼应该得到赔偿,因为学校董事会的顽固立场使格劳斯曼失去了做教师的资格,与此同时,格劳斯曼仍维持同自己妻子的婚姻关系,并继续抚养他们的三个女儿。

1939年出生的美国音乐家温迪·卡洛斯(原是沃尔特·卡洛斯)以设计莫式声音复合装置而著名。他的第一张唱片集《通电的单身汉》在60年代后期售出100多万张。虽然卡洛斯事业上十分成功,可他个人生活却十分糟糕。他对自己长就的一副男子的模样很感苦恼,他设法自己改变自己。1969年5月,他开始以一个女人的方式生活,最后一次作为沃尔特露面是在1970年的一次演出。1971年他同斯坦利·康布里克合作为一部电影配完乐后,便完全消失。一年后,他接受变性手术,在以后的7年时间里,她实际上过着隐居生活。在1979年情人节那天,她正式把名字改为温迪,并在同年5月的《花花公子》杂志上公开了她的真实情况。

台湾的变性人的日子也不好过。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第一例变性手术人林国华在理想敌不过现实的煎熬下,2003年5月6日中午自杀身亡。台中市警察局接获死亡案件通报,在台中市一家汽车宾馆房间内,发现一名女性平躺在床上,头部以黑色塑料袋套头,桌上摆放一瓶具有麻醉性的吸入性药水,现场并没有发现凌乱现象还留有遗书。警方清查,死者正是几年前进行变性手术后的林国华。据悉,林国华遇到了经济压力的瓶颈,经济与感情生活都不顺遂,还得忍受他人对变性人射来的异样的眼光,因此最后选择自杀,结束了他不幸的一生。据林国华的哥哥介绍,他已经自杀未遂多次。

据2004年3月8日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报道,还差4年就要退休的美国费城警察局的警官赫拉迪奥·冈萨雷斯,在

2005年1月6日做了变性手术,他于是给他的上司和同事写了一封公开信,宣布从今以后,他将以一个女人的身份开始生活和工作,名字由赫拉迪奥·冈萨雷斯改为玛丽亚·冈萨雷斯。57岁的冈萨雷斯因此成为了美国警界历史上第一位变性人警察。但是,他现在遭到家人、朋友和同事的白眼,有人责问他神经是不是出了毛病?有人嘲讽挖苦他,他的上级还希望他离开目前的工作岗位,理由是“有损于费城警方的名声”。这使得冈萨雷斯的处境很尴尬。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外基本相同,不能说只有中国人的观念落后。

印度的变性人当上了议员

在印度,变性人的传统收入来源原本是卖淫、求乞、在喜庆场合歌舞卖艺。现在,情况也起了变化。2004年,变性人在政坛上也开始活跃,选出第一个变性人议员沙南茂斯(Shabnam Mausi)。另一名参与时装表演的变性人拉兹亚,过去5年来辅导其他变性人歌唱和舞蹈,并参加兴都电影的演出。他说:“我很高兴能与时装界的重要人物接触。这为我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的机会。”

此外,还有一批变性人手术后当上了时装模特儿,并且获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可。

印度的顶尖模特儿中,有位名叫希娜的,就是变性人。他走完了男变女的艰难历程后,从隐蔽、隔离的变性人世界走了出来,舞台上几小时的光彩,相对于一生的压抑与歧视而言,算不上什么。但希娜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参加这场表演。希娜和其他5位变性人一起,终于登上舞台走猫步,她们骄傲地跟着

节奏,走过舞台,面对群众,一举成名。当化妆师为她化妆的时候,希娜说:“我兴奋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不相信自己能够走近这些著名模特儿的身旁。”

在时装表演中邀请变性人参加的,是丹批利雅创意公司(Tanpriya Creations)的执行主席莱卓胡里(Kumkum Roychoudhury)。他说:“我的目的是为这些变性人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在社会中被接受,就像你我一样。”这次时装表演是印度变性人近来一系列活动中最新的突破。

社会各方面的反映和评价是积极的。他们欢迎变性人融入到正常人的生活中来。时装表演的编舞师维曼尼指出,这些新加入的成员带给她一些意外的惊喜。她说:“起初我以为会很困难,但他们的热忱令表演相当顺利。”1998年度的印度小姐帕纳(Gul Panag)说:“他们很有才华。我相信他们只要被社会接受、只要拥有机会,就能够在许多领域证明他们的才干。”1995年的世界小姐亚军布拉(Manpreet Brar)坦言,起初她对变性人存有恐惧感。她说:“由于缺乏经验,刚开始时感觉有些压力。但只需几分钟时间,我就了解到,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些正常的普通人。”

泰国的变性人最能得到宽容

在泰国,变性人是最能得到宽容的。但是,泰国有不少变性人在易性之后,也不能立即得到家庭的认可。当奇他瑞塔从病房里苏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从一个男子变成了一个女子,但“他”的母亲却无法接受“她”。奇他瑞塔说:“整整三个月,她都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她吓坏了,她认为我脑子里有毛病。终

于有一天,她原谅了我,接受了我。”“他”的姐妹最后也接受了“她”,她们给“她”送来了女子内衣和化妆品。当奇他瑞塔参加变性人选美赛,全家都到现场为“她”加油。奇他瑞塔现在从事的工作是模特儿,但“她”在赢得众多掌声的同时,也不是没有遇到过麻烦。在“她”的身份证上,性别仍是男性。尽管在东南亚各国,乃至整个世界,泰国对变性人的态度是最宽松的,但泰国法律仍旧禁止利用手术改变自己的性别。而且,根据泰国有关法律,变性人即使受到强奸,也难以立案。另外,“她们”也没有权利结婚。纳佳丽塔·李是一个27岁的化妆师,“她”碰到的问题更加现实:“她”正翻来覆去考虑,是否要将自己曾是一个男儿身子,告诉“她”现在的男朋友——一个住在曼谷的外国人。纳佳丽塔的犹豫是因为“她”已有前车之鉴:“她”曾把这一切向以前的男朋友说过,但他的反应是断然分手。因此,这一次“她”实在不敢再冒险了。“找一个男朋友是容易的。”纳佳丽塔喃喃自语,“但找到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却是困难的。”

在韩国、日本,变性人的求学也有一定的困难。韩国变性美女河利秀准备考入汉阳大学电影学院,但却遭到汉阳大学学生的强烈反对。2002年12月仁川地方法院正式确认河利秀的女性身份,户口上的性别也改为“女性”。从此之后,河利秀的演艺事业发展顺利,但她一直认为自己文化修养不高,所以决定考大学。而汉阳大学的学生们大多数都反对河利秀入学,最大的理由是河利秀是变性人,有损于汉阳大学的名声。甚至有学生表示,如果河利秀考上汉阳大学,自己就退学。日本京都县还有一位30岁的变性人洋子,原是男性,在中国做完变性手术后,立刻返回早已毕业多年的高中,要求以女性的身份再次入学。可是校方却认为,她已经毕业了,如果再次让她入学,那将剥夺了

别的学生的人学机会,因此坚决拒绝她入学。于是,这位变性人把学校告上了法庭。在法庭上洋子表示:她已经在身体上和思想上都适应了女性的角色,她想以一名女高中生的身份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法庭最终判定洋子胜诉,校方必须接受她的人学申请。

那么,在中国,变性人的处境又如何呢?

在希望中紧握你的手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人们对于变性手术,对于变性人的出现,还是十分陌生的。有史以来,还不曾见到一个男子真正变成了女人。因而,秦惠英等人的变性新闻在报纸上发表后,议论、反响,乃是各不相同的。

先说说当事人对变性手术成功后的反应。

何清濂为“易性病”患者做了易性手术,特别是其中两例公开报道后,其震荡之巨大,反映之热烈,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先来听听第一个公开亮相的变性人秦惠英自己的反应。

他在术后不久即给何清濂写了一封信——

何教授:

您让我说说手术后有什么感觉?我从心底里要对您说:对于这次手术我非常满意!真的。首先,自我感觉良好;其次,周围的人也交口称好。

您知道,这次手术从根本上解除了我的最大痛苦。在遇到您之前,我整天处于痛苦与烦恼之中,常常对生活失去信心,心灰意冷,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甚至绝望到考虑过死!

……自从您给我做了手术,我顿觉世界精彩妩媚,生活充满了乐趣并富有情意!心里感觉异常舒服、惬意、幸福和快乐!我的信心大增,对于任何的挫折与困难也就能坦然处之,不再放在心上……

我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因为我遇到了您。现在自我感觉良好,不再有术前的那种紧张感、烦躁感、烦闷感、凄惶感、绝望感。在我眼里,世界已越来越色彩缤纷、美好又可爱。我对生活、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希望。

顺致

崇高的敬礼

秦惠英

1990年8月27日

时隔半年之后,秦惠英回到苏州老家过春节,又在那里发出了一封信,再次向何教授表述自己的感激之情和对未来生活的向往。

何教授:

今年春节是我第一个感到舒心、感到自在的春节。往年的春节都是在忧愁烦闷中度过的,真可谓活得虚假,活得凄凉,活得痛楚;而今年的春节,我觉得心旷神怡,安适自在。真的,这种感觉十分奇妙。我寻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在过去的15年中,我强烈地感到失去了自我,而如今,尊敬的何教授,是您用那把奇妙的手术刀,帮助了我“重新做人”,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您的大恩大德。

我的小妹已出嫁了。她的新房布置得很漂亮,很高雅,因为她的丈夫是一位木匠,家具都是自己做的,我相信一般的上海人的新房不会超出其右。如果您需要做什么家具,只要告诉我一声就成了。我和舅妈已经说好了。他们都非常欢迎您来苏州西山作客。这里居住条件虽然简陋,但还清雅,还过得去。我舅妈对我还是挺好的。我准备过些天再来一次上海,打算把欠医院的三百元钱还掉。另外,我打算改一个名字,新的名字已选定了,是“×××”,不知您觉得好不好?至于上次那个“婕”字,我也挺喜欢的,因为“陈婕”读起来上口,写起来也漂亮,但“婕”字没有什么意思。您说呢?当然我最后都听您的。

秦惠英

1991年2月20日夜

另一位男变女的患者,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在出院后给何教授写来的信,也颇有真情实感:

“我将永远忘不了1991年12月31日这个美好的日子。我盼了三十六个春秋,终于盼来了这一天。从此,我翻开了我的人生路上的新的一页。因为心情实在快活,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出我的感激,用词不当,望您原谅。我一定牢记您的教诲,在工作上和学习方面更上一层楼。”

还有一位南方某省的男变女的变性人,已年近30,完成手术后,加盟了某轻音乐团,因为他(她)的祖上有欧洲人的血统,生就一头栗色长发,有一种天然的“洋味”。加上身材修长,能歌善舞,一出场就魅力十足,很受观众注意。她还创作了一个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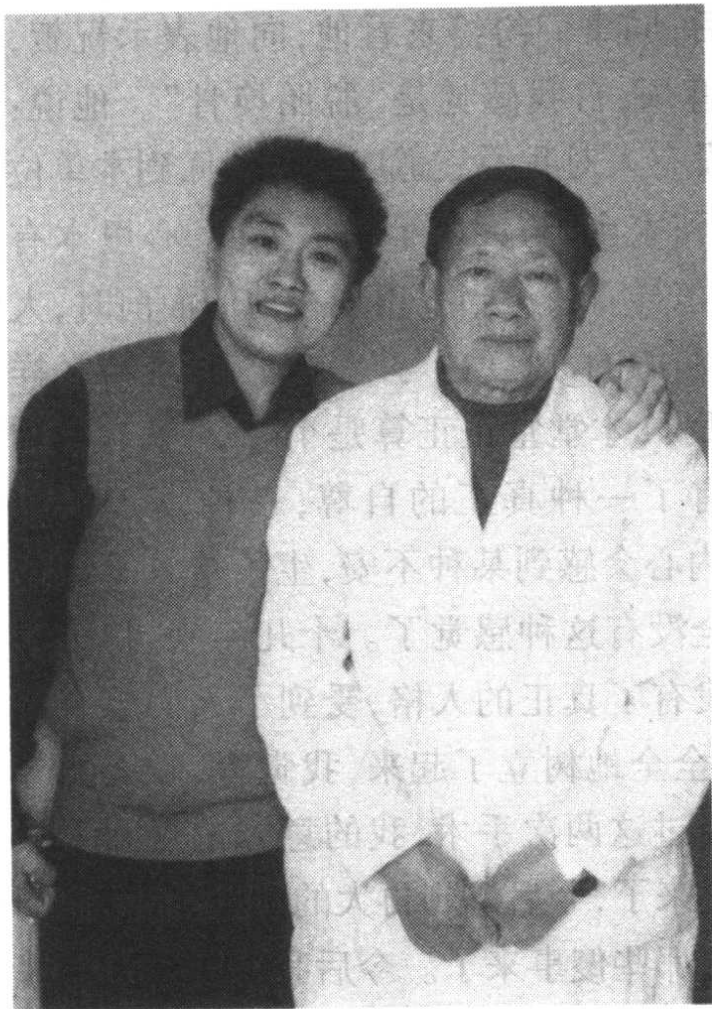
何清濂与他的助手赵烨德博士(后)为术后病人作检查

舞,将古典舞和现代舞糅合起来,既表现传统又有现代味。这个独舞使各层次的观众都能接受,在一年之中,已随团演出了二百余场,非常受欢迎,以至于吸引了一家地方报纸为她写了一篇专访。专访写道:“她很有性格,也很有思想,虽然采访她只有很短时间,但已让人感到她是一个有追求、生活很有目标的人。她说,年轻时她不想为名利所困,只要生活充实,即使每天易地演出也不觉苦,现在年纪大了一点,就希望能在艺术上更成熟些。”由此可见,这位舞蹈演员的身心和艺术已融合为一了。这位演员把这篇专访和演出的剧照寄给了何清濂教授,希望何教授能分享自己的一份潇洒和一份喜悦。

女变男的变性手术完成之后,好几位患者的欢欣之情,也是溢于言表。我采访过首例“女变男”的李一妮,他告诉我,现在

一切正常。回到本单位后，同事们纷纷来看他，向他表示祝贺，在工作上没有遇到任何麻烦，自我感觉是“脱胎换骨”。他说：我现在抽烟、喝酒，已经没有人对我说三道四了。他回到本单位后给何清濂写信道：“回到家乡，与大家第一次见面，心里本有点惶惶不安，不知大家会怎样看我。当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大家对我说，现在穿男装挺潇洒的，风度也与以前女扮男装不一样了。大家觉得，现在的‘我’，才堂堂正正算是个‘人’了。我和男性同事们相处，也拥有了一种真正的自尊，一种真正的快乐。”“我过去穿男装时，内心会感到某种不安，生怕被人看出破绽，受人嘲笑，现在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了。十几年来，我第一次觉得活得这么轻松。我有了真正的人格，受到了人们应有的尊重，我的自信心已完完全全地树立了起来，我觉得，昨天的寻死是那么不幸和可笑。经过这两次手术，我的意志也得到了锻炼。这么大的痛苦都熬过来了，今后碰到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我。我也不会轻易地干出那些傻事来了。今后我会用头脑和理智主宰自己的一切。”“身体的状况也在渐渐好转，对阴茎、阴囊的存在也开始适应了，走路也比原先快了，腿部的功能正在慢慢恢复，股部的创面也基本上长好了。但我不敢下蹲，下蹲时，封闭的阴道口很痛，有时小便也有这种感觉，不知是什么道理？”

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孩子变成男性后，感情上似仍保留了几分女性的纤细和伤感。他在给何清濂写信时，引用了一首流行歌曲的开头几句歌词：“繁星流动，与你同路。人生如梦，朋友如故，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的不退半步，正是您。遥对长空，点点星光，您不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唯有您明白我、理解我。情同父子，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从不分你和我，并拯救我，在绝望里紧握你手。”这位漂亮



手术成功了，一位女变男的易性病人和何清濂的合影

的姑娘变成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后告诉我说，从手术那天起，我就有着实现愿望后的激动，产生一种对新生活的向往。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何教授以高超的医术，为我实施了手术，对我的关怀的确是无微不至的。他不仅为我治好病，也教育了我应当怎样做人，怎样对待生活。我是他的病人，但在人生这个大课堂里，他又是我最好的老师。我要好好地生活，认真地做人，作

为对他的回报。

变性，或从男性变为女性，或从女性变为男性，这是人生所有改变中最剧烈的改变，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闻所未闻的。它涉及一个人的身份、姿态、前程、情感、名声、能力以及在公众社会中扮演角色的改变。人生之旅经过了这样一个巨大的转折后，下一步该怎么走？实在是颇费思量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祁冬涛先生在其论文《“灵魂”对“肉体”的背叛——变性人现象综述》中指出：“变性人在变性手术之前经受的是‘灵魂’与‘肉体’分裂的痛苦，而变性手术之后，经受

的则是被‘改造’过的性别角色与社会主流文化冲突所引起的痛苦。变性人所遭遇到的各种压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内心痛苦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几乎所有的弱势群体、‘亚文化’群体以及还不能算作群体的形形色色的‘异端’们，在与主流文化的‘交锋’中，都会有类似的经验。”整形外科专家张正文介绍说，易性病患者



他变成了“她”

许多人都有严重的自杀倾向，对他们实施手术，在帮助完成性别、社会角色转变的同时，还将挽救他们的生命。所以，易性手术不只是换个性别这么简单，如何在手术之后以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角色面对周围的人，确定周围的社会关系，这是所有易性病人不能忽略的问题。

外面的世界并不都精彩

当然,这些做了变性手术的患者走出医院大门,重返社会后,人们给他们的脸色,不会都是好看的。有一位社会学者指出,易性病者作为一种特殊患者,他们在痊愈出院后,如何开始一个异性的崭新生活,还面临着很多挑战。医院可以给这位男子一个女性的身体,或给一个女子一个男性的身体,但是她或他将来能不能真正幸福地生活,成为一名真正的女性或男性,重要的还是要靠社会尤其是亲人的理解和关心,要靠全社会的关心和帮助。在现实生活中,外面的世界并不都精彩,有时甚至很无奈,他们会显得进退维谷。

作为第一例的变性人秦惠英在媒体上公开亮相后,他的处境就颇不美妙。

秦惠英从医院出来后,他变成了“她”,去处也就成问题。原来的工作单位已不再收留他,于是只能求助于就读的复旦大学。经过何清濂的介绍、证明之后,学校领导也依旧接纳了秦惠英,让她住进了一间女生宿舍。尽管她是独居一室,但她的左邻右舍对这位不速之客仍颇具戒心。有几位女同学还向校长室提交了“照会”,意欲请她搬家。但校领导还算开明,含笑答道:“秦惠英已是女性,不住女生楼,难道住男生楼?”校方在她的宿舍里安排了一位进修生,秦惠英主动告诉对方自己的情况,那女生吃惊地看着秦惠英,最后还是换了一间宿舍。她对人说:“我从秦惠英身上看不出一点男人的影子,我也不歧视她。但是知道她过去曾是男人,思想上总是无法转过弯来。”

秦惠英住进女生楼后,自然还要去厕所、浴室。因为她是公

开过自己的变性过程的,她的女同胞们知道她原先是他,因而对秦惠英的光临自然抱着相当的戒心。厕所因为有好几个,女生们舍近就远避开就是了;浴室则不好办,只有一个。当女生们正在嘻嘻哈哈地洗澡时,秦惠英竟然堂而皇之地端着脸盆、趿着拖鞋,推门而入,这一下,可把她的女同胞们吓得哇哇大叫,秦惠英听而不闻,自顾自宽衣解带,旁若无人,怡然入浴,弄得同浴室的几位进也不是,退也不得。有几个大胆而泼辣的女生,将她的脸盆和衣服扔了出去。但也有曾和秦惠英同班的一位女同学,现留校任教,对秦的过去比较熟悉,思想比较开通,认为事已至此,也就不必步步设防。

最使秦惠英感到难堪的是回到故乡的遭遇。吴江县,属苏州地区,照理说不那么闭塞,但由于是农村,人们对于男变女之类事情,确实闻所未闻。亲朋好友都视她若路人,以轻蔑的目光注视她,在背后指指点点议论道:“生男生女,是天意,是爷娘决定的,怎么能变?”“哪作兴男的变成女人,勿曾听说过。”“真是作孽,好端端的男人勿做,却去做个勿男勿女的阴阳人,真是神经病,瞎热昏。”老年人大摇其头,年轻人赞成的也不多。秦惠荣回到故乡,一身女装,头发留着长波浪,人们像围观一个奇怪的动物一样围观她。她走到哪里,人们跟到那里。秦家门口,也不乏有好事之徒,三三两两跑来张望,使得秦惠英既不便解释,也不好解释。家乡的人问秦惠英的母亲:阿是惠英讨不起娘子,才这样做?

秦惠英找工作也很不容易。她自云南退回上海,直到做完变性手术后,整整三年时间,她的求职命运,就如一只找不到港湾停泊处的小舟。尽管她有吃香的外语专长,在住院期间,曾为长征医院翻译了数万字的英文医学文献,但在手术后的一年多

时间内,秦惠英依旧没有找到工作。上海高教局把她的档案转到她毕业的那所大学,该大学说没有重新分配工作的权利,档案又转往他处。有的说转到苏州,秦惠英又赶到苏州,苏州又没有下文,最后她懵了,不知找哪儿是好。在手术前,她没有报进户口,没有粮票,没有分文收入,也没有领到社会救济补助,生活十分清苦。她出院时体重只有41公斤,腰围从65cm缩到60cm。这一切,都是由于手术后营养没有跟上的缘故。她在长征医院做手术的一千多元费用,部分是长征医院的医生、护士出于理解和同情解囊相助的,部分是东拼西凑借来的,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还清。出院时,护士们还送给她许多女性衣服和化妆品。

她的变性经历在报上公开曝光后,舆论对她是毁誉参半,同情与讽刺兼而有之。一些单位原本需要外语人才,但得悉秦女士就是著名的变性人后,则纷纷敬谢不敏。她自己跑了好几个公司、旅游局,他们听了秦惠英一口流利的英语,对她很感兴趣,但她把自己的变性经过告诉对方后,事情就冷淡了下来,“让我们研究研究再答复你”,后来就没有下文。她还到深圳去找过工作,除了在长安大厦歌舞厅向一位女歌手献了一束白菊花,得到了这位歌手的回音:“谢谢刚才这位小姐送的鲜花”,有一点心理安慰外,别无所获。

她的家庭也不愿提供经济帮助,工作又无着落,身体需要营养……这一切,使秦惠英陷入巨大的困境。上海的《科学生活》、《康复》杂志将上述情况进一步撰文介绍,发行量达数百万份的《报刊文摘》予以转载,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秦惠英母校的老师,了解她情况的朋友、记者、亲戚,都惋惜她是复旦大学毕业、有外语专长,却找不到吃饭之所,哀怜其生活一贫如洗,衣食都成问题,纷纷呼吁社会应给她公正的待遇,重新给她

工作的权利。

一位热心人士三处碰壁

从康复医学的观点来看,易性病患者在完成变性手术后,应当远离其长期生活过的环境,重新开始他(她)们的生活。因为转变性别等于将原来拥有的各种社会关系全部打破了,所以不少易性病患者在手术后愿意选择离开,到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以新的性别出现在人群中。

有一位热心人得悉秦惠英的困境后,以为她是有外语专长,又是男变女的热点人物,有相当的社会影响,身材颀长,外貌也不差,这位热心人与几家服装厂的厂长、书记都很熟悉,听说厂里有涉外业务。他想,如果这几家厂聘用秦惠英,则一举两得,既可发挥她的外语专长,又可利用变性人的特殊身份,用以推销服装厂产品,各方面都能受益。这位热心人士访问了第一家工厂,岂料厂方并不欣赏他的建议,反而怀疑他和秦惠英有亲属关系,前来为她说情,使得他十分尴尬,再三声明和秦惠英未曾谋面,只想为秦惠英做一件好事。厂长大摇其头,表示对秦的所为很不理解,更不愿意让一个正宗的国营厂家的外销业务,借助这种“旁门左道”的帮助。这位热心人士便不好再说什么,只得默然走了。

他又走进了某羊毛衫厂。这家羊毛衫厂有一个时装表演队,也有涉外表演业务,如果秦惠英加盟,看来也有利无弊。这位热心人士向厂方阐明来意后,该厂领导面带微笑,委婉地说:“此事恐难以安排。”时装演出队是清一色的女孩子,秦惠英虽然已经易性,但他身子里流的血,还是男子汉的,他并不是一个

完全的女性,如果和时表演出队的女孩子生活在一起,不仅在思想上难于接受,而且在生活上,比如沐浴、上厕所、住宿等,都无法回避,会给演出队带来无穷的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第二家厂又碰了壁。

这位热心人士心仍不死,又找了某丝绸厂。这家厂与几家厂成立了一个联合服装表演队,回答几乎是相似的:后果可怕,麻烦事将层出不穷。这位热心人士表示,如果厂方进人“指标”有困难,他可以为之设法。厂方还是无动于衷。他按捺不住冒火了:“上海之大,竟容纳不下一个变性人!如果我们不扶他一把,那就没有尽到我们一个上海人的责任。”这位厂长冷冷地说:准确一点的说法是医学上的奇迹,应该由医学界去设法为她鼓吹,我们爱莫能助……

这位热心人士愤而离去,回到家里,向家人诉说自己一再碰壁的遭遇,不料家人也讥讽他“自找没趣”、“自寻烦恼”。儿媳则告诫他千万不要将变性人带回家来,“我会害怕的”。她还说,如果秦惠英坐了我家的椅子,我要洗刷三遍……或者把这把椅子烧掉。这位热心人士最后感慨地说:“想不到做一个好心人也那么不容易。看起来,变性人要被整个社会所接受,还要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但是,我并不泄气,我相信,变性人终将会被社会承认的。”

秦惠英在寻找职业屡屡碰壁之后,也感慨地说:“即使我是一个残疾人,尚且要安排工作,何况变性人也是正常人,而不是残疾人、废人,我哪一点不及人家?在工作上,我同样可以干得比别人出色。我自信我的能力并不比别人差!”

这位热心人士的话并没有说错,秦惠英的变性后的遭遇曝光后,也获得了许多人的关心和同情。当时的上海市政协主席、

复旦大学原校长谢希德听说秦惠英的遭遇后,亲自出面安排,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她现在只好埋名隐姓,先在外地一所学校里教书,只有该单位的领导知道其变性的经历。她偶尔给何教授来几封信,酸楚楚地说现在自己生活得很平静。现在,她在一家公司里做一些文案工作,每月收入只有一千多元。

青年 W 的遭遇似乎比秦惠英要好一些。她在完成手术后,自我感觉良好,又添置了一些女性生活用品,已回到原单位工作。她对英国记者格雷说:“原单位同事都知道我的事,想必不会对我另眼相看。再说,想瞒也瞒不住呀!当然,如果有收入更高的单位,我也会换一个的。”第一例女变男的李一妮也告诉我说,一旦条件成熟,他准备离开原单位,到外地去工作,或者趁自己还年轻,到国外去闯荡一番。听说在日本,变性人的处境与常人没有什么两样。谢媛媛在全部完成变性手术后,也准备易地找一家新的工作单位,她决心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变性的经历。

秦惠英公开自己变性人身份后引起的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使后继者不得不十分谨慎从事。何清濂在手术治疗之外的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就是要为每一个变性人保守秘密,特别要注意防止他们的照片流向社会。面对着各报、刊记者的来访,他不得不回避大部分采访。必要的采访,他也是小心翼翼地、有分寸地介绍有关病人情况,生怕捅出娄子,又伤害了他们……

继秦惠英之后,我征得何教授的同意,又采访了四五个变性人,他们再三叮嘱我,不能将他们的真名实姓、工作单位公诸于众。连才思敏捷、出口成章的谢媛媛,在变成男性之后,我征求他是否愿意公开自己的变性经历时,他也明确表示:我不愿意以鸡蛋去碰石头。秦惠英公开自己的变性经历的遭遇使我心寒。我不愿再成为舆论的注意对象。他还告诉我,家里人也有顾虑,

生怕我成了新闻人物,会对兄姐带来麻烦。谢媛媛还告诉我,已有朋友为他在南方某大城市找好了一份工作,他将改名换姓,以男性身份到该单位报到。

人间自有真情在

同情、关心秦惠英的,自然不止谢希德教授和上述那位热心人士。特别是秦惠英变性后在精神上受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与压力的材料见报后,人间自有真情在,不少人向她伸出了温暖的手。在此期间,何清濂和秦惠英先后收到了20多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

最早向秦惠英伸出温暖的手是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1991年上半年,《云南日报》记者李开义将秦惠英强烈要求变性导致自残的材料写成一份内参,送到云南省委。省委书记普朝柱亲笔批示:“记者的看法是正确的,如果属于病态,在不危及别人和社会的情况下,不要简单地处理而造成社会问题。希望××学院慎重考虑,对本人工作作适当安排。”这是一个明智而有力的批示,可惜为时已晚,批示下达时,秦惠英已被学院辞退了。

安徽省亳州市水利局干部梁玉荣十分钦佩秦惠英敢于冲破世俗偏见、公开亮相的勇气。梁玉荣是一位有四个子女的母亲,夫妇月工资收入350,两个孩子已参加工作。梁玉荣得悉秦惠英的窘境后,心田被深深地震动了。天下之大,为何存不了一个患病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容身之所?她欢迎秦惠英做自己的女儿。于是给何清濂写了一封信道:“请德高望重的何教授转告秦惠英:如果她愿意改变一下目前的生活环境的话,安徽省亳州市有一个母亲欢迎她去,我将尽全力为她提供安定的养病环境。”

我家经济上虽不宽裕,但维持基本生活是不成问题的。我会用一颗慈母的心对待她,帮助她度过生命旅途中的一段坎坷的历程。我的孩子们也会用她(他)们善良的心去温暖秦惠英大姐姐的一颗备受创伤的心。同时,我会根据她的意愿,对她的情况保密。待她的工作问题解决之后,去留任其自便。如不愿来,请速回信,我将立即兑换全国粮票寄去。”她还同时汇去人民币100元,请何清濂转交,以缓解秦惠英的燃眉之急。在信的背后,梁玉荣还告诉秦惠英,从上海到亳州有直达的汽车,写下了详细的地址,具体告诉她如何走法:“可坐三轮车到某厂门口,某小胡同第X户便是,坐三轮车不要讲价,下车付五角钱就行。”可见其用心之至诚。

一位和何清濂“同是八一军旗下成长的小兵”、江西宜春地区建筑工程公司的一位干部,称赞何清濂说:“既是科学家所作的事业,又是艺术家、教育家的事业。你用自己的无私奉献,并以慈母般的爱心去温暖那些被不幸所折磨的心灵,是极其崇高的事业。”他同时对秦惠英遭受到巨大的社会压力表示十分同情,他给秦惠英写信道:“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观念,受到千百年来的传统桎梏的束缚,社会的舆论有如漫天大雪一样弥漫着整个生存空间,变性这种伟大的科学成就,都被人视作为‘资本主义的产物’,而拒绝予以接受。流言和偏见,有时竟可以置人于死地。我认为何清濂所做的是完全正确的。医学事业的进步,应当为有严重的易性病患者解除痛苦,给他以一个重新选择性别的机会。医院要理解这一点,整个社会也要理解这一点。我对您的变性成功,致以诚挚的祝贺,并对您目前的处境,抱着深切的同情。您需要我做点什么,请来信告诉我。”还有一群自称和秦惠英“素不相识的朋友”,委托其中一位向秦惠英写信道:

“目前,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很想了解您学习、工作、生活的近况,希望能来信告诉我们。我和我的朋友们正在利用业余时间,发动社会募捐和‘为您服务’活动,把所得的钱转交给您。”

还有一位山东省德州市纺织厂技校的教师给秦惠英写信说:“一些世俗的偏见、甚至责难不足为虑,你应当成为生活的强者。我知道你的身心是清白的,心理上的苦楚是不堪言的,遭到的冷遇是不公平的,你应该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帮助。现在痛苦已除,你就要以常人的姿态投入工作和生活。我深深地理解你。你有什么困难,请回信告诉我。我也是大学毕业,年龄比你大十几岁,一家四口,经济情况过得去,我愿意在经济上全力支持你度过这段困难时期。”

西安公路学院有一位大学教师也给秦惠英来信说:“恕我冒昧给您写这封信。我无非想给您增添一点克服困难的勇气。我相信在 11 亿中国人中,还有很多人支持您的。我想从我菲薄的工资中抽出一部分来帮助你,请你尽快来信告诉你的通讯地址。我觉得一个人在一生中,能亲身体验到两种性别的人的生活,亦是人生一大幸事。我记得贝多芬说过:‘几只苍蝇咬一口,决不会把一匹奔马羈留。’让我们以此共勉。祝您在新开辟的人生之路上迈出更大的步伐。”

此外,还有单位愿意聘请秦惠英去工作。北方一家汽车工业联营公司的总经理专门寄来快件,向何清濂教授转达他们的聘意:“如果秦女士的身体能够适应北方的气候条件,我公司拟聘用她搞文秘、外贸工作,待遇从优,一切手续从简,只要有贵院的医疗证明即可。生活上可以特殊照顾,如工作出色,亦可获重奖。工资收入可高于大学毕业生 1—2 倍,使她无后顾之忧。我相信她会干出一番出色的事业来的。”沈阳另有一家医疗器械

经销公司的经理也邀请秦惠英去该公司从事外文翻译工作。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秦惠英均未能前去应聘,以致这几位总经理的一番好意,竟未能如愿。

值得一提的还有,她在手术前几乎流落街头时,向她伸出救援之手的,还有两家小旅馆的女服务员,把她安排在女客房,视其为姐妹,还有一位她的在上海的亲戚,陪着她找工作,不惜请事假、扣奖金而磨破嘴皮……这一切都使秦惠英永志不忘。更令人感慨的,则莫过于有一位姑娘愿意将自己的子宫,移植给秦惠英。这位自称“敬佩你的朋友”的姑娘,给秦惠英寄去200元钱的同时,欢迎秦惠英到她家里来住。并向何教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为了使变性手术进一步获得进展,更趋完善,如果您和秦惠英都同意的话,我愿意把自己的子宫移植给秦惠英。她今年27岁,身体健康,干事缺乏毅力。但已下决心这辈子不结婚了,子宫留在自己身上已没有任何价值。对于这件事,何清濂自然不便贸然从事,它涉及两个人的血型以及其他各项条件,但由此又足证人们对于变性手术的看法,并不止是一种声音。

祁冬涛在《“灵魂”对“肉体”的背叛——变性人现象综述》中指出:“应该说变性人对其周围的环境是无害的。这些无害的人过着悲惨的生活,这种痛苦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周围环境对他们的排斥和压力。而我们也知道,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和文化都对变性现象进行排斥。变性人在那些宽容的社会和文化中按照自己所向往的方式生活,没有人会用猜疑的眼光审视他(她),他(她)的日常生活中也许没有冰箱、彩电和心理治疗师,但我敢肯定:他(她)的心理感受肯定比我们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变性人都要快乐、幸福。我们的文化为什么就没有这群可怜人的一席之地呢?难道‘文明’就意味着不断地给与主流文

化不同的事物贴上‘不文明’的标签来使自己显得更文明吗？”（《社会》杂志，2002年第4期）在当今社会中，上述许多人用自己的行动，帮助了秦惠英，为文明社会增添了光彩的一页，我们希望能有更多善良的人们，继续伸出有力的双手，帮助已经变性或正准备变性的人，给这群可怜人以一席容身之地。

“秦大姐”，您现在还好吗？

我和秦惠英自1990年相识以来，也交上了朋友。她很信任我，同意在《文汇报》上公开发表她的易性后的照片。14年来，我们之间的联系不断，她不时告诉我关于她的工作和生活的新的进展。

2004年1月，我又在何教授那儿遇见了秦惠英。那一天，何教授陪我走进上海411医院的整形外科病房，8名易性病人亲亲热热地和何清濂打招呼，有的昵称他为“何爸”。他们中的4人过几天就要出院了。看得出来，他们的精神状态都很亢奋。特别令大伙高兴的是，今天来访的，还有一位特殊的客人。何教授向大家介绍说：“这就是你们仰慕已久的秦大姐——秦惠英大姐。”病房里顿时发出一片欢呼声，众人七嘴八舌地向秦惠英致意。“秦大姐，您好！”“秦大姐，您现在还好吗？您是我们中的开路先锋！”“您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没有您的昨天，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一片真情，溢于言表，室内的气氛顿时升温了。

秦惠英如今已完全女性化了。她的身材显得更苗条了，打扮也更女性化了。一头披发，秀发飘逸，穿一袭紫罗兰色的长裙，步态婀娜，略施粉黛，并涂了口红，戴一副宽边眼镜，在稳重



做了变性手术十年后，秦惠英和何清濂在一起

中显出几分妩媚。大家自然十分关心秦惠英的近况。秦惠英告诉大家，她的工作问题，前几年由于身份证没有办妥，因而几经周折。后来得到前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的帮助，将她从云南病退回沪，重新分配到川沙一家单位工作，尔后又到好几家公司工作，均不大如意。直到1994年解决了身份证问题，“身份”被正式确认了，她才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秦惠英由当时供职《劳动报》的记者胡展奋介绍，到浦东的一家中外合资公司工作，任英文翻译，有时也接待一些客户。每月收入有1500元左右，住房由公司提供。她自1994年起，就自学了电脑，现已能熟练地操作电脑。秦惠英说，公司总经理是位女士，知道她的经历后，十分理解和同情她的境遇，在工作上很放手，她也努力工作，

作为对社会对她关爱的回报。总经理对她生活上也很关心,常送一些饰物和衣服给她。她指着自已颈上挂的一根金项链说,这就是总经理送给我的。大家还很关心他和家人的关系。秦惠英说,现在好了,吴县老家的父母都接受了我。母亲十分疼爱我,父亲和弟妹们也和我和好如初,秦惠英现在每月都回家一两次,经常带点礼物孝敬父母。

和十年前相比,社会进步了,对变性人慢慢理解了,整个社会也宽容多了。我最近一次遇见秦惠英,是2004年3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她告诉我,这几年来,曾做过文秘、医疗器械公司的推销员、住宅建筑设计、英文翻译等工作,尝过生活的酸甜苦辣,生活得很充实,但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还感到很不适应。她又告诉我:前些时候,他和朋友合开了一家美容院,又没有成功,被人骗去了一笔钱。她说:“我现在已想清楚了,准备以全新的姿态投入到生活中去,不再更名换姓,而是换一种活法,比如公开自己的易性经历,让世人进一步了解自己。趁现在还年轻,我愿意再闯一闯。”我对她说,你作为中国第一个公开自己变性经历的人,十多年来,能独立自主地生活到今天,已大不容易。路是人走出来的。我相信明天你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美好。她点点头说,我对未来的确充满了希望。她计划在适当的时候,把自己的变性经历原原本本地写成一本书,公诸于众,目的在于让全社会理解她,以及为所有还在受煎熬的易性病患者,寻求社会对他(她)们的公正对待。她认真研读了马里欧·马丁诺写的《变性人》和英国作家、变性人杰恩·莫里斯写的《变性人自述》两本书,并作了比较。她对自己准备写的那本传记亦有如下构想:“我想采取杰恩·莫里斯的那种写作方法,要写得比马里欧·马丁诺有深度,但必须深入浅出,不要让别人看不懂。”我也支

持她的这个设想,希望她能早日见之于行动。秦惠英对我说:“可惜这十几年来,工作、生活一直不稳定,待生活稳定了,这本书是一定要写的。”

在谈到她的个人问题时,秦惠英很好看地一笑说,有一个朋友,在外地工作,他不愿意来上海,我也不想去外地,两人的关系如何,过一段时间再看。到目前为止,她还是单身,没有结婚。她表示,如果有合适的人,她还是愿意接触的。不过,她认为,男变女后,解决婚姻问题要比女变男困难得多。在结束采访时,秦惠英表示:“社会已经接纳了我,并给了我许多理解和关爱,我一定要好好生活,干一番事业,力争对社会多作一些贡献。”

变性以后再变美、变声

许多变性人完成手术后遇到的另一个困惑是,生理上的性别已转换了,但在外形上,仍是原来的样子。光靠服饰上的改变,还不能使自己真正的“异化”。于是,再想点什么办法,使易性人变性后再变美,这个问题就摆到了许多易性人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进入20世纪之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社会对做过变性手术的人,显出了更多的宽容。愿意公开自己变性身份的人,也越来越多。秦惠英的曲折经历,已经留在了身后。他们(她们)已不满足于生理上的易性,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一心想做中国的“河利秀”的重庆男模陈莉莉。她在完成变性手术后,为了去掉留存的男性特征,便要求再做整容手术。她在2004年春天住进了一家整形医院,接受了两个多小时的“煎熬”,手术获得了成功。据为她动手术的整形外科医师介绍,这次手术为莉莉动的

是鼻弓、颧弓、颧骨和宽鼻畸形矫正手术。手术的技术含量和难度都比较大。手术进行得比较顺利,一个星期以后就能拆线了。经过整形,某些男性化的脸面特征都被去除,陈莉莉显得更妩媚动人。陈莉莉于2004年6月10日参加第一部由变性人主演的电影《隐私》的拍摄。《隐私》是根据韩国美女作家金美丽的小说《我被偷窥》改编的电影,《隐私》描写了一个惊人的爱情故事:一个男孩偶遇一个漂亮女孩并喜欢上她,但在不了解却又按捺不住的情况下,男孩通过望远镜,每天观察女孩的生活,但逐渐地男孩却发现了一个连他自己也越来越不敢相信的秘密……现已通过上海市电影局的审查,由孙明强导演。5月27日,陈莉莉不仅大方而又坦诚地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变性的经过,同时还透露:就是想通过这部电影来表达做人的真实。但是,据2005年1月19日传来的消息,由于片中的敏感内容过多,影片未拍先被叫停,陈莉莉的影星梦暂时搁浅。正在南京整容的陈莉莉表示,找她拍戏的公司很多,不拍这部,还有别的戏哟。听说超级女声成都赛区正在报名,她打算19日以前赶回成都报名。她告诉记者,要做艺人,容貌很重要,所以她正做手术,从手臂抽脂填充到太阳穴,还打算做鼻尖、下颌骨,改变嗓音。

许多易性病人在解决了变性和变美的两个问题后,还有一个心病是,嗓音依旧,叫人听起来还有点别扭。如男变女后,外生殖器变了,穿着打扮也变了,美中不足的嗓子没变。秦惠英就对我说过:“我现在的另一个苦恼是声音还不能变。”这个问题,也提到了医务工作者的面前。因为嗓音也是人的第二张面孔,当你没见着对方时,甜美或者浑厚的嗓音能让对方马上产生好感。反之,如果嗓音过于沙哑或尖利,尽管此人外貌如何顺眼,品行如何优秀,都会给交往带来一些不便。陈莉莉拍电影,如果

声音依旧是男声,也会给人以不满足之感。

现代耳鼻喉科学的发展,可以为嗓音“美容”了。世界上第一家嗓音美容中心也于不久前在台湾成立。这是一种改变声带的手术,通过特殊的手术方法,能改变声音发出的频率,让以前沙哑尖利的嗓音变得圆润甜美。嗓音美容手术并不复杂,术后早期,患者的声音频率可能较高,就像婴儿一样,3~6个月后逐渐恢复正常。此项手术可以改善很多不好听的嗓音,如女性男声、男性女声、声音嘶哑低沉等,手术还可以改变变性人的声音,特别是做了男变女的变性手术后,嗓音依旧是男声,即使给予女性激素,还是无法改变,这种手术就可以达到很好效果。甚至于你想拥有歌星一样优美动听的嗓音,也不是一件难事。想想不久的将来,满大街都是帕瓦罗蒂、席玲·迪翁、张学友、邓丽君的



由他变成了“她”,欢欣之情溢于言表

声音时,那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啊!

中国有哪一家医院愿意一试,完成先变性、后变美、再变声的一条龙服务,那将是为中国的易性手术迈出了新的一步。曾任上海时光整形外科医院院长、现又在杭州开设华宾整形医院的许蓓华对我说,她想试一试,引进美国的变声的新技术,把变美和变声结合起来。我说,这样做是填补了国内的一项空白,是很有意义的。人们期待着。

[带来了一系列社会、伦理与法律问题]

变性手术在中国的成功,使易性病患者以牺牲健康肌体的代价,获得了重新选择自己所认同的性别的权利。传播媒介的宣传,无疑给一批试图通过易性解脱痛苦的患者带来了希望,令一批身心紊乱者找到了救治的曙光,也使人们对易性病患者的看法起了某些变化,但也毋庸讳言,变性手术的成功以及一批易性人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家庭、社会、伦理、法律、宗教、哲学诸方面的问题。他们在学习、就业、婚姻等方面要获得整个社会对他(她)们新性别的认同,却需要较长的时间。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认真关注、研究和探讨。

中国的国情与西方社会不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自然也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加上我国关于医疗的法律尚不健全,其他的有关法律条文也未完善。在通常情况下,无论男人或女人,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人人平等。但涉及一些具体的法律条款,如《宪法》中有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款项,《劳动法》中有关于用工不能歧视妇女及妇女休产假的规定,《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一方必须为男、另一方必须为女等等,因法律并没有对易性者进行特别规定,适用法律时有时只能靠司法解释来弥补这一漏洞,但对于易性后出院的人,目前还没有司法解释。因而对易性手术所引出的一系列新问题,唯有认真地加以研究,作有利于深化医学科学中的变性手术的研究,方能更有效、更安全地医治一大批易性病患者。

家庭是否重新接纳？

为易性病患者施行变性手术后，劈头遇到的第一个棘手的问题，则来自家庭。如家庭是否重新予以接纳，性别角色变换在家庭生活中的适应问题，恋爱婚姻、子女归属等等，都是家庭中的新问题。社会学家们对此也十分关注。对变性人来说，这个问题倘若解决不好，一着不慎，有可能全盘棋都成了死棋。

一个人的一生都离不开家庭。人，总要受家庭的影响，也反过来影响家庭。变性人走出医院的大门之后，首先是重新走进了自己的家门。家人对他的变性是否认同，对变性人的心理定势和走向关系极大。何清濂从1990年至1993年，共完成的12例变性手术，除一例外，均是未婚的。他们的年龄，多在20几岁至30多岁这个年龄段，本人都不是独生子女，或上有兄姐，或下有弟妹，因而分析一下这几位变性人如何处理家庭关系，颇有科研价值。

这几位易性病患者，因病情都十分严重，其家人原先的心态是焦虑、惊恐，又觉得耻辱、无奈，家门不幸，脸上无光，有的还辱骂、讥讽其子女，也有一些家庭，因求治心切，或生怕他（她）走上绝路，往往对患者采取宽容的态度，甚至父母哀求医生为他们的子女施行易性手术，希望他们从此获得新生。

何清濂做的三例女变男手术者，出院后都得到了家庭的宽容。手术后，他们和家人相处如常。“这是一个尊重个人选择的时代。如果放在以前，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一对满头白发的夫妇说。在与传统医学及社会、伦理观念的冲撞中，社会日益走向宽容和多元化，在中国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变性

人持理解、容纳态度,并将他们接纳于社会群体中。男变女者,除秦惠英外,余者的家庭成员对变性人大都不持歧视或排斥态度。1993年,何教授为浙江宁波的农民张亚男做了男变女的手术,他的妻子并没有拒绝接纳他,并继续和他生活在一起,一半的因素当然是为了维护家庭的完整。1996年12月28日,张亚男给何教授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几句话:“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又是三年过去了。三年前的今天,是我赴沪之日,三年前的除夕之夜,是我人生的新起点,在您的妙手下,使我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我将铭记这一天——我的重生之日。我和我的妻子继续在宁波工作,这里特别要向您汇报的是:我们夫妻间的感情一如既往,依旧是那么恩恩爱爱,我脾气差一点,可她交关体谅我、理解我,她真的待我好极了。虽然她的单位不景气,收入少了一些,可我们的感情像以前那样好,生活也很愉快。请您为我们祝福吧!”这样的家庭关系,在一方已易性的家庭中也是很少见的。

与张亚男相比,秦惠英则是不幸的。她在做完易性手术后,全家人,除母亲外,其他家庭成员对她采取了敌视的态度。秦惠英的父母都是文盲,父亲过去种田,现在和弟弟在采石场打石头。秦惠英是长子,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他生下后体质羸弱,好不容易将其抚养成人。前几年,他考上了复旦大学,秦家曾为此欢欣、荣耀过好几年,全家人节衣缩食,供秦惠英上了大学,本来指望他能光宗耀祖。秦惠英的父亲很想不通,他对人说:我生的是儿子,为什么现在偏要我认女儿?乡下的人不懂什么变性不变性,都说,书读多了,读出这种怪念头。她的父亲在秦惠英自残后的三年中,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弟妹们对待这位昔日的重点大学的高材生,过去曾引以为荣,如今“哥哥”成

了“姐姐”，都觉得脸上无光。尤其是娶了媳妇生了儿子的弟弟，眼看这个毫无经济收入的姐姐，大学毕业后还要靠大家养活，自然不会给她好面孔看。秦惠英的堂弟冬冬也不承认她是女性。“我还是依然把他当男的，小时候我们一起游泳，捉虾逮鱼，拿皮弹弓打鸟，印象太深了，怎么也难以变过来。”冬冬还对她的堂姐说：“你只有到别的地方去，别人一开始就把你当女人看待，你才可以重新安排新的生活。”冬冬的意见有一定的代表性。易性病患者做了变性手术后，改变了原来的自然性别，连熟悉的家人都会觉得别扭，更何况原单位的同事、四周的邻里及相识的人们！秦惠英在家里无事可干，除了养养病，主要任务是帮家里烧饭。余下的时间就是准备写自己的自传体的传记。秦惠英对此痛心疾首。她说：“我在这一点上，和世界首例变性人马里欧·马丁诺一样。我的弟弟、妹妹、姑妈、姑父，尤其是老父都讨厌我。由于我的工作迟迟不得落实，老父便断定我这辈子只能去讨饭过活了，声称要和我一刀两断、恩断义绝。”

唯秦惠英的妈妈对她依旧一往情深。在妈妈眼里，儿子也好，女儿也好，反正都是自己心头的一块肉，总是自己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在母亲看来，惠英本来是有病，是一种怪病，如今治好了，男的变成了女的，稀奇是稀奇的，但这都是命中注定的，是老天的安排，怪不得惠英的，为啥要不给好面孔看呢？现在毛病刚刚治好，家里人再不待她好一点。岂不是又害了她？亲情的力量是巨大的，亲情战胜了世俗。母亲在谈到她手术后因为缺乏必要的营养进补，一段时间里骨瘦如柴时，也禁不住泪水涟涟。她担心秦惠英就此遭到社会唾弃而毁了一生，成为比残疾人更不如的废人……这一点，又使秦惠英感到莫大的欣慰。世上只有妈妈好，妈妈虽然识字不多，但识字不多的妈妈和知书达

理的妈妈一样好。秦惠英感慨地说：“我有一位可爱的母亲就行了。我从小起就喜欢母亲。”

但是,并不是所有有易性病患者的家庭,都赞成变性手术的。有一个易性病患者背着家人,悄悄地到上海求医,人未踏进医院门诊部,一封航空信却已飞进了长征医院整形外科的主任室。来信者是患者的父亲,信写得极为至诚:“当他来院与您接洽后,请务必对他进行正确的人生观教育,万万不可为他施行变性手术,请您无论如何一定要治好他那种不健康的心理病态,挽救一名大祸临头的青年,千万拜托,千万拜托!”还有一位某县机关干部,听说他的儿子同另一个男青年来沪要求施行手术,然后两人结合。这两个男青年的家长闻说之后,气愤之极,赶紧写信给何清濂,声称“谁开刀谁负法律责任,要向法院提出控告,如果告不动,全家就住到开刀医师的家里去。”这位家长还用威胁的口气写道:“到那时,你和我们两家均不可收拾!为此,特将情况奉告,以免后患无穷。”这位家长看来也是由于一时情急,结果出言不逊。但是,上述两封来信仍然值得我们引起高度的重视。家庭是按血缘和姻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家庭成员之间无不有血缘或姻缘关系。中国家庭的稳定和和睦,是中国家庭关系优越性之所在。家庭的稳定反过来也有益于社会的稳定;反之,则有悖于社会的稳定。

我在海军411医院也遇见了一位男变女的病人,他是四川成都市人,是一位机关干部,现年63岁,从外貌穿着来看,她与常人无异,但她原来是“他”。2003年初做了变性手术,时间已有一年多,这次特来上海请何教授复查一下。她告诉我,他是在60岁那年做的手术,做了手术,生理感觉很舒畅,但已离婚,一个人独居,因为年龄大了,不想再婚。我问她:生活上有什么困

难？他说，靠养老金过活，生活还过得去，妻子和她离婚后，不再来往了，一子一女也很少来看她，但她现在最大的苦闷是整天没人说话。她这次到医院来复查，最大的愉快是和几位同病相怜者谈心，她已有好长时间没和别人畅谈了。她对我说，回到成都后，又要过那种成天和电视机对话的日子了。

还有一女子求助于“法律援助热线”：她的丈夫连招呼也没打，就做了变性手术，现在成了一个女人。本来的夫妻现在成了“姐妹”，一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尴尬状态。我们的婚姻如何维持？原本的家庭生活如何继续？难道身体是自己的，就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变吗？易性病患者在从事变性手术之前，必须征得家庭主要成员的同意，并经过具有法律效力的公证，这是进行变性手术的首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个先决条件，贸然进行手术，术后必定遗患无穷。因此，凡来院做变性手术，必须征得家庭成员的同意，这是何教授立下的一条严厉的规矩。“我这么做，既是对患者本人负责，也是对患者家庭成员负责。”何教授解释，“如果一个变性人没有得到家庭的理解和支持，那么即使手术很成功，他（她）也很难被家庭成员所接纳，被社会所接受；唯一的选择就是出走他乡，更名换姓。父母若不同意自己的子女变性，而你却自说自话做了，那不是伤了父母的心？他们可能因此还会对你记恨在心，跟你没完没了。”

本人如何融入社会？

变性人能否轻松“面世”，如何融入社会？公众能否坦然接受？这几个问题与变性人的生存直接相关，因而也值得认真探讨一下。

这个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视社会开放程度的不同而结论不同。

变性手术在我国的内地,还很稀罕。变性人的出现,往往成为当地的一大新闻,容易引发公众的好奇心。说是“心理变态”、“丢了男人的脸”,是因为各个性别群体都很认可自己的性别。但现在毕竟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是一个尊重人权的时代,是一个信息共享的社会,只要不影响社会人口性别的平衡,从变性人自身的心理与个人幸福着想,变性也是符合人道主义原则的,社会没有任何理由不接纳他们。

但是,从总体而言,中国目前还是一个“乡土社会”,即熟人社会,群众都有好奇心,街头巷尾的议论,会给变性人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压力。譬如以前叫“叔叔”、“哥哥”的,现在要改叫“阿姨”、“姐姐”。此外,因为其行为的特殊性,也会引出一些意外的社会问题。

佳木斯剧团的小王完成变性手术出院后,住进了北京的一家旅店。她男不男、女不女的声音,加上她身份证上为“男”,而打扮却又女性化,引起了服务员的警觉。警察来“查夜”,发现她与一位正被通缉的女毒贩极为相似,正好她还带有杜冷丁、吗啡等针剂,被公安“收容”,后来她出示了医院的有关证明材料,才弄清了她的身份,给予释放。

另有一位姓张的变性人,嫁给了一个香港人为妻,14年来老公懵然不知,一直以为1.76米身高的妻子是绝世佳人。一次在时装表演中,恰被一位长沙来的老乡认出,而多次向其勒索,威胁要公开其秘密。最后为避免敲诈,张某索性自己曝了光。

但是,随着“市民社会”的逐步建立,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在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里,大家都尊重别人的隐私,也就没那么多

的人去关注接触对象的身份了。

进入 21 世纪后,在上海,继秦惠英公开自己的易性经历之后,现在有不少变性人并不讳言自己的易性经历,甚至于从就职和成名的角度考虑,主动公开自己的变性历程,欢迎媒体宣传自己。变性人陈莉莉经过媒体的热炒后,有许多模特儿公司和她签约,收入大幅度增加,易性成为一种生财之道。而在一个开放的和与国外交流密切的城市里,人们对变性人就更为宽容,和他们接触多了,人们也就习以为常。当然,即使在上海,也还有相当一部分市民对变性人抱有成见。从何清濂那里做完手术后,愿意公开自己的变性经历者,据我的统计,还不到十分之一。

能否融入社会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变性人要从根本上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因为一般的变性者以成年人居多,已经过了数十年的“男人”生活,一旦换了性别,未必就能形成女性细腻的感情与心理,顺利地融入女人圈子,这样的适应过程,大约需要三四年的时间。

婚恋也是一个大问题

变性人改变自然性别后,能否恋爱、结婚,则是易性手术后遇到的又一个重大问题。变性人在易性之后,是否仍旧有性欲,这也是许多人关心的。本书将在后面专列一章研究这个问题,这里先简单地介绍一些国外情况。

在国外,许多国家的法律是不允许变性人结婚的。1983 年的英国的 Corbett v. Corbett 一案,是反对变性人结婚的经典性的案例。在该案中,一个男人娶了一个经过手术后由男变女的变性人(male - to - female, MTF),法院判定该婚姻无效。英国普

通法有关婚姻的基本定义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排除任何其他人的自愿地终生结合。婚姻的本质在于异性的结合。审理该案的法官认为,要判断一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主要取决于三个生物学上的因素,即染色体、性腺和生殖器。根据这个标准,法官认为,本案中的变性人从法律的角度看仍是一个男性。因此,该婚姻是无效的。虽然,法官指出,本案的理由仅适用于婚姻案件,但该案的影响已超出了婚姻范围之外。例如,在 Regina v. Tan 一案中,检察官根据英国 1956 年的《性犯罪法》第 30 条,对一位经过手术而由男变女的变性人(MTF) Gloria Greaves 提出指控。该条规定是,如果一个男人故意以卖淫为生,他就构成了犯罪,而女人则不构成犯罪。法院认为,Corbett 一案的判例应适用于该案,并最终认定该变性者是个男人。而心理学的方法是指在判定一个变性人的性别时,他的心理应起决定作用,即应根据他的意愿来确定他的性别。例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一些法院在判定变性人的性别时,就没有遵循英国法院所确立的生物学方法,而是采纳了心理学的方法。现在,英国已改变了原来的作法,对变性人采取了非常宽松的态度。例如,英国上院在 2004 年 2 月 10 日出台了一部新的法律,允许那些饱受性取向混乱之苦的人在法律上更改自己的性别,允许变性人获得新的出生证,并以新的性别结婚。这项名叫“性别识别法案”的法律规定,希望其新的性别得到法律承认的变性人将必须提供证据,证明他们打算完全以新的性别永久生活下去。而日本议会上院在 2003 年 7 月 2 日通过一项新的法案规定,变性人要改变身份证上的性别,还必须通过变性手术。

又据国外医学家的测试,易性病患者在改变性别后,几乎大部分人的性功能良好。据何教授告诉我,百分之九十的易性人

可以体验到性高潮。何教授认为,变性人是可以结婚的,而且可以有性生活。据我和几位未婚的变性人作深入交谈,他(她)们都有性的冲动和要求,希望成个家,对一个男变女的变性人来说,过去对自己的男性身份甚为厌恶,如今却希望找一个英俊的男性做丈夫。有一位男士变为女性后,已先后交过几位男朋友。后来,有一位长相很英俊的男青年知道她的变性经历,仍热烈地追求她,希望和她结为秦晋之好。她把和男友的合影照片给我看,并告诉我说,现在暂时还不打算结婚,希望在事业上有所进展,如果条件许可,还想到国外深造。秦惠英出院后,继续服用女性荷尔蒙,二三年后,皮肤已变得白皙,长发飘飘,胸脯微耸,加之羞涩的眼眸,骑一辆新潮女式的自行车,一举手,一投足,无不散发出女性气息。有人问她:“做了女人,你最怕什么?”秦惠英答道:“怕老。”谈到她今后是否想恋爱、结婚时,她说:“我以前的一些男性朋友有的已断了关系,但一些最亲密的男性朋友仍像以前一样关心我,帮助我。我谈不上有恋人,但我对男性有交往的要求。因为男性是力量的象征,和男性在一起,有安全感,尤其是当我在马路上一人行走时,遇到一些流里流气的男人,我多么希望有一位男朋友保护啊!有时我妒嫉别的女性依偎在男友的身旁。”在谈到她的未来的生活时,秦惠英也不加掩饰地说道:“我希望有个家,我的丈夫应该受过高等教育,文雅、渊博,年纪大一点没有关系。”有人问她:“你不能生育怎么办?”她轻松地表示可以领养一个孩子。不过她强调:“当然不会是男孩。”秦惠英这一想法是否如愿,还有待于她在日后的生活中去追寻。

但是,在国外,也有许多变性人在完成手术后,恋爱婚姻并不如意。据印度《印度斯坦时报》披露,现年29岁的库提亚马

生下来就同时具有男女生殖器,他与女亲戚劳拉相恋 15 年后,库提亚马花费 5 万卢比(1150 美元),到韩国做了变性手术,成为男性,并把名字改为比努,但没料到,劳拉已经与另一个男子订了婚。比努提出起诉,指控劳拉违反约定。比努在起诉书中说:“她已同意在我手术后嫁给我。我贷款支付了医院费用。”但是,比努即使官司打赢了,弄到了一笔钱,又怎样呢?他在精神上所受到的打击是难以补偿的。不过,令他高兴的是,劳拉的未婚夫在知道“比努的故事”后,即表示不打算娶劳拉为妻了。但劳拉是否会与比努重归于好,现在还不得而知。

美国变性人马丁诺在医院工作后,专和要求变性的人交朋友。他在观察了许多变性人回到社会生活后写道:“我发现,‘女性变男性’的变性人,大多数人都能够正常的参加社会生活,有着外在的建设性的通型,和普通的男性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在完成变性处理过程中和以后,继续受教育、结婚,建立起家庭来,安排好自己的生活目标。经过变性手术的这类女性,没有忧虑和烦恼,性格和意识比以前更加爽朗、丰富了。完成了变性以后,安安静静地离开医院,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发生什么意外的闲事。”在上海,有五位女变男的变性人离开医院后,已分别和姑娘们谈起了恋爱,热度也不低。但他们均向我表示:暂无结婚打算,还想自由自在地生活一段时间。

变性后工作、生活并不如意的,如美国作家唐·兰格利·豪尔(原是高登·兰格利·豪尔)。他从小被玛格丽特非正式领养。于 1962 年迁至南加州的查理斯顿,在那儿居住不久,他对古董的鉴赏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他写了几本书,使他名声大增,可他有一些怪脾气,例如他为自己宠爱的小动物初次公开露面,专门举办了一场招待会。他所写的书主要是一些妇女的传

记。他很喜欢把自己当成他笔下那些女性。1966年,他开始接受变性手术,使自己变成了一个女郎,改名为道恩。为期两年的治疗结束后,道恩嫁给一个22岁的黑人机修工。养母玛格利特对事情的进展很满意,但道恩的外婆却抱怨道:“我实在不希望道恩嫁给一个浸礼会教徒。”

许多病人在做了易性手术后,谈起了恋爱,有的已结婚,从此生活展示了新的一页。这样的例子在国内很多,不胜枚举。

郑某,31岁,女性,在一家公司里担任经理,工作能力很强,但自幼认为错生了性别,自以为应是一个男子汉,她试图以婚姻来摆脱困境,1979年1月结婚,产一女,但婚姻和家庭并不能改变她的易性愿望,她深感自己做了一件违心的事,很难和丈夫生活下去,于1982年离婚。她从厦门来上海求医十次,迫切要求变成一个男子。在何清濂的帮助下,于1995年2月为她施行了易性手术,术后心理得到平衡,心情和以前判若两人。她变成他后,郑某结识了一位女友,两人一见钟情,现正在热恋中,彼此都感到相见恨晚,双方生活得很幸福,并准备在最近结婚。

还有曲某,也有和郑某相似的经历。曲某,29岁,女性,在一家商场里任职,她自幼具有男子心理,成年后被父母逼迫婚嫁,但婚后毫无性欲,憎恶房事,结果和丈夫离异,遂四处求医,其间结识一女子,并相互爱恋,发展成为同性恋。她找到了何教授,强烈要求做女变男手术,何教授采用阴股沟皮瓣,为她再造了一根阴茎。曲某1994年再次结婚,这次结婚角色转换,成了丈夫,他婚后性生活满意,且性欲甚强,夫妻恩爱无比。开始改任推销员,他自变性后,精神面貌判若两人,工作潜力充分发挥了出来,超额完成了工作任务,领导对他的工作十分满意,1996年被推选为商场副经理,工资收入是妻子的两倍。妻子后经人

工授精,于1997年5月生了一个女儿,家庭生活很美满。

做完变性手术的男女在谈恋爱、结婚的过程中,是否应当在恋爱、结婚前将变性的情况通报给对方?我觉得,应预先说明为好。上述两位易性成功并恋爱结婚的变性人,都将自己的变性经历告诉了对方,结果并没有产生意外。如果隐瞒了这段人生经历,倒有可能产生不幸。英国有一位“男变女”者,名叫梅怡,是一位金发女郎,长着一个秀丽的脸庞,兼有窈窕的身材,被人们公认为是一位漂亮的姑娘,追求她的人很多。后来,她和一位体格棒得像雄狮的足球运动员谈起了恋爱,彼此深深地相爱着,已经订下了结婚的日期。但是,梅怡出于自尊,没有向那位足球运动员坦陈她的变性经历,结婚后,男方终于知道了梅怡没有向他表白过的隐私,婚后数日,男方就以婚姻伴侣隐匿了实情为由,向法院提出撤销婚约的申诉。经法院了解,梅怡也承认了自己的过错,法院判决解除婚约。梅怡的教训,在变性人的生活史中,留下了可借鉴的一页。

身份证的编码也要修改

变性手术完成后,性别改变了,由此带来的户籍登记和身份证如何变更的问题,急待解决。否则,买飞机票、出国等,都有巨大的困难。在身份证的变更中,还有一个身份证号码编码问题。随着时代的进步,变性以后,身份证的修改问题,现在已不再是一个难题。2005年3月3日,29岁的天长市汭涧镇变性人黄宁倩(原名黄恩岭),高兴地从天长市公安局汭涧派出所的民警手中接过新的公民身份证,他做女人的梦想终于得到了法律的认可。2004年12月31日至2005年1月31日,黄宁倩在南京市

成功地施行了由男变女的前期关键性手术。2月4日,她持相关证明材料,向当地公安机关提出变更身份证内容的申请,汉涧派出所和天长市公安局依法逐级报批,省公安厅制证中心特事特办,为黄宁倩办理了新的公民身份证。

湖北荆门的杨柳生下来就是“双性人”,2005年已28岁。8岁那年,经动手术,定性成为男孩。2003年,为了生存,他决定变为女人。三个月前,杨柳在广州完成第二次变性手术后,2005年2月2日回到沙洋老家,在当地公安局户政部门顺利领取了女性身份证。从此,无论在现实还是法律意义上,她都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2005年小年夜那天,杨柳与家人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团圆饭。2月3日下午,杨柳顺利拿到身份证,她感慨万分地说:“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做女人了!”她同时表示,“现在心理上还不能接受男人”,两年内不会恋爱结婚。

身份证号码编码中有一位是性别代码,奇数代表男性,偶数代表女性。那么,实施了男变女手术后的“某女士”的身份证,性别代码该用偶数还是奇数?就值得好好研究了。两年前的4月3日,河南某市男子张某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做了变性手术,30岁的男子变成了女儿身。由此带来的身份证如何变更的问题,已引起公安部门的重视。

我国居民身份证件原来是15位制的编码,最后一位是男女性别代码,百岁老人有一个专门号段。身份证号码升为18位后,第17位成为性别代码。张某的身份证性别代码原来是奇数,那么,他变性后身份证和户籍登记,该作如何改变呢?

公安部门现已作出了明确答复,对于做了变性手术的人,由医院出具负责任的变性证明后,公安机关对其户籍可作相应的更改,并收缴其原来的身份证,换发新的身份证。身份证的男女

性别代码,在新的身份证上将作必要的修改。现在,张某的身份证的性别代码已作了修改,她在身份证上的照片已由男更换为女。

据了解,在何教授已完成的一百零八位“儿女”中,绝大部分人在出院后半年内,都完成了身份证的修改事宜。特别是在大城市,解决这个问题的阻力更小一些。

“以后我咋个叫你呢?”

人的自然属性改变后,倘若是已婚者,那就面临家庭解体,子女归属的问题就提出来了。

何清濂教授已接纳过几位已婚的易性病患者的求治。已婚者如有子女,易性后涉及的问题更为复杂。国外曾报道过男子易性病患者在做了变性手术后,仍与原来的妻子共同生活的事例,但在中国,这样的夫妻关系很难为国人所接受。

从何清濂接到求治易性病患者的比例来看,尽管以未婚的年轻男女居多,但仍不乏已婚者,甚至有人已生育过两个子女,仍有变性的强烈要求。有一个男子提出,变性后不准备和妻子离婚,妻子也表示能接受变性后的状况,与丈夫以姐妹相称。她表示:只要他的“怪病”能治好,共同把两个子女抚养成人,也就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这个患者的两个女儿也调侃地说,我们以后有两个妈妈,生活在一起更方便了。这样的特殊家庭,虽然也可能维持下去,但实际上不会给另一方带来幸福。这种“两姐妹”关系,能否长时期存在下去,也很难说。何清濂对于已婚的易性病患者提出手术要求,持更为慎重的态度。他说:“作为医生,我充分理解他们的痛苦,但是,变性手术是个涉及面很广

的敏感问题,我们不能仅考虑到解除变性患者一方的痛苦,而使他们的妻子、孩子、家人蒙受创伤。”我曾和一位女变男的易性人探讨是否公开报道变性过程问题。他快人快语地说:“我倒没什么,既然手术也做了,单位的同事也瞒不住,但是,我的两位哥哥不赞成,生怕公开报道会给他们带来压力,出于这个原因,请暂时不要公开我的真实姓名。”

合肥市有一位男变女的编辑,在一家出版社供职,且是共产党员,已四十多岁,工作表现出色,但他的易性要求十分强烈,在2002年上半年,由何教授亲自为他作了变性手术,他已婚,并有一个女儿,和妈妈住在合肥,女儿至今不知道爸爸已变成了“妈妈”,每周和他通一次电话。我问他是否愿意公开他的变性经历,以打破社会对变性人的偏见,共产党员带个头,如何?他回答我说,本单位已认同了他的变性经历,在做手术前,本单位的党委书记还找他谈了话,党籍不会有问题,出院后照样过组织生活。现在,在工作上同事们和他合作得很好,公布变性经历也没什么关系,他还主持了一个关于易性病的网站,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但考虑到女儿的心理和处境,他对我说:“还是希望您不要公布为好。”我认为,他的顾虑也是不无道理的。

2004年5月1日,四川双流县彭镇变性人章琳和爱人杨启成在所有手续合法的情况下,从镇政府民政人员手中领到了大红的结婚证,成为一对合法夫妻。他们的父母亲都已认可了这门婚事,当地的百姓不再向他们吐口水,但是,有一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即在37岁以前,章琳和前妻生了一个女儿。小女孩叫了他12年的“爸爸”。现在章琳嫁作他人妇,女儿显得不知所措。2003年9月,当章琳做完变性手术后,女儿曾经跑到面前问:“以后我咋个叫你呢?还是叫你爸爸吗?”章琳当时告诉

女儿：“以前咋叫现在就咋叫，还是叫我爸爸吧！”但已成为别人妻子的章琳谈起女儿时，却有点不知如何是好，这样身份的变化，令她和女儿都备感尴尬。章琳和丈夫杨启成商量一阵后，章琳没有明确回答女儿该如何叫自己，而是告诉记者：“我和杨老四肯定会把孩子当自己的女儿看待，供她上学，关心她成长，好好爱她，就这样过一辈子。”那么，杨老四是否会很好地接纳前妻所生的这个女儿，也是一个新问题。

在英国，已婚的詹姆斯·莫里斯在考虑到要不要做变性手术时，妻子、子女的问题，也使他犹豫良久。他有3个子女。他在《生平困惑》一书中写道：“我开始几乎完全以女子身份生活，只在回到威尔士老家，处于两性难辨状态。这就需要处理伊丽莎白（莫里斯的妻子）和我的关系。我们不能轻易成为姐妹，因为她是莫里斯太太，我是莫里斯女士。我们也不愿仅仅是朋友关系，因为那就完全否定了我同子女的亲属关系。因此，我们只能作为姑嫂关系，这是我们所能想出的最接近真实情况的称谓。我已千真万确地成了我自己的姐妹，而由于詹姆斯的人格，甚至一段时期以后，对詹姆斯的记忆都从我的生活中消逝了，我就成为孩子们敬爱而不免多管闲事的一位姑妈，也成了同伊丽莎白既无血缘关系也无两性关系的一位亲属。”“把正在进展的事情告知孩子们是我们许多问题中最难的一个。有件事正在进行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虽然从未在他们面前穿过女装，同他们相处时，他们还多半未把我当女性看待。我们怕的倒不是他们自己的反应：他们早已过了童年时期感情最脆弱的年岁，年长的几个儿子几乎已经成人，我们一向虔信爱有治疗力量。我认为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他们会在学校里遭到嘲弄。”这样的考虑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不能一变了之。

根据英国医院的规定,凡做变性手术者,已婚者必须离婚,否则,外科医生拒绝做手术。詹姆斯·莫里斯为了达到变性的目的,终于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离了婚。他们亲亲热热地分了手,然后莫里斯走上了手术台。从医院回到家里,伊丽莎白像没有发生什么特别事情那样,迎接莫里斯回家,虽然他们已经分居两个住处,3个子女也没有和他对抗。作者的一个老友提到莫里斯时,把“她”说成了“他”,女儿苏珊一丝不苟地提出了责难和更正。长子马克还帮助莫里斯修改他的书稿,家人们多数已倾向接受了这个自我。由此可见,即使是在两性关系比较开放的英国,变性给家庭带来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

还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易性病患者伴有其他性偏离的疾病,如贸然变性,则会造成不良后果。有一位要求变性的男子,主要原因是年过不惑,已有两个子女,但“那可恼的东西经常昂然勃起,使我想动手术切除,以免引起烦恼。”妻子的性欲已基本上消退。他还同意将自己的男性生殖器官转让给那些想做男人的女人,何教授认为这不可能,没有同意。

还有一男性易性病患者,曾前来长征医院要求做变性手术。何清濂对他作了一年多的观察,认为他的易性病症状不典型,且伴有其他性偏离病情,认为不宜做变性手术。后来,外地另一家医院为这名患者施行了男变女手术,结果此人一度成了妓女,多次被警方抓获,对社会风气带来不良影响,也影响了变性手术的声誉。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更是屡见不鲜。在英国,有些男变女的变性人公开声称,她们毫不介意自己是一个什么性别,只要腰部以上有女性特征,脸上不长胡子,有隆起的乳房就行。这些人自诩是“城里最娇美的女人”,私下里则和男性鬼混,充当娼妓。这使所有的变性人蒙受了巨大的羞辱。变性手术的施行,

既可帮助确实需要变性的患者解除巨大的苦痛,但也可能引出某种流弊,污染社会风气,这就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对要求变性的人必须作全面的了解,谨防男变女者流入歧途。

手术费用由谁承担?

易性病既然是一种病,那么,治病的费用应由国家承担大部分。但是,实际上,许多病人难于启齿,治病也不给原单位和领导知道,因而更谈不上医疗费用由医保承担了。

在中国的大城市,做一个易性手术的费用,男变女在三万元左右,女变男四万左右。而大多数患易性病的病人,经济条件都很差,三到四万元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他们中的不少人,往往限于经济条件,只能先做一期手术,然后再去攒钱,待积攒到了足够的钱,再来做下一期手术,在这段时期,他们只能维持一种不男不女的状态,心理上和生理上都是很痛苦的。

江蔚属那种漂亮的女孩子,但她却是个易性病患者,母亲和弟弟十分不理解她的病痛。大学毕业后,她被留在了省邮电局,有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还有了单独的住房。为了治病,能变成一个男人,3年来,她拼命工作,省吃俭用,悄悄地攒下每一分钱。2004年,她终于如愿以偿,而她为此耗尽了所有的积蓄3.5万元。她为此十分不解,明明患的是易性病,单位就不同意报销手术治疗费。领导说:“这不是救死扶伤,费用为什么要由国家承担?”而另一位做肾移植手术的同事,却有幸报销了35万元的医药费用。因为经济上的原因,在变性后,江蔚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换一个环境。同事、朋友对她的接纳有限,但为了这份工作,她只能承受来自精神上的种种压力,虽然她渴望到一个新地

方去工作。

由何教授完成的154例易性病患者中,属公费医疗的约有近50例,但能报销医疗费的就仅2例。

因此,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既然科学已认定易性病的确是一种疾病,虽然它不是一种常见病,那么,从理论上说,医保就应当向易性病人敞开大门,给他们应有的帮助。如能像美国旧金山市政府给患易性病的公务员给予免费治疗的话,那对他们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福音了。

一个要求变性的年轻人的思想反复

对家庭的依恋,对父母的深情,以及看到变性后对家庭带来的损害,也会使得一部分要求变性的人思想斗争十分激烈,迟迟下不了决心。有一位署名王小刚的男青年曾给何清濂写过一封信,要求何教授“破例为他做一次手术”,但他又很爱自己的家庭,生怕这样做会伤父母的心:“何教授,认识我的人都说我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我有世上最好的爸爸、妈妈,世上最好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爸爸、妈妈对我和哥哥一视同仁,谆谆教育我和哥哥,希望两个儿子顶天立地干一番事业,可我不是他们的好儿子,也不是哥、姐们的好弟弟,我迫切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女性。我的躯体寄托于这种强烈愿望,好像鱼离不开水一样,在水里自由自在,鱼儿一旦离开了水,就会死去。我何尝不想像一个正常的人那样活着,可是这种变成女性的愿望,始终顽强地隐藏在我的内心深处,驱赶不走,摆脱不了,真是非常痛苦!我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家庭、我的父母,但除了做变性手术外,我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变性是我今后一生最好的归宿,不改换自

己的性别,我会死掉。”言词恳切,极为动人。何教授也被他的真情所打动了。

但是,易性病患者的思想状态极不稳定,在几天之后,王小刚又给何清濂来了一封信,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何教授,真对不起,我的信耽误了您不少时间,您能把我向您诉说痛苦的信全烧了吗?我曾随信给你邮去了我的一张照片,我很丑,没吓着你吧!我很喜欢那张照片,希望您能尽快把照片寄还给我。我想把这件事当成一个古怪离奇的梦,永远珍藏在心里。”从这两封信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易性病患者的思想状态是极不稳定的,是多变的、起伏的,今天痛苦得死去活来,明天经人一劝,也许又会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如果医院仅凭一时之言词贸然动刀,岂不危险?思想允许有反复,手术则不允许反复。家庭的影响,对于易病患者起着不小的作用。

还有一位易病患者同何教授保持了五六年的通信联系,一直要求变性。但何教授在和他谈话中,得知这位易病患者夫妻生活很正常。何教授凭他的经验感觉到,变性对于这位患者来说,可能不一定是最好的治疗方法。于是,何教授规劝他暂时不要考虑用手术治疗,因为变性将会改变他现有的生活,包括美满的婚姻和夫妻生活。何教授建议他找别的事做,有一个新的兴奋点,让自己的工作、生活忙碌起来。后来,这位易病患者通过了律师资格专业考试,成为一名很出色的律师。这位患者后来在给何教授的来信中说:“我现在生活得很好,工作也很有意思,对于变性,也不再是那么地渴望了。真的感谢何教授的提醒,要不是您,我不知道我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也许成了一个遭受世人冷眼的变性人吧。”

还有一个女孩,自以为是一个“生错了性别”的男子,强烈

要求变性,但其父执意不从,对她歧视、辱骂,甚至毒打。这个女孩于是萌发了轻生之念。她曾向各大医院写了十几封要求施行易性手术的信,但由于家庭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不一致,医院根本不可能将她的请求列入议事日程。如果医院轻率地将她变成了男性,将在这个家庭里引出了许多激烈的冲突。

幸而上述三位男女青年都没有轻率地做易性手术。如果做了手术再反悔,那麻烦就大了,而国外则有这样的麻烦事例。一名男子在2000年5月做了变性手术,成为一个他朝思暮想的女人后,不久就后悔了,她说:“多年来以男人的身份生活没有限制,现在我无法用女人的身份继续生活下去。”她还说:“我起初以为可以习惯,但是生活变得非常痛苦和难以忍受,所以我要求再变性。”但是,这一切都已迟了。她将陷入新的不可逆转的痛苦之中。在印度,也有一名阴阳人接受变性手术成为男儿身后,反遭情人抛弃的不幸事。

类似的情况在中国也已发生了。一名男变女的变性人在做了手术后,突然反悔;但事已既成,后悔也晚了,切下的生殖器不能再装上去。于是,这名变性人在近乎绝望、崩溃的思想状态中,持刀杀死了给自己做手术的医生,造成了一大人间悲剧。这至少说明,这个医生在做易性手术前,没有过细地做好病人的思想工作,也没有做好易性病的鉴定工作。如果施行变性手术的医生都能像何教授那样慎之又慎、倾注爱心,如果法律能够为变性手术定个规矩,那么,上述悲剧也许能避免了。

人言当然是可畏的

易性病患者完成变性手术后,大都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人言

可畏。

马丁诺调查了 100 多名作过变性手术的患者,对其居住的地点作了下述统计:“94%的人在变性手术后因为不能被人承认而搬迁到另一个地方居住。70%的人在变性治疗过程中搬到了郊区。20%的人愿意继续留在城市里。”这说明,即使是在美国,社会对变性人的舆论压力也是很大的。“人言”的压力,竟然迫使 94%的变性人只能易地而居,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

在中国,“人言”是不是可畏这个古老而新鲜的议题,从古到今,许多哲人先贤都发表了不少议论,值得我们注意。

屈原在他的绝命诗《惜往日》中,曾留下了这样的感叹诗句:“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虽有西施之美容兮,谗妒人以自代。”唐朝有两位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也以为人言是可畏的。韩愈说过:“重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白居易则在一首诗里写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你看,贤者如周公,对那些毁谤的流言,也是多么惶惶不安!由此可见,“人言可畏”,似乎不无道理。

对要变性的人来说,手术前或后,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更是不足为怪的。

男人忽而变成了女人,女人忽而变成了男人,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能被接受的。于是,他们对于易性病患者或变性人,或冷眼相向,或嘲讽讥议。对于易性人从医院出来重新回到社会,人们在没有普遍接受变性这种医学的成就之前,在没有把变性和治病救人结合在一体之前,往往持排斥、责难甚至敌意的态度。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变性手术是对“男女有别”的传统观念的一大冲击。有些人一提起生殖器官的再造,就感到伤害了

他们本身对性的固有观念,动摇了他们对于生物命运前途的信心。有的人认定两性器官的再造,失去了人性的尊严,或以为他成了“太监”、“人妖”,等等。

从宗教伦理方面来看,变性更是不能接受的。按天主教的说法,人死了是要去见上帝的,你生下来是男的,见上帝时竟然成了个女的,那怎么向上帝交待?在60年代初期,变性手术为天主教所不容。时至今日,也没有被他们完全承认。

在现实生活中,对于变性人的出现,“人言”是五花八门的:

“人的性别,是爹妈给的,怎么可以随便改变?”

“男变女,女变男,不男不女,不三不四。”

“好端端的一个男孩子,涂脂抹粉,穿裙露胸,娘娘腔,腻心得很。”

“大家都来变性,男变女,女变男,这个社会不就乱套了吗?”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医学科学的进展,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大门,使人登堂入室,发现了一个新天地。我们的社会封闭日久,对国门之外的变化,过去知之不多,现在改革开放,国门大开,许多新东西涌进来了,过去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人言”种种,不足为奇。从封闭到开放,从开放到理解,从理解到接受,有一个过程。但是,易性这个课题,将是医学界、心理学界需要解决问题,而主要不是伦理学有待解决的问题。一俟医学科学的新成果为人所接受,种种对变性的误解和责难就会逐渐消散,或者习以为常。

因此,对于各种不正确的“人言”,我们要作分析,变性手术是对一种传统的陈旧观念发起了冲击。按传统观念看来,男人穿裙子涂口红,是“道德败坏”;现代医学则告诉我们,这是一种

“异性装扮癖”；按传统观念来看，男性意欲变成女性，是“不伦不类”，现代医学则告诉我们，这是一种易性病，是一种疾病，我们不应歧视他们。

一位已至“不惑之年”的男性易性病者来何清濂处就诊，诉说自小父母将他扮成女孩，扎小辫，穿花衣裙，还叫他“妹妹”，直到上小学时，父亲才将他恢复男装打扮，他就自以为自己是—个女孩，连晚上做梦也变成了一个女子，从梦中笑出声来。进入青春期后，想变成一个女人的心情更加强烈。他读了不少古代小说和明、清笔记小说，小说里写有好多入，生为男身，过的却是女性生活，有的自残，有的被残，割去阴茎睾丸，使他羡慕不已。“在这期间，我也曾想切除生殖器，做一个女人，但社会的道德观念，世俗眼光是一种无形的压力，我只好把痛苦埋藏在心底。”于是，他悄悄地买了一些女性内衣内裤，胸罩等物，把自己装扮起来，这一切被人发现了，诉之于领导，于是被斥为“道德败坏”，受组织处分。可惜的是，这样的处分现在并没有纠正。

诸如此类的事情，在前几年也时有所闻。北京某医院有一位青年医生，是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该院工作的，他也因无法摆脱生理上的变性要求，痛苦不堪而自杀了，年仅29岁，死后还背着一个“道德败坏”的恶名。无独有偶，据1990年报载：广州公交公司有一名售票员，工作上是很出色的，却有类似秦惠英的变性要求，他借助刀片、剪刀、普鲁卡因、止血粉将自身阴茎全部切除，并完全以女性的角色出现在社会上，将名字改为一个女性的名字，穿上了连衣裙，并假造乳房，但社会不予承认，他被迫辞职，在家待业。如果这两位年轻人事发于今日，结局也许不至于如此悲惨了。

变性人的行为常引起人们的反感,这也是正常的。马丁诺的《变性人》记述了一个名叫威尔逊的男变女患者的怪诞表现。她的变性手术业已完成,在医院进行术后治疗。在病房里,她是一个相当活跃的人物。她不管病房里的患者是不是做过和她相同的手术,总是赤裸着身体在病房里出来进去,展示和炫耀自己的那个阴户部位,于是,马丁诺把她领进了自己的办公室,用暗锁锁上了门,对她劝说道:“威尔逊小姐,我是这个楼的护理主管,关于您的一些活动和行为,最近有人向我作了报告。”威尔逊小姐好像并不介意这类事情,望了马丁诺一眼,假睫毛一闪一闪,一只腿跷在另一只腿上颤动:“这不怪我,马丁诺先生。这个楼上的妇女想要看我做的手术,我就给她们看,全给她们看,难道,这种手术不能给她们看吗?”“威尔逊小姐,我们这儿是一所小型医院,这里的患者,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大多数是中产阶级的人士,有一定的文化素质,您光着身子在病房里走来走去,是违反习俗的。”她毫无羞耻心地讥笑马丁诺说:“你这样说,我也要对你说你是个假正经。我不是把裸体给男人看。女人对女人,有什么允许不允许的?再说,都是一样的玩意儿。”马丁诺觉得对她已无话可说。马丁诺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变性人,对于她的炫耀尚且有一种强烈的厌恶感,医院里的其他医护人员,就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反感。对这样一名行为极为异常的患者,当初就不应该允准她来这儿进行变性手术。马丁诺以变性人和医务人员的双重身份写道:“威尔逊的病例是一个教训。社会上对于两性人和变性人并不体谅,常常以冷眼和嘲讽对待他们的病态。而她却成为整个医院职工进行攻击和另眼相看的总代表,引起人们把所有的变性人都视为洪水猛兽,是不讲伦理道德、毫无廉耻的人。”

我倒以为,个别人变性后的异端行为,并不能代表多数变性人,更不应从而在总体上否定变性手术。看来,马丁诺的分析是正确的。像威尔逊这样的患者,原先患的可能不仅是易性病,而兼有性变态,批准这样的人做变性手术,确实是个教训。但从何清濂教授所做的154例变性手术来看,患者出院后的表现,均是正常的,即使对于个别行为稍有反常的变性人,我们的任务也是帮助他们好好对待生活,好好做人,而不是揭露他们,批判他们。

但是,“人言”也的确有可供借鉴的另一面。比如说,“男变女,女变男,不作兴胡来”,这提醒医院要慎重行事。“我们的检测水平不高,做变性手术要慎重。”这种意见也是不错的,一个人在变性之后,社会要求他(她)们的行为举止,必须符合新的性别的共同准则,否则,就会引出“不伦不类”的议论。“伦”和“类”,就是规则和类别的意思。瓦林德医学博士曾对变性人的人格差异作过下述探讨:“女变性人(女变男)不太容易有类似的偏执狂和迫害感。男变性人(男变女)在个性的特征上,显得比较虚弱,存在着歇斯底里和小儿性情等现象。”这种分析也可供我们参考。

易性手术在中国毕竟刚刚起步。我们的经验还不丰富。要求变性的患者,其动因是五花八门的,真真假假,有时难于辨明。从这个意义上看,“人言”不应一概视作逆耳的声音。

由男人变成女人的美国作家琳恩·拉斯金在变成女人后写过一段话:“手术后的唯一问题,就是我不喜欢世人以好奇的眼光来看待我。我应该是一个和别的女人一样的正常的女人。”“我不愿意人家总是注视着我,并且偷偷地、交头接耳地评头品足,问东问西:‘看见那个女人吗,她以前是个男性呢!’我也不愿在工作场所,被别人当作变性人。我是以和别的女人一样的

身份,论人生的事业的成败。”还有一位要求女变男的患者写道:“当人们问起我是不是变性人时,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是。我曾是不幸的易性病患者,是变性手术救治了我。请不要歧视我。一个人的价值与他的性别没有关系。我同样有一颗正直善良的心,我同样可以为社会为他人放出光和热。我衷心地希望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同情。”拉斯金和另一位中国易性病患者的上述意见,说出了作过变性手术的患者的心声,值得大家细细地咀嚼一番。当你生活的周围出现一位要求变性或完成变性的人之后,你不要对他指指点点,而应当关心他、同情他,尊重他,帮助他,凡属他的隐私,则不应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易性病患者既然已经完成了手术,他就是社会生活大家庭中的一员。一切歧视、取笑他们的言行都是不道德的。

法律的沉思

一个人的自然性别改变之后,还引出了一些法律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比如,医师为男易性病者施行“去势”(切除睾丸及阴茎),或为女易性病者实施子宫、卵巢切除术,是否属于“加工自伤行为”?

比如,一名患者要求变性,进行手术治疗,病人的家属、单位以及其他有关方面都同意了,但由于检测手段不准确,医务人员发生了误诊,病人已做了变性手术,该怎么办?

比如,我国宪法规定:凡满18岁的男子有服兵役的义务。那么,女变男之后,有没有必要履行这一义务?反之,是否可以免除服兵役的义务?

比如,易性病者在完成变性手术后,他的劳动权应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又比如,一对夫妻,如果丈夫做了变性手术,但妻子不愿离婚,其夫妻关系是否继续存在?如果离了婚,变性人与其子女是一种什么关系?变性人如果再婚,婚姻法是否许可?变性人离婚后,仍与原来的妻子同居,算不算违反婚姻法?

又比如,易性病患者在完成变性手术后,乱搞两性关系,应如何处置?

还有变性人更改姓名后,是否能继承亲生父母遗产?等等。

对于上述种种问题,由于变性手术在我国刚刚起步,涉及的人数不多,变性手术与法律条款的冲突并不明显,加之有些内容在法律中也未见条款。如刑法中有关故意伤害罪的法律规范中,并没有“自伤行为”和“加工自伤罪”的规定,因此不存在需要修改刑法,或补充“业务上正当行为可以不罚”等内容的条款。我国的医业法律也不完备,有关调整医疗行为、医疗业务和医业权的医师法,并没有制定和颁布。因此,也不存在变性手术是否正当,除严重的误诊外,不应追究正当医疗行为的责任。倘若易性病患者术后反悔,也不应追究医师的责任。

即使如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对变性手术涉及的法律问题,就可以置若罔闻?当然不是。目下,有识之士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1993年6月25日《法律日报》发表一篇题为《身心紊乱者的曙光——变性手术中的若干法律问题》的文章,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文章指出:“由于变性手术改变了人的自然性别角色,必然引起其社会角色的更迭,导致变性人在家庭和社会法律地位上的变化。又由于现有社会规范,尤其是法律规范是依循人类天然两性角色与生理构造所建构,如服兵役、劳动保护,以及

在竞技体育诸多方面,均有许多不同的规则和要求。变性人的出现及行为必然与现行规范之间发生冲突,造成一系列社会、伦理与法律的混乱。”提出这个问题,未雨而绸缪,防患于未然,引起立法、行政及卫生部门的关注,作出正确的决策,诚然是很有好处的。

做易性手术是否合法,在国外有两种对立的法律规定。如土耳其、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刑法条文中,都有明确规定:对易性病患者实施易性手术是一种犯罪违法行为,循规蹈矩的外科医师自然不敢去冒这个风险。但英、美、德、奥等国却对易性手术的合法性予以确认。德国法院曾以判例指明,实施变性手术的条件为“避免病人重大且不可避免的心理及身体伤害”。奥地利在1975年刑法中也明确规定:“医师经已满25岁人的同意或由于其他不违背善良风俗的理由而去势之手术者,阻却违法。”美国 Bevjamin 协会的变性手术条件是:(1)对变性手术要求至少持续2年;(2)专职处理易性病的临床行为专家必须做出性焦虑的诊断;(3)病人必须以他(她)们所选择的性别生活和工作至少达12个月;(4)术前接受心理和精神监护不得少于6个月;(5)术前必须有长于6个月的激素治疗;(6)专科临床医生应对病人进行全面的评估、仔细的观察和讨论。

根据中国的国情,以及从我国患者的绝对数量来看,在我国的刑法内,应增补有关有条件施行易性手术的条款,即承认易性医疗行为是给予“医疗辅助”的一种医疗行为。经过本人申请、家庭和有关部门同意,经医院权威检测中心认定,在所易性别的群体中生活两年之上者,则不反对进行易性手术。

对于已婚者的易性要求,应先离婚、后易性。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医院就不应予以易性。变性人在完成手术后,重新回到社

会生活中来,他的劳动权、就业机会,应一视同仁,不得予以歧视和刁难。他在易性改名之后,财产继承的权利也不应加以剥夺。变性人同样应履行服兵役的义务,但在入伍前后,则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变性人参与体育竞赛项目时,则应按其变更的性别而定,应慎重加以研究,然后决定能否参赛。其户籍、姓名也应随之更改。变性人已失去生殖能力(除内生殖器移植成功者例外),倘若借以从事有伤风化的活动,则应参照有关治安管理、法律条款进行处罚。

大不可取的做法:以变性人作店招

关于易性手术的法律范畴,在目前的中国还是一片空白。完善有关的法律规定,使变性手术有法可依,使身心紊乱者眼前的曙光,变成一片透亮的光明。

但是,在我们的面前,也有时会出现一些芜杂的色彩。2004年3月3日上午,济南市老东门附近一家酒店灯箱上有“变性美女”的招牌,介绍该店将招来一位易性女子作服务员,引来上百市民围观议论。许多市民认为此举不雅,有悖社会伦理,让人不舒服。酒店门口上灯箱上写着:“变性美女高婷婷真诚为您服务”。据了解,所谓“变性美女”是济南电视台一个栏目正在连续报道的人物,叫“高婷婷”,男性,正在筹款做变性手术。

据酒店马经理介绍,本来自己是以一种同情心接受他的,想让他酒店里做个迎宾、服务员之类的,但这几天在门口围观的人特别多,来吃饭的人反而少了。以前,店里的营业额每天在2000元左右,现在每天只有800多元了。煞费苦心,结果适得其反,这也是想借变性人做广告大赚一笔者所始料不及的。

以一种“生意经”着眼来看易性手术,甚至以此作为招揽生意的行动,那是不能允许的。变性手术是社会进入文明的一种标志,也是人性化的一种体现,对此不应该抱有任何偏见和歧视态度。一些机构出于商业目的,频频炒作变性手术,因变性手术是一个很严肃的医疗行为,牵涉个人隐私、社会影响等问题,如果大肆炒作是不对的。医院如果接受了这个本来不应做易性手术的人,为他变成了女性,那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将会带来无穷的纠纷。

眼下就有一例。新华社南京 2005 年 5 月 17 日电,南京第一变性案:手术做半截医院输官司法院终审判决:被告南京东方医院赔偿山东男子高婷婷损失 5 万元。类似的纠纷,我们听到已不止一起了。

“教育那些已经教育过的”

易性病是一种性偏离的病态,这种疾病的成因,有生理的,也有心理的,但其详尽确切的成因,医务界至今对它仍不甚了了。对于易性病,我们应以预防为主,普及有关的知识,一旦发现孩子产生了早期的易性病症状,就立即施以正确的心理疗法;另一方面,对那些病情严重的易病患者,医院应收治他们,不要把他们推到精神病院去,也不要简单化地把他们推向同性恋者一边去,而应当为他们提供积极治疗的条件。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制定了五项诊断标准,似可供我们参考:一、对自己的解剖学性别有一个不舒服和不适当的感受;二、希望去除自己的生殖器官并按异性成员生活;三、这种心理失常至少持续两年;四、没有生理上的两性畸形或基因异常;五、不是由

其他疾病,如精神分裂症所致。美国有些大医院都有一个性别验证科。英国有不少大医院对用手术治疗易性病的规定十分严格,即使最富有同情心的外科医生也需对患者作一年以上的前期观察,才敢于动手。因为有些两性畸形的人,误入歧途的同性恋者,以穿异性服装为乐的人,裸露下体成癖的精神病人,时时混杂于易性病患者中间。这就需要过细地加以鉴别。鉴别需要时间,当然更需要有经验的专家、设备。何清濂教授告诉我,在易性手术搞得较好的一些国家,医疗部门设有变性咨询机构,由性心理、精神分析、内分泌、泌尿、整形外科、妇产科和法律方面的专家组成,对要求变性的患者进行一系列分析、检查、研究,然后决定是否施行手术。这一步骤显然是必要的。从技术上看,我国的变性手术水平在短短几年内,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的检测机构,检测的水平比较低,而要求治病的学生则有几万人,倘若大规模推开变性手术,有相当的难度。何清濂还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拨出一定的经费,组成紧密的或松散的研究机构,加强易性病诊治及变性手术等方面的研究、协调和交流,为更多的易性病患者解除痛苦。

马丁诺和他的妻子开设的“迷宫基金咨询服务处”,有一条精彩的座右铭:“教育那些已经教育过的。”即不厌其烦地把咨询服务、宣传解释、正确对待易性病及其治疗方法,作为他们工作的宗旨。马丁诺开设这个服务处的主旨,是让患了这种令人难以启齿的疾病的人,坦然地说出自己的病情,解除他们的种种疑虑,然后找出对症下药的治疗方法。

手术治疗并不是治疗易性病患者的唯一手段。对某些典型的并伴有严重心理抑郁的易性病者,如有自残、自杀趋向者,可考虑施行易性手术。因为这对缓和患者自觉性别与生物学性别

的矛盾、促使其心理平衡有利,对社会的稳定也有利。但是,专家们指出,变性手术并非是易性病的惟一的纠正性治疗措施,其适应性的范围是很有限的。研究变性手术的疗效,不仅要观察它的近期效果,还要作远期观察,对一个明智的外科医生来说,不应病人有了变性的欲求,就非做变性手术不可。凡对自己生物学性别不满意的人,明智的选择还是顺从自然,不要轻率地要求变性。

努力治心为上策。从国外的文献资料来看,手术治疗的效果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常有并发症和后遗症。且不论手术水平的高低,将对手术的成败有很大的影响。三流外科医生的手术,只会给患者带来终生的遗恨。割除女性内生殖器,乳房,割除男性的阴茎,均会造成大量出血。技术水平不高的外科医生进行手术时,会把做好的阴道和肛门壁刺穿,还要做一个结肠造口手术加以弥补,在痊愈后再增加一次修正手术,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

在国外,因做变性手术而丧命者,并不是个别的。丹麦青年画家艾纳尔·魏甘纳是变性手术的第一个牺牲者。艾纳尔·魏甘纳患易性病已有多年,他一直把自己想象为两个人:一男、一女。这种想法笼罩心头无法驱除,魏甘纳心神迷乱,不胜烦恼,终于在1930年找到德累斯顿的一个外科医生,为他作了多次变性手术,终于把他的男性器官切除了,而代之以女性的生殖器官。这个医生不知道荷尔蒙的运用,还试图把女性卵巢移植到他的体内。在新的外表下,魏甘纳一度过得很快活,潇洒了一回。他从德累斯顿妇女诊所写信给家人道:“在这里的女性中间做个女子,同她们一样,真是太令人高兴了。”但是,魏甘纳的好景不长,他在做完手术后,一直没有画过一张画,变性手术不

仅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而且在次年要了他的命,以莉莉·埃尔贝的名字葬在德累斯顿。

即使是一流手术,本身无懈可击,但也有造成预后不良的。这倒不在于手术本身,而是患者思想起了变化。据国外文献报道,有的强烈要求变性者,在作了手术治疗之后,又因性别改变而后悔不已,但已无法逆转。于是演变成为真正的精神病人,成了一个废人。有的患者及其家属,居然对外科医生提出残害肢体的诉讼。瑞典的林德玛林在1986年报道13名男性易性病患者施行人造阴道术后,经6—25年的随访情况:三分之二的人造阴道没有功能,有四名对手术表示后悔,其中一名要求重新恢复术前状态。女性易性病作转换手术建造人造阴茎,由于手术难度大,承受的痛苦更多,后遗症也更复杂。英国有一位大学讲师,没有长时期服用荷尔蒙,也没有长时期地加以观察,草率地做了变性手术,术后成了一名女性同性恋者。英国还有一位气度不凡、才学出众的文官,年已55岁,但仍祈求变性,他服用了大量的女性荷尔蒙激素,强壮的男性躯体被破坏无遗,后来又做了变性手术,结果他的婚姻破裂了,文官前程也被断送了。还有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变成男性之后,她对自己的新的性别身份惊骇之极,竟抛弃了家庭、亲人和一切,在远处一个乡间小镇过着与世隔绝的孤寂生活。凡此种种,都说明手术治疗也不一定都给易性病患者带来福音。弄得不好,旧痛虽去,新疾又生,一辈子后悔莫及。

因此,在我国对于易性病患者的检测手段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在医院对这种性偏离疾病没有取得较多经验之前,变性手术的施行,似须逐个甄别。现在有的医生被别人私下请人去做变性手术,一对病人的病情不了解,二又无足够的临床经

验。这种手术更不能做。何清濂认为,任何患者在没有经过高级医疗小组的检查定评以前,不得批准进行变性手术。这样做,正是为病人负责,也不致因治疗失当而引出种种纠葛和麻烦。

这里还特别值得提一下的是,有些继发性的易性病患者,其病情并不严重时,进行药物治疗,并辅以心理治疗,也能取得一定疗效。因此,不要以为得了易性病后,就一定是“不治之症”,切勿自残、自尽,或放弃学习、工作,这样只会加重病情。

临床实践经验也会告诉我们:易性病患者大部分是不能完全治愈的,但在发病的早期可以通过心理行为疗法进行纠正的,尤其是青春期的少年,行为疗法有助于控制其异性意识的发展。曾有一例17岁的男性易性病患者,通过强化行为纠正治疗,其自觉性异常得到了纠正。另有一例14岁的女性易性病患者,通过个人或环境治疗,也取得了类似的效果。有的病人扬言不做变性手术就结束生命或自残,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有相当一部分继发性的病人,还是可以通过精神分析疗法,纠正不明显心理行为疗法控制病情的。有一位自华中某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的男性,从小认为自己是女性,婚后痛苦不堪地生活了许多年,但由于服用了大量女性激素,已失去了性欲,“和妻子躺在床上就情如姐妹”,但是,他没有改穿女性服装,也不想自残,原因在于“我对前途的成分看重和高度的自制”,因为他想考博士生,强烈希望在事业上有成就。他写道:“我生活的座右铭的头两个字就是克制。”他还考虑到目前的社会环境,妻子对他很好,因而接受了何教授的劝告,不做手术治疗。有一位来自河北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病人给何教授来信说:“我给自己设计了两条路:一条是顺应性格,改变性别,这只能借助于变性手术;另

一条是改变性别,顺应性别。也许此路不通,那样,我只能一辈子凑合过了。我的各方面条件还可以,即使谈不了爱情,也可以找到一个丈夫,我只能一辈子凑合过了。”也许迟到的爱情,能够产生一种强大的力量,能弥合她的心灵中的伤痕,给她带来幸福。

对实施易性手术规定的探讨

变性对于患者自身来说不仅是一次最激烈的心理、生理上的变化,而且它还牵涉到一系列的家庭、社会问题。变性需慎重。面对大批的求治信件,何清濂有点招架不住了。在十三年前,曾设计了一封铅印的复信,寄给各位求治者:

XX 同志:

您好!为了给您保密,台头就不写了,想您会赞同的。您信上所述的痛苦,我们深为同情和理解,希望您安心工作、学习和生活,就地治疗,与疾病作斗争,自我解脱烦恼。

最近要求变性手术的人太多,有关部门不同意开展此项手术,我们无法安排,“暂时概不接受”,请谅。若同样问题提出,亦不再回信,歉甚。

如果您愿意,可将发病,治疗,家庭情况等来信详告,以利今后治疗这种疾病时参考。

请您:

切勿来院,来了不接待,不收治。

切勿自残、自尽,自找痛苦,亦不可收治。

切勿退学、退职,对自己不利,亦不会收治。

致

敬礼

长征医院整形外科

长征医院发出的这封复信,对许多强烈期待变性的患者来说,不啻是当头浇下一盆冷水。

但是,从易性医学应当慎之又慎的角度来看,长征医院这样的复信是完全必要的。1992年,长征医院整形外科对变性手术制定了严格程序和制度:

1. 患者在手术前必需解决和考虑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诸如手术后的工作、生活、经济来源、家庭组成、社会舆论等。
2. 手术前先有适应过程,日常生活中试行异性行为及角色1—2年。
3. 必需具备下列各项证明:(1)公安部门证明,公安部门的理解和认可,无犯罪证明;(2)个人申请,包括病史、经历、家庭情况、手术要求和决心;(3)精神病院证明;(4)父母兄弟姊妹的证明;(5)已婚者必需解决好配偶问题并具法院证明。

即使在时隔十几年之后,在台湾的各大整形外科医院的公开规定中,对易性手术的实施仍然有严格的十条基本条件:

1. 必须是原发性变性欲症患者(须由精神科医师诊断并取得评估证明)。
2. 获得父母及家人的认同(手术同意书须由双亲之一签署且获认同)。
3. 单身或离婚后后方可接受手术(为使亲子伦常不致混淆不清)。

4. 必须扮演另一性别角色生活及工作至少两年且适应良好(经扮演的转变取得亲人及朋友的认同)。

5. 年龄在20岁以上、45岁以下(须20岁成年,而45岁以上身体不堪负荷手术)。

6. 智力功能至少中等(经心理测试评估其思考的自主力)。

7. 有独立自主的经济能力。

8. 有充足的术后护理常识(术后良好的护理有助于手术成果的维持)。

9. 无重大犯罪记录(为使不成为逃罪及规避工具)。

10. 无内科疾病如B型肝炎或ATDS、糖尿病等(部分疾病将影响手术成果之伤口愈合及抵抗病菌感染的能力)。

对长征医院的铅印复信,许多易性病人有不同的反映。

一位来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青年人来信道:“收到了您用铅字打印的回信后,失望的心情是无法用笔墨形容的。这不亚于粉碎了我今后重新做人的希望。收到了您的回信后,我慎重地考虑了两个星期,我还是向您申诉这样的意见:如果我不能做变性手术,我将没有信心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上海一位中学教师回信道:“尊敬的何大夫,我盼了一天又一天,终于盼来了您的答复,却不料是一封冷冰冰的信,一连串的‘不’字,像一柄利剑刺进了我的心。我的一线生的希望破灭了。难道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竟无人能把我从痛苦的深渊中救出来吗?请您拿起神圣的手术刀,赐予我这个绝望之人幸福吧!”

南方一位现年已过不惑之年的副教授收到长征医院的上述复信后,又来一信:“我仍在控制自己,按您嘱咐的第二条:‘等

待。’虽然控制自己是很困难的,有时简直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仍为我留下了一线希望,我将会不断来信,将我的病情、家庭情况不断向您禀报,能够得到您的指点,同时做好一切的准备工作的,以期有朝一日能做变性手术。”

一位期待变成男性、自杀数次而未遂的姑娘来信说:“我看到报纸上登的变性成功的消息后,我从心里激动,我有救了,所以我马上给您写信。想不到回答会令人失望。希望你们在以后不要忘记我。有一名心灵万分痛苦的患者在等待着您的治疗。我有千言万语诉不尽心头之苦。我宁愿选择一刀之苦,而不愿换没有尽头的心灵上的苦。”

一位从事工会工作的女性给何教授写信说:“我是从事工会宣传工作的,任何说教对我来说都是苍白无力的。正确对待人生、心理治疗等等,大可不必用在我身上,我不是一时冲动或赶时髦新潮才想这么做。我懂得变性要付出很大代价的,但再大的痛苦我也可以忍受。我不会用肉麻的话语称颂您的功德,但我将在魂归九泉之后,也会记住您曾给我的巨大帮助,只要我还活着,我会天天祈祷您终将会赐给我一个机会,再给我一个选择生活的权利。”

还有一位署名陈玲的女工写来一封信,振振有词地反驳长征医院的铅印信道:“我不满足做一个外表上的男人。医学之所以令人钦敬,就在于它能救死扶伤。您说这是一种病,您又是一名医生,有办法治疗这种病,为什么要把我们拒之于门外呢?是您,使我在绝望之中看到了希望,但为什么您又把这希望之光扑灭,让我再次掉进绝望的深渊呢?您能拯救一条生命,为什么不能让众多痛苦的心灵得到解脱呢?您做第一例手术时,难道没有想过天下之大,决不会只有一个秦惠英吗?您说过变性在我国是一个

很敏感、很复杂的问题,但再复杂的女变男您也完成了,其他的复杂的人际关系,比起变性手术来,难道会更复杂吗?”

陈玲小姐求医心切,写出一通肺腑之言,的确令人深思。但她错怪何清濂了。何清濂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学家。其实,有时候,处理某些复杂的社会关系问题,要比做尖端的外科手术还要困难得多。

何教授对我说,易性病也有轻重之分,不能轻易动刀。况且,变性手术还涉及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为此,在患者未能对手术后任何随之而来的苦难做过充分考虑之前,何教授是决不会实施变性手术的。为此,有时候,他需要花5—6年的时间,其间,与患者来往的信件有数十封,不断商讨,来确诊到底是否要进行手术。而且他还需要患者的其他家庭成员、工作单位以及居委会、派出所的同意才行。有位患者写来了100封信,见面不下10次,并与其母亲通了电话才定下手术。在14年中,他接到的来信有5000多件,但做手术的仅154例,成功率达百分之百。

另外,何清濂还有其难言之隐。收治一个易性患者,涉及许多非医学方面的问题。男变女,抑或女变男,纵然困难重重,何清濂还是有办法的,但是,一旦涉及户籍、工作安排、家庭关系、收治病人范围等问题,何教授则爱莫能助了。他极为同情大批患者的处境,但又不得不发出一封封婉拒病人来沪求治的信件。这是因为变性手术在中国,还刚刚起步,万事开头难,走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

办一家性别外科医院,如何?

最后,还想提一个问题:在今天的社会里,人们将逐渐开放接纳经历变性手术的人,那么,是否会涌现越来越多的要求变性

的人呢？

从宏观而论，将大批易性病患者拒之于医院之门，是不明智的。过于繁杂的手术论证，有时也会耽误病情，给病人带来长时期的痛苦。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用科学的手段鉴定病情，这是一个新问题。看来，确诊易性病在外科领域的繁衍，也是时代的要求。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变性手术知识的普及，人们对变性人看法的转变，看来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暂时概不接受”，只是“暂时”而已。当然，从一家医院的情况来看，限于技术、床位、人力等因素，收治大批易性病病人，也许有相当的难度。但是，医学界既然已经肯定易性病是一种疾病，并取得了手术与非手术的疗法，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的昌盛，何清濂教授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必将逐步得到推广。

有远见卓识的领导，应当热情欢迎何清濂所作出的贡献，并为他创造更多的条件，培养更多的易性手术的接班人。现在，受过正规化训练的易性手术主刀医生不多，为了使变性手术在中国更上一层楼，当务之急是培养一批中青年的主刀医生。有些整形医院只顾眼前利益的需要，把大批未经严格训练的外科医生推上了易性手术的手术台，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此外，关于易性病的病因研究，也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有一位生物学家提出，他愿意从胚胎学的角度，研究易性病的生理成因。这样的设想，无疑应得到支持。

何清濂为 154 位易性病患者解除了痛苦，无一例失败或留下后遗症。这自然是一个十分可喜的消息。但是，154 例与数以万计的病人相比，毕竟是一个很小的数字。而且何教授年事已高，今年已 77 岁，虽然还能上手术台动刀，但毕竟年岁不饶人了。这项医学科研事业迫切需要培养接班人。易性病究竟是一

种什么病,它的生理原因也需要作深入的探究。为此,何清濂教授曾多次提出建议:“是不是可以由国家有关部门出面,拨出一定的经费,组成紧密的或松散的科研机构,加强对易性病的诊治及易性手术等方面的研究、协调和交流,加强与国际易性病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和沟通,更多的了解易性病。”他还呼吁有经济实力的慈善家,投资建立变性专科医院,造福于民,那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各地有条件的医院,也应当收治这类病人,并交流有关经验,以促进我国变性手术水平的提高。有条件的大医院,是否可以开设易性病的专科门诊?从检测、咨询、心理治疗、药物治疗到住院手术治疗、术后观察,联成一条龙。或是否可以开设整形外科的专业医院,或成立一家性别转换医院,专门收治性偏离的病人,从科研到临床,取得更为丰富的经验。如是,在变性手术领域内超过国际先进水平,也是完全可以的。此外,在国外,比如在德国,易性、整形、美容已有一系列的服务,我国是否也可以向德国学习,并能有所创造,有所发展。比如,男变女后,声音是否也能作相应的改变。据说这是一个世界上尚未解决的难题,我国的有识之士能否想个什么办法,帮助解决一下?如是,成千上万易性病患者当拱手称谢、顶礼膜拜。

从现象上看,要求变性的人的确在增多。原来不好意思提及自己患有这种“怪病”的人,纷纷从生活的各个角落里走出来,或投书医院,诉述自己的不幸;或亲临医院门诊,寻找解除痛苦之法;从现象上看,人数并不少;但是,如果深入分析一下,按照男易性病患者人数占十万分之一,女易性病患者占十三万分之一的比例测算,在全国13亿人之中,患有易性病的人,也不过一万多人。况且,这一万多人中,并不是每个患者都要求变性

的,以前关于变性手术的科学知识没有普及,这批病人依旧是客观存在着的,不过未被人注意而已,如今得知此病可以治,患者从地下走到地上,也不过就是这么一万多人。它不是一种传染病,会在一个晚上骤然增加;它也不是一种伤风感冒症,稍稍吃点药就会治好。如果我们能够正视这些病人,不把他们拒之于门外,并创造一种宽松的社会环境,那么要求变性的病人是不会大批增加,反而会逐渐缩小。美国门理博士的乐观评论,似可供我们参考:

“假如有关性的禁制能够日见宽松的话,尤其是有关儿童养育的优生问题,我们将会高兴地发现变性在不断地减少。”

“我们是生长在一种男女两性间的微妙不平衡概型上。如果我们的容忍力增加,那么这些‘不是100%的男性,也不是100%的女性’的中间人,也就没有必要去寻求烦琐的变性手术了。”

门理博士的意见是对的。假如我们做父母的能多一点关于变性的缘由的医学知识,从儿童时期起,不要把女儿当作“假小子”来抚养,也不要因逗趣而将儿子穿上花衣裙,梳小辫。在农村某地,有一农妇生了一个男孩,因小时脾气暴烈,于是给他从小改穿女装,意在以柔克刚,取了一个“云妹子”的小名,读到中学时,才给他改穿男装。不料改不过来了,“云妹子”自小以为自己是女孩,长大后只想变成女孩,给这户农家带来了不少烦恼。

此外,在孩子开始懂事的时候,如果发现有某种性偏离的萌芽,就及早给予心理治疗,不要歧视、讽刺他们,这样,也许能防患于未然,大大减少继发性易性病的发病,即使成为易性病,因及时就医,庶几也可避免求助于变性手术。有知总是征服无知,科学终将战胜愚昧。

[开拓新的人生之路]

易性人在完成手术出院后,如何开始一种全新生活,还将面临很多挑战。他们劈头碰到的一个问题是:社会是否接纳他们?这是重新开拓人生之路的一个重要问题。医院可以给一个易性病患者以异性的身体,改变了他(她)的性别,但将来能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异性,真正幸福地生活,最重要的还是要靠全社会,尤其是亲人的理解和关心。同时,如何在手术之后以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和性别角色面对周围的人,确定周围的社会关系,这也是所有易性病患者必须正视的问题。

这里应当特别提出的是,变性人对其周围的环境是无害的。他们过去过着痛苦的生活,这种痛苦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周围环境对他们的排斥和压力。现在,他们本身的不幸已经消除了。我们的社会和周围环境没有任何理由对变性人进行排斥,为什么就不能给这群可怜人的一席之地呢?难道“文明”就意味着不断地给与主流文化不同的事物贴上“不文明”的标签来使自己显得更文明吗?我们应利用这种命运的优势来排斥那些不幸的人呢?还是应给予他们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呢?我们是忙着指斥他们为“神经病”、“流氓”以示自己的“清白”呢?还是应更多地关注他们的成长环境呢?正确的结论应当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有幸的是,在2002年,一些媒体编排了“2002年十大‘性’事”,将“变性手术后变更性别:社会开始接受变性人”当作十大“性”事之一。近两年来,媒体有关变性人的报道也多起来了:参加环球小姐大赛的,要拍电影的,结婚后发生婚变的……有资

料显示,目前全国约有 40 多万人要求改变自己的性别,而且已有几百人作了变性手术。变性人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群体,他们正在一步步走进人们的视野。

这是一件好事。它体现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体现出社会对易性人深厚的人性关怀。从 1990 年秦惠英公布她的变性经历至今,已有 15 年的时间。这 15 年来,中国的社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变性人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宽容,越来越理性,人的欲望、人的尊严、人的权利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社会从蔑视、轻视易性人,到接受、宽容易性人,体现出当今社会的一大变化。

从鄙视到宽容

自 1990 年到 21 世纪初,变性人的处境随着时代的进步有了明显的改善。我们的社会对他们表现了更多的宽容。截至 2004 年上半年,在何清濂完成易性手术的 154 例中,大部分人都找到了工作。有 14 人留在原单位工作,已被社会所认同。

这里,且列举一些材料,来看看他们(她们)是怎样走向社会的。

浦先生,自男变女,做手术时已 36 岁,职员,自幼就萌发变性欲望,自感低贱、下流而无法自拔,曾渴望结婚能使病情好转,在 27 岁时结婚,有一子,但浦某欲成为女性的心理丝毫未减。1991 年 11 月夫妻分居,他多次来医院门诊要求做变性手术,但何教授没有答应他。于是,浦先生 1993 年和妻子离婚,开始着女装,以女性角色投入生活,还要求儿子称自己为妈妈。1994 年 2 月自残,出现排尿困难,其离异的妻子出于同情和理解,多

次陪同他前来长征医院求医。1994年5月,何教授为他施行了变性手术,术后心态平静,判若两人,现在她从事美容工作,工作有创造性,生活得很幸福。

来自吉林农村的陈雪梅小姐,在2004年3月做了男变女的易性手术后,感慨不已地说:“最大的区别就是:我过上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不再被人骂作‘不男不女’,有了从前所没有的自信心。现在,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没有人再管我叫‘大哥’了,都叫我‘大姐’,而且叫得是那样自然,也没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这样的感受,几乎是每一个完成变性手术的变性人所共有的。

河北阜平县一位机关干部方宏伟在顺利完成了女变男的手术后,回到了家乡。他在1999年7月20日给何教授写来了一封信:“亲爱的何爸:转眼我回家已十多天了。昨天我已正式上班,回到单位。上至局长,下至职员,都对我表示欢迎和慰问,一点也不见外。我开心极了,可以说是一身轻松,一点压力也没有。周围的朋友和邻居也没有对我另眼相看,家里人也别提有多高兴了,但家里人在高兴的同时,也提醒我:一定要好好工作,替‘何爸’争口气!我现在白天上班,晚上去跳舞,生活得可舒坦呢!”

刘小姐做完手术来到了海南三亚做起了模特。开始很辛苦,大部分收入被老板剥削去了。生活的艰辛让她很难承受。后来,有一段时间,她曾经去娱乐场所做表演,虽然收入很丰厚,但她感觉自己不属于这个行业,她认为自己和人妖不一样,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很多观众也认为她是冒充人妖进行欺骗。不久她离开了娱乐场,开始做一名真正的T台模特,身边比较熟的同事基本上都知道她的经历,大部分都接受她,理解她,同

情她,也有羡慕她这种勇气的。她说,对那些不理解她的人,她的态度是远离他们。同时,社会上很多变性人成功的经历,也给了她很大的鼓励。现在她的收入也不错。她说,虽然自己很爱花钱,但挣的钱已经足够养活自己了。

黄恩岭于1998年与天长市一位秦姓姑娘领了结婚证,尽管妻子漂亮、贤惠,但少年时就有变性愿望的黄恩岭始终没有“碰”一下妻子,直到2003年3月,夫妻俩背着双方的亲人,悄悄地到天长市民政局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2004年初,秦姑娘与蚌埠市的陈先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当有人将秦姑娘产下一男孩的消息告诉黄恩岭时,由他变成她的黄恩岭高兴地说:“好啊!我真诚地祝福她!希望她全家幸福!”

最令人感动的,则莫过于一位易性病人要求做手术,却得到了单位的募捐支持。天津市一家百货公司有一位李姓售货员,她上有一个哥哥和姐姐,从小父母亲一直把她当作女孩子抚养,但在参加工作后,她以为自己是一个男人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到25岁时,她的例假也越来越不规律,于是,她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男人,并求治于天津第二中心医院泌尿科主任陈彦明医生,希望能为她做易性手术。陈医生为李小姐作了仔细的检查,发现她确是一位原发性的易性病患者。李小姐的父亲也坚决支持她做手术。李的父亲找到陈医生说:“您放心吧,只要我女儿愿意,怎么办都行。”1993年,陈医生决定为她做手术,但一个新问题接踵而至:需要手术费2万元。令人感动的是,李小姐所在的那家商场得悉后,在商场和下属的机构共2000名职工中,开始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捐款活动,一个星期后,共得到捐款1.7万元,做手术的费用基本得到解决。经过近一年的三次手术,李小姐终于如愿以偿,“李小姐”变成了“李先生”。李某出院后,他

所在的派出所也顺利地为他更改了户口本上性别和姓名,商场也为他安排了一份新的工作,他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当然,我们也不必讳言,有的易性病人走向社会后,要找一份适当的工作,还是很不容易。山东的高婷婷就是一例。高婷婷,曾用名高永贵,今年30岁,山东莒县人,曾当过三年兵,退伍后返回老家工作、结婚,有一对5岁的双胞胎女儿。1998年起,他开始着女装生活,由于经济条件限制,直到2003年才开始做了隆鼻、脱毛,未做变性手术。在此期间,高婷婷已和妻子签订离婚协议,变性手术成功后立即生效。2004年3月份,山东精神卫生中心为高婷婷出具了无精神病性症状的证明。5月12日,高婷婷只身来到南京,在一天多的时间内,高婷婷一连去了十多家招人单位,这些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在与他见面交谈后,都婉言谢绝了他。从人们怪异的神情中,高婷婷清楚地知道,自己之所以被拒绝,只不过是因为被对方察觉到了自己准变性人的特殊身份。类似高婷婷的经历,应当说还不是个别的。

女变男比男变女的处境要好

自2003年1月至今,何清濂又为42位病人做了易性手术,已先后出院,其中有28人是女变男,都找到了工作。我分析了他们的就业状况,得出的结论是:女变男的就业机会,要比男变女的好。

最令大家羡慕的是东北某市的一位女民警。当地的公安分局得悉其已确诊为易性病后,便十分支持其来沪做手术,并承担了全部医药费用。他现已高兴地出院,仍回原单位工作,做她



何清廉和他的孩子们在一起

心爱的警察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多次受到领导表扬,还加了两次工资。

在江苏某县小学任教的教师黄鸿在2002年5月15日告诉我,下周就可以出院,我不想回原单位工作了,自己喜爱写作,打算找一家杂志做点校对什么的,同时想写点东西。天津市的张梦云说:“我不想张扬我的成功,但新的生活已经开始,我要用自己的努力,去谱写我的生命史的新的一章。”

再来看看其他几位女变男的易性人的就业状况,也是很令人鼓舞的。

湖南某市的刘文英原是一个个体工商户,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女青年,生意做得很红火,30多岁了,还未成家,原因很简单:想变性做一个男人。她积了一笔钱,跑到上海找何教授,要求为她做变性手术,经过反复的观察研究,何教授在2003年初为她

做了女变男的手术。回家后,依然做她的副食品生意,赚了大把的钱,现已有四辆运输车。去年,他和一位女孩结了婚,婚后生活得很滋润,通过人工授精,今年3月,妻子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还买了一辆轿车。刘文英(现改名为刘伟)前些日子又给何教授打来电话,报告自己被评为2004年的所在的城市十佳青年。这个消息,着实让何教授高兴了好几天。

另一位变性人也是一位个体户,名叫潘益飞。他在做了女变男的易性手术后,和刘文英一样“飞”了起来。她原来是部队文工团的一位演奏员,个子不高,长得玲珑乖巧,有一对很好看的眼睛,镶嵌在一张圆脸上,模样十分讨人喜欢,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她擅长吹长笛,一笛在手,动听的声音就汨汨地流出来了。高山流水,余音绕梁,令人难忘。但是,令她揪心的是,她从小好动,天生的不安分,以为自己是个男孩,进部队文工团后,和大批男子汉工作在一起,她更为自己的“性别问题”而终日寝食不安。好不容易熬到复员,她便投奔做房地产生意的哥哥,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后来,潘益飞来到上海,在何教授那里做了女变男的手术。我见到他时,已成为一个英俊的小伙子。我问他:“感觉如何?”他调皮地笑了一笑,回答一句话:“感觉好极了!”他还说,变了性,人像头上去掉了一个“紧箍咒”,换了一种心态,浑身舒坦全身似乎有使不完的劲。他在大连有一条街的房产,有上千万的家产。他还花了一大笔钱,去加拿大办了移民身份,有了加拿大的国籍,两头跑跑,也在加拿大做点生意。有一天,变性人李小丽在他开的饭店和一群朋友见面,潘益飞开了一辆日本产的本田车来,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位。他对我说:“我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太太了。”我问他有没有合适的候选人,他笑笑说:“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谈了七年,后来送她

去英国留学,现在等待她学成回国。”

到何教授那里申请做易性手术的,还有一批在国外留学的青年人。他们在出国前就患了易性病,到了国外,高昂的医疗费用使他们进退两难,弄得求学不成,求医也不成。他们打听到上海有位何教授,医德好,技术精,纷纷从国外来信求援。何教授拿出一叠信给我看,有来自俄罗斯的,也有来自澳大利亚、新加坡的,言词同样恳切。何教授为其中一位做了女变男的手术。赵小月,20岁,杭州人,自费到澳大利亚留学,后发现患了严重的易性病。她想在澳大利亚做手术,但一打听费用,吓了一跳,需20多万元人民币。这对一个没有收入的留学生来说,是很难承担的。她来到上海,请何教授为她做易性手术,费用只有澳大利亚的十分之一。做了易性手术后,他的情绪正常了。后来考进了南京的一所大学,读了两年研究生,现毕业回到杭州,在一家公司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月收入有2000多元,虽然不高,但也心满意足了。

河南的邵后军在变性后的工作业绩,也为同龄人所羡慕。他33岁,1992年大学毕业。读的是冶金专业。2000年10月做了变性手术。在手术前,他在一家国营企业工作,月收入是3000元。手术后他想换个环境,休息了3个月,去苏州一家外资企业应聘,他的英俊的长相和出色的工作能力,一下子就被这家外资企业看中了。试用期的底薪是1500元,4个月后,工资加到7000元。邵后军在苏州买了房子,准备在这里扎根。有意思的是,她的主管是一位长得很漂亮的苏州姑娘,对邵先生很有意思,曾多次对他说,你的长相很像韩国的河莉秀,邵后军试探性地问她:“我要是真是女变男的河莉秀,你还能爱我吗?”女主管想了一想后说:“您别开玩笑。我妈妈要我至少生一个漂

亮的男孩。”邵后军听后默然。他决定不能把自己的变性真相告诉她。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工作,邵后军感到很为难。两年后,辞去了工作,又应聘到另一家民营企业做营销工作,底薪是5000元。老板对他说,做得好,三个月后再加工资。他现在的苦恼是,没有时间谈恋爱,在上海住院期间,他和这家医院的一位护士关系很不错,两人愿意发展关系,但现在工作实在太忙,谈恋爱也顾不上。

即使年纪大了,做了易性手术后,生命同样能发出光彩。陈又阳六十多岁了,是一位中学教师。她的经历很坎坷,从小失去了父母亲,讨过饭,以捕鱼摸蟹为生,因生活没有着落,到庵堂里做了尼姑,后来,她又被卖给一家人家做童养媳。解放后,她才有机会上学读书,在一所中学里做教师。她结了婚,丈夫待她不错,有一子一女,都已成家。按理说,她的人生经历应当说是无忧无虑了。但是,陈又阳随着年龄的增大,易性的愿望却越来越强烈,她热切地希望能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男人。有人讽刺她是“八十岁吃砒霜——活得不耐烦”,陈又阳大不以为然反驳说:“十几岁是十几岁的活法,六十几岁是六十几岁的活法。砒霜能治白血病,如果能治好女变男的易性病,我也愿意试一试。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应当是还我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了。”她来到上海的一家医院,何教授与她商讨了三年,最后为她做了女变男的易性手术:由她变成了他。变了性的陈又阳说:“这是我第二次解放。”他完成了易性手术后,即和老伴离了婚,但依然保持着联系,互相照顾,互相关心。陈又阳除了领取养老金外,兼做几份家教,也有一笔可观收入,生活也别开了新生面。他高兴地说:“现在人的寿命长了,我还有信心再活几十年,把前半生吃的苦补回来。”他还在公园里培训交谊舞,生活的乐滋滋的。

司徒梅英女士建了一家网站

2003年9月5日,何清濂在他自己的网站上,收到了司徒梅英女士的一封来信:

何爸:

您好!我是司徒梅英。手术后我的心情一直很好,现在工作学习都专心了,再也不会分心了。非常感谢您为我做了手术,使我能以愉快的心情面对生活。您的恩情真是不能用言词来表达。今天来信是为了告诉您,我的网站《司徒梅英小姐客栈》正式开通了,以前的域名还有待重新注册,等待注册后也可以重新访问。

中秋佳节快要到了,祝您中秋快乐。致以
崇高的敬礼

司徒梅英

2003.9.5

司徒梅英女士是一位男变女的变性人。她同时又是一个很早就钻研互联网的网民。1997年就上了网,水平不错。他出院后,心怀感激之情,在新浪网上开办了一个《司徒梅英小姐客栈》的网站,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现在全国的易性病人中,已经很有名气。这是全国第一家由易性病人自己办的网站,点击率很高。许多年轻的易性病人都把司徒梅英奉为最可信的知音和朋友,纷纷和她在网上交流。因为她还有一个重要身份——共产党员,许多同病相怜的病人,都很相信她,都把她奉为“意

见领袖”，她在网上很有号召力。

这家网站专门介绍有关易性病的知识和治疗方式，发布国内外关于易性手术的新闻，还介绍国内外探索易性病的最新成就。介绍易性病人在手术前后的心得感受，为病人之间的交流经验提供一个新的平台。易性病人在互联网上交流信息，互相关切，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全国各地的易性病人都通过这个窗口，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她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回报社会，受到了网友们的热烈欢迎。《司徒梅英小姐客栈》网站的点击率，在中国的私人网站中名列前茅，在全世界的网站排名是第八万八千多名，比她所在的杂志所建的网站的点击率要高出许多。

我也在网上浏览了这个网站，发现内容的确很丰富。于是，我约见了她，司徒梅英欣然接受了采访，并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她的话不多，但每说一句话，似乎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司徒梅英今年45岁了，人长得高高的，皮肤较黑，也是一头批肩的长发。她是浙江一所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获研究生学位，毕业后分配在安徽一家党校工作，当了十多年的党校教师，现在合肥市一家出版社当编辑，入党已十多年，已婚，还有一个儿子，她对工作认真负责，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但是，他患易性病已有二十多年，强烈地希望自己变成女性。看到秦惠英完成了男变女的新闻后，他重新燃起了新的希望，很快和秦惠英交上了朋友。同病相怜，两人有说不完的话。他专程赶到上海，找到何教授，向他倾诉自己的巨大痛苦。何教授考虑到他已婚并有了孩子，建议他慎重考虑手术，并提出，如需手术，应征得单位的同意。于是，司徒梅英主意拿定了，决不改变，他毅然走上了易性手术的手术台。

在做易性手术前，单位的党委书记找他谈了话，告诉他治病

是第一位的,如果何教授同意给你做手术,组织上同意医生的意见。做完手术后,党员身份不变,工作岗位不变,各种待遇不变。听了这番话,他感到了巨大的温暖。他对党委书记说,我是一个党员,做了手术,病治好了,我会加倍努力地工作,回报领导对我的信任和社会的帮助。在手术前,他对妻子说:我要去做手术了,真对不起你。对你和孩子,我有一种负疚感。妻子说:“你患的是一种病,那也没有办法。你对手术已作了长时间的思索和反省,那不是犯罪,而是治病,你去做手术吧!希望你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于是,司徒梅英果断地上了手术台。“他”变成了“她”。他做完手术后,和妻子协议离婚,孩子归女方抚养,司徒梅英担负孩子的生活费用。2004年3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见到了司徒梅英女士,并作了倾心长谈。她现在留了披肩发,一袭黑色长裙,脚穿一双长统靴,人的身材显得更加修长。司徒梅英女士对我说,易性这个毛病真是怪,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就是想变性,不变实在不行,生不如死。现在做了女人,心里透亮,特别舒畅,有幸的是,我所在的单位的同事们都很理解我,谁也没有对我另眼相看,组织生活照常参加,工作效率提高了许多。2003年,她因为工作出色,年终奖拿了三四万元!我问她,今后是否打算再结婚,她告诉我,现在已40多岁了,把病治好了,下半生可以活得舒服一些,结婚的事,不再想了。

她办的《司徒梅英小姐客栈》网站,本早已注册了,因为住院做手术,耽误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出院后,发现他的网站的域名被别人抢注了。她只得另换现在的名字。为了办这个网站,她投入了很多精力,在经济上还有一笔不小的支出,但她心甘情愿。司徒梅英女士说:“只要对病友们有帮助,不要让他们再在

黑暗中摸索,我花一点时间和支出一些金钱,也是值得的,尽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好在现在没有了家庭的牵累,时间也多了。做一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我感到非常幸福。”

司徒梅英现在的心病还有两个:一个是学位证书上的身份不能改,做完手术后调到新的单位工作后,原来的职称也没有了,一切要从头开始。她建议,如要作变性手术,确诊了就要早做;二是她十分疼爱自己的女儿,总觉得有点对不住女儿,司徒梅英决心不让独生女知道爸爸已成了“妈妈”,因此在这几年内不打算和女儿见面。我问她:是否考虑整一下容,这样会更好些。她表示:现在还不准备整容,她还和女儿保持着电话的联系,女儿还不知道爸爸变成了“妈妈”。万一女儿来探望爸爸,发现爸爸成了“妈妈”,怎么对女儿说呢。她的女儿和已离婚的妻子生活在一起。女儿只知道父母亲因“感情不好”而离了婚,但不知道爸爸和妈妈离婚的真实原因。夫妻两人也商定,待她再长大一点,才把真相告诉她。司徒梅英又很想见到女儿,想得苦了,便通过看照片来缓解自己的思念之情。

李小丽在上海开了两家餐馆

几年前的一个上午,我约了六位做了易性手术的朋友,到何教授处见面,大家叙叙旧,他们谈得很热乎,三个小时很快地过去了,何教授提议去吃韩国特色烧烤,我们一行八人来到本市西区的一家餐馆。在路上,何教授告诉我,这家餐馆的店主,就是那位宁可跳楼也不愿结婚的李小丽开的。她在父母亲的陪同下,于1999年1月来上海做完了第三次易性手术后,便在上海开了这家餐馆。他多次邀我到餐馆作客,一直抽不出时间。李

小丽在电话中多次埋怨何爸是“有了孙子，不管儿子”。这一回，我们大家去看看他，顺便也在那里吃顿饭。

这是一家刚刚装潢一新的小餐馆，三开间的门面，营业面积近200平方米。站在我们面前的李小丽，现在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身材魁伟，1米74的个头，理一个平顶头，戴一副眼镜，说话爽直，显然是“名”不符实。他和我握手时十分有力。何教授向他介绍了我和秦惠英。李小丽对秦惠英说：“见到你真是十分高兴。我是看了关于您的报道后，才从遥远的东北来上海找到何教授的。我和何教授是相见恨晚。”又对我说：“您写的《变性的困惑》一书，在我们这群人中影响很大。”我问李小丽：“出院后感觉如何？”他掩饰不住喜悦的心情说：“我有一种重新做人的感觉，一家人都为我高兴。爸爸放下了手头的活儿，到上海来帮我开了这家餐馆。”李小丽的父亲告诉我，换一个环境，也许对他事业的发展更有利些。于是，一家人筹集25万元，到这里开了这家餐馆，并另租了一套住房，李小丽和爸妈住在一起。他的女朋友王小姐也从外地来到上海，帮他料理店务。菜是韩式烧烤，有许多特殊的调料，都是从韩国买来的，烧烤的肉都很新鲜，也很入味。当时在上海，韩国烧烤店不多。我问生意如何？李小丽说，附近是虹桥开发区，美国、韩国、日本、台湾的客人不少，因为刚开张，知名度不高，收支只能持平。韩式烧烤的味道不错，大家都吃出了一头汗。

隔了三年，李小丽又在上海市中心开了第二家餐馆。这是地道的东北菜馆。2004年2月29日，我和何教授一行十人，又第二次应邀到他家餐馆作客，品尝他的妻子做的东北菜。餐馆面积不大，楼上楼下，面积约30平方米，只可放七八张桌子。三年多前帮助李小丽开第一家餐馆的女朋友王秀惠，现在成了他

的妻子,兼任餐馆的主厨。李小丽告诉我,上一家餐馆因为缺乏经验,亏了十几万,后来关了门,新开了这一家。这家餐馆的租金便宜,每月才2000元。现在,一天的营业额不少于2000元。店里雇了四个服务员,生意很好。今天来的客人都是何教授的“儿女”们,有苏州、杭州、连云港特意赶来的,也有从新加坡来的,李小丽一家显得特别兴奋,要露一手,好好招待客人。

李小丽的妻子亲自给我们做了八菜一汤。有东北大拉皮,酸辣鱼,炸蚕蛹,怪味羊肉,还有狗肉白菜汤,香辣鲜美,菜很入味,是地道的东北菜。饺子皮是李小丽亲自擀的,馅有韭菜肉和羊肉两种,皮子很有咬劲,馅儿鲜美。临走时,他还给每人带走一大盒饺子,回去与家人共享。李小丽既有东北汉子的豪爽,又有女性的细腻。何教授还告诉我,年初一,李小丽还放下了店里繁忙的营业,一大早,就赶到他的住处,为“何爸”一家包饺子。他说:“按东北人的习惯,这是小辈给长辈尽一点孝心。”

上海有不少东北人,东北餐馆很少,上海人吃惯了广帮菜和杭帮菜,很想尝尝新,东北菜是投其所好,因此生意火爆。情人节那天,到了凌晨三点还收不了场。这家开设在江苏路的饭店在上海的东北人中已小有名气,每天中午也是座客常满。餐饮行家们说,看一家饭店生意好不好,晚上好不算好,中午生意好,才是真的好。李小丽对我说,这家店只投资5万元,到2004年年底就可以全部收回投资。现在最大的困难是厨房太小,顾客来多了,应接不暇。待条件好一些,准备扩充一下店的门面。李小丽夫妻还悄悄地告诉我,待生活安定下来了,他们考虑要一个孩子。现在,店里养了一条小狗,看见客人进店吃饭,尾巴摇个不停,很讨人欢喜。李小丽专门买了狗食喂它,天热还亲自给它洗澡。每逢易性病友在上海聚会,他总是豪爽地邀请他们到自

己的饭店吃饭,分文不取。秦惠英几次要“埋单”,李小丽都大声说:“你们难道能把我这个店吃穷了?谁要付钱,今后就别进门来。”

在足尖下跳出一片新天地

男变女后事业有成者,不能不提到金星。

著名舞蹈演员金星 1995 年 2 月在北京医科大学整形外科医院做了男变女手术,当时她已 28 岁了。当她走向手术台接受变性手术时,感觉整个身心得到释放。她说:“我当时看到手术室里白晃晃的照明灯都备觉兴奋。”金星透露,当初做手术时,她特意请朋友张元及两位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拍下了手术的全过程,“我只想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不过我并不想把它公之于众,用于宣传炒作。”

变性手术获得了成功。做完变性手术后,她重新回到了钟爱的舞台上,更加心情舒畅地跳舞,跳啊跳,在脚尖下跳出了一片新天地。

金星少年成名。她的生命历程是由一串动人的数字和业绩组成的。她 9 岁考入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1984 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1985 年获中国舞蹈大赛桃李杯少年组第一名,1986 年获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优秀演员奖,1987 年考入广东舞蹈学校现代舞试验班,次年获得全额奖金赴美留学。1990 年金星参加美国舞蹈节演出,获“最佳编舞家”称号。1992 年任比利时皇家舞蹈学院教授,创建比利时白风现代舞团。1996 年 1 月与北京市文化局联合创办北京现代舞团。这期间为成方圆独唱音乐会《蓝色风情》和大型音乐剧《音乐之声》担任导演,并主演

了话剧《断腕》。此后,她还举办的现代舞专场有《红与黑》、《向日葵》等。1998年8月,《红与黑》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的文华奖。

少年得志,青年有为,对金星来说,可以说是心满意足的了。但是,在1995年前,金星还有一个心愿未了,那就是想变性,变成一个朝思暮想的女孩子。她曾这样说过:“我是一个生活在男人躯体里的女性。”她从6岁起,就认为自己应当像姐姐一样。上厕所时就想:我早晚也要到那边去。在美国留学时,她从媒体上得知信息:男变女是可以办得到的。1990年上海秦惠英的变性成功,更增强了她的变性决心。金星把自己的想法和当军人的父亲沟通,原以为会遭来一顿痛斥,不料父亲平静地说:“总算对上号了,从小看你就像个女孩子。”妈妈也同意了她的变性的请求。

“对上号”的金星换上了向往已久的女装,活跃在现代舞的舞台上,尽情地跳着,越跳越好。变性后的金星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由自己名字命名的现代舞蹈团,并出任团长和艺术总监,如今她已定居上海。

在她的生理性别改变以后,她的现代舞风格有了明显的变化。有人问她:这是否与她的生理变化有关?“没有关系。”金星斩钉截铁地否定,“艺术风格的变化与年龄和经历有关。一个人在40岁时说的豪言壮语或者‘我爱你’,跟18岁时说出的,从语气到意味,都有着天壤之别。”2000年11月30日在北京中央歌剧院演出的大型音乐舞蹈清唱剧《布朗寺院之歌》中,金星为这部有中世纪风格的音乐作品担任编舞并演出,与我们惯常认可和看到的现代舞大有不同的是,金星在编舞时充分照顾到整台节目的风格,演出中她身穿中世纪服装,眼眶红红的,

脸上白白的,看不出本人长相。在舞蹈动作上金星借助中国的太极拳、西方的舞蹈,并运用象征性的道具,手中拿着用颤动的铁丝挑着的白纱帐,在舞台上飘来飘去。舞者们一改以往现代舞给人的只是硬线条的伸胳膊伸腿的旧有模式,呈现出下肢力量像西方的芭蕾、上肢力量像民族的软线条舞蹈,同时通过奔跑等运动之后产生很强的冲击力,让人感觉很有力度。2001年1月25日,由她主演的大型现代舞剧《永远的现在时》在上海商城剧院首演。据悉,300元的高票价并没有影响上海人对她的热情,两场演出票基本售完。2004年春节,金星带着她自编并主演的现代舞剧《上海探戈》在法国巴黎上演,一炮打响,好评如潮。这一年,正好“中国文化年”在法国举行,《上海探戈》这出舞剧接连到马赛、里昂、布鲁塞尔等七个城市演出,连演了13场,为中国文化年增添了瑰丽的色彩。

变性后的金星已到了谈婚论嫁的日子。金星有一对漂亮的“丹凤眼”,加上两条柳叶眉,显得分外妩媚动人。在谈到她的择偶标准时,金星说:“我非找个外国人不可。我不是对中国男人不感兴趣,而是像我这样有着特殊经历的人,要是找个中国丈夫,会让他活得很累,因为文化观念不同,中国男人很在乎别人怎么看他,而外国人更注重自身感受,为自己而活。”现在,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心上人,他的身份是法国公务员,一半是意大利人,一半是法国人,金星和他是在一个法国商场里偶然相识的。他对金星一见钟情,认出了她是一位有名气的中国舞蹈演员,并对金星的趾高气扬的神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3年他们订了婚。金星在法国也有房子,每年会上那里住上几个月。说起外国的公婆,金星也是乐不可支:“哎呀,我的公公可喜欢我了,婆婆有点不满意,说怎么找了个这么特殊的中国女人。我的男

朋友回答他妈妈：正因为有点特殊，我才找她啊！不特殊我才不要呢！婆婆于是无话可说。”

变了性的金星已做了母亲，而且成了三个孩子的妈妈。不过，这三个孩子都是领养的弃婴，两男一女，名字叫嘟嘟、妮妮和小三。与其说是金星突然选择了做母亲，不如说是从天而降的孩子选择了金星。第一个孩子是金星的妈妈在医院里捡到的弃婴。这对于金星而言，她的变化已经开始：从男人变为女人，再从女人变成母亲，金星完成了又一次超乎常人所能想象的角色转换。有了第一个，一发而不可收拾，又有了第二个、第三个。突然做了母亲的金星，她的生活方式是否有所改变呢？金星坦言，当然有改变，但对自己的工作影响不大。孩子的到来对自己情感是有着很大影响：和男人在一起的时候，自己心中会产生女性的温柔，但这种感觉和被一个小生命所激发出来的母性显然有所不同。“每次抱他在怀里，我都会立刻浑身发软。经过33年风雨吹打的身体，由于他们而完全融化掉。”“所有的生命都是残酷的，但是生活的过程是美丽的，我想我的孩子会和我一起来明白这一切。”

金星待孩子们可好哩。每逢出外演出，还把她们一起带上，请一个小保姆照顾她们的生活，在去北京的软卧上，有的乘客看见这种情景，就断言这一家子，肯定是一个大款包养的，否则，怎么生了这一堆孩子。金星听了暗暗好笑，想你们才不能理解呢，我这个单身妈妈住在上海，有一幢小洋房，开辆甲壳虫汽车，还请了两个阿姨，这完全不是靠别人，而是全靠自己的两条腿跳出来的。金星既做母亲，又做父亲。她本来就忙碌，如今更忙了。但她很开心，因为多了一分牵挂，生活就多了一分充实。

一分为二看“人造美女”

2004年12月18日晚,一场精心策划6月之久的“人造美女大赛”,终于在北京红馆落下了帷幕。20名“人造美女”在见面会上依次亮相参赛。参与者,有不少人是变性人。冠、亚、季军分别由冯倩、张爽、陈莉莉获得。变性人刘晓晶和来自石家庄的62岁的奶奶级“人造美女”刘玉兰分别获得最佳新闻奖。

哈尔滨选手刘晓晶身穿蓝色晚礼服,体态妖娆、举止婀娜,谁也不曾想到她曾是须眉男子,在2004年9月才做了变性和整形手术。刘晓晶说:“现在我没觉得有什么压力,只想通过这次大赛实现做女人的理想。”

对于这场比赛,人们的看法不一。有人说:“什么人造美女大赛,又是在做秀。”“如今的美女大赛一个接着一个,其实就是用美女做招牌来刺激眼球,赚赞助商的钱,赚美女们的钱”。

随着社会的进步,许多易性人和陈莉莉一样,大大方方地走入了人们的生活,她们并不讳言自己易性的经历,甚至敢于将易性作为一种引起人们关注的手段。拍电影、参加世界小姐的选美比赛和参加人造美女大赛,都是一种融入社会的手段,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做秀,的确是显然的。但做秀,也不宜全盘否定。在市场经济社会里,美女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著名性学专家、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银河说:“人造美女大赛能够举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整容业以及美容业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心理的变化。”安徽的黄宁倩,她供职于南京一家化妆品公司。最近,听说2005年5月2日将在合肥举办全国黄梅戏大赛,目的是为了纪念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诞辰75周年,弘扬黄梅戏

艺术。她是一位黄梅戏票友,立即在电话里报名参加。2005年4月26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黄小姐坦诚地说:“我报名参赛,目的不是为了拿什么奖,主要是想会一会严凤英老师的著名弟子和黄梅戏名角。”黄宁倩此举并不排除她有扩大知名度的意向,若能如愿,我看这样做也不坏,至少还可以消除人们对变性人的某种偏见。一分为二看这个问题,我们对于变性人参加人造美女的比赛,也要持宽容的态度。

但是,对有些经办人和某些整形医院而言,我们也不容讳言其商业赢利的动机。李银河又指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里的爱美,指的是自然规律先天造就的美,而非后天刻意制造的人造美。由人造美女参加的选美比赛,必将以更加极端的方式,对更多原本清纯健康的女性构成致命的蛊惑,诱使她们把大把大把的钞票投进整容医院老板的腰包。”“社会应该警惕这种极端美的现象,警惕对容貌与体型的规范。在人造美女大赛的引导与暗示作用下,社会上将会形成一股强劲不衰的整容时尚,从形形色色整容医院走出来的女性,一小部分人可能在人造美女大赛上一炮走红,但大部分人的成功梦终将归于无形,另有一部分人则可能遭遇整容失败成为可怜可叹的牺牲品。”这样的提醒,我以为也不是多余的。

全国性的选美和模特大赛在2004这一年就举办了30多次。如果把各省市的选美比赛都算进去的话,至少也要达到上百次。东方宾利文化发展公司董事长姚戈说:“十天一场全国大赛,三天一场地区比赛,如此之频率,选美大赛还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模特行业委员会王涛也说:“选美赛事多如牛毛不是好事。十天一个全国冠军,三天一个地区冠军,如此容易的冠军头衔,又能有多少含金量呢?毫不客气地讲,如此王牌,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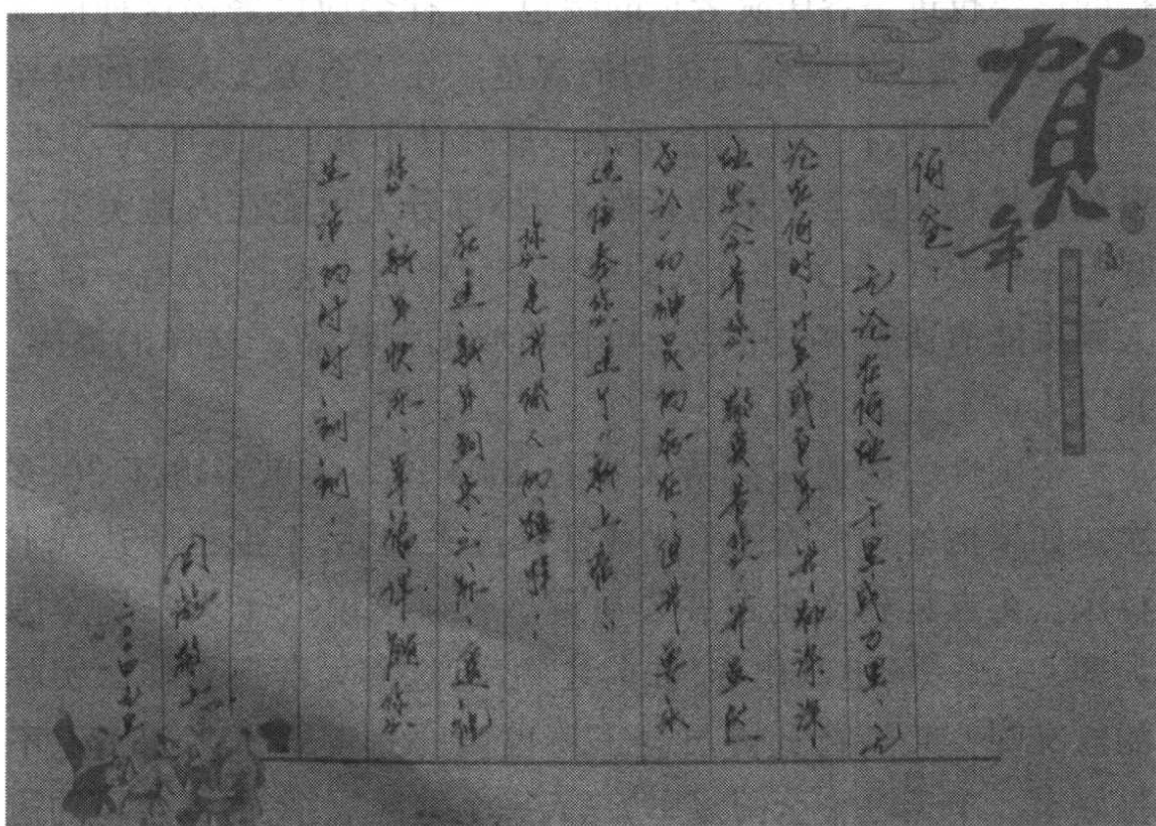
不值!”因此,我们也不要过高地估价选美大赛的作用。许多变性人获得了一个什么冠军之类的称号,到头来,对她的求职可能不会带来更多的帮助。

何清濂的最大欣慰

对何教授来说,他的最大的欣慰,莫过于在逢年过节时病人对他的祝福。

在新年来到时,他的108个“儿女”,从天南地北纷纷给他来信来电,致以节日的问候,致以节日的祝福。一封封贺信和贺卡,寄托了“儿女们”对“何爸”的一片深情和厚爱。

在何教授的家里,我见了按年序分门别类地放着的一包包



康复出院后的病人给何清濂写来感谢信

贺信和贺卡。这是何教授最珍爱的东西,平时不轻易示人。经我的请求,他给我展示了其中的一部分。

2000年元旦署名“孩儿”小林来信道:

“叫您一声何爸,我心中充满自豪。有您这样一位父亲,是我今世之福。认识您至今,受到您关怀的细节种种,已一言难尽。但我一直觉得,您就是我的重生父母。因为,天下只有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才会是这样。我们已构成了您的生命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已远离了那噩梦般的生活,满怀渴望地计划着新的人生。感谢您,何爸!您不仅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还给了我许多丰富的思想。只有经历了这个手术的痛苦的患者,才会深深感到做这个手术的医生的伟大。我明白,您的双肩已扛得太多太重,每当想起您那一双慈祥的眼睛,我就告诫自己: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一定不要轻易言苦,我要坚强不屈。”

河南大学的刘素霞 2003年12月17日早晨写来《给您拜年——谨以此诗送给挚爱的何爸》:

我的老人,
又是一年,
我在远方给您拜年。
山山水水几重阻,
阻不断我对您的思念。
此地腊梅花香,
一定也香到了江南,

沪上有您花儿独灿。

我的老人，
又是一年，
我在远方给您拜年。
深冬里地冻天寒，
您可记得加衣，
您可记得添衫。
您永远安康，是我最大的心愿。

黑龙江哈尔滨市房地产局的周游在 2004 年元旦写来贺词：

“何爸：

无论在何地，千里或万里，无论在何时，十年或百年，我都深深地思念着您！敬爱着您！我虽然否认一切神灵的存在，但我要永远陪奉您这个‘新上帝’！

您永远是我做人的榜样！

在这新年来到之际，遥祝您：新年快乐，幸福伴随您生活的时时刻刻！”

广州市缘缘美容器材公司的欧阳立戈也在 2004 年春节前寄来了贺卡：

“何爸：

您还好吗？

天之角、地之涯——

难忘何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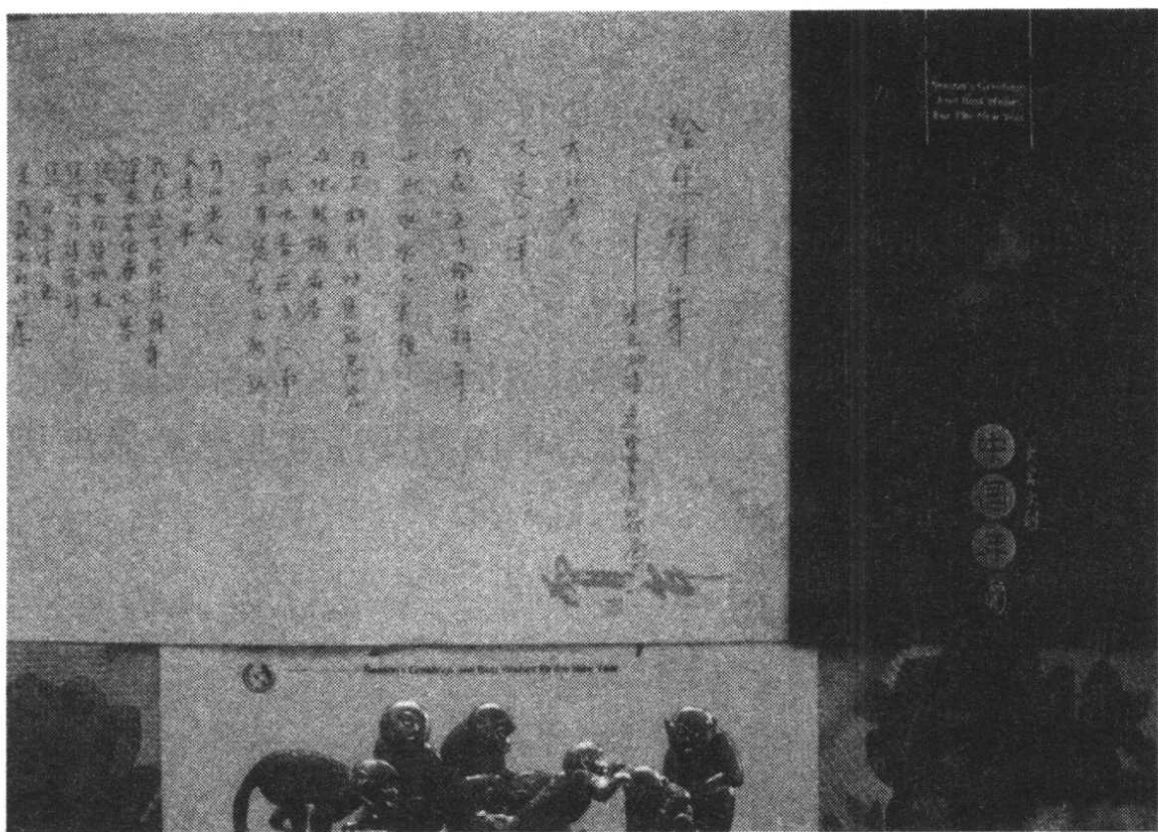
祝您：

新的一年万事如意健康长寿

儿子欧阳立戈”

日本名古屋市的大矢洋子也寄来贺卡。洋子是日本人，她原在新加坡读书，来上海做了男变女的易性手术后，又回到了日本。2003年新年也给远方的中国亲人寄来了祝福：

“您是我的再生父亲，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大海，挡不住我对您的一片崇敬之情。”



何清濂的孩子给他拜年

何教授的生命之树常青。浇灌这棵生命之树最有营养的材料,不是金钱,也不是荣誉,这些东西他早已置之度外。他到411医院上班,没要医院派车接送,也不愿意打的,78岁的高龄,仍乘公交车上下班,经常是早晨6时30分前就出门,为的是避开公交车的拥挤高峰。惟有一样东西,他最不能忘却,那就是病人对他的祝福。14年时间不平常,何清濂为154位易性病患者解除了痛苦,无一例失败或留下后遗症。这自然是一个十分可喜的消息。但是,154例与十几万的病人相比,毕竟是一个很小的数字;而且何教授年事已高,这项医学科研事业迫切需要培养接班人。我们的科学家们,应该像何清濂教授一样,有义务让这些“边缘”人感觉到更多更亮的科技之光。为了帮助这些人获得公平的待遇和理解的目光,科学家们更有义务去进一步探究易性病形成的原因、历史上的传统、预防或治疗的方法,并广而告之,以正确引导大众的态度和行为。我们应当有更多的何清濂。

十多年来,没有立功、授奖,没有掌声、鲜花,他按着自己的立言行事:“人民养育我,我为人民多干活”。为了新兴的变性医学事业,摸着石头过河。他默默地拖着中风后发麻的腿,慢慢地走着。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为中国的变性事业继续做出贡献,造福于民。

[看一看世界的新潮流]

在现代社会中,变性人常与同性恋归为一类,认为他们是精神扭曲,追求一种变态生活的特殊人群,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外科手术水平的提高,加之人权观念的日益深入人心,易性已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韩国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该国有 51.3% 的成年男女认为“可以根据个人情况进行变性手术”。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特立尼达镇,全镇居民共有 9500 名。这里气候宜人,风景如画,居民和善,号称“世界变性之乡”,因为迄今为止已有 4500 位患者在这里做过变性手术,为全球之最。在美国,易性人的权益相对而言,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保护。

旧金山市政府资助公务员做易性手术

美国旧金山市政府及市长已签署一项开创先河的法令,将易性手术费用纳入公务员的医疗保险范围内,受聘满一年有需要易性的公务员,可以享受高达 85% 的手术费津贴,而旧金山则成为全美首个提供这类保险计划的地方政府。当地人权委员会一位歧视问题调查员指出,旧金山市政府的现行福利制度,为女性雇员的子宫切除手术及药物治疗提供医疗保险,却对通过手术改变性别雇员拒之门外,“这无疑是一个民权问题”。现在,这个规定随着将易性手术费用纳入公务员的医疗保险范围内而改变,美国旧金山市政府已写下历史的新的一页,成为全美唯一提供公务员易性手术津贴、不允许对做过易性手术的公务

员歧视的城市。

旧金山市 3.7 万名公务员中,现有 14 位是变性人。该市的易性概念是比较宽泛的,包括易装癖、行为异性化、变性人、人妖和先天双性(阴阳人)等不同类型。要动手术而需要申请变性医疗津贴的人,必须先接受彻底医学评估,评估期最长可达半年。在职一年以上者才能申请补助,上限 5 万美元(40 万港元)。当地由男变女的手术平均需 3.7 万美元(29 万港元)的费用,由女变男的费用则相当昂贵,达 7.7 万美元(逾 60 万港元)。由于当地几乎没有人反对有关措施,因此为争取这种福利长达五年之久的人权机构相信一定成功,使旧金山市成为全国唯一津贴公务员易性的城市。

在此之前,明尼苏达州政府曾提供易性补助,但该项计划在 1998 年终止。俄勒冈州也曾讨论过类似的津贴法案,但也在 1999 年遭封杀。这项法令已于 2001 年 7 月 1 日生效。这样一来,易性手术在美国更为合法化了。易性病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进一步的保护。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海外,变性人的权益倘若受到了侵犯,他还可以把侵犯者告上法庭。2003 年 8 月 12 日,英国五名由男变女的变性人在约翰·果索普在北安普敦郡经营的红狮子旅店中借宿。但是,当“她们”当中的一人使用了该旅店中的女士卫生间时,旅店老板果索普勃然大怒,将她们统统从旅店赶了出去。她们便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指控 53 岁的旅店老板对“她们”怀有性歧视态度。但是,她们在此案中败诉。负责审理这起案件的查尔斯·哈里斯不同意这五名变性人在讼词中所表达的观点,当时旅店老板果索普之所以把这五名变性人赶出红狮子旅店,是因为将“她们”看成穿着女人衣服的男人。在牛津地

方法院宣读的一份判决书中,这名法官表示:这五个变性人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仍然是法律上所界定的男性,而“她们”当时在旅店中的行为使其他的消费者感到不安。

另据新华网报道,一名变性人起诉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要求该航空公司赔偿5万美元。这名变性人声称,机组人员将他赶下飞机,并要求他登机时换上男装。这名变性人名叫理查德·沃德,当时他正准备搭乘一架从奥马哈市飞往芝加哥的班机。该机机组人员认为,沃德的护照显示是男性,所以沃德应该下机去换上男装。但沃德振振有词地说,他向机组人员出示了医生的诊断证明,证明上解释说,由于沃德正在接受从男性到女性转变的治疗,所以身着女装对于他来说是完全正常的。沃德说,尽管如此,机组人员还是拒绝让他登机,除非他打扮得和护照上的照片一样。这场官司的下文如何,还不得而知,但即此一端,也可见易性病人的人权,在许多国家是不允许任意侵犯的。

这一点,在影视作品中也得到了反映。如果说,在若干年前,达斯汀·霍夫曼在《宝贝》里装扮成女人,还只是明星们的一种“创新的独白”,偶一为之,却奉为至宝。那么,到了2000年,电影里男变女、女变男,靠性倒错的招数寻求事业或票房突破,已经成为了一股流行的时尚。没名的演员靠“变性”出名;有名的演员靠“变性”更上一层楼。银幕上有“变性”的片子不是得奖就是票房火爆。有不少演员靠演变性人得了大奖。反映变性人的生活比在银幕上一脱了之还要吃香。2000年,美国女演员希拉里·斯万克在《男孩不哭》里演个成天穿着男装的假小子,凭此角色她夺走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有人开玩笑说,评委们是不是搞错了,应该给她颁一个最佳男主角奖才对呢!

阿根廷 50 岁的“女人”要变男人

如果说荷兰堪称欧洲最开放的国家,那么,拉丁美洲的阿根廷现在也迎头赶上了。这里不仅批准过堕胎、同性恋婚姻,2005年4月22日,这里又传出了一则新闻:经法院判决批准,为一位50岁的妇女实施了易性手术。

这位妇女没有透露她的名和姓。她从出生到现在,就萌发了变性的愿望。青春里,又因为“她”的男性化的举止神态而遭到同学们的欺负。在25岁时,她彻底告别了女性的打扮,改头换面地成了一个男人。她离家出走,与女友公开同居,并为自己取了个男人的名字,这样一直过了二十多年。到了50岁那年,她实在忍无可忍,决定再向前迈进一步,即通过向法庭寻求支持,请求实施易性手术,从而在法律上和生理上都变成一个真正的男人。

在阿根廷,易性手术不是想做就做的,必须经过法律的批准。“她”的请求提交法院后,法院对她作了多方面的取证和测试,并围绕这一案件做了大量合理性的论证。法院调集了一批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对当事人进行了严格测试,既有形体测试、心理测试、人格投射测试等专业测试,也有颜色测试等精神方面的普通测试。测试的结果和她的要求完全一致:这位妇女无论心理还是大脑器官都没有显示出任何女性的特征。她同时呈现出易性病的典型特征,要彻底根除这个毛病,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做变性手术。

4月22日,马德普拉塔市的第三法院法官盖莱在此案进行口头辩论后宣布:法庭鉴于当事人长期以来在人格尊严、个人主

权、私生活、个人身份等方面都遭受歧视,需要通过外科手术来完成其性别的再鉴定。因此,批准当事人施行必要的外科手术,以协调其女性生理特征与其体内的男性基因。

在接到代理律师的电话后,这位已获得法律支持的50岁的“女人”非常高兴。他说:“我知道作出这个判决对于法官来说,不是一件平常事。我实在无法表达对他的感谢,这次手术对我的一生来说将是决定性的,它会帮助我实现重新组建家庭的人生计划。”在阿根廷,开了这样的先例后,一大批要求变性的病人将可以堂堂正正地走进医院。

英国也为变性开了绿灯

英国人对变性手术一向比较保守。素以绅士风度著称的英国人一直看不起易性病人。英国和爱尔兰是欧盟中唯一拒绝让变性人更改出生性别的国家。英国的法律还规定不准变性人结婚。

据报道,英国现约有5000变性人,他们的日子不大好过。长期以来,他们(或她们)在作了变性手术后,不能更改性别身份,不能领取养老金,生活也得不到基本的保障,这使他们(她们)感到十分苦闷。由女性变成男性的惠特尔说,他的伴侣经由人工授精生下孩子,却不能领养孩子,这很不公平,他们很痛苦。惠特尔称,法律上他是个女人,但法律不允许他结婚,这更让他苦恼不堪。惠特尔认为,他有权利当父亲,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政府阻止他获得这种权利,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于是,惠特尔在1997年向欧洲人权法庭提出上诉,欧洲人权法庭将了英国法院一军。2002年7月,斯特拉斯堡法庭裁决

这两名英国变性人胜诉。辩护律师说,英国现有法律规定不能更改出生性别的做法,侵犯了变性人享受家庭生活和结婚的权利。这个裁判对英国的法律是一大冲击。经过许多维护人权人士的努力,英国政府终于改变了对变性人的法律规定。在2002年年底,英国终于宣布一项司法改革,使英国的法律和欧洲法律一样,允许做过变性手术的人更改性别,甚至能正式结婚。

据《北京晨报》驻伦敦记者张晓2002年12月17日报道,英国新闻界爆出一条颇有意思的新闻。北约克郡警察局首次向外界证实,该局一名英姿飒爽的女警官——兰姆,原是一位男子。

为此,她举行了30分钟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这名警官原名叫克里斯。49岁的兰姆身着绿衬衣,灰色裙,面带微笑。兰姆在北约克郡警察局通讯部工作了26年。由于英国一份销量很大的小报将公开兰姆的身份。于是,警察局抢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兰姆原来是男人”。局长肯沃西说:“我们对兰姆的表现感到非常满意。”与此同时,警察局顾问安德森还公开另一名在北约克郡警察局工作的变性人警官的身份,以及另外两名在艾塞克斯工作的变性人警官。她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她们都是我们警察队伍中的一员。”

做过变性手术的女子也能当警察,这在英国历史上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皇家空军最近涌现出的第一位变性人。“他”原来的名字叫埃克里·库克森,现在则称“她”为卡罗琳·佩奇。卡罗琳·佩奇在手术前是皇家空军的直升机中尉驾驶员,是一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蓝天雄鹰”。2004年,39岁的佩奇“摇身一变”后,成了一个大名人。英国《太阳报》对她进行了采访,还专门配发了其变性前后不同面目装饰的照片。佩奇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自己对女儿身的渴望实

实际上由来已久,只不过在 1980 年刚刚参加皇家空军时,由于内心深处的情感无人察觉,因此未遇到什么麻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两年前,情况开始变得糟糕起来。佩奇回忆说:“我意识到,现在的状况并不是我自己真正想要过的生活。”库克森终于下定了决心改变现状,并大胆地提出要求手术变性。在这一要求得到同意后,库克森还获准在手术前的过渡期内穿戴女性服饰。从埃里克·库克森转变为卡罗琳·佩奇的手术,耗费了 1.8 万英镑,这笔费用完全由他自己承担。但是,她在完成变性手术后,又迫不及待地想重返蓝天。但来自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佩奇能不能继续胜任驾驶直升机,还需等她接受严格的医疗检查后才能确定。

不过,英国政府的政策改变还有点吞吞吐吐,还是有所保留的。英国专家称,新通过的法律有附加条件,一个可能性是坚持要变性人绝育。

无独有偶,西班牙军方也在最近同意一位变性人继续留在军中服役。据中国新闻网 2004 年 3 月 28 日电,西班牙军方近日首次批准变性人在军中服役。据称,这名“自 14 岁时就感觉自己是个女人”的下士已向上司提出,“希望停止掩藏和过双重生活”。后来,西班牙海军法庭对这一个案进行了审判,判决军方应继续赋予一名变性人以正常士兵的权利。

海外奇谈真是多得很。更有意思的是,英国有个男变女的变性人,找了一个侏儒做丈夫。罗伯特是一个马戏团小丑,身高仅 3 尺 6 寸,他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遇到了身高 6 尺 3 寸的巴士女司机黛比,她是一个变性人,两人一见钟情。黛比和罗伯特的第一次偶遇,是在黛比进行最后一次易性手术之前。当时黛比身穿一条长裙,打扮得像一个女人。黛比说:“当我第一眼看见

罗伯特时,我并不觉得他是一名侏儒,在我眼里看到的是一个令我仰慕的男人。”黛比又说:“我们倾谈了一会儿,我便觉得与他有一见钟情的感觉。虽然我们的外形差距很大,但我却毫不介意。”

他们交往了一段时间后,彼此发现,倘若失去了对方,一天的生活就过得没有滋味。罗伯特感叹地说:“我不能想象,我若失去了她,怎样才能活下去。现在每一天都有她陪伴在我身边,这是上天赐给我最好的礼物。”还说:“起初我也很担心黛比不会接受我,但最终我鼓起勇气与她交往,因为我知道,她便是我一直想要找寻的理想妻子。”于是,罗伯特鼓起最大的勇气,借故搭乘黛比的巴士,邀她外出旅行。在往后的数星期里,他俩频频约会,罗伯特甚至拒绝其他女孩子的约会。几个月后,两人开始同居。因为英国的法律不容许同性或变性人结婚,他俩只请来了一些亲戚朋友吃饭作为庆祝。虽然罗伯特与黛比是一对外形相当悬殊的恋人,但他俩齐声说:“其实我俩只是平常人,都希望过平常人的生活。”罗伯特与黛比的结合,又是对传统的英国法律的一次强烈挑战。

印尼的变性人受社会尊崇

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但变性人在生活中却是随处可见,在雅加达,至少居住着 2000 名变性人。接受正规医疗变性手术的印尼人并不多,他们没有钱去新加坡或泰国进行变性手术,他们并没有“去势”,通常只能每天靠低质量荷尔蒙激素和硅树脂灌输隆胸,从而表现出女性的特征。

不过,印尼的变性人在国内的处境,和其他的穆斯林国家大不相同。在许多地方,她(他)们有的是牧师,有的是美容院的职员,有的是商店里的服务员,有的是婚姻介绍所的工作人员,有的担任了模特儿……不少印尼的居民还认为,在生活中,遇到变性人将给自己带来好运。无论变性人从事着何种职业,在印尼都受到尊敬。

现年26岁的雷斯蒂·克里斯蒂安原来是个男性,现在变成了一个身材苗条的姑娘,成为一名舞蹈演员。她穿着一件紧身的连衣裙,让自己的身材的曲线毕露。克里斯蒂安在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时说:“自己对变性后的生活状况十分满意,这让我摆脱了童年时的梦魇。当自己还是一个小男孩时,自己的军人父亲时常对我拳脚相加,这种痛苦的回忆时常让自己半夜惊醒。然而,善良的母亲却用慈祥的母爱温暖了自己的童年,母亲时常背着父亲教我跳舞,她那和蔼可亲的容貌和宽容一切的母爱,让我今生难以忘记,这也正是我成为变性人的初衷。”

类似克里斯蒂安童年经历的变性人在印尼并不是特例。他们被人们称为“Waria”。这个名称的意思也就是变性人。Waria通常都是在成年之后,改变自己的性别,从而实现自己从小梦想的“性别补偿”。他们在完成变性之后,在就业方面,一般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人们要问:为什么变性人在印尼能获得如此的宽容,甚至赢得人们的尊敬呢?据当地社会学家的解释,他们之所以能得到印尼文化和社会各界的认可,是由于他们能够毫不隐瞒自己的身份,成为“变性一族”,他们能够公开地出现在公众场所。这样一来,变性人表现得更加自信一些;而同性恋则不然,他们不能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同性恋只能进行秘密聚会寻求志同道合

的性伴侣。印尼的百姓很看不起偷偷摸摸寻找性伴侣的同性恋者。雅加达主持每年度同性恋电影节的主管约翰·巴达鲁说：“尽管印尼是一个传统保守的穆斯林国家，但是变性人却在印尼有着特殊的地位，印尼人对变性人和同性恋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观点。”巴达鲁表示，许多变性人都来自印尼贫穷的社会底层，他们成为变性人之后也肩负着养家糊口的重担，这一点为身边邻居所共识，人们是同情弱者的。变性人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体谅。记录印尼变性人生活长达6年的法国摄影师伊丽莎白·卡里什奥称，变性人与同性恋在印尼的社会地位相差悬殊，许多印尼人都将变性人的到场视为护身符，在苏拉威西岛和泗水东部爪哇岛的渔民出海时，都会邀请一位变性人水手同行。他们认为，只有和变性人在一起，航海才会逢凶化吉、化险为夷。

更有意思的是，印尼的变性人在担任宗教牧师后，他们的“非男非女”的身份，被视为天界与凡界的调停者，因而受到人们格外的尊敬。印尼波诺罗科地区东部爪哇岛至今仍流传着传统的舞蹈——“Reog”。这种舞蹈表现的是男性可以从女性那里得到神奇的力量，而跳这种舞蹈的通常都是一些异性模仿者或是变性人。在印尼中部的苏拉威西岛，有一种宗教组织名为“Bugis”，他们仍信奉着伊斯兰教，但也掺杂了许多印尼古代宗教文化在内，该组织的牧师 Bugis 是变性人或是两性人，他们得到当地居民的尊崇，被视为人和神的中介，传递神灵意旨，沟通人间和鬼神世界的联系。变性人成为神话世界的某种投影和折射。因此，这个现象引起了许多人类文化学家的关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克里斯琴·佩尔拉斯多年研究 Bugis 文化，并且大有收获。他描述 Bugis 是被居民视为具有神力的牧师，他们信奉着伊斯兰教，但他们的身体却带着女性的特征。Bugis

被传说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印尼居民也持有畏惧和敬重的心理,因此,在举行婚礼等仪式上,也时常出现受人尊崇的 Bugis,他的出现可以为新婚夫妻带来幸福美满。佩尔拉斯说:“Bugis 是印尼古宗教文化的守卫者,在古代神话中,像 Bugis 这样的变性人是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男性还是女性,他是凡界和天界之间的调停者,也是神的使者。”

尽管世界逐渐现代化,宗教仍是各民族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印尼的变性人身上,透出了宗教的神秘色彩,它和现代的科技进步带来的人的观念更新,可谓是殊途同归。原始的宗教文化的深厚的影响,又为变性人提供了有力的庇护,这也是研究变性人遭遇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河莉秀在法律上变成了女性

让我们继续来看看韩国。2002 年,韩国有一名堂堂男子汉,经过易性后,摇身一变,变为一名人见人爱的性感女神,一枝独秀,风情万种,成为广告、乐坛及电影界的新宠儿,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河莉秀。

韩国明星河莉秀在完成了易性手术后,也向仁川地方法院提出了户籍更正以及改名。不久前,仁川地方法院批准了河莉秀的户籍更正以及改名。据《联合晚报》2002 年 12 月 16 日报道,仁川地方法院已批准河莉秀的户籍更正以及改名。审判部在裁决书上指出:“认为河莉秀已经具备女性的生理特点,完全可以在社会上履行女性的职责,所以做出了上述决定。”审判部还指出,“申请人更改性别的医学、法律方面条件充分”,“根据

变性人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追求幸福权等宪法理念,应该接纳他的申请。”

经法院的判决后,河莉秀的居民登记证、护照、驾驶证等所有证书上的性别,将会从男性改为女性,她在法律上可以堂堂正正地结婚,结婚后可以收养孩子并注册到户籍上,成为一个母亲。按照本人的愿望,河莉秀的真名将改成李庆恩。

河莉秀听到法院的判决后,高兴得流下了眼泪。她说:“太让我感动了。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今后将会作为真正的女人,创造美好的生活。”她充满憧憬地说:“我今后可以同英俊的男子结婚了。”这位被韩国媒体称为“历史上最美变性人”的河莉秀,在自己写的自传《成为夏娃的亚当》中公开披露自己易性的心路历程。她在书中颇为感慨地称:“虽然当时很多客人已经识破我的变性身份,但是他们还是被我的柔美气质所折服。”她表示:“希望大家通过这本书,了解变性人的性爱观与存在的意义,不要再对变性人持以鄙夷的态度,并体谅变性人在抉择时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河莉秀的好事接连不断地来。2004年5月14日,韩国汉城大学美术学院又隆重地宣布,将邀请变性美女河莉秀到汉城大学做报告,这是因为在对学生的问卷调查中显示:学生们最想见到的艺人讲师是河莉秀。于是,汉城大学美术学院学生会决定邀请河莉秀当一天的特别讲座教师。在5月19日的开讲中,有300多名汉城大学的学生到场听讲。在1个半小时的时间中,河莉秀为学生们讲述作为易性人所遭受到的心理痛苦和克服困难成为艺人的过程,还讲述了自己的自传中没有写到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个人隐私,这引起了与会者的莫大兴趣。

日本确定4月4日为变性日

易性手术于1998年在日本合法化,但变性人不能改变身份证明上的性别记录。这样的变性人目前约有2000人,他们希望自己目前的真正身份能得到世人的承认。

到了2000年,情况有了变化。日本参议院在2000年4月2日就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变性人改变身份证明上的性别记录。一些社会活动家对此表示了欢迎,认为该法案将帮助变性人过上正常的生活。然而,要想改变身份证明上的性别记录并不容易。申请人必须符合严格的条件,例如,申请人必须接受过变性手术,而且没有子女。这个法案的通过,受到了许多变性人的欢迎。一位坚持要求改变户口性别记录的变性人作家寅井政说:“我们以前总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现在我们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寅井政原是女性,后来在美国作了变性手术。现在,唯一能让人看出他以前性别的就是户口。户口是日本人重要的身份证明,无论找工作还是申请护照,都需要用户口。

尔后,日本又允许变性人竞选议员。据新华社2003年4月21日报道,日本首位“变性人”阿也江上川参加地方议会选举,决心要当“女议员”。他在2003年4月20日提交的地方选举正式报名表“性别”一栏中,坚定地写下了“女性”,虽然从他出生之日起,一直是一名“男性”日本公民。阿也江上川今年35岁,于1998年被诊断为患有易性病,次年10月,他被允许给自己取一个女性化的姓名。然而,有关政府部门至今仍然不准他将家庭档案中“性别”一栏由“男性”改为“女性”。东京市世田区的选举委员会正式批准了阿也江上川作为一名女性公民参加4月

27日的地方议会选举。这样,届时,他将与其他71名候选人一同竞争52个地方议会的席位。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的被选举人注册性别与家庭档案不一致的情况。此前,主管日本选举的公共管理部门官员作出的意见是,如果在委员会的提议下,被选举人仍然不愿意修改自己的性别,委员会应准许他的被选举资格,并批准他的选举注册表。但有关官员同时表示,在官方的选举纪录中,他的性别仍然是“男性”,与他的家庭档案相一致。阿也江上川事件对日本乃至全世界的变性人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有意思的是,日本确定4月4日为变性人庆祝日。据1999年4月1日《京都新闻》报道,日本节日协会决定,将每年的4月4日定为变性人庆祝日,以提高大众对于变性人的理解。东京还将举办一个题为“变性人和人权”的讲座。六个月前,日本一家医院进行了全国第一个合法的变性手术。

更有趣的是,3月3日为日本的女儿节,5月5日为男儿节,变性人庆祝日正好定于两个节日的中间。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变性后的运动员可以参加奥运会

在2003年,一条最震撼人心的消息,则莫过于变性运动员也可以参加奥运会了。据新华社2003年11月15日讯,国际奥委会(IOC)出台了一项“前卫”的决定:允许“变性人”参加下一届的雅典奥运会。为此,IOC医学委员会主席林奎斯还特地召集了“变性”领域的大批医学专家,在瑞典开会专门研究“变性人”参加奥运会的问题。经过深入的讨论,IOC认为,在这个问

题上,他们必须尊重人权。国际奥委会药物委员会官员斯查马施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不会歧视这些改变了性别的运动员,国际奥委会尊重人权。”因此,IOC 最终批准变性人参加奥运会,包括所有的比赛。

时隔六个月后,据 2004 年 5 月 18 日瑞士传出的消息,国际奥委会在当地时间 5 月 17 日下午向新闻界表示,变性人将可以参加奥运会。决议说,只要接受适当的外科手术,当事人就可以以新的“性别”参加奥运会。这就是说,不论对于由男性转变为女性或者由女性转变为男性的运动员来说,他们都可以按“新的性别”来报名参加 2004 年 8 月在雅典举行的奥运会。

奥委会医学委员会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整套严格标准,要求那些希望易性的运动员必须严格执行该标准,才能获得奥运参赛资格。它们包括:完全的外科手术,其中外生殖器和性腺都必须进行完整切割;官方机构须出具变性说明,证明其完成变性过程,即已从“男人”变为“女人”,或从“女人”变为“男人”;参加竞技项目以前,必须停止注射荷尔蒙达两年,并且在监管机构监督下通过特定的检验,以使有充足时间将变性影响降到最低。

但是,是否允许变性人参加奥运会的问题,人们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变性运动员一旦参加比赛,将对现有运动员造成冲击,特别是对女运动员更甚。众所周知,男性在睾丸激素、肌肉力量、心率以及肺活量上,相对女性都有天生的优势。

有人问:奥委会允许变性人参加奥运会,是否影响公平竞赛?这个问题很值得加以研究。古代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只准许男性选手参加竞技,为了防止女性混入其中,比赛时要求参赛者一律裸体竞技。女性被允许参加现代奥运会后,问题的焦点就变成:如何防止男性鱼目混珠参加女子项目而轻易取走奖

牌。在1968年前,参加奥运的女选手必须提出性别证明。自1968年开始,由一群国际人士组成,具有公信力的医疗团队在比赛当地为女选手进行体检,女选手必须裸体在一组妇科医生前接受审查。现在,假若男变女的选手参加到女选手的行列中,医学专家们发现,由于男女在生理上的差别,即使一个男选手在做了变性手术后,她的体能优势仍会明显高于其他女选手。在荷尔蒙的作用下,人的体能特征不会在短期内发生变化。但是,也有医学专家认为,相当部分变性人在变性前性激素分泌就存在问题,如男性的性激素分泌偏向女性,而女性的性激素分泌偏向男性,还有一些人在变性前就因为长期使用激素药,表面上看与异性差别不大。所以,在变性后,即便运动能力增强,也强不了多少。帕德里克博士认为,经过外科手术和荷尔蒙治疗之后,那些“由男变女”运动员的睾丸激素和肌肉模块都会相应降低。

不过,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表示,让变性人参加奥运会涉及复杂的医学问题,不容易一下子解决。体育法学专家里托·桑德罗认为:“如果是女变男参加男子项目比赛,往往会博得法官的好感,但如果男变女参加女子项目比赛,就会有人来质疑比赛的公平性。这既是一个复杂的医学问题,又是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圣保罗大学的体育维权专家戈麦斯也认为,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最为棘手的是没有公认的法律来进行规范,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判决都很难做到真正的司法公正。”国际排联却禁止变性人参赛,在戈麦斯看来,这就是“双重标准”。他说:“如果我外表看起来是女人,又没人揭发我,我可以参赛,可实际上我是个变性人。毫无疑问,这是自相矛盾的。”

那么,人们要问:究竟需要多少时间,才能确保变性人在接

受荷尔蒙治疗后的副作用完全消失？或者相关的法律能制订出来？澳大利亚国际奥委会委员克恩·菲奇教授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时间表。他说，一个易性后的运动员参加比赛的条件是，必须在他实施变性手术两年之后。举例说，如果一个男田径选手做了变性手术，她必须在穿裙子至少两年后，才能站到女子项目的队伍里。有专家提出，还应对其参赛提出一些附加条件。北京医学院三院成形外科主任李健宁医生建议对变性运动员进行精确的性激素水平测定，并进行检查和分析，确立一个标准。只有变性人体内的性激素水平达到或不超过某一标准，才被允许参赛。这样做，可以在保障变性人权利的同时，也保证竞赛的公平，特别是保障奥林匹克比赛的公正和公平竞争的原则。

综观已经出现的实例，测试和仲裁结论中的偶然性还没到可以微弱不计的程度。因为性别鉴定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有的运动员没有做过易性手术，外生殖器是女的，但她的染色体却是男的，于是，她即使没有做过易性手术，她的性别鉴定应为男性。据1992年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说：西班牙跳栏女选手Patino在参加1985年在日本神户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前，从未怀疑过自己的性别，尽管在解剖学层面上她有女性生殖器官，但是，那次染色体测试却显示她带有Y染色体。Patino不仅因此丧失比赛资格，失去奖学金，男友也在困惑中离她而去。

这位西班牙女运动员不能忍受这样的打击，便提出要求，应当用科学方法对她的性别进行测试。国际运动组织决定放弃测试染色体，恢复采用早先的直接检查外生殖器官的方法来判定性别。IAAF委员会的一名妇科专家解释说：某些情况下X或Y染色体无法促使人体分泌相对应的女性或男性荷尔蒙，以至于外观上发育出来生理性征、及对运动选手关系重大的身材尺

寸和肌肉结构,无法经由染色体来判定。国际运动组织的筛选策略转向,也使得 Patino 经过三年的辛苦争取,终于重新取得“女性”的身份。这说明,要鉴别一位性别有争议的运动员,竟花了三年的时间。因此,变性人参加奥运会,将有许多更为复杂艰巨的工作要做。

这样一来,势必使这个决定可能停留在纸面上。国际奥委会为检查运动员是否服用兴奋剂问题,曾想了许多办法,但仍然引出许多官司和争论。在奥运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男选手“假冒”女选手参赛的事件——这种做法是想利用男性睾丸激素分泌较多、肌肉力量较强以及更好的心肺功能等生理特点,在女子比赛中“占便宜”。而许多女运动员服用类固醇类兴奋剂,目的也是一样的。运动员在接受荷尔蒙治疗后的副作用是否完全消失,奥委会用什么办法来加以监测,还没有制定出具体的规定,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医学专家们慎重研究的问题。否则,实施上述决定,将会在体育界和社会生活中引起一片混乱,闹出许多具有轰动效应的社会新闻来。

那么,奥委会的这个决定会不会刺激和鼓励更多的运动员为了取得好成绩而变性?北京医学院三院成形外科主任李健宁医生认为,总的来说不大可能。因为每一个人在进行变性手术之前,都要由专业的心理医生反复进行严格的心理测试,只有那些确实有易性病的人,才会被允许进行变性手术。当然,也不排除个别人出于功利目的进行变性手术,但这些人一般很难通过心理测试,即便因此进行变性,以后往往会产生后悔心理。著名舞蹈演员金星很坦诚地说:“这个决定很好,它是对变性人的一种尊重。变性,并不是一个很随意的事情,我相信很少有人会因为要夺取奖牌,而草率地去做变性手术,这根本就不值得。以我

自己为例,我是从小的时候起,就觉得自己是生活在男人躯壳中的女人,手术之前我的激素分泌就已经不同于一般男性了。而且,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男人变成女人后,与运动能力强的女运动员去比,并不一定就具备多么大的优势。”

无论如何,有识之士认为,这毕竟是一个破天荒的消息。易性运动员将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参加奥运会的权利,男变女和女变男的运动员,和正常的男女运动员一起参加比赛,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突破。国际奥委会这个决定,可以看作是关于变性人的“人权宣言”。它也同时体现了奥运精神。因为奥运精神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公平地提供给全人类展示个人风采、文化、能力以及意识形态的大舞台。奥委会这个规定表明,这些过去生活在角落里的边缘人群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和正常人一样参与社会活动了。这是国际社会对变性人最根本的尊重。变性人的生存权、比赛权已得到确认,随之而来的许多问题,如就业问题、结婚问题、财产继承问题,等等,将会随之得到解决,至少将形成一个解决问题的良好氛围。

敢吃第一只螃蟹的易性运动员出现了

现在,敢于吃第一只螃蟹的易性运动员已经出现了。她就是澳大利亚的高尔夫球运动员巴格尔。优雅而宁逸的高尔夫球场曾为性别大战闹得沸沸扬扬,现在女子也加入了高尔夫球的比赛行列。一发而不可收拾,PGA的禁门一旦被打开后,就无法关上。如今,男变女的高尔夫球选手也能参加澳大利亚的重要比赛,成为一大新闻。

据2004年3月6日《东方早报》报道:米安·巴格尔,这位

37 岁的女性,1995 年以前是男人,日前已获得了澳大利亚高尔夫球女子公开赛的资格。她在易性后,曾三次获得南澳大利亚业余锦标赛的冠军,但 3 月 4 日开始的澳洲女子公开赛则是欧巡赛的第一站。她能否参加欧巡赛,至今还是一个问号。因为欧巡赛并没有作出改变自己章程的决定——巡回赛选手必需生来是女人。让人乐观的是,欧巡赛的执行官伊安·拉德表示,欧巡赛会考虑巴格斯的请求。作为全世界第一个参加女子比赛的易性人巴格斯,则向欧巡赛和美巡赛委员会发出了呼吁:“我知道很多人没办法理解,但经过手术,我们体内的荷尔蒙发生了变化,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强壮,我应该得到和其他女人同样的机会。”她还说:“如果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巡回选手,我的人生将无比精彩。”巴格斯已经走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下一步如何走,将是举世瞩目的。

在此之前,一位在六年前突破“阴阳之隔”、由男性转变为女性的加拿大山地自行车选手,也于 2002 年 8 月 7 日入选了加拿大女子山地速降队,但这位变性人的到来,立刻在国家队内部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这人名叫米歇尔·杜马雷斯克(变性前叫迈克尔·杜马雷斯克),32 岁,这是她第一次入选国家队。一年前,杜马雷斯克才开始参加山地自行车赛,结果在六场比赛里,拿了两次第一、两次第二,可谓“大器晚成”。但是,“天嫉奇才”,杜马雷斯克仍难以得到队友的认可。加拿大女子山地速降冠军阿伦说:“与她在一起,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阿伦认为,杜马雷斯克不应该被归入女性运动员一类,否则会让她占了便宜。据悉,阿伦已经联合另一名队友布恩,一起向国际自行车联合会写信表示抗议。不过阿伦还算“人道”,没有要求国际自联剥夺杜马雷斯克的参赛权,而是要求在传统的男、女性别外,

增设一个“变性”项目,杜马雷斯克应在“变性”项目中参赛。

不过,变性人参加竞赛项目,在更早些时候尝试吃螃蟹的,要算1975年的美国网球运动员雷内·理查兹。理查兹本来是一位在事业上很成功的眼科医生,他同时又是一位业余的网球运动员。他在1975年接受了易性手术后,移居加利福尼亚州。他参加了加州举办的第一届网球锦标赛,并夺得了男子冠军。一个爱打听的记者了解到这个身高6英尺2英寸的运动员,原来是一位女子,便在全国电视新闻中透露了这一情况,这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此在他参加的下一场大赛中,比赛的组织者决定,除了25名选手被淘汰外,剩下的选手都必须接受性激素检查,这在网球史上尚属首次。理查兹对此提出诉讼。1977年纽约最高法院判定:“医学上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此人确系女性”,理查兹打赢了官司。现在,理查兹已不再行医,而是将他全部时间投入职业网球运动中去。

但是,有人因此发出惊呼:将要诞生超级巨星了。比方说,女变男的运动员和女运动员一起参加一百米的短跑,他的成绩肯定会超过女运动员的成绩。如果他的体能保持了男性的潜在力量,他所取得的成绩应不应当予以承认?这个问题将会引起体育界的广泛争论。还有一位中国女排队员听说国际排联不再检测运动员的性别的消息后,感慨地说:“这样好了,出个变性人的女排球员,力量大、弹跳好,国际女子排球界可能就要诞生一位前所未有的超级巨星了。”国际排联取消国际比赛前进行性别检查,这对刚登上世界冠军宝座的中国女排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挑战无疑也是不庸忽视的。国家体育总局排球管理中心主任徐利表示,目前世界女排各强队之间的差距十分微小,一旦在某个球队中出现一个男变女的“女队员”,实力对比无疑将

立即改变,因此,中国女排拒绝变性人加盟。当记者问,如果中国女排遇到的对手中有变性人怎么办时,徐利回答得铿锵有力:“别人我们管不了,但是,我们的女排姑娘绝对是女性!”这里,徐利还有一种观念有待改变,即已经变性的人,他的性别已不再是原来的性别了。他还强调:“目前我们中国排球界是没有变性人参赛的,国内的联赛也不会允许变性人参加!”

然而,变性人参加世界排球比赛,也是大势所趋。国际排联取消性别检查之后,中国女排在未来的比赛里将如何应对“变性人的进攻”,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自命清高,以不变应万变,看来是要吃亏的。

但是,对于变性人参加运动会获得的成绩,头脑清醒的人士也是有的。2004年10月26日《长沙晚报》报道,10月19日下午,在女子100米推轮胎赛预赛中,湖南选手刘群利战胜了一名黑龙江选手,并最终夺冠。在场观众和记者发现刘群利无论是从身体形态,还是动作特点来看均似男性。赛后,黑龙江代表团从现场执法裁判处得到证实后,向比赛仲裁委员会递交了上诉状。10月21日,全国第五届农运会竞赛部负责人郑胜先谈到此事时透露,组委会有关部门经过调查取证对其作出结论,该选手为“变性人”,有资格参加此次农运会,其获得的金牌也有效。

尼日利亚国家足球队也遇到了一个难题

近日,尼日利亚国家足球队遇到了一个难题:原尼日利亚国家女足球员伊娅波·阿巴德近日在成功进行了变性手术后,向尼日利亚足协提出申请,要求转入尼日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现年19岁的阿巴德此前被证实是两性人,并于近日前往美国的

加利福尼亚接受了变性手术,在手术成功后更名为詹姆士·约翰逊。

阿巴德的申请引起尼日利亚各界的关注。有专家担心,一旦同意阿巴德以“约翰逊”的身份转入尼日利亚男足,可能会引发社会各方的争议;也有专家指出,阿巴德虽然成功变性,但能否承受男足的运动强度还是个未知数。更有人表示,阿巴德其实应该利用自身身体素质的优势,继续保留“伊娅波”的身份,为尼日利亚女足做出更大的贡献。

但是,伊娅波·阿巴德留在尼日利亚国家女足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她现在已从她变成了他,国家女子足球队有一名男子汉掺杂其间,显然是不妥当的。男女球员在身体素质上存在巨大差异,而性别的转变却不一定能够带动竞技实力的提升。如果转入尼日利亚男足,阿巴德是否能胜任这个使命,因为他毕竟是从女性转换过来。选择男儿身的约翰逊则无疑走上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尽管他可能也会有技术细腻、身体灵活的特点,但比起身体强壮、以速度见长的尼日利亚男足球队员来说,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那里也不缺乏脚法好的球员,奥克查、卡努就是最好的代表。因此,即便是国际足联网开一面,约翰逊也很难在男足中站稳脚跟。但是,此事使尼日利亚足协陷入两难的境地。这不仅在尼日利亚足球史上闻所未闻,即便是国际足联也从未受理过此类个案。尼日利亚足协主席加拉迪马称,在得到国际足联的有关指示之前,尼日利亚足协不会作出任何决定。

允许变性人参加足球比赛,这是现代足球发展的百余年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情况;社会舆论对变性人的偏见也将会影响到国际足联的判断,约翰逊要重新开始自己的足球生涯绝非易事。国际足联过去的态度是明确的:重申足球是男女分开的体育项

目。不久前,有一名墨西哥人叫多明戈斯,是一个女子,她却执意要参加男足比赛,这使国际足联很尴尬。现在,国际足联则可能遇上更大的闹剧:又有一位“女性”要进入男子足球的世界。但与多明戈斯事件所不同的是,他们这次遇上的对手过去是女人,现在却变成了男人。

不过机会总是有的。虽然足球圈内对变性人的话题还比较忌讳,但整个体育界却已经在逐步地接受变性人。早在2003年年末,国际奥委会就已宣布允许变性人参加奥运会,给了他们正式的权益。高尔夫球手巴格尔则是变性人“重新开始”的鲜活的例子。这位澳大利亚人在1995年由男变女,后来成为高尔夫职业球员,2004年更是在澳大利亚公开赛中获得了第9名的佳绩。国际足联这回如何处理阿巴德的申请,下文如何,现尚不得而知。

另一道难题:中国变性人能不能竞选“环姐”?

男变女的变性人,能不能参加世界环球小姐的竞选?2004年2月22日,有称“中国版河莉秀”的易性人陈莉莉,向“2004环球小姐中国·四川选拔赛”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也是对世界环球小姐的竞选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陈莉莉原名陈勇军,1980年2月出生在四川南充市仪陇县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喜欢男扮女装,连性格、爱好等都带有明显的女性特征。10岁母亲去世,13岁离家出走,辗转于河北等地打工,16岁进入河北莲花歌舞团开始演艺生活,18岁在广东夜总会、舞厅以表演谋生。17岁那年,他做了隆胸手术,并开始了男扮女装的生活,和男子谈恋爱,周围的人并不知道她的真实性别。

2003年11月,他在青岛一家医院接受了变性手术,彻底告别男儿身,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陈莉莉说:“我做完手术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公共场合,去女澡堂、去游泳池,穿上紧身的裤子和衣服,展示我的身材。我当时真的觉得很幸福,觉得做一个女人满足极了,感到之前吃的那些苦,忍受的那些疼痛都值得。当我在病床上疼得忍受不了时,就一直在勉励自己,多忍一秒钟,就离以后的快乐近了一点。”2004年2月11日,她在广西南充市公安局拿到了女性的居民身份证,被誉为“中国版河莉秀”。

2004年6月,环球小姐大赛将在厄瓜多尔举行。从2月开始至3月5日,是中国区总决赛四川选拔赛的报名阶段。2004年2月22日,身材高挑、穿着时髦、留着披肩长发的一位女郎来到四川选拔赛组委会的办公室,在办完了报名程序后,女郎突然对工作人员说:“我可以见见你们负责人吗?”组委会主任张瑞陵接待了她。她语出惊人:“请允许我在你面前表现出我的诚实和勇气,我有一个秘密……”女郎习惯性地用手擦了擦头发,“其实,我是一个变性人。”与女郎的平静相比,张瑞陵却是大吃一惊,“什么,你说你曾经是男性?”“是的,我以前是男性,还有一个很男人味的名字,叫陈勇军,现在我叫陈莉莉。”她在报名表上如实地填写了各项要求:年龄24岁,性别女,身高1.73米,无犯罪记录,高中学历……这些资料,几乎每一条都符合这次选拔的条件,

张瑞陵毕竟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他对陈莉莉的说明虽然毫无思想准备,但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他没有足够的理由拒绝她的报名请求。他于是对陈莉莉说:“待我们研究一下后,再把意见告诉你。”事后,他立即向设在美国的“环姐执行中国总部”紧急请示:能不能让曾经是男性的陈莉莉参加环球小姐的选拔?

“易性人报名参加环姐选拔,这在全世界都从未有过!”身在纽约中国总部的总裁秦臻同样感到震惊。事关重大,秦臻表示会向董事局请示。

过了一天,即2月23日,美国纽约“环姐执行中国总部”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经过谨慎考虑,“环姐”中国总部一方面盛赞了陈莉莉对环姐选拔的信赖,而目前她的女性身份也得到了国家认可,总部以法律为准则,体现公平参赛的原则;另一方面,“环姐”历来的理念是“实现女性理想”,陈莉莉从男到女的转变,正体现了她对自身理想的追求。因此,总部批准同意让陈莉莉报名参加这次四川选拔赛!四川选拔赛组委会在接到这个消息后也表示,他们将严肃谨慎认真地对待陈莉莉的参赛问题,但她是否能进入更高阶段的比赛,能否进一步脱颖而出,尚将接受评委们一视同仁的筛选。

变性人参加选美,在国外也是史无前例的。曾击败过50名拳击手的泰国拳王诺童,在1998年曾获全国轻量级冠军,也是一个“男人身、女人心”的易性病患者,他于1999年做了易性手术,由一个健硕的彪形大汉变成一位千娇百媚的“美娇娘”,诺童本着“女为悦己者容”,四度参加泰国选美,生来具备模特儿骨架,拥有突出轮廓的诺童,3次当选泰国美后,其中一次更赢得“时下最红的美后”!诺童目前在泰国是一名电视演员兼模特儿。她在变性后,拍了一部《命运拳击手》的电视片,大受观众欢迎。

但是,泰国拳王诺童的经历,这一回却没能再现。事隔三天后,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美国纽约“环姐执行中国总部”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转变:北京时间2月26日零时30分,美国纽约环姐执行中国总部总裁秦臻从纽约打电话给张瑞

陵,通知他“环姐”比赛暂不接受变性人的报名。理由是:环球小姐是“一项高尚的、严肃的赛事”,参赛对象都是“自然、健康的女性”,可以接受“人造美女”(指经过整容),但不接受“人造女性”(指变性)。据了解,环球小姐选拔针对18—25岁的健康女性,在其53年历史里从来没有变性人参赛的先例。2月26日下午,四川选拔赛组委会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包括法新社在内的全球媒体宣布:“环姐执行中国总部”决定收回接受变性人陈莉莉报名的决定。张瑞陵代表四川组委会表态:1、无条件服从总部决定和环球比赛章程;2、对陈莉莉的情况表示遗憾和同情,组委会将进行研究,可能会在3月6日初赛时给予陈莉莉单独展示才艺、风貌的机会。

先是肯定,后是否定,时间相隔只有数天,反映了人们的观念转变还要经过一个激烈的冲突过程。变性人要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看起来还不会一帆风顺。但是,变性人既已成功地完成性别的转移,他(她)的人权应当得到尊重和承认。从美国纽约“环姐执行中国总部”作出的这两个决定来看,国际社会对变性人的观念,还有相当尖锐的冲突和争论。上海国际时装模特儿大赛组委会副主任曹钢认为:“她有了身份证,即获得了法律上的承认。也就是说,法律赋予了她享有与所有女性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任何人都不能歧视她。如果取消了她的参赛资格,对她来说是不公平的。她做了变性手术,实现了他做女人的愿望,应该得到尊重,社会上的人更应该理解她,而不是歧视她。”陈莉莉在完成男变女的手术后,她应该能获得女性拥有的一切权利,现在虽然没有获得选美(还有其他)的权利,但是,她融入当今社会的大趋势已成定局。我们为她的勇敢行为喝彩,并期待着获得更多的成功。

陈莉莉一展歌喉

陈莉莉尽管无缘参加“环姐”的选拔,但四川组委会还是通情达理的,破例给了她一个展示才艺的机会,让她单独作一次歌舞表演。

2004年3月7日下午,戴上棕色假发的陈莉莉风情万种地登场,闪光灯、聚光灯亮成一片。包括台湾TVBS在内的数十家媒体在比赛前,把陈莉莉围了个水泄不通。比赛开始前,主持人邀请陈莉莉致辞。陈莉莉对热情洋溢的观众说:“我从前是一个来自农村的男青年,在经历了许多挫折后才站在这里,我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初赛中,陈莉莉两次登台,进行了泳装展示和歌舞表演。

穿上泳装的陈莉莉,现出了一副好身材。上海《新闻晨报》实习生郭翔鹤用“泳装下没有亚当的影子”为题,描写了陈莉莉穿着泳装的身材,可谓是十分恰当。据说,她穿的这套泳装是在上海定做的。她穿着泳装在舞台上亮相时,赢得台下观众的一片惊叹:“真是难得的好身材!”“比标准美女还漂亮!”“不知道是不是经过加工的?”陈莉莉则向观众坦白:她没有做过塑身手术,身材是天生的。身高1.74米的陈莉莉唱到低音处,一不小心露出了男声,但观众还是原谅了她。因为她毕竟由他刚刚演变而来。

但是,陈莉莉如果再花一点工夫,作一些“整嗓”的治疗,完成变性、变美、变声的“三变”,就可以使她拥有一个美妙的女声,而且可能比一般的女声更动听。现在,美国兴起一种名为“整嗓”的美容手术,为声带做手术。75岁的安齐代伊是一位建

筑总管,他在几年前接受了“整嗓”手术和治疗。现在声音变得年轻多了。他说:“过去因为我话说得太多,一天下来,我就感到整个人好像要垮下来似的,现在,嘶哑声没有了,这是最大的改善。”

据报道,美国格拉杜特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萨特罗夫博士说:“许多人愿意花1万5千美元拉脸皮,但他们一张口,却发出老年人的声音。颤抖、虚弱,这就是我们认为声音变老的标志。”现在,有了“整嗓”手术,不仅可以让人的声音变得年轻,而且可以使人的声音变得更美。一位“整嗓”专家说:“手术会帮助歌星延长他们的表演生涯,也会使那些需要力度声音的人,如政治人物和教师受益。”

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整嗓”手术不能保证百分之百获得成功,也有做了手术反而弄巧成拙的。电影《音乐之声》女主角朱丽·安德鲁在上世纪90年代在百老汇演出时感到嗓子有点毛病,所以动手术摘除了声带上的良性小瘤,谁知手术后,她那著名的四个八度音阶的宽厚嗓音不见了。为此,她和医院打起了官司。因此,“整嗓”手术也要谨慎从事才好。

变性人生活也被写进了文学作品

变性人的生活也被写进了文学作品。在当代作家中,最出名的作品,要算日本女作家吉本芭娜娜的处女作《厨房》了。

在当今日本文坛,村上春树和吉本芭娜娜两人独领风骚,被人称为“文学天皇”和“文学皇后”。吉本芭娜娜是著名诗人和文学评论家吉本隆明的女儿。1988年,吉本芭娜娜如同一颗耀眼的新星出现在日本文坛。她那年刚好大学毕业,花了十天时

间,第一次试着写了一部短篇小说《月光阴影》,作为毕业论文。同年,她在餐厅里当女招待时创作的《厨房》,获第六届“海燕”新人文学奖和泉镜花文学奖,并获得芥川奖提名,成为书市上的畅销书,被译成意大利文,在意大利名列畅销书榜首。这也是变性人生活第一次进入日本的文学作品,是一次重要的突破。

《厨房》写一个离开厨房就不能入睡的天涯孤女,这位绝代佳人般的母亲原来是她的父亲,是一个由男变女的变性人。因为是变性人,她的心态、行为有种种与众不同之处,她在变性后的孤苦无援的遭遇,在文学作品中第一次得到反映。这个题材对许多日本青年人来说,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天涯孤女的母亲的形象刻画得非常独特而深刻。三个人同住一套房子,既相依为命,又各有其内心孤独。不久,她的母亲死于单相思男子之手,抛下一对无依无靠的少男少女,奇特的构思和感人的情节吸引了许多读者。这本只有区区数万字的小说,一问世就获得了无数青年读者的喜爱和眼泪,畅销数百万册,变性人的生活经过精妙绝伦的艺术加工,造就了非同寻常的文学成就。吉本芭娜娜因此获得了多项文学大奖,并因此而被誉为“烹调文字的高手”。

《厨房》使吉本芭娜娜一举成名,在日本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继《厨房》之后,紧接着在两三年内,她又完成了《泡沫》、《哀愁的预感》、《Tugumi(斑鸠)》、《白河夜船》等多部作品,而且几乎每本书都销售上百万册,还接连两次获得芥川奖提名,并获得文部大臣新人奖、山本周五郎奖等大奖,在日本文坛刮起了一股“吉本芭娜娜旋风”。她的小说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尤其受到欧美读者的高度关注,并获意大利 SCANO 外国文学奖,亚马逊书店则以四颗半的星级评介她的作品。

日本评论界惊呼：日本的中老年人读着吉本隆明的文章走向二十世纪末，年轻人则捧着吉本芭娜娜的小说迎来新的世纪。吉本芭娜娜的成功，对中国的青年作家也很有启发。因为易性人的生活，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还是一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如果有人敢于去耕作，写一部反映变性人生活的小说，那么，收获将是非常可喜的。

10

第十章

[莫尼教授为何“无话可说”?]

对于易性病患者,我们应该给予同情和关注,并通过一定的宣传,让人们改变对易性手术的认识,帮助易性人走向社会,帮助他们在就业、婚姻、家庭等方面,不再受到歧视。目前在中国,病人的数量远远大于能接受手术的医院;但是,任何问题都是一分为二的。如果滥施易性手术,那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有些人可能利用做易性手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易性手术也可能成为某些庸医牟取暴利的手段。随着要求变性手术人数的增多,许多并不具备技术和设备的医院从谋名或牟利出发,纷纷做起了易性手术。还有报道说,在俄罗斯,有些俄罗斯男人之所以变性,有的是为了继承财产,有的是为了在做生意时方便些。这些现象是应当引起我们特别关注的。

从两起涉及变性人的刑事案件谈起

2003年,新闻媒体接连公布了两起涉及变性人的刑事案件,一起是2002年2月2日凌晨,北京东城公安分局的刑警远赴上海,抓捕了两年前在北京诈骗了3.1万美元后一直在逃的犯罪嫌疑人易某。刑警们找到易某租住的地点叫开门后,却愣住了。因为他们追捕了两年的易某是个小伙子,而此刻站在他们眼前的“易某”,却是一个长发披肩、体态轻盈、身着女性装束的大姑娘。

刑警们经过进一步的核实确认:眼前的这个大姑娘,就是他

们辛苦追捕了两年的诈骗犯罪嫌疑人易某。易某在行骗逃脱后做了易性手术。据了解,本是男儿身的易某是个易性病人。他从小在女孩堆里长大,十三岁的时候,他从杂志上看到,可以通过做手术改变人的性别,他异常兴奋,决定要通过手术将自己的性别从男子改为女儿。这需要三四万元的高额手术费用。为此,易某放弃了学业,决定外出打工挣钱。为了尽快使自己变成一个女人,1998年底,易某通过帮朋友换美金的机会,卷走了朋友的3万美元,奔赴上海,分别于1999年年底和2000年10月份做了两次变性手术,术后改名为杨某。北京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王胜利说:“我们第一次接触此类犯人,因为易某的变性手术还没有做完,他现在只是外观上是女性,但生殖器官还是男性,因此他现在只能关在独立房间,至于定罪后关在‘男号’还是‘女号’,都是个问题。”

另一起是台北警方在不久前在万华区查获的风化案件,一名陈姓变性人涉嫌在下班后卖淫。据警方介绍,陈某持女性身份证,从小就拥有双性特征,因为男性生殖器官不明显,登记性别为女性,就以女性装扮,家人也不以为意。后来这个“阴阳人”做了男变女的易性手术。她为了讨生活,在10多年前就在台北市的中山区的酒店上班,近来因酒店生意清淡,经常无台可坐,只好利用下班时间自行在万华一带从事“流莺”勾当,以出卖肉体来赚些钱用。

那名男性逃犯易某变为女人,说明那家为他作易性手术的医院的审查手续形同虚设。但是,他即使改头换面,还是难逃法网;而台湾那名“阴阳人”做了男变女的手术后,又利用她的不男不女的身份,做起“流莺”勾当,更是对救死扶伤的易性手术的一种亵渎,严重地毒化了社会风气。这两起案件说明,易性手

术可以被某些心存不良之徒所利用,应引起我们的警惕。医院做易性手术,必须加强管理,不能见钱眼开,不能谁付钱,就给谁做手术,这将会被某些犯罪分子钻了空子。如果明知某些人为了某种不良的动机想做易性手术,从而造成对社会的混乱和破坏,那么,在犯罪分子落网后,公安部门应当追究有关医院和医务人员的责任。

“他残”现象

任意做易性手术的另一恶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他残”现象。

在易性病患者中,有人在饱受极端痛苦的折磨后,被不负责任的庸医所残害,这种“他残”行为,使有些人从一种痛苦转换到了另一种痛苦。

有位女青年,名叫张峰,她和许多要求易性的患者一样,憎恨女性的躯体,以“要么改变我的性别,要么让我死”的决心,前几年曾求助于北方的一家整形医院。她按医生的要求做了公证,在这家医院做了部分“女变男”的手术,结果,乳房、子宫等女性器官被切除了,但是,医生并没有将她的女性器官完全去除,阴道粘膜并没有剥离干净,阴道口还被保留着。作为男性器官的阴茎的再造又失败了,由于组织坏死,不能再造阴茎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仍要蹲着排尿,也不能过夫妻生活,成了一个两性畸形人。她痛苦极了,于是悲惨地问道:“像我们这样的不男不女的人怎么在社会上生活?哪个人愿意只做一半,不男不女地活着?”她说:“每个病人都是忍受着极大的几近休克的肉体痛苦来做手术的,为的是免除自己的精神痛苦。但花了大笔

钱,做完手术后,却成了这个样子。”她现正在准备材料,向有关司法部门提出申诉。

如果说,易性病患者自己动手切除阴茎是一种自残现象;而张峰的遭遇则构成了一种“他残”现象,造成这一切的,是一些不负责任的医生闯的祸。那些根本不具备做变性手术的医生(包括一些私人医生),也敢斗胆站在手术台前做手术,原有的器官被切除了,新的器官又再造不了,他们给易性病患者带来的伤害极大。不成功的易性手术给被残者带来了有口说不出的痛苦,因为许多患者不想让人知道过去,只能打落了门牙往肚子里咽,默默忍受着医疗事故带来的巨大痛苦。

又见两位病人状告医院

由于易性手术的增多,这方面的医疗事故和纠纷也不断增加。病人状告医院的纠纷屡有所闻。这里再介绍一例。

19年前,14岁的朱军在西南一家医院做易性手术时,医生将其塑造成了一个“女性”。可谁曾想到,被判为女性的“她”,竟然长成了一个身高1.82米、男人味儿十足的“怪人”。19年里,“她”女厕所不敢上;进浴室被误认为“流氓”而遭到女同胞的毒打;不能正常恋爱……2001年5月17日,当朱军再次来到这家医院鉴定自己的性别时,染色体鉴定结果令朱军惊愕不已:46xy,男性。“她”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男子汉!捧着鉴定报告单,朱军悲泪横流。通过调查,朱军竟发现当年医生在手术时,切除了“她”所有的男性生殖器官,将本是男儿身的朱军变成了女性。悲愤不已的朱军,于2001年7月31日向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将这家医院推上被告席,提出56万元的赔

偿请求。

但是,这家医院在法庭上辩称,朱军的情况十分特殊,“她”的外在特征表现为女性,但内部特征都是男性,也就是民间俗称的“阴阳人”。医生在入院前及手术做出初步判断:朱军是男性,这和19年后医院的染色体报告是一致的。因此诊断并没有任何错误,手术也没有任何过错。如果当初将朱军变为男性,或许“她”比现在更痛苦。医院的代理律师还拿出一份手术前家属签字单指出,做变性手术时,治疗方案需征求本人同意,因为朱军做手术时尚未成年,“她”对手术的后果不可能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其母亲代他在手术单上签了字。手术单上明确地指出,“双侧睾丸摘除术,剖腹探测”等。因此,不存在手术有过错的问题。法官征求双方是否愿意接受调解,医院从人道主义角度可给予朱军一些帮助,朱军拒绝了,调解失败。官司看来还得打下去,但这件官司对要求做易性手术的患者来说,郑重行事,无论如何是必要的。

再介绍一个变性歌手状告医院的材料。

做了易性手术的歌手李莹状告一家整形医院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在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起变性人状告医院的人身损害案没有公开开庭审理,但李莹向记者首次公开了她内心的秘密——

李莹,35岁,男性,出生在江苏镇江的一个小镇。他自懂事的一天起就有一个梦想:要是有一天一觉醒来自己变成了一个长发飘飘的女孩子,那该多好!在他读初二时,一次偶然的机
会,李莹看到了一篇文章,说一名美国修女做了变性手术后,变成了西班牙斗牛士。他才知道世界上还可以通过做手术改变性别,于是开始搜集资料和联系医院。在李莹24岁那年,为了

促使父母接受自己变性的梦想,他偷偷服用一种药丸,不久后,他的肌肤白皙起来了,胡须也没了,一个月后,他还发现自己的胸部隐隐作痛,出现了硬块。接下来,李莹便做了头发,化了妆,还买了文胸、旗袍,打扮起来,加上一米七五的个子,李莹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美女。但父母没有认同儿子要变成女儿的想法,李莹最终离家出走,寻找做变性手术的医院。

李莹寻找的第一站是上海,找到了长征医院的何清濂教授,但李莹的要求遭到了何教授的拒绝。何教授认为他现在还不具备做手术的条件。同时,李莹的哥哥从镇江赶到上海,找到何教授,言明全家人不同意李莹做变性手术。李莹决定先赚一点钱,然后找一个医院做变性手术。他利用自己身材的优势,到杭州一家舞厅陪舞。或许是李莹亭亭玉立的身材,或许是那如泣如诉的眼神,使李莹很快地赚到了一笔钱,于是,他赶紧到一家医院做了变性手术。

刚做了变性手术的小李悔恨不已地对记者说:“都怪自己太不慎重、太草率了。也许是因为那时的我病急乱投医,饥不择食,所以就随便选择了一家肯为我做手术的医院。谁知道……”为了做变性手术,小李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不仅花光了自己辛辛苦苦打工积攒下来的钱,而且还跟自己的父母搞僵了关系。到头来,变性手术失败了,不仅性别转换没有达到目的,更糟糕的是,小李发现自己“不伦不类”:说自己是男性吧,可男人该有的东西都已被切掉了;说是女性吧,可自己还欠缺许多女性该有的“零件”。手术后的小李就是在两性的“夹缝”中生存,“连上公共厕所都成了很大的问题,不知道该去男厕所还是女厕所。”小李一脸的痛楚和无奈。小李苦诉记者,手术后,他曾问主刀医生,自己为什么没有作再造阴道的手术? 那名医生拍

拍胸脯保证：“你先等一两年，到那时候不要说阴道再造，而且还可以子宫移植，让你跟正常的女人无异，她们能生孩子，你也能生孩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小李对那位医生的胡说八道深信不疑，沉浸在能做母亲的幻想之中；直到后来伤口感染，去医院诊治，才知道自己被骗了：所谓的“子宫移植”，只不过是一种难以实现的愿望罢了。

他向法院状告杭州这家整形医院人身损害，并要求赔偿，但没有如愿以偿。在法庭上，原告和被告的律师唇枪舌剑，辩论不已。医院并不认为他们的手术是失败的。医院辩称，原告因男性女性化生活14年，变性愿望十分强烈，去多家医院求诊均遭拒绝。于是，原告用剃须刀切除了自己的双侧睾丸，前往被告处求诊，要求做变性手术。同年2月27日，为其成功施行了变性手术，手术非常顺利，护理也很规范。对原告阴道再造手术中被告采用了阴茎皮瓣再造阴道，手术后无需插入模具。且阴道萎缩的事实并不存在。而原告在诉状中所提到的“肉环”，其实是阴道口疤痕挛缩，这是手术的必然结果。原告在诉状中称其未能达到性别转换的目的，被告认为变性手术只能解决易性病患者的外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心理的转换问题。

临时为原告出庭的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姚燕倩律师，对被告认定其手术是成功的提出异议。他认为手术成功与否，做到哪一步才算成功，关键要看手术效果。原告在变性手术中做一项阴道再造的目的，除了排尿的功能，还要有过性生活的要求，目前因手术护理不当导致阴道萎缩，仅容一指，根本无法过性生活。没有达到效果的手术，能算成功吗？而阴道再造术并非是一项技术难度很高的手术，在对石女和一些畸形的女性患者是经常做的，成功与否其关键还在于术后护理。

相信与小李有着同样遭遇的变性人,还有不少。世俗的偏见,使得他们不便开口,只能默默地忍受着生理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有泪也只能往肚里吞,独自品尝其中的酸楚。命运对他们本来就很不公,患上了罕有的易性病,在“身与心为敌”的状态下,艰难地支撑着。但一些庸医却打着“变性手术”的幌子,干着谋财害命的勾当,使得这些易性病患者雪上加霜,这能不叫人寒心吗?

目前变性手术在国内还未正式成为公开的医疗技术加以推广,因此我国卫生主管部门尚未制定变性手术的相关规范和标准。医患双方无章可循、无法可依,这很难以保障那些受易性病之害的患者的合法利益。变性歌手李莹站在法庭上公开亮相,给现有的中国法律出了一道难题,同样也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李莹宁愿冒一个歌手可能被“毁誉”的危险,也要为自己讨个说法,他要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讨回8年来失去的公道,挽回经济损失。这种勇气无疑是值得支持的。这场官司的结局如何,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即使他胜诉了,获赔了几十万元钱,但被切去的男性生殖器再也装不上去了。李莹的教训是深刻的。他没有听取何清濂教授的劝告,草率地去做易性手术,贻害无穷,他的深刻教训,不也值得有类似想法的朋友们共同吸取吗?

再介绍一宗外国变性官司

在国外,这一类的官司也不少。据英国《泰晤士报》2004年5月26日报道,7年前,英国一名百万富翁花了1万英镑做了变性手术,由男变女。7年后,这名变性女子却向英国高等法院提

交了一份诉讼请求,要求那名给她做变性手术的医生赔偿她186442 英镑,并还其男儿身。这笔赔偿金是做手术费用的18 倍。

这宗变性手术还得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时,凯恩女士还是萨姆·哈什米先生——一名在伊拉克出生、拥有一个房地产帝国的百万富翁,且他膝下已有两个孩子。当他与孩子们失去联系时,曾一度变得很沮丧、郁闷,于是就开始产生幻想,想象自己穿上女人装。1996年12月,他通过易装癖者指南《特拉尼指导》的介绍,与当地很有名望的精神病咨询医生拉什尔·雷德医生联系上了。雷德医生建议哈什米做变性手术,称这样做了,也许会减轻他的精神压力。他花了1万英镑接受了变性手术。7年前,他由“哈什米先生”变性成了“凯恩女士”。

手术完成后,凯恩就以一个女人的身份出现在社会上。但不久后,她就感到自己做变性手术是个错误,这并没有给她带来新的幸福。男变女没有增加她的自信心,反而使她的身心受到很大伤害。两年前,她尝试着找到了另一名整容师,在重铸了男性生殖器后,“凯恩女士”又变为“哈什米先生”,开始像男人一样穿戴和生活。她说,她当时被雷德医生误诊了。因为雷德医生从来没有向她提及性的重新安排事宜。为此,她向当地高院提出诉讼,要求雷德医生恢复她的男儿身,并赔偿186442 英镑的肉体和精神损失费。

这宗官司结果如何,也要经过一段漫长的旅程。但是,值得研究的是,在7年前,萨姆·哈什米先生因心情郁闷而爱穿女装,是否便是患了易性病。他很可能是心理上出了毛病,或者患了易装癖,而不一定是患易性病。因为易装癖与易性病,在症状上是相似的,两者有时又有交叉,很难一下子鉴别清楚。退一步

说,即使是易性病,从他膝下已有两个孩子的情况来看,是否有必要立即做变性手术,都是值得研究的。雷德医生当时没有对他的病情作深入的分析,很快便决定为他做男变女的手术,至少是草率了一点。

另一种可能是雷德医生在治疗上不能算作误诊,但后来哈什米先生的思想出现了反复。这对医生来说,也是有责任的。因为做易性手术,不是开一个双眼皮,做得不好,可以改过来。由于病人对易性病的了解不多,医生匆匆忙忙给病人动了手术,使病人在手术后就觉得不对劲,七年后终于闹上了法庭,双方耗费大量的精力,这对医生来说,同样是得不偿失。至于那些为了赚一笔钱而不惜草草了事做易性手术者,更可以从这宗官司中吸取必要的教训。

庸医之害是终生的

现在,一些易性病患者反映,在求医中遇到不少缺乏责任感的医生,只要病人交钱,马上就做手术,而且乱开价码,一个正常的女变男手术,约需人民币3万元,有人开价人民币10万元。变性手术的泛滥导致相当高的失败率,没有统一的标准,又让不少易性病患者投诉无门。经常有被庸医所误的易性病患者来找何清濂哭诉,痛陈失败的变性手术给他们带来的心灵和肉体上的新的创伤。要求何教授再给他们一个完整的身体。这些病人在其他地方曾作过女变男的手术,但由于医生技术不过关,把她们子宫、卵巢切除后,却没有办法给她们再造男性生殖器,使她们真的成了“不男不女”,备受折磨。何教授非常气愤:“这是害人一辈子的事情!这给病人带来的是一辈子生理、心理上的痛

苦！这些庸医毁了她们一生的幸福，这跟草菅人命没有什么区别！”

庸医之害是终生的。一个男变女，一个女变男，都是庸医弄错了。性别变错了，就无法照原样改过来。变性手术是需要相当高明的医术和技巧的，尤其是女变男的手术，在全国能做得了的医院和医生，是屈指可数的。有些医院声称自己也能做女变男的手术，其实充其量，只能完成前期的切除手术而已，再造阴茎则多半不成功。可是，现在一些医院、医生却不顾自身并不具备变性手术的条件这一现实，对“饥不择食”的易性病患者“有求必应”，用自己的手术刀导演着一幕幕人间的悲剧。他们对做了前二期的手术的病人许诺说，等一等，等条件成熟后，再做他人的生殖器官移植手术。可是，有些病人一等几年，还是没有着落，继续过着“不男不女”的生活。何教授提醒易性病患者注意，现在社会上有些人打着做变性手术的旗号，借此骗取钱财，医术极其拙劣，人为制造两性畸形，患者不要因求医心切而上当受骗。何教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庸医也能杀人啊，那是为天理所不容的。我们的宗旨应该是‘治病救人，使人幸福’。”

莫尼教授为何“无话可说”？

做变性手术弄到身败名裂者，中国有，外国也有。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莫尼教授，便是其中的一个。

38年前，莫尼教授已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外科医生。本书第三章中，曾提及小布鲁斯在出生后的一次普通包皮切除手术中，意外地失去了自己的男性生殖器官。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他的父母不知如何是好，直到他们看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莫

尼教授在电视上谈论性别可由后天决定的理论。莫尼正在对一些天生性器官不正常的婴儿进行实验。他有一个激进的新性别理论,认为人的性别并不是由天生决定的,而是可以通过手术选择及培养环境,后天造就的。在进行手术、改造行为和使用荷尔蒙后,婴儿的性别可以重新决定。对莫尼而言,雷莫这一病例为证明他的理论提供了一个空前机遇。病人雷莫有一个孪生兄弟,而且他出生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男孩。莫尼想做这样一个实验:两个人在同一个子宫里孕育,拥有同样的基因特征,但是在后天手术以及药物帮助下,后天培养可以使其中一个改变性别。男孩可以通过手术及后天性格培养成为女孩,当然手术越早越好。他于是向小布鲁斯的父母建议,为他做男变女的变性手术。这个手术,在当年是相当前卫的。

1967年7月3日,出生只有几个月的布鲁斯接受了变性手术,彻底摘除了睾丸。出院后,莫尼向布赖默一家作出了严格的指示:“不要讲出整个真相,不能让他知道自己不是女孩。”可是,布鲁斯长大后,并没有接受莫尼教授的性别重组,天生男孩要变成女孩并不那么容易。变性后的布鲁斯的生活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可是,直到2000年,关于布鲁斯的痛苦经历的真实故事已流传到社会上,他再也不想忍受变性的折磨了,他要把自己的遭遇公之于众。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一切生理现象,似乎都事与愿违——他与强加给自己的这个女性性别格格不入。他的肩膀越来越宽厚,他的声音越来越浑厚。他成了一个“不男不女的孩子”。到这个时候,他已脱下女儿装,也不戴胸罩,重新以男性的面目出现在社会上。布鲁斯在得知事情的真相后,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去医院,找到这个庸医,枪毙了他。”后来,他自杀了三次,都没有成功。他只得再去医院,做了

四次女变男的手术,改回了自己的男性身份,并改名为大卫。2000年,《滚石》杂志的记者约翰·柯拉品托以大卫的故事写成《造化弄人:一个被当成女孩养大的男孩》一书,真实地记录了性别在大卫身上来回变化带来的无穷的痛苦。他写道:“这(变性)就像洗脑一样。”大卫遭受的变性之苦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造化弄人:一个被当作女孩养大的男孩》一书,打了莫尼教授一记响亮的耳光,也是为滥做变性手术者敲响了一记沉重的警钟。

记者柯拉品托推出这本书的同时,大卫出现在温弗瑞主持的电视节目里。柯拉品托当时接受主动性采访时表示:“我认为大卫一家都是很有尊严的人,这个来自温尼伯的心地善良的工薪家庭走进温弗瑞主持的电视节目,勇敢地走上世界舞台,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关于尊严与生存,开放与勇气的课。在此之前,科学家一直以为,他们可以安排孩子的性别。大卫的遭遇发生后,如果还有谁相信这样的变性理论,如果还有谁教授这样的理论,如果谁还在自己的诊所里实践这样的理论,那么,他就是一个失去理智的人,是在制造丑闻。”这本书的出版给大卫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在23岁那年,他和一个名叫简的带着3个孩子的单身妈妈结了婚。但这一切,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厄运依旧像影子一样伴随着他。大卫的家人说,他曾威胁当初烧掉他阴茎的医生,并曾三度自杀。他控告毁了他一生的医院,获赔偿73000美元,但这同样没有能够挽回他的心理上的痛苦和经济损失。

大卫后来又失业了,只能在当地的高尔夫球场做一些零工,两年前弟弟布赖恩又自杀身亡。母亲珍妮特说,弟弟的自杀给大卫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影响。他每天都要去弟弟的墓上祭扫,

摆上自己带来的花朵。最近几个月,大卫又一反常态,将自己仅有的几千美元全部投资股票,在股票大跌后,他投资损失 47500 美元,朋友们说大卫“已经疯了”。接着,他的妻子带着孩子们离开了他。大卫陷入消沉,失业又给了他最后一击。大卫实在承受不了生活的巨大压力,2004 年 5 月 4 日这一天,大卫终于结束了“两次变性,悲惨一生”的生命,在家中开枪自杀身亡,享年 38 岁。

在儿子的葬礼上,她的妈妈含着泪花对记者说,她迄今无法原谅莫尼,她相信儿子当初若没有变性,现在不会自杀。她说:“他非常大方,充满爱心,喜欢音乐,喜欢说笑话,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他是如此慷慨,献出了他所拥有的一切。”多伦多“上瘾与心理健康中心”首席精神病学家肯·祖克尔指出:“大卫案让这一研究领域的人意识到,一旦涉及性,问题就比 30 年前人们最初认为的要复杂得多。我们必须承认,生物的性别和性别所扮演的角色都是先天安排好了的,但环境因素也很重要。”

大卫当年的变性手术,曾是莫尼教授的经典实验,把它当成自己的得意之作,在报纸上广为传播。他成为世界一流的性科学家,推出了一系列专著,例如写于 1991 年的《令人窒息的高潮》、1986 年的《女性的阴茎》、1988 年的《同性恋与阴阳人》,都很受读者欢迎。母亲珍妮特也不止一次地说:“我们把他敬为上帝,希望他能真正挽救这个孩子。”莫尼教授随后在《性行为文献》等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称自己的手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在论文中写道:“这个孩子后来的行为举止已经变成了活泼的小女孩,与他的双胞胎弟弟的男孩子习气截然不同。”孪生弟弟布赖恩从一开始便成了莫尼教授变性手术绝妙

的对照物，“双胞胎案例”从此名传天下。可是，莫尼教授的结论下得太早了，他高兴得也太早了。性别是不能轻易地改变的，环境也不能人为地把一个男人变成一个女人。实践的结果是最有说服力的。大卫对发生在身上的事非常愤怒，尤其是当他得知莫尼在他身上造的孽，竟然被世界各地的医院效仿，他的悲剧竟然仍在不断地被复制，大卫决心挺身而出，让这些丑行停下来。大卫表示：“我很惊讶，其他人竟然因为我的所谓‘成功案例’而心甘情愿地重复着我的遭遇。但我想说的是，在我身上发生的事那能叫成功吗！你们都希望通过这样的手术，今后可以心安理得地穿女人的衣服，做女人所做的事，玩女孩子的玩具。可是，我从不认为我是女孩，我认为，那些因为我的阴茎被烧掉就认为我不再是男人的人是非常无知的。一个因为乳腺癌而做了乳房切除手术的妇女仍是女人，她们的女性成分丝毫没有减少。”大卫的死，更是给当年制造这终生痛苦的莫尼教授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当初的经典实验，如今已是臭名昭著的失败案例。它当然也有存在的价值，那是作为一个反面教训留在变性手术的历史上。

莫尼现已退休。他的助手在2004年5月11日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说：“他（莫尼）不会对此事作出任何评论，也无话可说。”他的确是无话可说了，也无须再说什么了！没有勇气认错的人，自然是无话可说了。沉默也许是高明的。只有沉默，才是他回避检讨的最巧妙的办法。

何教授说，上了手术台也可以下来

和莫尼教授不同的是，15年来，何教授一共做了154例变

性手术,成功率达到 100%。如此复杂的手术,如此高的成功率,堪称医学上的奇迹。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除了何教授精湛的医术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对患者本人、家庭负责,对社会、国家负责”的谨慎态度。这既是一种高尚的医德,更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何清濂说,他做变性手术前,要对病人进行长期追踪观察,与患者交换许多信件,与患者进行许多个人的商讨,并要求病人在日常生活中试行异性行为及角色 1 至 2 年,办妥公安部门、父母兄弟、工作单位等各项证明。至此之前,何教授是决不会实施变性手术的。有时候他需要花五到六年的时间,来研究观察这名患者是否合适做手术。

做变性手术,必须征得家庭成员的同意,这是何教授立下的一条严厉的规矩。“我这么做,既是对患者本人负责,也是对患者家庭成员负责。”何教授解释,“如果一个变性人没有得到家庭的理解和支持,那么即使手术很成功,他(她)也很难被家庭成员所接纳,被社会所接受;唯一的选择就是出走他乡,更名换姓。父母若不同意自己的子女变性,而你却自说自话做了,那不是伤了患者父母的心?他们可能因此还会对你记恨在心,跟你没完没了。”有一位患者要求做“男变女”手术的时候,他 70 多岁的老父亲到医院大闹,声称“宁愿他死”,也不准他这样“大逆不道”。老人甚至找医生说,给你多少钱都行,千万别给孩子做手术。

何教授对每一个需要易性的病人,都经过了长时期的考察,即使病人上了手术台,他还要对病人说,你可以对自己的决定作最后的核对,如果不愿做了,还可以立即走下手术台,决不勉强。何教授曾为一个 27 岁的男青年做男变女的手术,这个病人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困在男性躯体中的女人。他来自一个有五个女

儿和四个儿子的大家庭,是一对双胞胎的另一半。他的双胞胎哥哥对自己的身分很认同,很安适,但他却坚持认为自己错投了人生,他本是一个女孩子。当这位双胞胎弟弟坚持要做变性手术时,全家都惊呆了。他母亲尤其不能接受她那漂亮的儿子将要成为女儿的事实。经过艰难的思想斗争,这个家庭最后同意他的选择。但是,当何教授准备为他进行手术时,病人已上了手术台时,这个家庭突然拍来了一份电报说,他的母亲已改变了主意,不同意为儿子做变性手术,要求手术立即停下来。但是,最后那位母亲心软了,又同意实施手术。当这个病人在实施手术后,躺在床上说,我虽然吃了很多苦头,但我感到很幸福,而且“不能比现在更幸福了”。何教授感慨地说:“对一位易性病人来说,究竟要不要做手术,的确需要三思而后行,一思不够,再思也不够,而要三思才行,来不得半点马虎。”这的确是肺腑之言。

事实上,医院里也的确有这样的易性病人,已申请了易性,医院已为他安排了手术,但在准备上手术台的前一天,却又反悔了。2004年3月底,哈尔滨市有个小伙子,名叫张东辉,他一心想当女模特,来到沈阳求医欲做变性手术。沈阳市的一家医院答应为他做手术,并安排好了医生。但是,在准备做手术的前一天,张东辉却神秘地“失踪”了。事后,当地一家报纸报道了此事,“失踪”了5天的张东辉看到报道后跑到报社,向沈阳市的这家整形美容外科医院公开道歉。至于为什么要“不辞而别”,他表示:“为什么走了我不想说”。若是沈阳市这家医院为张某做了男变女的易性手术,那麻烦就大了。

作为一个医生,何教授对于给病人去掉身体的一个健康自然的部分,然后替换成一个人造的器官,是慎之又慎的。因为这毕竟不是隆胸,不是增高,割掉男性生殖器也不是割阑尾,这是

对性别角色的放弃,它所关联的绝不仅仅是医生的医术,这是精神矫正的手术。“每当我施行一个手术时,感觉就像心理折磨。但是,当我想到我的病人正在遭受着痛苦时,我就不停地对自己说我正在医治他们的病痛并拯救他们的生命。”何教授又说,“但是不管我作出多大的努力,我都不能创造出切掉的那些器官——一样好的新的生殖器官。”

变性手术呼唤法治

我们生活在一个法制社会里。做变性手术,也要有法律规范。但是,现在,在变性手术这个领域里,可以说是无法可依。没有法律说禁止做变性手术,也没有法律说可以做变性手术,更没有法律规定什么人可以做变性手术,什么人不可以做变性手术。目前变性手术在国内还未正式成为公开的医疗技术加以推广,我国卫生主管部门尚未制定变性手术的相关规范和标准。希望有关部门尽早制定相关的规范和标准,同时通过严格的考核在全国范围内选定数家人才、技术、设备达标的医院,作为变性手术的定点医院。

做了变性手术后,过了几年,当事人要反悔,说当时是误诊,打起了官司,医生的权益如何得到法律的保证,等等,都应当有法可依。何清濂教授强烈呼吁变性手术要加强法治。他指出:“相关法律应该指定专门医院、医生做变性手术,对他们进行技术考核,合格的颁发许可证;不合格的,严禁做变性手术,并且确定变性病的治疗原则,即谁治疗,谁负责。同时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对变性手术过程出现的事故,有监督、调查的权利。那些在手术过程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变性病患者,可以到监督机构

去投诉,监督机构对患者有主持公道和保密的义务。”

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2003年7月2日日本参议院一致通过了《性同一性障碍者性别特例法案》,今后对于那些在心理和身体上性别不一致的性同一性障碍者来说,将可以根据此特例法案在户籍上对性别进行更改。该法案规定,被诊断为性同一性障碍者在满足以下四点:一,20岁以上;二,未结婚;三,没有子女;四,因变性手术而没生殖能力,可以由家庭法院裁决对户籍上的性别进行变更。用法律方式把易性手术的条件固定下来,则是有法可依了。

何清濂多年来一直呼吁社会给予变性手术一个存在空间。他言辞恳切地说:“有关部门该出手管管了,别让好不容易才发展起来的我国变性手术事业走向歧途。”何教授还说:“易性病是一种心理障碍疾病,治疗方向在于通过心理治疗和行为纠正,使患者认识到顺应自己的天然性别,也能很好地生活下去。对那些病史长,症状典型,已严重影响生活乃至生命者,才考虑实施变性手术,医生是治病救人的,你活不下去了,我才有义务救助你。一定要排除那些一时冲动,或别有用心患者的变性要求。”“我总是劝他们不要轻易做手术,假如有其他方式可以过幸福的生活的话。”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周振想教授对时下变性手术的不规范,也提出了他的见解。他认为,中国的法律在变性手术方面确实存在一个盲区,现在整容、变性等特殊医疗行为确实有市场需要,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市场。“为了避免和减少不法分子借此机会钻空子、逃避法律责任,的确应该有相关的法律措施出台,来规范患者和医院的行为。”中国也应该通过相关的法律,规范变性手

术的行为,这样做了,也能大大减少有关的医疗纠纷。

目前,在我国의 各大城市里,变性手术已普遍实施。这对做手术的医生的道德规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变性手术的医生不同于其他整形美容外科医生,因为他不仅应具备整形美容外科的全面技术和原则,同时还要求具备优良的学术作风和心理学、性心理学、性别自认障碍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伦理学、相关的法学、生殖医学和社会学等相关联的跨学科知识。做变性手术本身并代表不了医生的技术高超,论经济收入远不如做整形美容外科的医生,论知名度也比不上做显微外科专家。如果在这些方面没有足够的修养,那就会在手术中不断制造麻烦,而医疗事故和医疗纠纷也将层出不穷。

专家学者们还认为,变性手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项“高精尖”的技术。现有的外科技术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变性,只能做到形似。医学界对易性病的诊断、易性病人的心理疏导等问题还没有统一标准,医生轻率地对易性病人选择手术治疗是不恰当的。目前医学界对变性手术做的只是临床探索研究,不宜在公众媒体大肆宣扬,更不能为了获取商业利益把变性当作题材炒作。目前由于一些医疗机构和媒体对变性手术的大肆炒作,致使一些人受到了暗示,强化了变性冲动,会产生不良后果。南京脑科医院医学心理科李箕君副教授也指出,变性手术犹如一把双刃剑,不是解决易性病的惟一方法,无法解决手术带来的心理问题,手术后必须接受长时间的心理治疗恢复社会功能。还有的人做了变性手术后面临社会的巨大压力,成为自杀的高危人群,所以选择做变性手术须慎之又慎。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些医院为了多赚钱,不惜扩大对变性的宣传。有些媒体对变性人乐此不疲的关注固然是为吸引读

者,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一些医院同样在变性手术上不遗余力的宣传和暗示,误导着公众的视线,同时也迎合着媒体的需要。南京一家医院的心理医师指出,从医院对外宣传的用词方式可以看出,医院在变性手术上宣传自身的用意,炒作的成分大于医疗技术本身。许多医院实施变性手术目的就是为了宣传,有的医院宣称可免费为患者做变性手术,其目的就是引起媒体的关注,为了扩大医院的知名度。这样做的结果,对易性病人来说,也可能是一种误导,贻害无穷。

何教授开设了一家网站

互联网的出现,为易性病人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人们可以在网上交流关于治疗易性病的各种信息。一位年轻的易性病人向何教授提出了一个建议:能不能建立一个自己的网站?何教授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2002年3月,他在新浪网上建立了一个“何氏性别再赋整形整容网”。这个网站内容丰富多彩,有变性专题、治疗范围、相关报道、就诊指南,还有介绍医务人员的“关于我们”,网友们有哪些问题,可以通过互联网得到回音。鼠标轻轻一点,许多难题便迎刃而解。

这个网站建立后,何教授收到了大批电子信件。在全国的易性病网友中,它享有极高的声誉,点击率在同类网站中居于首位。何教授在对易性病患者的电子信件回复中,特别提醒患者:发现自己患了易性病后,应当如何求医,切不可操之过急,不要上五花八门的广告骗子的当。

他还在网上发表了一封“致易性病患者的公开信”,其中有言:

本网站自2002年3月开通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密切关注,每天有大量的咨询电子邮件。许多患者求治的心情十分迫切,而所述病史又过于简单。由于易性病的诊断是一个非常周密细致、慎重的过程,需要详细了解患者的病情,单凭几封简单的电子邮件是无法做出诊断的,也不符合我们的治疗宗旨——治病救人、使人幸福。况且有些问题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的,所以请各位患者用书信的方式将自己的详细病史写明寄来,供诊断研究,必要时尚需面谈。

来信内容包括姓名、年龄、性别、职业、学历、经历、父母兄弟姐妹情况,从小到大的病情……地址、邮编一定要写得很清楚。

祝

好!

何清濂

2002.7.12

又及:具体联系地址见本网站(www.srschina.com)就诊指南。

11

第十一章

[易性人结婚,怪也不怪?]

易性病人能不能结婚?在易性手术获得成功后,这个问题便顺理成章地提出来了。因为这是易性病人的正常的生理需求之一。

从1990年8月何教授成功地完成了中国首例男性转换为女性的手术以来,有人说,中国已有千余人做了变性手术,但何清濂教授认为,保守一点的估计,中国至今最多只有二三百人成功地完全地完成了变性手术。很多是单项切除手术,也算一例变性手术。如:隆乳、喉结切除、平乳、子宫切除,根本没有完成阴道、阴茎再造。但是,不管怎样,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易性病人,概莫能外。有的易性病人在易性之前,已谈起了恋爱,或是由男友或是女友陪同前来做手术。恩爱之情,溢于言表。手术既成,病人已脱离疾病的折磨,便提出结婚要求。别人看起来觉得有点怪,从医学眼光来看,一点也不怪。因为饮食男女,乃是人之本能。男变成了女,或女变成了男,他们成了正常人,他(或她)的性的要求依然存在。满足他(或她)的生理要求,也是人之常情。作为变性人,只要没有危及他人利益,他们可以谈恋爱、可以结婚、可以正常地学习和工作、可以向社会公开表明自身的真实情况而不必担心因此受到伤害,他们既不会受到歧视也不会受到特别的照顾,他们需要的只是和我们日常所见到的任何一个人一样,成为一般权利的享有者和义务的承担者。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易性病人结婚在法律上是否允许?中国人民大学婚姻法专家杨大文教授的回答是:“当人的自然身

份和户籍证明一致的时候,登记结婚在法律上就没有问题。变性人通过变性手术使得自己的自然身份发生了改变,同时他们也通过合法的手续改变了户籍证明上的性别登记,两者只要保持一致,结婚就是正当的。当婚姻主体是一男一女时,他们当然可以结婚。”变性人可以登记结婚,这是人性复归的又次体现。这样的事件以及其背后透露出来的现代精神,会越来越具有普遍性,越来越成为变性人的本能选择。

世界各国的规定不一

不过,关于变性人是否可以结婚的问题,世界各国的规定不一。美国是允许易性病人改变性别后结婚的,泰国、日本等国也是同意易性病人结婚的,但英国比较保守,不允许易性病人结婚。英国法律至今仍有禁止易性人结婚和在“丧偶”后领取养老金的规定。最近,一位英国妇女向法庭提出起诉,由于她的生活伴侣是一位变性人,两人无法合法结为夫妇。这位妇女认为,英国的该项法律规定带有歧视性。欧盟属下的欧洲法院法律专家哈拉沃在2003年6月10日指出,英国的法律规定,有悖于欧盟的法律。

2002年7月11日,这一天,对英国人克里斯廷·古德温来说,是改变她一生的重要日子,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庭判决,古德温是一名真正的女性,她有权以女性身份结婚。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古德温以前是一名卡车司机,从1984年开始,以女性的方式生活,1990年接受了变性手术。但是英国政府按照英国的法律,一直都不承认古德温女性的身份,

拒绝她像其他的妇女那样在 60 岁后领取养老金补助。古德温状告雇主对她进行性骚扰的起诉,也未被法庭接受。因为英国法律判定古德温是一名男性。虽然屡屡受挫,古德温却没有灰心,“她”又向欧洲人权法庭提起了控诉,并最终获胜。法庭判决古德温是一名真正的女性,可以以女性身份结婚。由于欧洲人权法庭并不能凌驾于英国本国法庭之上,因此英国政府和法庭并不理会欧洲人权法庭的判决。但是,这一判决毕竟开了一个先例,在今后的审判中,英国法庭就可以以此作为依据,易性病人实现自己结婚愿望的一天越来越近了。在两年之后,英国上院在 2004 年 2 月 10 日出台了一部新的法律,允许那些饱受性取向混乱之苦的人在法律上更改自己的性别,允许变性人获得新的出生证,并以新的性别结婚。

在此之前,有些做了变性手术的英国人跑到泰国结婚。据 2004 年 2 月 3 日《泰晤士报》报道,两名在泰国做过变性手术的英国男子以女性身份举行了婚礼。26 岁的哈罗威尔是一位来自威尔士的工业设计师,30 岁的考克斯是来自伦敦的一名程序员。他们在泰国南部的旅游胜地普吉的西里罗医院举行了一个泰国和西方风俗结合的婚礼。他们都做了隆乳、去除阴茎和再造阴道的手术。这家医院的院长说:“在婚礼上,他们都哭了,开始他们要求我们为他们举行婚礼,这也是我们首次做这样的事。”这两位英国人敢于开风气之先的行动,同样受到了保守的英国人的瞩目。

在我国,原有的婚姻法并没有易性病人是否可以结婚的规定。于是,易性病人做了手术后可不可以结婚,婚姻是否合法,便成易性后的一个社会问题,也成为他们病愈出院后的一个长时期困扰的心病。

1998年有关部门通知：易性病人结婚的消息今后不要登了！

在1996年前，易性病人的结婚问题，是一个敏感问题，媒体不大好去碰。我在1998年曾为上海一家报纸写过一篇新闻，报道何清濂教授治愈的易性病人中有五人喜结良缘。这无疑是一条可读性的社会新闻，可不可以发表？几经周折，新闻勉强发表了，读者反映也不错，但报社却接到有关领导部门的通知：易性病人结婚的消息今后不要登了！什么道理，不言而喻。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随着更多易性病人的被治愈，也随着国门的进一步打开，人权观念的深入人心，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改变，易性后的男女结婚一事已被悄悄地认可。到1999年8月，在何教授已完成的50例易性手术的病人中，已有18人喜结良缘，其中男性转换成女性者2人，女性转换成男性者16人，已订婚者6人。何教授喜滋滋地拿出一叠照片给我看，新郎新娘的幸福之情，洋溢在照片上。何清濂说，这18对夫妇中的一方，在解除了难以启齿、无法遏制的巨大痛苦后，经当地的民政部门同意，他们都如愿以偿，领到了结婚证。一位曾为人妻的女性，不堪忍受病情的折磨，终于和丈夫离了婚，在完成女变男的性别转换手术后，又和一位姑娘结了婚，成了她的丈夫。另一位男青年也强烈渴望易性，十年前，由一位深深同情他的男友陪同来长征医院，经何清濂教授手术治疗后，妙手回春，后来她和这位男士共结秦晋之好。

有人说，变性人结婚后可能存在很多的问题，如不能生

儿育女等。但是，这不能作为我们剥夺变性人合法权利的依据。

据台湾媒体报道，最近，台湾有一名女变男的变性人打算借精生子，成为岛内首例变性人申请人工生殖案。这对夫妻中的男士不到30岁，其父是岛内颇有名望的企业家。据台湾媒体报道称，身兼台湾妇产科医学会理事长的李茂盛说，站在科学的立场上看，这名男士的染色体其实仍是女性，要为两名“女性”作人工生殖，他心中有些犹豫，要有待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才行事。在上海，已有多对变性人夫妇生下了孩子。据何教授告诉我，18对夫妇婚后的生活均正常，没有服用荷尔蒙一类药物。18对夫妇中有2对夫妇的妻子来沪作了人工授精，因为人工授精的成功概率只有百分之二十，有一位女士曾来沪五次，终于获得成功，各生下一个孩子。吉林那对夫妇还要求何清濂给他们的儿子取个名字，何清濂为他取名“幸生”。还有一对夫妇领养了一个女孩，现已8岁。逢年过节，或出差来沪，这些获得新生的人，总忘不了来电、来访，问候何教授。有机会碰在一起，他们还相约到何教授家做客，感谢他们的“救命恩人”。何清濂教授说：“许多易性人在结婚后正常的生活证明，中国社会已宽容地接受了变性人婚姻的存在。”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上而言，道德应当比法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宽容体现了一种人文化的、符合文明进步定义的精神。在价值取向多样化的社会里，价值评价已不再是过去的两分法模式，在好与坏、先进与落后、公与私等两极行为之间存在着广阔的中间地带。一个成熟健康的社会是不会害怕“另类”存在的。因为如果只有“遗传”而没有“变异”，不允许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对人类生存的帮助，那对于一个社会和一个物种的发展来说都是致命的。

2003 年中国民政部作出新规定：易性病人可以结婚

到了 2003 年初,中国政府对易性病人的政策有了明显的变化,允许易性病人离婚和结婚。据新华社 2003 年 1 月 17 日报道,如果夫妻双方中有一个人做了易性手术,已成为同性的一对夫妻,他们的婚姻关系怎么处理?民政部对此作出明确答复:易性人的结婚登记合法有效,解除婚姻关系参照协议离婚处理。民政部有关方面负责人还举了一个例子:杨某(女)和游某(男)于 1998 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婚后,游某患易性病,并做了性别矫正手术。术后,游某重新办理了女性合法身份证明。身为女性的她,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原婚姻关系。民政部在接到地方请示后,经协商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后答复如下:杨某和游某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时,符合结婚的实质要求和形式要求,结婚登记合法有效。一方在做了易性手术后,如果双方对财产问题没有争议,登记机关可以参照协议离婚处理,离婚的效力自婚姻关系解除之日起算。双方因财产分割发生争议起诉至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在解除当事人婚姻关系的同时,一并解决财产问题。民政部有关负责人指出,这个答复适用于解决所有类似情况。这位负责人同时强调,变性人同我国其他公民一样,有权按照婚姻法与异性自愿登记结婚,这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障碍设置。

到了 2003 年 10 月,随着新《婚姻登记条例》的正式实施,易性病人的结婚则合法化了。新《婚姻登记条例》规定,结婚双方必须是一男一女,变性人只要做了变性手术,并按照新的性别重新办了身份证后,也可以按更新后的性别办理结婚登记,不受歧视。2003 年 9 月 9 日《兰州晨报》率先作了报道:从 2003 年

10月1日起,凡经公安部门批准改变性别身份者,可以申请登记结婚。

这项规定为许多做了易性手术的患者消除了离婚和结婚的禁区,打开了新的幸福生活的大门。许多做了易性手术的病人都勇敢地进行了结婚登记。据2003年12月31日7时报道,四川的一位女变男的男士和自己心爱的女友在民政部门领取了结婚证。29年前,这位名叫阿刚的人以女儿身来到人间,但20多年来,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女人,几乎每天都不由自主地抗拒着与生俱来的生理特性。为了爱情,2003年春天,他决然通过手术改变了性别。2003年5月31日,阿刚出院,他头一次正大光明地走进了男厕所。7月底,阿刚返回老家,凭手术证明更改了身份证和户口簿。办证民警并没有显得意外,只是笑着问了一下做手术的费用。在2003年岁末,阿刚和女友携手来到四川内江的民政部门,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他和苦恋了3年的女友光明正大地步入了神圣的婚姻殿堂。身材娇小的准新娘小莉幸福地依偎在阿刚身旁,脸上浮现出浅浅的微笑。谁也不会想到,一头短发、身材略显削瘦的准新郎阿刚在半年前还是女儿身。

另据《南方都市报》2004年1月13日报道,在深圳,也出现了当地首例变性人成功结婚的新闻。北大深圳医院生殖外科主任朱辉在1月11日收到一个手机短讯:“我们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光明正大地结婚了!”发信人是女性易性症患者阿均(化名),为了爱执意要求做变性手术,成功地变成“男子汉”。在国家民政部门同意变性人结婚后,阿均终于在2004年元旦和苦恋多年的女友领到了结婚证,他也成为深圳首例结婚的易性人。

阿均从易性到结婚,可谓是经历了人生的苦难的历程。她从懂事开始就希望自己能变成男孩。在她遇到女孩小梅后,这

个念头变得强烈起来。1997年,令阿均伤心的是,眼睁睁地看着小梅嫁与他人。但到了2001年,小梅因感情不和与丈夫离婚。其后,阿均和小梅相恋了,但两个女人如何结婚?双方父母都无法接受这个现实。“爱一个人就要让她幸福”,阿均决定变性。2003年,阿均走进了北大深圳医院,如愿以偿地成为一个男人。2004年元旦,阿均和小梅在老家的民政局领到了结婚证。他们决定到一个新的城市去工作,开始新生活。

新华社为章琳结婚发了消息

更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5月1日,新华社为变性人章琳女士结婚发了消息。



首例变性人结婚的消息公开见报

新华社记者刘大江写道：“成都市崇州市听江镇凤凰村2组。一对龙凤烛，三炷高香，烟雾缭绕在一间新盖的贴着红双喜的简陋房子里，38岁的章琳身披白色婚纱，在自愿从南京来主持婚礼的司仪山林的祝福声中，终于成为梦想了30年之久的温柔新娘。5月1日，四川首个变性人婚礼在这个简朴的农家小院里举行。上午8时刚过，尽管下着大雨，附近许多村民都赶来参加这个‘特殊’婚礼。在离新房大约一里远的三岔路口，一乘缀满红绸花的小巧花轿停在路中央，等待迎接新娘章琳。上午10时半，突然鞭炮齐响，锣鼓喧天，新娘在20余名娘家人的簇拥下，照当地人的习俗，被新郎杨启成迎娶回来。”一千多位来宾参加了这场别开生面的婚礼。崇州市听江镇镇政府的领导也参加了他俩的婚礼。

新闻又写道：“章琳原名章士林，四川成都双流彭镇人，从她懂事开始，就觉得自己和别的男孩不一样：安静、内向、害羞，羡慕穿裙子、留长发，讨厌男孩的装扮。24岁时，在家人的一再要求下，章琳非常不情愿地与邻村一名姑娘结婚。不久，他们的女儿出世了，章琳不得不承担起作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但他对夫妻生活一直感到痛苦，觉得自己没办法做一个男人，终于在女儿12岁时，与妻子离了婚。离婚后的章琳在镇上开了一家小理发店，一年多前，杨启成来到店里做学徒，两人一见钟情，由此开始了他们惊世骇俗的恋情。2003年8月，在杨启成的支持下，章琳在成都空军医院做了变性手术，实现了做一名女人的愿望。并在2004年3月经公安部门批准，更改了身份证上的性别，领到了女性身份证；之后，又经民政部门批准，她和杨启成顺利地领取了结婚证书。”

新闻写得很生动，简洁而有味。这是中国几百个做了变性

手术的变性人中的一个镜头。但是,这个镜头意味深长。它意味着,中国的变性人的生活从此展开了新的一页。新闻中“四川变性人首个婚礼”的提法,也是比较确切的。因为在这个新闻发表之前,已有数十位做了变性手术的病人,在出院后结了婚。截至2005年3月,何教授已完成变性手术154例,已有75人喜结良缘,已近他完成手术的病人的半数。其中有6位变性人的妻子经人工授精后生了孩子,巧得很,正好是三男三女。这里更值得一提的是,变性人第一例结婚者,他们的孩子现已10岁,读小学五年级。第二例结婚者,妻子经人工授精生下的女孩,也已9岁。不过,因囿于世俗观念的影响,过去这些结婚和生孩子的消息只在私下流传,未作公开报道。

四川这则新闻的重要意义在于,变性人章琳敢于进一步打破世俗观念的羁绊,勇敢地向它提出了挑战,人们对变性人的看法,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报道阿刚和新娘小莉结婚新闻的同时,还发表了经过技术处理的两人的登记结婚的合影,向社会公开了自己的“秘密”。这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中国人观念的一大变化,做了变性手术,不再是难以启齿的见不得人的丑事,人们也不再用好奇的目光注视他们,更不会认为他们的结婚是荒唐之举。在与传统医学及社会伦理观念的剧烈冲撞中,中国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变性人持理解、宽容态度,并将他们接纳于社会群体中。一位在婚礼现场的潘姓大娘发表评论道:“新娘子以前是男人,但现在已动了手术,变成女人,我就当她是女的。”末了,她还反问记者:“我怎么会当她是怪物呢?她跟我们一样,也是人呀!”一位中国农村的老大娘对变性人结婚的看法,可以说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中国百姓对变性人看法的变化,可见尊重人权的观念正在深入人心。

在众人的祝福中,章琳告诉记者:“今天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她能成为梦寐以求的‘美丽新娘’,靠的是她和爱人的彼此信任和巨大勇气,还有来自社会各界的精神、物质的无私支持。”关于变性人结婚,当今社会是否认同,2004年5月12日网易新闻论坛曾作过一个社会调查,大部分网民对变性人结婚事采取宽容的态度:“这样一来,也许对他们的身心较好。”“社会是一个能够海纳百川的整体,正因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才会显得多姿多彩。我觉得只要变性人做完手术按正常手续去公安机关办理登记后,就是一名真正男人(或女人),应该享有自由结婚的权利。”“社会在进步,个性在展示,人类应有更多的包容心。只要没有危害社会,都是允许的。他们也是有特殊的原因,自身存在痛苦,需要社会包容他们。”“这是一个尊重个人选择的时代。”一对满头白发的夫妇说:“况且,变性人他们本身没有过错,是上天在犯错误。”但是,也仍有一些网友对此持不赞成的态度:“变性已是怪,再结婚是怪上加怪。”

下面,让我们对近年来中国变性病人的婚姻状况,作一些具体扫描。

“女强人”变成了“男强人”

有的读者也许要问:一方是变性人,另一方为正常人,他们婚后的生活情况怎样?

黑龙江省有一位小学校长,原是女性,32岁,工作很有魄力,有“女强人”的称号,工作肯吃苦,又有魄力,但从小就期盼易性。经何教授成功完成女变男的手术后,“女强人”变成了“男强人”,重新回到学校的领导岗位上,工作更加意气风发,他

一天也没有休息过。这个小学的老师都知道他到上海完成了易性手术,纷纷向他祝贺。同事们在工作上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在他的领导下,学校取得了地区第一名,他本人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这位小学校长在2001年10月6日和一位小学教师结了婚。妻子长得很漂亮,人人都夸他找到了一位好妻子。当时按照东北的风俗举行了隆重而热闹的结婚典礼,新人双方的父母亲和兄弟姐妹都远道赶来参加他们的婚礼,并为他们的未来生活祝福。小学校长在411医院治病时结识的一位男变女的姑娘,也特意从上海赶到辽阳为他的未婚妻做伴娘,使这对新婚夫妇特别感动。他的妻子在生活上和工作上给了他巨大的支持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使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校的领导工作中去,鼓励他克服各种困难,终于使他事业有成。

婚后不久,他给何教授写了一封长信,在汇报了工作上取得的成就和幸福的生活后,他充满真情地写道:“何爸,我特别怀念和您在一起的日子。在您的身边,心中就有了依靠。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帮助我调整了心态,教育我怎样做人。您慈父般的关怀和谆谆教导,时刻在我的耳边回响。是您,圆了我们的梦,让我们重新找回了失落的自我,鼓励我们好好工作,给了我们幸福的生活。”

“晓晨”的婚礼

36岁男变女的变性人晓晨,于2005年4月28日,和她的丈夫在临安举行了一场简朴而隆重的婚礼。

这是我写作本书收集到的最新信息。据当天的《都市快

报》报道,晓晨前35年,身份证上的名字一直写着於昌两字,男性。“晓晨”是她在易性后给自己取的名字。2004年6月,她在上海实现了多年的梦想——易性。1个月后,她拿着医疗证明,在临安市的派出所换身份证,并给自己取了这个名字。她说:“晓”是给她做手术的医生名字里的一个字;“晨”是她希望自己的人生,像每天的清晨一样,有个新的开始。“晓晨”的婚礼,同样也预示着他们今后的生活,也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霞光万道,充满了活力和生机。

《都市快报》记者何欣采访了这位做完变性手术的新娘。他写道,於昌的少年时代并没有给他留下愉快的回忆。12岁那年,父母离异,於昌跟了父亲,但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多数时候,他还是和母亲及4个哥哥姐姐一起生活。进入青春期,於昌开始隐隐发觉自己和别的男孩有些不同:一点不喜欢女孩,却对男孩情有独钟。这种感觉越来越强,以至于日常生活中,他自然显露的都是女孩才有的神情作态。21岁那年,於昌从邻居那里看到一张《文汇报》,上面介绍了国内首个变性人手术的报道。於昌开始坚信自己原本就是一个女孩,并萌生改变性别的想法。

2004年6月17日上午9时,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於昌躺在上海一所医院病床上,接受手术前的全身麻醉。似乎只是睡了一觉,清醒过来觉得疼痛无比。於昌变成了晓晨,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虽然很疼,但心里是快乐的……”

从上海做完手术回来,她正式以女人的身份外出打工,在一家建筑工地帮厨。老公是工地上的泥工,他们经人介绍认识。老公小她两岁,知道真实情况后,还是接受了她。他们很快确定了关系。婚礼的化妆、服装、场地等等一切,都是临安市当地一家商家赞助的。准新郎在屋里躺着,一只母鸡跳到了床上,一件

雪白的衬衫挂在床头——这是她特意给老公买的。

新娘晓晨此时此地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愉快也有隐忧。她说,能穿上婚纱,真的觉得开心,但也隐隐有些忧虑:婚礼肯定会有很多媒体来采访,自己早已经习惯,但老公却是个性格内向的人,过于张扬可能让他心里不好过。还有一点就是,他们注定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而老公的父母现在还不知情,一直盼她赶紧生一个。不过,这不要紧,可以领养一个孩子,也能给新生活带来温馨和幸福。

M 国作家找了一位中国妻子

另有一位 M 国作家来上海完成易性手术并结婚的故事,也是颇有兴味的。

M 国作家本是一位女性,个子不高,脸长得白白的,眼睛凹下去,长得像中国的广东人一样。她不幸也患了易性病,自信是个男人,到了 35 岁,还未能结婚。她所在的国家不能做易性手术,于是她决定到中国就医。她通过媒体报道得知,上海有位名医,叫何清濂,能成功地做女变男的手术,她便申请到中国南方某大学留学,专学中文,先读书,后求医,一年后,她已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于是抽时间到上海来治病。

2002 年 5 月初,她来到上海 411 医院,拜见了何教授,恳求何教授妙手回春。因为是外国人,何教授格外慎重。留下了她的通讯地址,通过信件交往和直接谈话,观察了她五个多月,确诊她是一名易性病患者。这位 M 国作家又送来了护照和该国政府的相关证明材料,何教授于 2002 年 10 月底分三次为她做了女变男的手术,手术很成功,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2003 年 1

月她变成他,病愈后高高兴兴地出院了。

但是,他在回国修改身份证的性别时,却遇到了大麻烦。该国法律规定,修改身份证明需要法院认定。这位作家被请到了作家的出生地的法院,几名法官团团围住了作家,当场检验了作家的易性成果,惊讶得嘴都合不拢来,女变男,人造阴茎,几可乱真,法官们未曾见过。他们交头接耳,大惊失色。这位作家是该国作易性手术的第一人。法官严正问道:“手术是在哪里做的?”作家回答说:“在上海,由被誉为‘中国变性手术之父’的何清濂教授亲手做的。”法官不信,要他起誓:担保自己所说的全是真话,作家照办了,并到该市的中央医院作了鉴定,还要求由上海411医院出具做手术的证明。作家又照办了,证明送去后,作家又请该国著名的律师为自己的合法权利作辩护。现在,法院已把此事报送国家最高法院认定,至今尚未有结论。作家还在苦苦等待。

M国作家从411医院出院后,和他就读的大学的一位中国姑娘谈起了恋爱。恋爱升温很快,不到半年时间,就讨论婚嫁事宜。去年5月,作家要到这位湖北姑娘的老家去相亲。女方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父母亲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对未来的女婿的要求很高。在去湖北拜见未来的丈人之前,M国作家向何教授讨教:易性后胡子还没有长出来,阳刚之气不足,怎么办?何教授建议作家多晒太阳,多运动,也可以适当地服一点药。作家又问:中国准女婿上门,应当注意哪几个问题,何教授又一一作指点。这位亚裔准女婿上门,言行举止,颇为得体,人又长得眉清目秀,经济情况更是不错。虽是女变男,却也别具另一种风韵。经过几天的交谈接触,姑娘的老爸老妈说了声“OK!”,认可了这门涉外婚事。去年上半年,M国作家和中国姑娘回湖北

老家结了婚。结婚那天,喜酒办了三十几桌,此事在当地成了一个特大的社会新闻。当地的一些头面人物听说这位姑娘在上海找了一位洋女婿,而且是位外国作家,人们纷至沓来,出席婚礼,一睹洋女婿的风采。

但遗憾的是,因为 M 国作家的身份尚未认定,身份证和护照上的身份还没有改定。为此,妻子暂时不能回 M 国去拜见公婆。2004 年 2 月 6 日,何教授接到了 M 国作家的来电,说他已向我国政府申请中国国籍,现正在等待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批。若能如愿,获得了双重国籍,就可以和新婚的妻子堂堂正正地回国省亲了。M 国作家有感于该国国情的闭塞,决定要把自己的易性经历,写成一本书出版,以此来唤醒国人,拯救更多的易性病人。我祝愿 M 国作家的努力能获得成功。

对阿楠的祝福

女变男后结婚的故事还有不少。台湾的阿楠的故事也很感人。

阿楠是位台商,自小得了易性病,现已三十多岁。前年上半年,由妹妹陪同,慕名而来到大陆,到某医院做了变性手术,主刀的医生收了 12000 元的一个红包,一瓶法国 XO 的洋酒,另吃请花去了 600 多元,不料这位医院的主刀大夫对女变男手术是刚刚入门,只会做外科的切除手术,为她切除了乳房、子宫和阴道,但阴道并没有剥脱闭锁,乳头又坏死了,待到做第 3 期手术——人造阴茎时,他却束手无策。病人被告知,大夫出国去了。那时的阿楠,真的成了一个不女又不男的人。她气不过,到处告状,

精力费去无数,但无结果。后来听说上海有位70多岁的何清濂教授,能妙手回春,便从外地匆匆赶到上海,求救于何教授。我也在《新民晚报》接待过阿楠,她向我气愤地诉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我十分同情她,并告诉她:你到上海找何教授,是找对了,他一定能帮助你解决问题。

去年下半年,何教授接受了这份“返工活”,为她做了人造阴茎的手术,手术做得极为精致,可以站着小便,也可以像正常男人一样过性生活。他终于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男人。阿楠喜不自胜。他提出要送何教授一大笔钱,何教授婉拒了。何教授说,我治病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图钱。要赚大钱,有的是地方,国外有好几个医院请我去主刀,但我不去,我的病人在中国,中国有几千个病人等待着我去做手术。

阿楠出院后,由他的妹妹陪同回到台湾,一家人欢天喜地,吃了好几天的酒,又到民政部门改了身份证上的性别。不久后,他又到大陆经商,在泰安市找了一位女朋友,人长得漂漂亮亮,伶牙俐齿,工作是导游。他俩决定在2004年1月结婚,打了四五个电话给何清濂,请求他能出席在泰安举行的婚礼。何清濂因忙于照料身边的病人,不能分身前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便写去了一封贺信。2004年1月14日,何教授收到了一大包沉甸甸的喜糖,并附一信:“我终于完成婚姻大事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之情,38年的痛苦和不幸从此灰飞烟灭,不再提起。寄上结婚照和影碟,请您和何妈分享我们的快乐。当然照片给人看看也无所谓,但请勿告诉别人我们的身份——永远。因为人言还是可畏啊!你们的祝福,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再献上喜糖,敬请品尝,随信附上红色请柬,写有您作为主宾的入席标记,以示诚意。”

在2004年母亲节那天,阿楠夫妇还给何教授的妻子楼月芳



何清濂和他的夫人楼月芳教授

教授寄来了一份别出心裁的特制贺卡。这份贺卡的题名为“送给充满爱心的您”。阿楠写道：“何妈：每位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女性；您是何爸身后那位伟大的女性，也是我们大家永远的‘何妈’。”阿楠的妻子丽红则写道：“祝福何妈：何妈何爸长相伴，青山绿水泰安游。节日快乐，满心喜欢。”何清濂收到这两份礼物，是最欣慰的事。2005年5月阿楠夫妇又专程来到上海，一定要补请吃结婚喜酒，并告知妻子经人工授精已妊娠3月，真是喜上加喜，皆大欢喜。

“何爸”当了两回奇特的“月老”

何教授完成了154例易性手术，还有一个出乎意料的收获：

他当了两回奇特的“月下老人”——两对双方都是易性病患者，在他工作的医院里相逢、相识又相爱，终于喜结连理。何教授既治愈了他们生理上的痼疾，又为他们治愈了心理上的毛病。

我在2004年1月上旬到何教授家做客，他拿出一盘录像带放给我看，一看真令人振奋，原来是一对易性病人结婚的现场录像。它引出了一幕新的人间喜剧：

新娘子王云芳（原名王勇），本是一个东北男子汉，但有点名不副实，人长得细细巧巧的，脸上还长着一对好看的酒窝，笑一笑，妩媚动人。不幸的是，他自小患了易性病，自认为是个女性，这个病折磨了他23年，恨不得去死。王云芳原来有个男朋友，算得是个“哥们”，名叫李奋，有硕士学位，人长得很帅，也很同情他的病。千里迢迢，从东北来上海，慕名找到何教授，希望能救王云芳一命。

终于，在新世纪的头一年，王云芳在李奋的陪同下，何教授为王云芳做了男变女的易性手术。出院那天，王云芳欢天喜地地换上了女装，烫了发，涂了口红，乘火车回到了东北老家。两人商量好，再过些时候，等积攒一笔钱，就把婚事办了。

两人在当地开了一家名叫“知味斋”的饮食店。开张那天，当地许多知道内情的人都来了，大家纷纷举杯，为王小姐的饮食店开张而高兴，更为她的易性成功表示祝贺，并望她和男朋友李奋早日结婚。

饮食店开张后，因为王云芳人长得漂亮，里里外外是一把好手，李奋也精明强干，菜肴的质量很不错，店里的生意红红火火，许多回头客是冲着王云芳的周到服务而来的。两人积了几万元钱，准备在2001年结婚。

可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两人的婚姻节外生枝。李

奋的妈妈是南方人,知道了王云芳的易性经历后,坚决不同意儿子和她结婚,理由说出来很简单:“两个男人怎么好成夫妻”、“他们的爱情是一时冲动”、“将来生不出孩子,李家就断了后”。李奋爱王云芳,又很爱他的母亲,他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如果和未婚妻王云芳结婚,就要和母亲断绝来往;如果顺从母亲的意见,就只得和王云芳分手。非此即彼,水火不容,两者必居其一。李奋无可奈何地选择了后者。两人上演了一出 21 世纪的《孔雀东南飞》,一对相爱多年的恋人,终于痛苦地洒泪而别。

不过,王云芳幸而生活在 21 世纪,新编的《孔雀东南飞》没有继续演下去,她在重新寻找自己的新的幸福生活。她在东北开饮食店时结识了一位钟女士,钟女士的丈夫是当地税务局的局长。家里经济条件不错,老夫妻膝下只有一女,年已 26 岁。钟女士经常到饭店来吃饭,得悉王云芳的变性经历后,不仅没有表示惊讶,而且对她十分同情。原来,钟女士的女儿也患了同样的病,成天寻死觅活,要求做变性手术。钟女士问王云芳:“你有没有办法帮她一把?”王云芳回答她:“我和您女儿见一见面再说。”

男变女的王云芳和钟女士的女儿林月贺见了面。她西装革履,身材高高的,长得挺神气,双肩厚实,有运动员的架势,剃了个平顶头,透出一股男人的刚性,让人懂得什么叫生得英俊。她的变性要求果然十分强烈,说如果不变性,生不如死。她曾到外地做了切除乳房和子宫手术,不过,手术不很高明,最要紧的第三期手术——人造阴茎没有做,现在弄得不男又不女。王云芳告诉她,变了性,人真爽!等于重新做人。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王云芳还告诉她,上海有个“何爸”,现在上海 411 医院当

顾问,他医术好,女变男,中国第一例手术是他做的,人造阴茎全国就数他做得最好。“何爸”人特好,兰州的一位病人到上海找他看病,医药费给小偷偷去了,他送路费一千元给兰州的病人回家。第二年,这位病人又来找他做手术了。林月贺说,天下竟有这样的 好人,无论如何请您给我引见一下,所需多少费用,我家没问题。王云芳说,好啊,易性病人帮易性病人,理所当然,我陪你到上海去一趟。

2002年的春天,王云芳放下了店里的生意,陪林月贺到上海见了“何爸”。何教授认真地听取了林月贺的病史,查看了有关资料,检查了前两期手术情况,又决定接受这个“返工活”。2002年10月14日入院,2003年1月28日出院。五个小时的手术,一举成功,再造了一个男性生殖器,和真的一样。用“恩同再造”这四个字来形容林月贺当时和今后的心情,可谓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王云芳几次来上海陪伴林月贺治病,两人由同病相怜发展到同病相爱。何清濂的病房,成了花前月下的场所。两人共诉衷肠:昨天不变性,活着比死还难受,今朝变了性,好比重新做人。王云芳说,知人知面不容易,知人更要知心;林月贺说,变性人找变性人,海枯石烂不变心。王云芳说,我俩是前世有缘今世有情;林月贺说,今世有情,最后终要成眷属。林月贺说,要天长地久不变心,只有今生今世做夫妻。

出院后,王云芳又伴林月贺去北京做了治疗先天性黄斑病变的手术。从此,两人的精神面貌和几年前判若两人。两人又相约:成婚在手术成功半年后。

但是,在讨论婚嫁的过程时,又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波折,王云芳的母 亲不大赞成这门婚事。他们想,自己的女儿已经是

男变女,再找一位丈夫是女变男,这个家庭太离奇了。天下之大,难道找不到更好的男人了吗?以下是母女俩的一段对话:

母:你自己是“男变女”,再找一个老公是“女变男”,这日子将来怎么过?

女:妈,你不想想,女儿吃过那么多的苦,现在重新做人,不是过得很好吗?我的第一个男朋友李奋的母亲嫌我是变性人,最后割断了我俩的婚事。你难道也想做第二个李奋的母亲吗?

母:妈是为你好。两人都变了性,今后能处一辈子吗?

女:爱是最要紧的。相亲相爱,比什么都要紧。同病相怜,这是爱情的基础,这种基础最牢靠,这种感情将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小林疼我、爱我,比找一个什么大款、硕士生都强。

母:将来不能生孩子怎么办?

女:自己不能生,就领养一个。好好调教,一样胜过亲生。

母:今后的日子靠你们自己去过,想明白了就好。

谈婚论嫁的最后的一道障碍被扫除了。2003年夏天,在王云芳的家乡辽宁,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新郎是“女变男”,新娘是“男变女”,双方的父母亲和亲友们都高高兴兴地出席了这场人间难得一见的婚礼。

证婚人朗声高喊道:“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一对新人在众人的一片喝彩声中,徐徐行礼,众乡亲热烈喝彩和鼓掌。新娘子的确长得很漂亮,不知内情的人,根本看不出新娘子是由男人“变”过来的,而新郎也长得很魁伟。

亲友们都夸奖林月贺有眼力,娶到了一个漂亮而贤惠的妻子。钟女士和她的丈夫更是放下了心口的一块大石头:为女儿——现在的儿子的未来深深地祝福。夫妻俩还把婚礼制成了录像带,留作永久的纪念,并托人把这盘录像带专程送到上海。

他们尊称“何爸”是他们的“月老”。何教授把录像带放给医院的医生和护士,还有病房里的病人们看,大家都分享这份快乐。这个故事,在医院传为美谈。

不堪回首的昨天已经过去,难言之隐的痛苦也已不再。人世间,还有什么能比这样一对夫妻的爱情更动人呢!王云芳和她的丈夫在成婚后,到海口市工作,现在,他俩已买了一辆轿车,两人上下班,都由丈夫开车。林月贺从事文秘工作,妻子做销售工作,收入也很不错,小日子过得自由自在。

又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关于何教授为易性病患者当“月下老人”的动人故事,还有另一个“双胞胎”。

这个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的经历,和王云芳、林月贺的经历类似,也是通过何教授治病救人,在病房里从相识到相爱,有情人终成眷属。

吴木是南京某高校的毕业生,专业是搞土木工程设计的,是位硕士生,人很正派,也很能干——这里补充一句,有不少年轻的易性病患者,因为从小经受磨难,他们都有超常的智慧和才干——吴木个儿虽不高,但意志很坚强。不幸的是,她在十几岁时患了易性病,自信是一个男孩,但每天要穿着女孩子的服装上学,这使她痛苦万分,也曾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进大学后,吴木从报纸上看到上海二军大长征医院的何教授能做女变男的易性手术,她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便下决心在工作后积攒一笔钱,到何教授那里做手术。她在大学里向何清濂发出了求医信。何教授给她回过好几封信,并亲切地接待了这

个不幸的女性。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何教授确诊她是患了典型的易性病,并对她提出建议:“确诊易性病后,最好是及早做手术,而且最好在结婚前完成手术。”吴木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来到上海,请何教授做了女变男的易性手术。手术后,吴木从“她”变成了“他”,成了一个很帅气的男人,身材修长,眉宇间又透出一股英气,精神状态与术前判若两人,人变得越发潇洒。举手投足之间,也表现出一种文化人的儒雅之气。他现在上海一家外资企业里从事设计工作,是科室里的骨干,工作十分出色。

在医院治病期间,一位姑娘闯进了富有才干的吴木的视线。她就是钱和平,一位医科大学的大四学生。原为男性的钱和平也患了易性病,因为信息不灵,几经周折,到深圳做了男变女的手术,虽然变成了女性,但手术不很成功,有漏尿的后遗症,还有一个“讨厌”的喉结没有去掉。仔细看看,又像男人,皮肤也很粗糙,这仍使她觉得美中不足,于是慕名来到上海,求助于何清濂。区区小事,不足挂齿。何教授略施小技,为她切除了喉结,并解决了漏尿问题。

更令钱和平意想不到的,她在医院里竟找到了一位理想的意中人。钱和平在医学院里曾当过节目主持人,风姿绰约,眉目动人,曾是一个活脱脱的现代“贾宝玉”,吸引过不少女性。她在医院里接触了“女变男”的吴木后,吴木的优雅的风度和幽默的谈吐,深深地打动了“男变女”的钱和平。她为吴木的出众才华所倾倒,她主动地向吴木发动了凌厉的攻势。

不过,吴木在医院中对钱和平的求爱,开始并没有太在意。他曾另有所爱。在读大学时,吴木有个很漂亮的女朋友,两人感情很好。但在病房里结识钱和平后,吴木发现,眼前的钱和平有

思想、有能力,更因同病相怜,对生存、对生命、对生活、对未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同是天涯变性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吴木的思想起了变化。他认为,找一个同病相怜的人做年前伴侣,将来的婚姻更为巩固。他感到,易性后结婚,找个伴侣,不仅是满足生理上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志趣相投,事业上有更多的共同语言。钱和平的攻势使吴木的心头感到震颤。他经过反复的比较权衡,他最后最终接受了她的求爱,在病房里,从一见钟情发展到谈婚论嫁,进展的速度之快,令双方都感到有点意外。

吴木所在的单位效益很好,他的个人经济收入不菲。2003年3月,他在浦东买了房子,和钱和平于2003年年底结了婚,婚后夫妻俩十分恩爱。因为吴木经常要出差,钱和平正在一家著名的大学读硕士研究生。两人决定暂时不能要孩子,待钱和平拿到硕士学位,并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后,再考虑领养一个孩子。

这里顺便还要提一下,何清濂在1991年完成的中国第一例女变男的李一妮(在易性前,他曾三次自杀未遂),在三年后也和一位男变女的易性病患者结了婚。我在1995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变性的困惑》一书中,曾详细地描写过李一妮的易性过程。这样,同是易性病患者结为夫妻的故事,有了第三对。这也是殊为难得的一对。

我在2004年春节后遇见何教授,听到这个消息后,想约李一妮一谈,进一步了解他们完婚的故事,但何教授对我说,李一妮对此事的处理很低调,不愿张扬自己的恋爱、结婚过程,更不愿意透露女方的任何情况,因为当地百姓还很难接受一对易性人结婚的现实。他现已易地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并已改换了

名姓,夫妻俩希望平静地生活。我希望李一妮能对本书的读者说几句话。他同意了。他通过何教授告诉关心他的读者:他妻子是一位小学教师,婚后的生活很平静,目前也不打算领养孩子。

“我做爸爸了!”

在何教授的那本用了十多年的工作日记手册上,纪录了两个报喜电话:

1998年8月25日晚7时30分王明德来电:妻子小潘在下午4点,生了个儿子,母子平安。

2002年9月25日晨7时30分洪长江来电:“妻子在清晨4点生了一个女儿,重3000克,我做爸爸了!”

两个电话中提到的做爸爸的主人公,都是经何教授之手完成的女变男的易性病患者。他们出院后不久结了婚。人们不禁要问:易性患者不仅能像常人一样能结婚,还能生儿育女,这是怎么一回事?

何教授坦言,易性病人在完成手术后生育目前尚不可能。因为易性手术并不能将男性的内、外生殖器官原原本本地移植给女性,或将女性的内、外生殖器官丝毫无损地移植给男性,也不能保证双方内外生殖器官的生理功能不受损害。因此,双方直接生儿育女是不可能的,但可以由女方通过人工授精来生育。

上述两位易性病人“我做爸爸了”的喜讯,便是这样来的。

王明德是一位国家公务员,他和妻子潘琴芳恋爱、结婚的故事,也是充满了戏剧性。王明德和潘琴芳是大学里的同学,相好了四年,感情很深。王明德自小就认为自己是一个男性,妈妈买

给她的第一条裙子,就被她偷偷地剪了两个洞。王明德的母亲听说女儿和潘琴芳要好后,坚决反对他们的关系,认为是“同性恋”,王明德提出做易性手术后,和恋人潘琴芳结婚,母亲坚决不同意,以死相逼。王明德的母亲还不断给女儿介绍“男朋友”。王明德为了安慰年迈的母亲,违心地和“男朋友”交往,内心则很痛苦。她经常和潘琴芳抱头痛哭。王明德担心潘琴芳因此会离她而去。潘琴芳则一遍又一遍地对王明德说,我等你,等你做好了易性手术后,我们就结婚。

1996年7月22日,王明德被送进了手术台,从此开始了他的生活的崭新的一页。他又变得有说有笑了。他和妈妈说,现在病治好了,我已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我和小潘的关系,不再是“同性恋”了。让我和小潘结婚吧!妈妈说,一个真女人,一个假男人,怎么养儿女?王明德说,现在科学进步了,可以另想办法。

洪长江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当上了江苏省某市的一位公务员,原是女性,于2001年4月由女朋友张逸陪来,经何教授的妙手,做了女变男的手术。出院后不久就和张逸结了婚,双方的父母亲都赞成这门婚事。他的妻子也是一位医学院的毕业生,因为懂医,对他的易性经历完全理解,并通过人工授精怀了孕,现在一家卫生防疫站工作。妻子十分善良贤惠,洪长江做完手术后,在当地开了一家豆腐店,因为讲究卫生,又注重豆制品的质量,生意很好。

有一天,洪长江从中央电视台七台上看到河南新乡有个老太太做“凉皮”生意的报道后,很受启发,就立即坐了火车去新乡,向那位老太太学习做“凉皮”。学习要交学费,洪长江毫不犹豫地交了学费,学了技术,回来后,又开了一家豆腐店,经营

“凉皮”，也大受欢迎，还请了一位工人帮忙。

在女儿出生前，张逸给何教授写信道：“何爸，这可能是我最近给您写的最后一封信了。因为再过两周我孩子就要出生了。不过我一直在坚持工作，每天仍上班，下班后到小店里转一圈，但已不像以前那样‘事必躬亲’了，在家里，扫地、做饭、洗衣等家务活，仍由自己来做。何爸，尽管我和长江同孩子还没有见过面，可我俩已对孩子充满了感情，充满了爱意。为了孩子，我整整呕吐了四个月；为了孩子，我的臀部因打针成了筛子网眼；为了孩子，我已变得像大象一样笨重，但我心甘情愿。每天早上醒来，我感到孩子的手脚都在动，心里无限欣慰。每天晚上，长江也学会了用听诊器听胎心，和我一起计胎动，那一刻，我感到特别幸福。何爸，等到我的孩子稍微大些，我们一家三口去上海，看望您和何妈妈，以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我们的小店一如既往地忙碌，生意也很好，老顾客没有减少，新顾客不断增加，今年新雇了两名工人，现在他们对操作规程已相当熟悉了，长江也可以从繁忙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正好我也快生了，住院的东西我已准备齐了，装在一只皮箱里，一有情况，就可以提起皮箱就走。”张逸在给何教授的信中还写道：“我给长江买了三份保险：一份是养老险，一份医疗住院险，一份意外事故险，我想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一点儿保障。”

女儿出生后，给一家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一家三口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夫妻俩的体重都增加了二十多斤。女儿长到六个月后，张逸上班了，丈夫则继续经营他的豆腐店。2003年9月的一天，秋高气爽，一家三口去看菊展，拍了好多照片。洪长江选挑了三张，给何教授寄去。八个月的女儿，长得健壮可爱，穿一身红色衣衫，坐在爸爸的肩上，背景是一片怒放的嫩黄

色的菊花,真是人见人爱。

洪长江在给何教授的信中报告说:“店里的生意挺好的。今年黄豆的价格上涨,没办法,豆腐和豆制品的价格也相应上调了一些,总的利润低了点儿,因为每月要还银行的房屋贷款,经济上也有一点压力,但日子还过得去,今年搞了些家庭建设,买了新房,住进了自己的家,逐渐添置了冰箱、洗衣机、空调、饮水机、加湿机,生活质量提高了许多。贷款算不了什么,我们还年轻,怕什么,辛苦一点儿就过去了!”妻子给何教授的信中描述一家的生活道:“女儿已能拍手表示欢迎了,长了两颗牙,能自己站立一会了。把她放进学步车里,她能满屋子追着人跑,高兴时会笑得咯咯出声。每天长江一回家,就伸出小手要他抱,不抱就哭,两个人可亲了。”妻子还希望何教授能给她的丈夫美容一番,最好垫一垫眉,让脸看起来更有棱角一些。

天伦之乐,在这个变性人结婚的家庭中,照样和和美美的,和寻常人家没有什么两样。2005年的春节,一家三口冒着严寒,从北方来到上海何教授家拜年,照了一张祖孙三代全家福,过了个高高兴兴的年。小张说,“还想要个儿子”。

有没有必要实施“男妈妈工程”?

易性手术成功后,易性的男子没有生育能力。医务界有人提出让男人也生孩子,准备启动“男妈妈工程”,并已招募“男妈妈”的志愿者。

此举是否必要?我认为是值得研究的。

所谓“让男人也生孩子”,就是把胚胎放入男人腹腔内的特定部位,随时监测怀孕男性体内的激素水平并补充女性激素,以

完全摹拟女性怀孕时体内的内环境。孕期将满时,对怀孕者施行剖腹产。

这样做,从医学科研上看,作为个案实验一下,似无不可,但它不是一种临床的治疗手段,即使实验取得成功,普遍推广意义不大。我们应对“男妈妈”志愿者的需求作些具体分析。

如是“前卫派”的需求,那就对不起,很难满足。他们本是正常男性,但希望挑战世俗、体验丰富的人生,在我看来,这样的“挑战”,似同四川一名老中医躲进一个玻璃房内绝食四十多天之类一样,作秀意义大于科学实验。女人生孩子,本是天经地义;这种生理规律——并非“世俗”,理应尊重,没有挑战之必要;男人生孩子,如一不是为了治病救人,二不是创造一种科学成果,那是游戏人生,既不值得赞扬,更谈不上支持。如果本来是好端端的男性,却想“体验”女人的生活,品尝一下生儿育女的滋味,则是可笑之极。科技的发展应是造福于人类,而不是去满足前卫派们这种稀奇古怪的需要。

女变男的变性人,如果结了婚,他想要一个孩子,女方完全可以用人工授精的办法,让妻子怀孕,然后顺理成章产下子女,又何必由易了性别的丈夫来代劳?有人患了易性病,而且又呈现一种严重病态,改变性别,乃是不得已而为之,从治病救人出发,做变性手术,是完全必要的,即使有一定的风险,也值得一冒。但对女变男的变性人来说,做女人时不生儿育女,变性为男人,却再来生子,岂非多此一举?

如果是妻子不能或不愿生育,两人又希望拥有亲生的孩子,于是由丈夫代替妻子完成生育儿女的天职,这样做,我看也没有必要。因为男子怀孕,涉及一系列复杂的生理和心理上的问题。男人生孩子,也要经历正常女性母亲所受的痛苦,风险要比女性

高出很多。假如是两性畸形的病人,已定性为男人,那就好好做男人就是了,再冒生孩子的大风险,也不值得。再者,即使女方不能生育,需要是借腹生子,又何必去找男性一试?

如果是男性独身或者同性恋者,想试一下做爸爸的“快乐”,这也为中国的法律、伦理和道德所不容,将带来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如该男子生下孩子,他究竟是孩子的爸爸,还是孩子的妈妈?他所生下的孩子的适应期将是长期的,因为绝大多数人是妈妈生的,他的孩子将会成为别人眼里的“另类”。长大了,他们的心理压力将是空前巨大的。这样一来,又有鼓励同性恋之嫌,在目前的条件下,没有这种必要。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研究员葛晨虹指出:“如果是用治疗手段去满足得到孩子的愿望,那么是可取的,但要是普遍放开就要慎重考虑人种的繁殖、发展走向。毕竟女性怀胎是人类有史以来的自然法则。即使是技术成熟后,还有一个社会理性的接受问题。‘男妈妈’将给两性、家庭、父母和子女的情感关系造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这位专家的意见,应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因此,“男妈妈工程”,在目前情况下,似宜暂缓启动。

四位护士的爱情故事

医院整形外科病房里的爱情故事真不少。爱情的火焰不仅在住院的易性病人之间燃烧,而且也在整形外科内护士和病人之间燃烧。从21世纪以来的四年期间,在何教授供职的那家医院里,每年都有一位护士和住院的易性病人谈起了恋爱。病人出院了,护士也随之跟着去了。医生们开玩笑说,我们的护士成

了爱河里的鱼,每年都要被病人“钓”去一条。

周捷是河北人,从事药品的销售工作,生意做得不错。人长得高头大马,有一股北方男子的英武之气,但变性的苦恼长期困扰着她。2000年初,她来医院做了女变男的手术。在病房里,她结识了护士A。

A是安徽人,是合同制护士,在当地的护士学习班毕业后,到上海来找到这份工作,已有一年多时间。她人长得很秀气,身段好,脸生得标致,又很文静,工作认真负责,对易性病人的病情很理解,病人对她的服务赞不绝口。在周捷住院期间,A同样给予她无微不至的照顾,端茶送水,打针服药,清理伤口,换药喂饭,可以说是一丝不苟,使周捷十分感动。她想,我长到那么大,还没有一个人这么疼我呢!心里动了情。周捷做完易性手术之后,有了他的男儿身。在A眼里,周捷既有男子汉的气魄,又有女性的细心和温情,悄悄地,A和周捷之间燃起了爱情的火花。周捷出院了,A护士也向院方提出了辞职的请求。事后人们才知道,A护士已随周捷回到了河北的老家,是否成婚,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第二位和护士谈起恋爱的是方亚男。她确实是名副其实的亚男,身高1·8米,身材魁梧,理一个平顶头,一副英俊挺拔的样子,她的能力也很强,到哪一个单位,都受到领导的器重,她又是苏州人,说一口评弹里才听得到的软糯的苏州话,风趣幽默,出口成章,女孩子都会喜欢她。她又是一家著名大学计算机系的高材生。毕业后,在一家外资公司任职,做的是电脑程序的编辑工作,收入不菲。方亚男在住院时,也被护士B的周到而细致的服务所打动。

护士B的长相平平,个头也不高,但人很聪明,有主见,护

理工作有条不紊,动作利索,滴水不漏。方亚男主动向护士 B 发动了爱情攻势,但 B 知道易性病人没有生儿育女的能力,因而对方亚男的求爱迟疑再三,但方亚男认定 B 是个有出息的女孩子,锲而不舍。B 征求何教授的意见,何教授劝她自己拿主意。一个半月后,方亚男出院了,两人的关系仍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

出院后,方亚男回到苏州的外资企业,继续做他的电脑程序工作。有意思的是,他的顶头上司——主管,也是一个未婚的女孩子,一直对方亚男很关心。尽管这位主管在本单位很有人缘,追求她的人也不少,人长得很漂亮,心直口快,她多次对方亚男暗示:“妈妈说过,谁如果做她的女婿,送一套房子。一辆车,外加现金 50 万元。”可是,方亚男没有动心,从事电脑程序的人,一旦对爱情形成固定的程序,也是难以改变的。

方亚男主意已定:他要设法把 B 护士娶过来。原因之一是,她知道他的变性经历。他把 B 和女主管作了比较,女主管现在不知道他的变性经历,如果一旦了解真相,事情也许会发生大变化。而 B 对这一切都知情,和他的爱情一旦成功是建筑在比较牢固的基础上。B 是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了悉心的照料,这是他终身难忘的。人不能没有良心,为了报答这种照料,他必须和她结婚。

方亚男把女主管追求他的故事向 B 护士和盘托出。B 护士深深地被打动了,终于允诺了方亚男。现在,为避免别人的闲言碎语,B 护士已离开了医院,到上海另一家医院当护士。她和方亚男约定,再过一段时间,如果条件成熟,就登记结婚。

如果说,前面两位护士和易性病人的恋爱关系,两位护士是被动的,那么,接下去所述另外两位女护士的爱情故事,护士却

是主动的。

C 护士也是一位外地人,到这家医院做护理工作,只有一年时间。她和住院病人吴成亮确立了恋爱关系,则完全是主动的。吴成亮是四川人,原是自贡市的一位幼儿园的教师,人长得小小巧巧的,但在易性之后,却增多了几分儒雅之气,对人很关心。仅举一例,他知道 C 护士喜欢吃四川的一种香辣酱,就经常请家里人买了托人送来。C 被吴成亮的风度和温情迷住了,说什么也要跟他走。吴成亮出院后,不回当地幼儿园做老师,现在上海一家餐馆打工,C 也辞去了护士的工作,另外找了份工作,和吴成亮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和护士 D 谈恋爱的第四位易性病人是赵敏,湖北人。他曾是当地政府机关的公务员,经济条件不错。由“她”变成“他”后,护士 D 也看上了他。赵敏原来有个女朋友,但和 D 相处一段时间后,他选择了 D。现在赵敏留在上海改行做货运工作,收入不错,D 也辞去了医院的工作,随着他一起做货运工作,收入是护士工作的好几倍。现在,他们的心愿是积一笔钱,在上海买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然后结婚。

我问何教授:你做了那么多的易性手术,在医院的医务人员中,有没有男医生看上男变女的病人的?何教授说,至今还没有?我又请教何教授:如何解释医院里先后有四位护士和女变男的病人谈恋爱?

何教授分析原因有三:一是在医院治疗期间护士与病人的接触密切,易产生感情。在易性病人的生活经历中,他们很少得到如此强烈的关爱,对护士的悉心照料,易于产生爱情的火花。二、女变男的男子,往往除有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外,另有一种女性的细致和温情,英俊和潇洒两者融合于一体,这对有些少女来

说,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在浙江的女子越剧中,女小生这个行当,风流倜傥,往往有许多女性的戏迷和追星族,就是这个道理。三、医院中的护士有不少是从外地来沪的,多为未婚姑娘,她们来医院工作后,希望在上海找一个可靠的男子作丈夫,在上海能安个家。在医院里,她们接触人的范围比较窄,而病人是主要的工作对象,也易于在护理工作中产生感情。他们发现有些易性人的经济条件较好,人也不错,一般来说,他们都比较善良,知恩图报。虽然她们知道易性病人已没有生育能力,但现在有些女孩子的生育观念也变了,觉得生不生孩子也无所谓,这也是女护士愿意和女变男者恋爱甚至结婚的原因之一。他们的恋爱关系往往先在地下,出院时转为公开;因为护士和医院的关系是合同制,所以医院一般也不便多加干涉。

这里再摘引 1996 年一位嫁给女变男的易性人为妻的女子,写给何教授的一封来信,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护士愿意嫁给女变男的易性人为妻的问题:

“他在手术的当天,我的心情是复杂多变的。一方面担心他虚弱的身体难以承受这巨大的痛苦,另一方面心情特别激动,一想到我们终于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夫妻,激动的心情是常人所难以理解。也许有人认为我看中他家里的金钱、名利和地位,也许有人会说我是出于某种目的才和他走到了一起,其实都不是。我爱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有男人的外貌、有坚强不屈的男人的性格以及男人的好胜心理,还有生活方面的能力(他的能力比一般男人强上百倍),当然,他的渊博的知识更使我叹服。”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正常女性和易性男人恋爱、结婚的共同的心声。

于是,我对医院中不断有护士随女变男的病人而去的现象,多了几分理解。

性生活是否和谐？

要回答易性病人结婚怪也不怪，另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是易性人婚后的性生活问题。有的读者也许要问，易性病人手术成功后结婚，能不能过正常人的性生活，或者说，他们的性生活是否和谐？

何教授的回答是，那要看手术做得是否成功。

从前述易性手术的方法中可以得知，完成易性手术后的女性，具有女性的阴道和乳房，她们婚后过性生活是没有任何困难的。完成易性后的男性，由于他们具有男性外生殖器，特别是经何清濂教授亲自主刀的女变男手术，再造阴茎外形几可乱真，用股沟皮瓣再造的阴茎，带有阴部外动静脉和髂腹股沟神经，阴茎能充血，增硬有知觉。其功能也和男子阴茎无异，过性生活无任何问题。

何教授告诉我，绝大部分易性病人结婚后有正常的性生活。因为手术后的性器官是用本人的皮肉做成的，有血有肉，与神经中枢的正常连接，性功能得到了恢复。他们（她们）的外生殖器已和正常人接近，内在的性功能也基本恢复正常。但是，尽管做了易性手术的人可以过性生活，不过每个人的性感受的满足程度也是不尽相同的。从已结婚的70余人的情况来看，绝大部分人都有正常的性生活。男变女的，百分之百有性高潮；女变男的，大部分人有性高潮。何教授对他的已婚的“儿女”的婚后生活作了认真细致的调查，从他们的生活情况的汇报中，可以得悉大部分人的婚姻状况是美满的。

据对已婚的十几对易性病患者的私下了解，七八对夫妇对

性生活表示满意,但也有三对夫妇的回答是“一般”,有两对夫妇表示“不理想”。前述那位由“女强人”变为“男强人”的小学校长,曾在婚后一段时间内性生活不很正常,他便向何教授去了一信,向何教授咨询了有关性生活的一些技巧问题,何教授给了他具体的指点,使他克服了一些与别人难以启齿的困惑,现在夫妻的性生活美满和谐,这位小学校长喜不自胜。食色,性也。性是玄妙的,人定胜天。易性病人的性更是深不可测。有位女易性病者说,过去我们结婚一年,以处女膜未破裂而告终。我现在手术后成了他,却很想过性生活,真是怪事。何教授感慨地说:“天下很多事都是无法解释的,行易知难,幸福就行。”

我的手记

何清濂

本文提及的易性病患者还要走漫长的人生之路,为免去他(她)们不必要的麻烦,皆隐去真名。

这是一个隐秘、离奇、令人扼腕叹息的世界。

许多男人和女人,从花甲之年的老翁老妪到十来岁的祖国花朵,从学识渊博的教授到目不识丁的农民,在痛苦、烦恼、绝望中挣扎。他们在医生面前长跪不起,泣不成声:“救救我,我要变性……”

他们得了一种怪病:易性病。什么是易性病?简单地说,就是男人想变成女人,女人想变成男人。

明明是一种病,可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他(她)们却被视作“流氓”、“道德败坏”,甚至受到行政、司法部门的惩处。

医学的进步、社会大环境的宽松,终于给广大易性病患者带来了福音。1990年7月,我完成了我国首例公开亮相的男性变女性的变性手术。1991年10月,我再次大胆突破,完成了我国首例女性变男性的变性手术。

三年来,我接触了大量易性病患者,深入了解了他(她)们的内心世界,并为之震惊!我感到,我有责任把我知道的写出

来,以求得社会对易性病患者的了解、理解、同情和帮助。

我国第一个公开亮相的变性人

美国人马里欧·马丁诺为世界变性手术史写下了重要的一页。1953年,他曾是一位嘴上没毛、乳房高耸、在女性世界中生活了30年之久的修女,通过变性手术成为嗓音洪亮、满脸络腮胡子的男子汉,在人类医学史上树起了一块里程碑,地球上也因此发现了变性人这一新的群体。

揭开我国变性手术史的,则是一位极富勇气的易性病患者,他叫秦惠英。

1990年春季里的一天,一位奇怪的就诊者来到了我的诊室。说他是男人吧,他却长发披肩,一身女装,举止妩媚;说她是女人吧,他却嗓音粗厚,喉结突出。进一步的检查更让我吃惊:此人的男性生殖器官严重残缺,没有睾丸,仅有一小截阴茎。

在我的询问下,这位病人敞开心扉,述说了自己痛苦的病史:

“我叫秦惠英,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今年27岁。在童年时,我是个典型的男孩,整天和小伙伴们野在外面玩。可是进入青春期以后,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内向,不再喜欢和男孩们在一起,却对女孩的艳丽服装产生了兴趣和向往。感到自己应该是个女孩,为自己男性身份而纳闷、痛苦。高中毕业考上复旦大学外语系之后,我的女性化倾向愈益严重,开始外面穿男装,里面穿女装。外语系的师生们都比较新潮,也没人以我为怪。

“1985年毕业分配前夕,北京一家军事科学单位挑中了我。可是我觉得我有想当女孩的病,又喜欢穿女装,不配当军人,就

报名到云南一所大学去当老师。

“一到云南,我便迫不及待地将所有男装及男性用品全部扔掉,买来许多女装及化妆品进行打扮。大学里的同事们认为人各有所好,我又是从大上海来的,又是搞外语的,对我也没什么责怪。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7年圣诞节的晚上。

“那天晚上,我感觉烦躁,在无法自控的状态下,用一片刮胡子刀片割掉了自己的双侧阴囊。当时大量出血,被送医院住了8天。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也觉得很害怕,但当时我不觉得特别疼,心里还充满了胜利的快感。可是,学校认为我‘道德败坏’、‘不宜工作’,将我退回复旦大学重新分配工作。亲朋好友也对我有了看法。

“但我的病却仍在发展。几个月后,痛苦和烦躁又一次驱使我自己动手切除了阴茎,便成了个不男不女的人。不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在扮演的社会角色上,我都忍受着极大的痛苦。请您一定救救我……”

听完秦惠英的诉说,我明白,秦惠英患的是种叫易性病的性变态疾病。

医学辞典对易性病的解释:性别方面的心理变态,患者深信自己是另一性别的人,强烈要求改变其性解剖结构,为此要求做变性手术以使其性解剖结构符合个人信念。

人类对易性病现象的注意和观察古已有之。但是对易性病现象的深入了解和研究,并取得重要进展却是近四十年的事。1964年,著名易性病专家何欧尼格将易性病特征概括为经典性的四点:一、深信自己内在是真正的异性;二、声称自己是异性,但躯体发育并非异性,亦非两性畸形;三、要求医学改变躯体,成为自己所体会的性别;四、希望周围人按其体验到的性别接受

自己。

后来,进一步的研究揭示,男性易性病患者的特征为:外表为男性特征,男性生殖器官完整;他们早在三至四岁时就可出现明显的女孩兴趣和行为,到了青春期及性成熟后,他们企图改变性别而出现自残,受痛苦的折磨而进行自虐性伤害,甚至自杀;为了缓和内心的冲突,他们会偏爱女性打扮;当易性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常极为痛苦,孤僻内向,不喜交际,充满内疚感、悔恨感。

对照来看,秦惠英正是典型的男性易性病患者。

要不要给他做变性手术?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过去,我曾为一位因工伤事故失去阴茎的病人再造阴茎,使这位病人不仅结婚,还生下了一个大胖儿子;我还为一位结婚5年、因先天没有阴道而从无真正性生活的石女重建阴道,使她和丈夫从此拥有了美满的婚姻生活。但像秦惠英这样因患病自残而要做变性手术,我却是第一次碰上,在全国也从未见诸于报道。虽然凭着自己的经验、医技及参照国外文献,我有把握完成这一手术。但这一手术涉及人的社会角色、道德伦理、心理卫生以及社会规范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必须慎之又慎。

我和助手们详细了解、诊断了秦惠英的病史和病症,确认秦惠英不是精神病,也不是同性恋,而是患了严重的心理变态范畴内的易性病。由于其自残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若不及时施行手术,秦惠英可能失去工作和生活能力。同时,秦惠英是独身,改变其性别对社会、家庭和他人均无直接的妨害,因此,我们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出发,决定为秦惠英施行变性手术。

手术于1990年7月25日和8月10日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将残缺的阴茎切除,利用敏感皮肤改造阴部,做成人造阴唇、阴蒂和阴道,尿道改植成女式。第二次又为其做了一对手感柔

软、均匀对称的乳房,同时作了喉结切除手术。尔后,她又在妇产科专家的指导下,进行了激素调整等一系列治疗。至此,在经历了10多年困惑、躁动和痛苦之后,身高1米60、体重50公斤的秦惠英,终于梦想成真,从“他”变成了“她”。同年8月底,她在给我的信中说:“我是幸运的,因为我遇到了您。现在我感觉良好,不再有术前的那种紧张感、烦躁感、忧闷感、凄惶感和对生活、对前途的迷茫、失落、绝望。在我眼里,世界已越来越色彩缤纷,美好又可爱。我对生活对未来充满信心,充满希望!”

据了解,在此之前,我国曾悄然进行过2例变性手术。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手术后两例变性人旋即与医生失去联系,如黄鹤飞去,杳无踪影,连手术效果如何也不得而知。但是,秦惠英却以极大的勇气表示:愿意公开自己的一切,让全社会理解、帮助我以及所有还在受煎熬的易性病患者。由此,秦惠英成了中国首例公开亮相的变性人。

哭泣的灵魂

秦惠英的变性手术经新闻媒介披露后,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也为那些饱受痛苦的易性病患者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一时间,来信来电雪片似的飞往一些以整形外科著称的医院。我们长征医院更成了热点。我一共收到了一千多封信,而且每天还在增加。(作者注:现在何教授共收到了五千多封信)来信的易性病患者遍布全国各省市,包括香港,日本也有患者来信来访。最多的一个患者一共写了40多封信。他们中有教授、研究生、工人、职员、医生、农民、战士,可谓工农商学兵各个行业、各个阶层都有。年龄最大的56岁,最小的才10岁。

“以前我从不敢对人说”——封封信都是宝贵的医学资料；
“救救我”——封封信都是有着血泪史。

刘建军是济南一个公司的推销员，今年33岁。他说：“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女人，从7岁记事起就开始了。起初是偷穿姐姐的花衬衣，模仿女人腔调说话。高中毕业参军时，偷偷买了女式服装，并把一些军裤改成女式，借口外出躲在僻静处换上以满足心理的要求。复员后，变性心理愈益难以控制，常把刚发下来的工资一咬牙买了妇女用品打扮自己。25岁那年，在父母督促下我结婚了，下决心把以前购置的女式服装及化妆品全部扔掉。可是，没过多久，旧病就复发了，乘妻子上班时穿上她的衣服、乳罩，涂上口红，戴上耳环，修剪眉毛，过过瘾。妻子发现后同我大吵大闹，搞得家里鸡犬不宁。……”

王新安是福州一家工厂工人。今年28岁。他说：“自小我就整天和女孩一起玩，跳橡皮筋、织毛衣、裁剪服装等凡是女孩会的活我全会。10年前我进厂工作后，没进过一次男厕所，没进过一次男浴室，不管春夏秋冬都在家里洗澡，尿再急也要憋到家里或无人处去解……”

令人吃惊的是，来信来访的易性病患者中女性占三分之一，且大多正处于妙龄。

杨莹晶是上海一家公司的计算机操作员，今年22岁。她诉说道：“那是在上初一的时候，随着女性月经的来临，我开始羞愧自己是个女性。我讨厌尖细的声音，讨厌女性的外表特征，更讨厌女性特有的月经。到了乳房隆起的时候，我就死命束胸，还尝试过用药物停经，睡觉时用砖头压住双胸但是做不到。万般无奈的我常会在夜深人静之时跪在地上，祈求上帝把我变成男人……”

23岁的刘晖是武汉一所大学的研究生。她说：“我恨父母，为什么生了我一个女儿身，却给了我一个男儿心？我做梦都企望自己是个男人。每当痛苦得不能自拔时，我就用刀一点点地划自己的身体，划得全身伤痕累累……”

更可怕的是，不少易性病患者在痛苦烦恼难以排遣、难以自控的情形下，采取了过激的自杀、自残行为。

河南省25岁的患者洪亮每当看到自己的男性生殖器官就痛恨。1991年春天，他一气之下，用水果刀穿刺睾丸。后因伤口感染住了半个月的医院。1992年4月，山东一位患者在自残时用尖刀刺破阴囊，再用气筒往里打气，结果形成全身性气肿，差点送了命。

据我一年多前的统计，来信要求做变性手术的295人中，有十多人自残，二十多人自杀过。有过自残念头的有44人，自杀念头的有76人。自残、自杀的比例如此之高，为其他疾病所罕见。

可怜天下父母心。有些父母不忍看到孩子在痛苦中被毁掉，急切地向医生求救。

南京一位易性病患者的父母给长征医院的信中说：“昨天，我在报上看到你们成功地做了一例变性手术，顿时感到我们的孩子有救了。我们盼来了救星。我抱着十二万分的激动心情，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

东北一位年轻母亲为其尚年幼的孩子发来求救信：“我有2个女儿，大的12岁，一切正常。小的才10岁，却不同。她喜欢留平头，穿军装，玩枪使棒，与男孩子们结帮拉伙。常常吵着要做男孩。有次看见一个男孩开裆裤里的‘小鸡鸡’伸手就去揪，说要揪下来安在自己身上，揪得对方变了色也不松手。我告诉

她安不上,她很失望,哭着求我:‘妈妈求求您,让我变成男孩吧!我愿干重活,长大当军官……’我们实在无法可想,恳请你们救救我的孩子吧。”

遗憾的是,像这些有文化、有理智,能够理解孩子的痛苦与不幸,体谅孩子苦衷的父母也属少数。更多的家庭则大多对患病的家庭成员加以痛责、谩骂甚至殴打,加深了患者的痛苦。浙江农村24岁患者高贵根来信说,他的亲朋好友都咒骂他,赶他出门,要断绝与他的关系。他在信中说:“前天,堂兄建议父亲把我往死里打。还有人建议在我前脚跨出家门时,家里人找出我的衣服浇上汽油点燃,给我举行一个隆重的葬礼……”

读着这一封封浸透辛酸、血泪的来信来电,搀扶起一个个长跪不起、泣不成声的易性病患者,我们的心震颤了。医生的天职和责任感撞击着我们的胸膛,驱使我们继续探索下去,为易性病患者寻求一条脱离苦海的希望之路。

女变男的难题

1990年底,一个27岁的姑娘,拿着登有我为秦惠英做变性手术消息的报纸,急匆匆从外地来到我们医院,要求变为男人。在以后的岁月里又四次往返行程达2万多里。陪她来的母亲几次下跪,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恳求:“救救我的孩子吧!”

这位名叫李一妮的姑娘是外地一家宾馆的服务员。她从小就像个野小子,喜欢和男孩子一起翻墙爬树。父母发觉她太野,逼她和女孩子一起玩,她却总是欺负别的女孩子。长到十三四岁,她的个性更趋男性化,理男孩头,穿男孩装,踢足球。此时起,她开始萌生一种渴望——将来要成为一名男子汉!随着年

龄的增长,她的这种渴望愈加强烈,内心也更加痛苦。在失控的情形下,她先后3次自杀。第一次服安眠药,昏睡了2天后醒了过来;第二次服降压片,被抢救过来;第三次是切腕,被家人及时发现送医院缝合。但她一直没有断了死的念头,直到像发现救命稻草似的读到了有关我为秦惠英施行变性手术的消息。

我们对李一妮的病情作了细致的研究,认为她已处于一种严重的病态之中,如不及时对她作手术治疗,这个病人将丧失工作能力,甚至会有性命之虞。在李一妮写下手术申请书,并取得父母、单位、居委会、派出所的同意手术的证明之后,我决定为李一妮施行我国首例女变男手术。

女变男的变性手术,较之男变女,要困难得多。这是一种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变性手术。为慎重起见,我决定手术分两步走。第一次手术在1991年10月进行,为李一妮切除了乳房和女性生殖器。手术很顺利,病人的易性病得到了稳定。第二次手术在几个月后进行,我们在李一妮的下腹部制成了一个乒乓球板状的皮瓣,形成阴茎、尿道和阴囊。人造阴茎因有血管神经、血运及其他感觉,几可乱真。通过一定时间的适应期,李一妮现已能站着小便。

李一妮回家后给我来信说:“我现在心里好开心呵。痛苦与死亡已离我远去,我要为新生活去奋斗。虽然会有困难坎坷,但是,严冬已经过去,春天还会远吗……”

最近,我又运用自己创造的阴股沟皮瓣新法,完成了第二例女变男手术。到1994年8月为止,我们共成功完成了12例变性手术,为我国整形外科一个新崛起的分支——变性手术,积累了开创性的珍贵的临床经验。

可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从小心翼翼的试刀到迈入国

际先进水平行列,只用了两三年时间!

变性之后

如愿以偿的秦惠英、李一妮等变性人愉快、兴奋的心情自不待言。但当他们走出医院,以另一种性别角色重返社会之后,社会给他们的,又是怎样一种脸色呢?

秦惠英手术出院后,在复旦大学领导的关心下,住进了一幢女生楼。尽管她是独居一室,但左邻右舍的天然女子们对这位“不速之女”颇有戒心。有几位还去校长室提交“照会”,意欲“驱逐”。校领导含笑答曰:“秦已是女性,不住女生楼,难道住男生楼不成?”

自然,也有胆大的女生三两天接触下来和秦混熟了,倒也相安无事。秦惠英大学同班的一位女生留校任教,常与秦惠英碰面,也不以为忤。让秦惠英最伤心,是家里人认为她给祖宗蒙羞,断绝了和她的关系。

尽管有一份吃香的外语专长,但在手术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秦惠英一直没找到工作。一些原本很需要外语人才的单位,一听其变性人的身份,便避之唯恐不及。后来,上海市政协主席、复旦老校长谢希德闻得此事,伸出援手,方使秦惠英找到了“饭碗”。现在,秦惠英已改姓更名,只有单位领导知道其变性人的身份。

正因为如此,她准备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她这样阐述写书的目的:“让全社会理解我以及所有还在受煎熬的易性病患者。”

再说说其他变性人。李一妮变成男人回家后,同事们纷纷

前来看望他,称赞他“好帅的一个小伙子”。单位领导还允许他报销数千元手术费。李一妮准备待身体完全康复后即去原单位上班。我做的第二例“她”变成“他”后,已与一个姑娘谈起了恋爱。一位男变女的演员变性效果非常好,目前已以女性身份正常演出,并参与了电视剧拍摄,没有人对她的性别提出过质疑。

顺利也罢,坎坷也罢,在易性病患者中,上述几位变性人是幸运儿。但是,这种幸运的概率,绝不会多于一夜暴富的股民。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易性病与其他性偏离症一样,鲜为人知。患者得了这种病羞于启齿,旁观者也难以接受,以至于前些年我国一本医学专著上说我国仅见一例易性病病例。但据国外的研究资料显示,易性病在男性中的发病率为十万分之一,在女性中的发病率为十三万分之一。据此推算,我国易性病患者近一万多人。而在他们之中,接受变性手术获得痊愈的仅数十人。

众多的灵魂在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折磨下呻吟。他们企盼着能够早日解除痛苦,企盼着重塑性别角色,重新开始生活,堂堂正正做人。

云南一位患者哭诉:“目前的痛苦生活已使我无力自拔,变性手术是我唯一的机会和希望了。恳求医生尽快给我手术,如果拒绝的话,你们也许再也听不到一个远在边疆的患者的哭诉了……”

江苏一个26岁的小伙子说得更是辛酸:“如果你们不救我,那我岂不要一辈子在性别的边缘上挣扎?我请求你们可怜可怜我好吗?就像在街上看见一只饿得要死的狗,赏它一口饭让它不死那样,赏我一个我赖以生存的‘性别’好吗?我已经不能适应男人的生活了,却能做个好女人,可我为什么还是男人?”

甘肃一个28岁姑娘从新疆一个边境收容所寄给我一封用铅笔写在卫生纸上的信：“我是一名性转移的女人，有很强烈的变性欲望，到过北京，不给我做变性手术。又到上海找你，你偏偏出差去了。我失望了，看到报纸上说瑞典可以做，我便来到新疆，想偷越国境去瑞典，但被抓了……”

不少患者不断给我写信，多的已有二三十封。东北一位研究生说：“如果你不肯给我手术，我就给您写一辈子的信！”有些患者甚至以死相求：“如果你们不答应，我就来上海找你们，我一定要死在医院里，死在你们面前！”个别患者则把手术费用也寄到医院里来，以为这样就能迫使医生为其手术。

翻阅上千封易性病患者的来信和数十例就诊记录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易性病患者都希望早日手术。因为他们确信，自己只有在做了变性手术后才会幸福。他们遐想着手术后痛苦顿除，烦恼皆消，一切万事如意；想象着手术后新的性别带来的巨大快乐。这种想法令他们激动，令他们陶醉，同时也令他们更加迫不及待地，有时甚至是疯狂地要求做变性手术。

说实话，我很同情他们。他们在苦苦等待着，找寻着能够为他们施行手术的医院，其急切、焦急的心情就像在辽阔无际的茫茫沙漠中，行走得筋疲力尽且已多天滴水未进焦渴难当的旅人，还在又绝望又不甘心寻找着水源。

然而，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我实在是爱莫能助。

做变性手术必须慎之又慎

我个人认为，目前变性手术在我国不宜推广，必须慎之又慎。

难题有三：

不少人一听到易性病就想到同性恋，其实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同性恋患者的特点是在幻想或实际生活中，喜欢与同性个体发生性关系，它是对别人的感觉。而易性病患者的特点是对自己的性别认同产生困扰，它是对自我身心的感觉，并不是一种性关系的方式。但是，从众多的求诊来信中发现，有时候同性恋与易性病有交叉，有时难以判别，这样问题就变得复杂了。此其一。

易性病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原发性易性病是与生俱来的，占一小部分。大多数易性病都属继发性，它是患者受家庭、社会等影响后天产生的。一般来说，对原发性易病患者可以放心施以手术治疗。对于继发性易病患者则最好采取心理治疗或精神分析治疗，同时辅以药物。如贸然施以手术，继发性患者有可能发生后悔。但是，原发性易性病和继发性易性病的界定又颇费思量。此其二。

其三，在西方国家，医疗部门特设有变性咨询机构，由性心理、精神分析、内分泌、泌尿、整形、妇产科和法律等方面的专家组成，对要求变性的患者进行一系列分析、检查、研究，然后再集体决定是否手术。这一系列步骤显然是必需的。但是，目前我国尚无此专门机构，大面积推广变性手术有可能出问题。

因此，我们对变性手术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在通过一系列严格甄别确诊为真正易性病后，患者在手术前必须解决和考虑到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诸如手术后的工作、生活、经济、家庭组成、社会舆论等等。患者还需有适应性准备，如日常生活中试行异性行为及角色1至2年，服用药物以取得心理平衡等。然后患者还需提交各项证明，包括：个人申请、公安部门证明、精

神病院证明、居委会证明、父母兄弟姐妹证明,已婚者还需解决好配偶问题并出具证明。最后再由医院报有关部门审批。

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这样做,为的是促进变性手术这门新兴的、严肃的医学事业健康发展,使真正的易性病患者得到治疗,得到幸福。

正因为严格按照原则办事,我们目前所做的12例变性手术全部成功,12个变性人没有出现任何反常情况,其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与术前判若两人。

我还想说明一下,我们做变性手术和国外搞“人妖”完全是两码事。在某些国家专门挑眉清目秀的男孩,给他们服用药物或手术,变成男不男、女不女的“人妖”,用于色情业赚大钱,这反映的是这些国家的社会阴暗面。而我们对易性病患者做变性手术是为了治病救人。

所以,我建议:是不是可以由国家有关部门出面,拨出一定的经费,组成紧密的或松散的研究机构,加强易性病诊治及变性手术等方面的研究、协调和交流,加强与国际易性病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和沟通,为更多的易性病患者解除痛苦。

让我们分一点爱、分一点同情、分一点理解,给那些易性病患者,给那些在磨难中苦苦挣扎的灵魂!

(新华社记者陆斌整理)

我为什么要做变性手术

秦惠英

“你为什么要做变性手术？”

自1987年底我首次向外界袒露出强烈的变性意向后，不少人这样问过我。正如现代人不能不经常问自己：“我是谁？”我不能不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为什么一定要做变性手术？

我出身于质朴的、不存在任何足以影响儿童性心理畸变因素的农民家庭。

我曾是一个顽童、一个根本不容置疑的男孩子，13岁那年进入男孩子的青春期，第一次的梦遗使我既惊慌又困惑，但不知怎么回事，更多的似乎是一种厌恶。

这种厌恶随着自己性生理的日臻成熟而一天天演变成强烈的憎恶。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这种情绪的嬗变在当时绝对没有受任何文化因素的干扰。

可以认定的是，我当时自觉身体里有一股羡慕女孩的热流在涌动。她们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她们的蝴蝶结、她们的彩裙、她们的娇嗔莺声……我几乎天天做梦，梦中的我总是个漂亮而娇憨的女孩。

从没有一本书或一个人在诱导我去做一个女孩，我这种心

态的产生,就像冬虫夏草一定要长成冬虫夏草、一料香蕈的孢子一定要长成一朵香蕈一样自然、一样无法避免。

每当这种情绪袭来,我就产生无以名状的烦躁、焦虑、沮丧。由于对这种“异性转换症”的绝对无知,我只能千遍万遍地咒骂自己“下流”、“低贱”。然而,一种念头、一种意向、一种思想,无论如何单凭骂是骂不走的。

我只能是孤雁、独鹤,只能远远地离开人群,自初中而高中而大学,我视我的男装如敌忾、如桎梏。

已记不清我曾多少次地诅咒我那时的男性特征,那无用的赘物,完全长错了对象并且从根本上妨碍了我成为女性!正如何清濂教授在对我进行极其严谨的科学研究后所下的结论:“异性转换症患者以穿着异性服装为其形式,以变性为其最终目的……”

一句话,我是一个临床意义上的异性转换症病人,我还年轻,我热爱生命,你不能要求一个人永远“心与身为敌”地生活下去!

我的病好发于春秋两季,只是在冬季缓解些。发病期间往往突然像寄生蟹找不到新居一样极度焦虑骚动、失眠、冷汗淋漓、心悸,事情终于发展到我毫不迟疑地除掉了我那无用的赘物。

但是,自残以后,我的处境并没有改善,相反由于我着女装但身份仍是“男性”,更大的麻烦接踵而来。

由于我的“不男不女”,已记不清遭人多少次侮辱了。

1987年以后的一段历史,就是一段被人唾弃、嘲骂、呵斥和歧视甚至殴打的历史,对我刺激最大的就是1990年清明那天夜里发生的事。那一晚我因投宿旅馆而落入几个工纠队员之手,

他们像捕获了猎物一样亢奋，立即召来附近的派出所人员，不由分说地把我抓了进去。

罪名仅仅因为我穿女装而看上去像男性。

一只手对我浑身乱捏乱摸，另一只手不停地赏我嘴巴，然后认定我是“流氓”，把我一脚踢进铁门槛，工纠队手持警棍看守。

深夜，几个劳动服务队的人忽然闯进来，揪住我朝我脸上吐浓痰！天亮后，一个高个子强令我脱光内裤，乱摸我下身，说是检查，最后以猛击我三拳而告终。

我梦魇似的日子长得没有尽头，我累极了。

要结束这种“不男不女”的状态，要结束这种理论上虽受法律保护而事实上却得不到应有保护的状态，一句话，要让我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享有公民权利而不被追缉、捉拿、盘诘、凌辱的人。

我这可怜的人，除了做变性手术以“定性”之外，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这里让我运用古先贤的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然而，我行我素，终于了却了心愿。

（原载《康复》杂志 1991 年第 3 期）

后 记

结识何清濂教授始于15年前。是时，何教授和他的妻子——长征医院著名眼科专家楼月芳主任为全国一批高年资外科医师传授整形美容之道，我的妻子戴平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领导工作之余，兼从事美学教学，有幸参与讲学。这样，我和何教授就相识了，且过从甚密。长征医院距舍下当时仅一箭之地，何教授有空常到舍下小坐。1990年8月的一个中午，时值盛夏，何教授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他最近完成了一项极有意思的外科手术——男变女，患者是一位大学毕业生，思想开放，你是否有意和他谈谈？我心头一动：此事可否作公开报道？何教授说，这位病人现已痊愈，倘作公开报道，则是全国第一例，但需征得病家同意。我很感激何教授的通风报信。次日，我去长征医院采访秦惠英。她已一副女性打扮，梳髻着裙，但不施脂粉，娇小玲珑，身材、行止均与女性无异，唯发声仍是男声。她很健谈，因为刚从他变成了她，情绪极佳，又得悉我是何教授的好友，便慨然将自己的痛苦与欢欣和盘托出，也不反对作公开报道。此后，我和秦惠英又有几次细谈。秦小姐出院之日，我又请《文汇报》摄影记者徐裕根先生为之摄影留念。秦惠英与护士小姐们手拉着手，依依惜别，情景甚为动人。我写了一则600字的消息，付《文汇报》，不日见报。中国变性手术成功，并公开见报，

史无前例,举国哗然。港、台以及日本的多家报刊竞相转载这则消息,并以此昭示中国进一步走向改革开放。何教授在半年内即收到七百余封来信,忙得不亦乐乎。职业的敏感告诉我,变性手术在中国,是一个值得加以留意的题目。

在写我国首例男变女消息之时,我找来了一批材料研读,包括莫里斯的《变性人自述》和马丁诺的《变性人》两本书。读后有感,看来,中国变性人暂无人著书出版,我是否可以越俎代庖?惜乎当时材料太少。何教授对此表示支持,陆续送来大批病家来信、材料,还约我观看录像资料,参观手术全过程,以及后来收治的12位变性人的情况,及时向我通报,并为我提供了种种采访便利条件。由于舍下离长征医院甚近,只要有变性患者住院,我常利用吃过晚饭后的时间,漫步去医院探视病人,或男或女,均不见外,谈话内容极为广泛,谈易性病之苦,谈变性手术成功之乐,谈着异性服装之快感,谈服药之效应,谈家庭,谈出院,甚至谈性冲动、谈婚嫁。由于我无意于打探病人的隐私,更不以渲染其痛苦为乐事,这十几年来,我采访了几十位要求做变性手术的患者,积累了一批材料,又陆续写了一些报道和通讯,在报刊上发表。于是,我在这群病人之中赢得了信任。他们对我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使我继续获得了不少第一手的材料。虽则如此,由于变性手术在全世界,仍是外科医学的一个年轻分支,外国医学文献为数不多,易性病的确切成因,至今也不甚了了。我则利用业余时间,一直关注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日积月累,有十几斤之多。到2005年5月,何教授共做了154例变性手术,无论数量或质量,水平堪称国内一流。他被誉为“中国变性手术之父”。他的医术医德极为高超,有口皆碑,病人都尊称他为“何爸”。

我从2002年从《新民晚报》退休后,可以少写时文,时间相对多出一些,于是决心把何教授和他的“子女”的故事记录下来,顺便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一下易性病的成因和来龙去脉,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历时6月,终于完稿。此外,还应提到的一点:近十年来,我国对变性手术和对易性病人的政策,有了很大的变化。如允许变性人结婚,允许他们在完成手术后可修改户口和身份证上的性别,这是社会的进步,也为本书的写作、出版提供了方便。

这里还应交代一下:我对整形外科医学是素无研究,对变性手术更是完全的外行。外行谈医,疏漏肤浅之处,恐在所难免。但这个题材的探索,国内少有人涉足,因而不揣冒昧,姑妄一试。

书中涉及的许多患者的姓名、籍贯及工作单位,为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除个别愿意公开者外,余者均隐去或变姓易名,这也是要请读者朋友原谅的。

吴兴人

2005年5月1日劳动节于上海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44CK57qg5q2j5LiK5bid55qE6ZSZ6K+v77ya4oCc5Lit5Zu95Y+Y5oCn5omL5pyv5LmL54i24oCd5L2V5riF5r+C55qE6Z2e5bi46K6w5b+G44CLXzExNDk0NTQ2LnppcA==",
  "filename_decoded": "\u300a\u7ea0\u6b63\u4e0a\u5e1d\u7684\u9519\u8bef\u71a\u201c\u4e2d\u56fd\u53d8\u6027\u624b\u672f\u4e4b\u7236\u201d\u4f55\u6e05\u6fc2\u7684\u975e\u5e38\u8bb0\u5fc6\u300b_11494546.zip",
  "filesize": 32543581,
  "md5": "9556c6ff3149c98d48aadbfd5287ee01",
  "header_md5": "d52951b67f7c8c9db0d5b3e558aa1801",
  "sha1": "fea74447d5e0eac67419ab972e2fac78f3c6f8f0",
  "sha256": "1c8dac1e5fb2a177c8d83bff4d37ac84ddb19eb01d0cfbfa29be262543e9da6e",
  "crc32": 2745854749,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34975186,
  "pdg_dir_name": "\u300a\u7ea0\u6b63\u4e0a\u5e1d\u7684\u9519\u8bef\u71a\u201c\u4e2d\u56fd\u53d8\u6027\u624b\u672f\u4e4b\u7236\u201d\u4f55\u6e05\u6fc2\u7684\u975e\u5e38\u8bb0\u5fc6\u300b_11494546",
  "pdg_main_pages_found": 380,
  "pdg_main_pages_max": 380,
  "total_pages": 393,
  "total_pixels": 146887680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